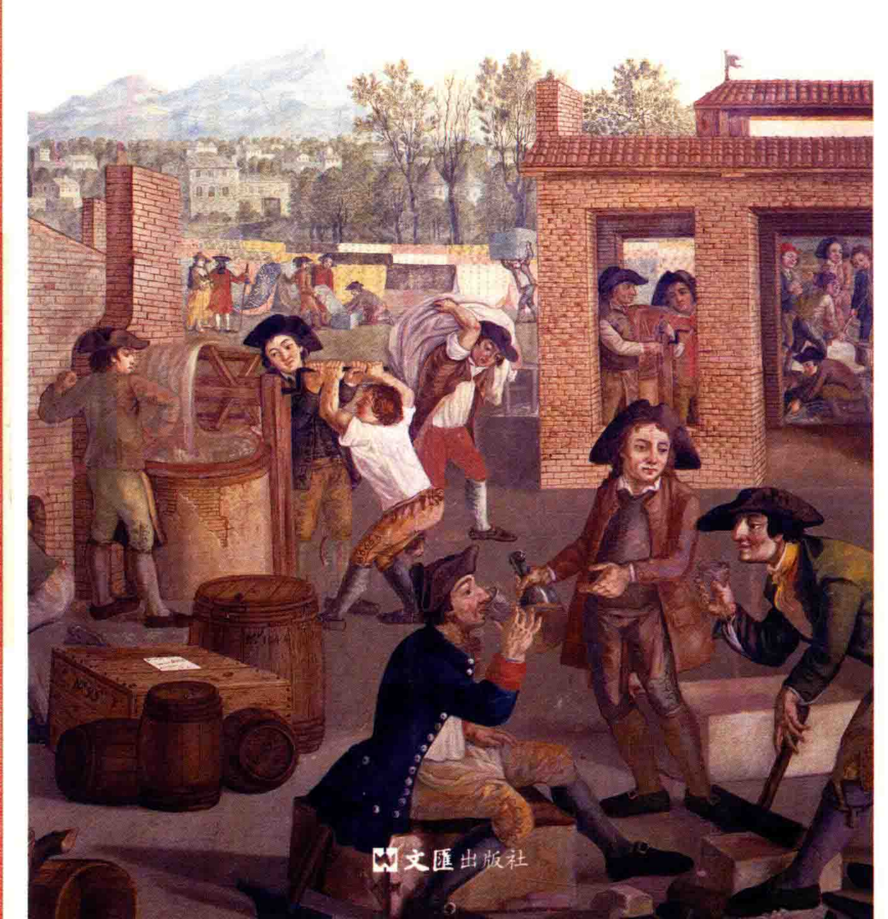
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

〔法〕阿莱特·法尔热 著

陈旻乐 译

Arlette Farge



文匯出版社

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

〔法〕阿莱特·法尔热 著
陈旻乐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法)阿莱特·法尔热著;陈旻乐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496-2103-3

I. ①法… II. ①阿… ②陈… III. ①法国大革命-研究 IV. ① K565.4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5224 号

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
Arlette FARGE

Collection *La Librairie du XXIe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urice Olender

图字 09-2017-286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

作　　者/〔法〕阿莱特·法尔热
译　　者/陈旻乐
策　　划/陈　丰
责任编辑/何　璟
装帧设计/李照祥
出　　版/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发　　行/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010-68423599　邮　　箱/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装订/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920×1270　1/32
印　　张/10.5

ISBN 978-7-5496-2103-3
定　　价/55.00 元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我用自己不曾活过的日子来装点我的生活。

——帕斯卡·基尼亚尔[1]

---

① 帕斯卡·基尼亚尔（1948— ），法国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代表作《秘密生活》《罗马阳台》《游荡的影子》等。（本书脚注为译注，尾注为作者原注。）

前　言

在 18 世纪，轻率的、反抗的、狂怒的抑或辱骂性的言论四起，形势严峻。国王大肆追查，试图把言论囚禁于监狱的高墙之内。于是，它们要么虚耗在警方的审讯记录上，要么被记录在某条关押的命令中。历史学家捕捉到了它们，并声称：它们是有意义的。于是，他们追逐着被追查的言论，并构建起人们所说的“精神实体”。这是最后的陷阱吗？是捕捉过去、充满幻想（总之是诗意的）的历史学家的众多化身之一吗？他们曾经错过了那些言论，但现在，正费力地将它们从故纸堆中摘录出来，希望归还它们被国王夺走的那么多年的自由。

当然，这是个梦想，但也是一种信念。靠近那个时代各种事件的言论发生之地，研究那些流窜于街头巷尾的观点，可以构建出故事的情节。如果没有人用心去收集它们，四散的言论将永远保持沉默。当然收集它们，不是为了给它们建个博物馆，而是透过它们看似无足轻重的外表，去找寻那些或反抗或赞同的深层意味，而这些都是从那些从来没有被征求（亦未授予）过话语权的人们口中迸出的。

完全重现那些无名之辈的批判之辞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很清楚自己时常会遇到言论的缺失。这样的言论是无法复原历史的，尽管研究者努力在原始资料中寻找，希望它们历经

岁月依然鲜活生动，但言论依然是个谜。如今只模模糊糊地确定那些躁动、呼吁和感慨，还有那些秘密对话或公开言论存在过，并且造成一些（有迹可循）的行动，以及历史上无数重要的时刻。有时，沉默的资料中会打开一个缺口，言论被记录下来，通常是因为那些言论引发了公愤或是勇闯某个禁区。这可能是某些忠于职守的警方密探从公共场所打听来的八卦；或者是某些对激烈而颠覆性的运动充满好奇的专栏作者报道的对话；也有可能是被他人检举、被判违法的言论，其始作俑者会遭到追捕；还有那些涂写在墙上的字迹和散落在地的传单上的文字。

整个 18 世纪，言论都折磨着当局。关于这一点，当言论是表达反对意见时，大家都能理解；然而，当它们看起来毫无意义，甚至是在歌功颂德时，当局依然备受折磨，这就很让人吃惊了。“支持的话语”所带来的困扰并不亚于“反对的话语”：这是严重损害君主制最深层的思想之一，按照这一思想，庸俗且易冲动的民众根本就无权妄议时事。万一有什么公共事件必须征得民众的同意，一般也是通过常规的礼仪、节日庆典、宗教仪式或是惩戒性的方式来实现的。

这些言论，对各种好的、不好的事件发表意见，表明客观存在且显而易见的事实：巴黎人民并不盲目地接受他们生活的现状。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对民众恐惧至极的君主政体看来，人们对事件的看法，以及对所见所闻发表的言论，居然毫无意义。我们应该调查这一领域，揭示话语管

控的意义所在。重新收集这些言论并非易事，因为它们已经分散在不计其数的资料中，可是一旦找到，就可以提出各种相关的问题：它们的历史、存在的理由、话语的动机以及随着时代与事件而形成的不同转变。18 世纪正如其他世纪一样，充斥着谣言。这是一个特例吗？可以说这是公众舆论或是某些政治立场的表达吗？这个提问是很大胆的，可能给人抓住时代错误的把柄，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男男女女都是国王的臣民而非政治主体。然而，这也是最实在的问题，不是为了再次找寻世纪末那场奠基性事件——法国大革命——的根源，而是为了将言论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运动之中。表达出来的言论与广泛传播的舆论，在言与行的间隙中产生距离、制造歧义并且组织起某些新事物。故而，要在它们产生的地点以及它们涌现的中心牢牢地掌握它们，这样我们才可以读到："新事物的形成，福柯所说的'时事'出现了。"[1]

18 世纪的时事是由一介草民在炽热的公共空间发出的、经常被惩戒的言论构成的。我们都知道，小说家们喜爱这些生动的言语，以此表现不为人所知的悲剧或卑微的放弃。我们知道他们想通过对话的艺术让人认知这一"鲜活的实体"，尽管艺术从来就不能改变实体[2]。把这美好的任务留给他们去完成吧。而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努力剖析话语以提取其意义，他们特别渴望为那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俗事命名，那些日常的言论往往一说出口就消失了。但就是它们，插入原先密不可分的时代之间。这个插入的空隙产生了时事。应该这样说："他曾为粗鄙的话语困扰，他必须把它们说出来……"[3]

导 论

本书的写作受到一本经典著作的启发，即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1]，同时建立在某些历史学家近期所关注的问题上[2]。哈贝马斯展现了18世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如何诞生的；它被理性所统治，这个理性是可以质疑国王和宫廷权力的。在这个领域中，开明舆论得以形成，充满合理性与普遍性。当然，这与个人观点毫不相干，却可以通往某种存在争议的“真理”，并反对完全被王权所控制的宫廷的公共领域。文章、编年史和报刊都成为表达新观点的阵地：精英们在那里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明确的历史框架之下，形成一个文人批判的领域。此处在哈贝马斯看来，舆论“反射出运用理性的个人所构建起的公共领域”。他的整部著作都在研究这一模式，并且一上来就明确指出对这一既定历史样式（即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研究“要把一个一直被压制的平民公共领域的变体丢在一边”。

“被压制的”？让我们围绕这个词展开思考。既然这个领域曾被压制，那就表明它确实存在过。那么，为什么不能找到它的表现形式？确切地说，阅读哈贝马斯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哈氏还写道，法国大革命时，“已摆脱了文学层面的公共领域突然发挥了作用。这一次，身为主体的是没文化的民众，而非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有三个词值得注意：“民众”、“没文化”以及

“主体”。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所谓没文化的民众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他们完全没有文化吗？他们是在7月14日之前开始“发挥作用”的吗？作为主体，他们怎样看待自身的？是谁的主体？他们是如何被看待？谁来对他们进行思考？

如果要用更加学术的词语来表达，或许可以说，本书旨在勾勒普通民众在面对一些事件和王室盛举时或赞同或不满的政治形式，探讨公众舆论的存在，发现并确定它们的动机。这类问题，如果没有进行预先思考是难以提出的。“公众舆论”不是一个容易被掌控的对象。当其涉及旧制度时，要加倍留心，并在方法论上保持谨慎。否则就会陷入简单的时代错误或是严重的表述错误中。事实上，“公众舆论”，从其常用的表达来看，“与议会民主制联系紧密”[3]，这显然与18世纪的情况不符。不仅如此，在那个时代，民众与政治无关，并被千方百计隔离于政治之外。所有出自平民之口的观点都被视为疯狂的、冲动的和荒谬的，正如孔多塞在1776年定义公众舆论时所言，“它源于最愚蠢亦最不幸的那些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本书要探讨的对象无从找寻？本来我早就应该放弃了，但是我坚信，一个社会的某些部分总是在正式结构之外起作用[4]，那么就可以从这样的差异中研究现实的过程、显示和结构。要构建历史对象，必须了解社会角色，了解他们的策略、言论、行为，以及一些见不得光的操作。

如果真是这样，从禁止普通民众拥有真知灼见的 18 世纪的某些言论中探寻其动机，就不那么冒险了。我们的研究涉及悠久的传统，1601 年，皮埃尔·沙朗[①]在其著作《论智慧》(*De la sagesse*) 中写道：

> 民众……总是嘟嘟哝哝低声埋怨着国家，对它的统治者和领导人们尽情诽谤且出言不逊……总之，那些俗人就是野兽，思考的尽是虚幻，所言尽是虚假和谬误，所谴责的都是好人好事，所赞扬的却都是坏人坏事，所肯定的都是无耻的事，所做的和准备做的只不过是十足的蠢事。[5]

从 18 世纪那些学识渊博的自由思想家（如加布里埃尔·诺代，著有《政治与政变思考》，罗马出版社，1639 年）和众多哲学家及回忆录作者那里，我们找到了这些几乎未被触及过的主题。然而，在启蒙运动时代，有些事情不一样了：成立于 1667 年的巴黎警察总署，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安插信息员身上，他们负责在某些公共场所（散步广场、小酒馆、公园、广场和十字路口）窃听关于国王和一些重大时事的议论。警方的暗探和密探们（被民众称为"苍蝇"[②]）走街串巷，无论是欢呼还是交谈，都会被他们写进报告里，按时呈报给警察总监。而

① 皮埃尔·沙朗（1541—1603），法国哲学家，蒙田的好友。

② 法语中，密探（mouchard）与苍蝇（mouche）的单词相似，同时这一称呼还源自 16 世纪臭名昭著的密探安托万·穆西（Antoine Mouchy）。

后者在每周一次觐见国王之时，会让君主了解时局。

这些系统记录民众言论的报告并非无关紧要的消遣，它是警察系统的基本活动之一。他们整天琢磨人们说了什么，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并负责将其中的主要部分上报当局。

很显然，我们正处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中：在巴黎，民众对各种事件（可见的、真实的、日常的）发表意见，那些合情合理、有针对性的政治意见却遭到当局的否定。与此同时，当局密切监视着民众，特别是，通过一个充斥着“苍蝇”、密探、暗探的警察系统来监视。这个系统其实是镇压或者杀一儆百策略的一部分。当一些大型的社会政治事件突发时，这一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事件包括战争、签订和平条约、骚乱、议会危机，以及冉森派[①]的反抗。在日常生活中这一矛盾也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当物价上涨或频繁出现行刑处决时。

尽管被官方隔离于政治领域之外，那些“观点”还是变成了君主制政府的众多困扰之一，有时也让它不得不明确表态。这必然会产生广泛传播的效果，触发当局、事件本身以及民众之间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行动与回应，引发一个奇特的螺旋状效应，形成公共表达的新形式。尽管这些意见是以一种非常规的方法表达出来的。普通民众说的话没有生命亦无身份，既是政治的禁区，又

① 冉森派（jansénisme），17 世纪 30 年代由荷兰神学家冉森（Cornelius Jansen，1585—1638）的宗教理论而发端的天主教派。17 世纪中期传入法国并迅速发展，因其主张与主流不合，于 1653 年被教皇定罪。自 17 世纪末起，此流派的影响扩大至各领域，有了明显的反对绝对王权的政治色彩，也因此遭到残酷镇压。

是社会实践的老生常谈。在政权的围追堵截中，它有了形象与生命，在体制的核心中发展起来。矛盾的是这一体制既否认公共言论，又揣测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了它。无论存在与否，关于时事的公众言论始终存在一个中间地带：在政治的外围和总是受到质疑的、人们习以为常的领域之间。

上层肯定的、政治上的不存在，却要面对确确实实的存在。这种矛盾滋生了新的尖锐的意义。正是这种矛盾决定了在整个世纪里，君主制与民众一直在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抱怨和批评存在于被政治领域排斥的状态下，因此既在政治之外，又在政治之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继续研究它们，否则就会出现时代错置。就算 18 世纪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也还是有一些民众的意见，无论其形式、内容还是作用，都在君主政体内部发展着。君主制在拒绝它们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们生命。在这种奇特的压力之下，谣言四起，也许在某些时刻它们不受约束。

根据这些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如果任何人都能够批评[6]，那么为这种能力书写历史就可以构建一个批评能够在其中行动自如的领域。总之，只有当我们努力把民众的抱怨和不满与其所处的环境相关联时，它们才能成为历史关注的对象。历史环境本身是变化而复杂的，因此最好将怨言与不同现象的多样性“挂钩”：引发谣言的事件是什么？地点又在哪儿？正是这些事件和地点在某些时候让这些话语统一起来。围绕着哪

些事实，民众批评所涉及的主题集中起来并得到证实？这些被传播的言论接受的过程（镇压是其中之一）是否促使它们失败或是重新活跃起来？

将思考关联起来避开了两大陷阱：一是将煽动性言论视为静止不变的（无论何时，人们都会批判他们的政府及生活条件）；二是想要在被法国大革命终结的18世纪里找到一种有争议的观念，它不断地自我强化并在1789年到达高潮。让我们远离这些观点，以便全身心地研究公众舆论这一跌宕的线索，它们形式多样、错综复杂，与政府机制、政治事件、社会话语和实践都有特殊的关联。

包含公众舆论的各种资料有：编年史、报刊、回忆录、警方笔录、大量的手写新闻，还有巴士底狱的档案。

舆论的栖居地以自己的方式构建着舆论，为了不同的目的占有舆论：历史记录者和回忆录作者们嘲弄舆论或为此担忧；警方监视舆论，随时准备揭发；地下媒体则从中获取信息以支撑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国王则认为收集舆论是为了更好地统治，等等。于是，这些舆论就在蔑视与禁止、骗取与占有之间流动着。言论见证者们的社会政治机能就是本书第一部分的研究对象。

第二部分着力分析谣言的形式与动机：它是怎样出现的？在其立场背后有着怎样传统或特殊的原因？

最后一部分仅围绕一份原始资料（巴士底狱的档案）展开，研究那些对国王图谋不轨（恶意中伤、辱骂、匿名信、阴谋或

是揭露阴谋）而被囚禁起来的人的资料。这些来自巴士底狱的言论，让我们得以发现国王和臣民之间复杂而模糊的关系，以及舆论形成的时期。

认真浏览满是他人言语的资料，也许会读到或者猜到某些以前我们不太关注的微妙话语或某种日常知识，因为我们以为它们并未成型，甚至从诞生就是残缺的。

目　录

第一部分

日记、报纸和警方记录：街头流言

没有人能无视普通民众的言论，街市本就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就算被否认或被抗拒，它那嘈杂的繁荣永远都在。谣言起于街市，流窜的速度和消失的速度一样快。无论是精英们，还是出版社和警方，都盯着街市；谣言并不很准确地在他们的笔下重现，有的带着恐惧，有的带着愤怒，有的无中生有。我们会看到，无论谣言是被轻视还是被怀疑，它都在提供消息。新故事和酒馆闲聊不仅引起警察总监的注意，还会受到小说家们的重视，他们贪婪地收集着各种新闻、轶事和一些下流、好卖的故事。别忘了，还有地下出版物，它们的影响，部分就建立在民众对一些特别事件的反馈上。

从不同层面进行阐释，流言蜚语都会产生令人惊奇的影响。它们刚一发表就被四处传播，通过各种媒介，被用在不同的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覆盖的范围也在不断变化：逐渐占领街市、出版物和宫廷。它们的真实状态，甚至是被篡改、被歪曲或被吹嘘的状态，都会让听众张皇失措，人们会感到害怕，却又始终绕不开它们。所以它们在评论和态度、意见和政策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无论哪个领域都无法控制它们。

第一章

被轻视的言论，被追查的言论

我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印刷品，出自18世纪初的精英之手。在1715年至1726年，三位伟大的见证者写下了他们的日记或回忆录：让·比瓦（Jean Buvat），马蒂厄·马雷（Mathieu Marais）和埃德蒙-让·巴尔比耶（Edmond-Jean Barbier），三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思想也不尽相同[1]。

第二个资料来源是手稿，既不算文学作品亦非新闻，而是警方的密探和暗探们的报告。这些人被警察总监雇用，监视巴黎人都在说些什么。这些资料作为巴士底狱档案的一部分，保留在了阿斯纳图书馆①里[2]。它们包括的年代从1725年至1740年，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因为，正是从那时起，公众舆论骤然变得非常重要。

① 阿斯纳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部分，在巴黎兵工厂的旧址上建立，故名。Arsenal在法语里亦表示兵工厂，军火库。

18 世纪初的日记和回忆录

路易十五未成年时的摄政期① 是一支政治插曲。人们热情洋溢地庆祝太阳王统治终结的同时，怀着温柔且急不可耐的心情，期盼尚未成年的国王长大成人。按照历史记载，那些年是美好的，似乎没有受到日益衰微的王室威权的影响，历史学家们认为，王室的衰微始于 18 世纪中期[3]。此外，启蒙思想和哲学家尚未发挥主导作用。令人宽慰的是，我们能通过日记作者的视角去研究人民大众，并且没有受到一个难题的困扰，即大众思想与精英领域如何相互影响。这并不意味着摄政期平淡无奇。事实上有些事件在人们脑海里造成了持久的影响力，并引起了众多的反应。

路易十四死后，给法国的经济、财政留下一个奄奄一息的烂摊子。试图挽救的措施是一个名叫约翰·劳（John Law）的体系。约翰·劳是苏格兰的财政专家，奉摄政王之命重整财政秩序。1718 年，皇家银行成立，国家税收尽在其中，而国王是全部金融证券的唯一持有者。为了重振经济，约翰·劳得到国家授权向市场发行纸币。与此同时，他着手成立了一家巨大的贸易公司，起初定名为“西方公司”。之前路易十四曾将路易斯

① 指 1715—1723 年路易十四的侄子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1674—1723）摄政时期。

安那的开发权授予一位银行家克罗扎，后者后来放弃了这项权利。于是，财政部就委托约翰·劳，给他两百万的贷款用于这块土地的殖民化。为了向诸如中国、日本等国扩展经济势力，约翰·劳给公司取了个新名字：印度公司。但真正广为人知的是密西西比公司这个名字，因为这是约翰·劳最关注的计划，向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移民。

这些新计划经历了一系列无常变化。1719 年 1 月和 3 月，以及之后的 1720 年，警方严厉处置乞丐和流浪汉，以整顿麻烦的流动人口。他们实行严苛的关押政策，满大街逮捕可疑分子和流浪汉。1720 年初，一船又一船（最贫穷的）男男女女被运往路易斯安那，以充实那片过于荒芜的土地。警察总监达让松尤为无情：在光天化日里抓人，还强迫人们结婚，激发了公愤。1720 年，终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暴动。

至于约翰·劳的体系，最终演变成通货膨胀。发行了太多纸币，巨额财富成为泡沫，整个系统失去控制。当一切崩溃，恐慌就产生了。大街上冲突不断，约翰·劳仓皇出逃，墙上贴满了对摄政王的谩骂，地下尽是尖锐抨击的小册子。高等法院无法坐视不管，便行使了抗诉权，它劝诫摄政王，就 1713 年的《乌尼詹尼图斯谕旨》① 与他反目，该谕旨已为冉森派教义定罪。这是高等法院与王室当权者的第一次对立。1720 年 7 月，整个法院被流放到蓬图瓦兹，引起轰动。

---

① 即教皇克莱蒙十一世支持法国国王、谴责冉森派的通告，引发广泛抗议，成为此后一个世纪法国政治与宗教动荡的根源之一。

1720 年还有其他大事：鼠疫在马赛[4]爆发，巴黎人对此忧心忡忡，这使得他们对于各种违法行为越发紧张。人们的注意力和想象力很快就会被吸引到一桩著名的逮捕案件上，那是在 1721 年，对大盗卡图什的逮捕，几个月后他被处决。这一案件的审判原本是为了起到震慑的作用，结果却使他成为一个英雄，但是他的失势也牵连了好几百人。

18 世纪的前 25 年终结于一场动乱：1725 年，面包价格居高不下，粮食严重短缺，巴黎人民开始暴动。此时，警察总监翁布勒瓦尔被免职。1726 年，波旁公爵①失宠，由此，枢机主教弗勒里②开启了他漫长的内阁生涯。

在这十一年里，民众有很多发表意见的机会。那么，回忆录作者和日记作者是如何记录民众的，他们是如何看待，又是如何评价民众的？民众突然大量涌现于日记和回忆录中并非偶然。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日记和回忆录的文学性很弱。它们记录的不一定是事实，但却很重要。最起码，它们“以回忆录之名，深入私密地书写历史，随意而真实，日复一日记录当下的思考，写法自由、前后不一致、分散，但却足够忠实，尽可能地记下历史本来的样子”[5]。

足够忠实？让我们一起审视 18 世纪初三位著名的记录者：让·比瓦（1660—1729），马蒂厄·马雷（1665—1737）和埃德

---

① 指波旁公爵路易·亨利（1692—1740），路易十五的表兄。

② 指弗勒里主教（1653—1743），原名安德烈–赫丘勒·德·弗勒里，法国枢机主教，路易十五时期实际上的首席大臣，1726—1743 年在任。

蒙—让·巴尔比耶（1689—1771）。

比瓦从1715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1723年，他是个简单的人，是国王图书馆的抄写员。出于对各种事件的好奇心，他把它们杂乱地记下来，并未将其精心整理成故事。为此，后人夏尔·奥贝坦称他的作品为“混乱的历史”[6]。但不管怎样，因其朴素真挚，他的观点还是珍贵的。从街边或是某些相识的教士那儿听来的消息，都让他清楚了解发生在1713年由《乌尼詹尼图斯谕旨》引发的骚动。

马雷是另一种类型，他是个律师，他的议会思想似乎与生俱来，他的回忆录始于1715年，止于1737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有思想的人，其文笔自成风格，同时伴随着鲜明的批判色彩，主要是针对耶稣会士的。他周旋于议员之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冉森派。他不怎么拥护绝对权力。总之，他并不留意街头，他更关注王公贵族们的生活，尤其是摄政王的。他观看表演，参加庆典，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以便更好地写下来。他和民众看的是同一面镜子，但却是正反两面。

巴尔比耶毫无疑问是三人中最为出名的。他的记录极长，从1718年一直到1763年。通常历史学家们都视他的记录为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尤其是涉及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时法院争端那一段。巴尔比耶详细描述了法院与国王之间的分歧，显示了其对未来的预见性。阅读他的作品，能感受到作者稳健的观点和他的谨慎。作为一个律师，他先后担任过掌玺大臣达让松、孔蒂王妃和奥尔良公爵的首席幕僚，巴尔比耶几乎无法轻松面对

民众，即便是欢乐的民众也让他感到恐慌。他不是一个教权主义者，不是冉森教徒，而是一个保持平静、热爱秩序的人，他讨厌激烈的情绪，却小心翼翼地关注每一次危机。

这三位差异显著的证人都生活在思想和道德多少有点混乱的社会氛围中。尽管他们的风格和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在说到民众的时候，方式还是差不多的。

首先，他们都认为“民众”很重要，尽管关于民众的篇幅和关于宫廷、王子、公爵和公爵夫人们的新闻，或者诸如外交条约、教会和法院事务的新闻相比还是少的，但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回忆录相比，民众的存在感就清晰多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宫廷不再设在凡尔赛，摄政王住在巴黎的王宫里。观察者关注巴黎，这个摄政王所在的城市，他们注意宫廷的动向，而宫廷的主人也无法回避群众。在首都，节日庆典和表演是给公众看的，有助于他们迅速融入城市氛围。宫廷也不再像 17 世纪那样，仅仅意味着是国王现身之处，而是成为面向不同公众进行表演的多姿多彩的场景集合，公众就这样被构建起来。因此，关注宫廷的记录者们不得不关注宫廷为之表演为之炫耀的对象。于是，时事总是关于宫廷和迎接王公贵族们的地方（喜剧院、歌剧院、圣叙尔皮斯教堂[①]或圣罗赫教堂）。这些都是公众的聚集地，尽管不允许他们参与其中，但却并不妨碍将组织好的炫耀之举呈现在他们眼前。观察者无法绕开公众。

① 该教堂是巴黎市内仅次于巴黎圣母院的第二大教堂。

显而易见，民众是无法回避的，然而他们并不能随时渗入历史记录者谨慎记录的时事中。比瓦、马雷和巴尔比耶都只会以两种方式让民众登上舞台：要么这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比如可怕的社会新闻、流血事件、不可思议的梦、起死回生）；要么就是以集体的方式，即群众密密麻麻聚集起来低声抱怨、嘲笑或是欢呼。

这些轶事有的娱乐性很强，有的耸人听闻。1716 年 1 月 15 日，比瓦写道："21 日夜里，有人在城墙上发现了一个全裸的年轻女子，被绑在树上，是冻死的。"1719 年 6 月，他又写道："在圣厄斯塔什教堂举行了一场婚礼，丈夫 108 岁，妻子 95 岁。"除了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外，民众都是以集体的方式出现，回应所有可能引起不安的事件：也许是面包价格上涨，暴动开始，或是偶发的庆祝。从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拥有众多无名氏的集合体，他们的聚集或多或少会造成恐惧。在这种摇摆不定的恐惧里，还加入些轻蔑、优越感和某种嘲弄。不需要再举出成千上万的例子，因为它们彼此都很相似。

比瓦在 1719 年 5 月写道："在巴黎，面包售价 2 苏 6 德尼尔[①]或 3 苏一斤，那些平民为此表示了抗议。"

1720 年 5 月 4 日又记，那些警察的职责就是逮捕未经许可的乞讨者和那些或健康或残疾的可怜的流浪汉，在国王颁布法令禁止干扰低级警务人员工作之后，"平民和那些在小作坊工作

① 德尼尔为法国旧货币单位，1 苏为 12 德尼尔。

的人暴动了好几次，来表达他们对低级警务人员的不信赖”。

还有巴尔比耶，他在1723年写道：“尽管时局艰难，人们还是过了个热烈的狂欢节。”

1722年3月：“因为经常要给巴黎民众安排娱乐活动以抚慰他们缺钱之苦，也为了在周日或是周一迎接西班牙的小公主，我们会准备令人称奇的辉煌庆典，希望在街道上挂上挂毯，一切都要豪华不凡。”

因此，民众只会以这种“轰动”的形式出现，甚至要依赖或多或少有些异国情调的事。要么就是以一般的方式出现，当其规模足以构成事件时。根本不存在所谓民众的中间地带，在那里可以考虑他们已显现出不同的生活及行为方式，在那里他们复杂的社会阅历和内心向往可以得到分析。恐怕要一直等到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巴黎图景》(*Tableau de Paris*，1782）问世，才能细致地观察多样化的民众所具有的策略。他们中的个体，必须拥有异乎寻常的个性或是奇异的冒险经历，才会被人谈起（这与人们审视着他们不了解却又十分好奇的动物真的有区别吗?)，要么就是被塑造成男男女女们出于本能而形成简单的集合体，他们的举止难以控制和引导（动物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

既然民众都是以这样的方式登上舞台——要么是出于对其中某些“特殊分子”的猎奇心理，要么为他们的集体“骚动”所困扰——那么，他们在回忆录作者笔下最常见的行为方式是什么呢？回答很简单。事实上，民众只在下述三种情况中出现：

在王室庆典、皇家婚礼或是葬礼这些或喜庆或悲痛的场合里，在为胜利或是某位王子的康复所吟唱的“感恩赞”[1]里；在不安笼罩全城，来自暴民的谋杀之举让巴黎随时可能变成暗杀的危险场所时；当民众情绪在城中暗潮汹涌时。

我们怎么可能看不出他们所描述的都只是集体的反应。无论是对君主制的忠诚，还是暴动或者犯罪，都是对“上面”强加命令的回应。日记和回忆录里没有其他任何行为模式的痕迹，诸如休闲娱乐、社会习惯、生活及居住方式、消费模式甚至是生活乃至生存下去的积极性（让我们想想关于移民潮所可能进行的描写）。

通常情况下，民众通过有形表现被描述出来：当他们齐声高呼“国王万岁”时，或者当他们在街角殴斗时。这意味着只有涉及暴力、打架、各种违法犯罪以及渲染不安情绪时，才会谈论到他们。他们被定格于此，行为混乱、举止粗暴。只有他们的肉体才是最直观可见的，至于他们的思考能力或精神状况，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可是民众就在那里，既可以兴高采烈地赞同，又可以气势汹汹地反对。

至于社会新闻，回忆录作者们模棱两可的态度总会导致读者产生一些毛骨悚然的感觉。他们所展现的碎尸案、被切成两半的女人、尸体被切成一块一块丢得到处都是，就好像作者的

---

① 该仪式于1587年由亨利三世所创，将颂圣歌、读赞美诗和为国王祈祷结合在一起，最初是国王加冕典礼和入城仪式中的一部分，后演变成一个独立的仪式。

想象力都定格于屠宰场。1716 年 2 月 6 日，比瓦讲了一件可怕的事：

> 冰面（指的是塞纳河的水冻成的冰）裂开，击碎了好几艘船，很多洗衣女工遇难，还被切成两半；有些人的头还浮在冰块上，可她们的身体已经沉入了河底，根本无法施救，这是多么可怕的场景啊！

到了 1717 年，他又写了另外一件事："在巴黎圣母院、莫贝尔广场上的卡尔姆教堂和卢浮宫教堂[①]里，人们看到一堆堆白布裹着一段段尸体。"还有这样的话："在圣玛索区的某条街道上，有人发现一具女尸，被人用铁扦子穿着烤焦了，铁扦从头部穿出。"

这类情况可以与同时代对医学解剖的狂热联系起来，或者可以视作具有象征意义：民众只会以群体或部分的方式存在，否则无法被辨认。特别是那些对所有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情景，如格列夫广场[②]上所执行的处决。一周里有好几次，民众都能看到这样的场面，尸体被扯碎，被切成块。1721 年，卡图什被捕后，揭发了一大批同谋，这些人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先后被撕成碎片。作者们坚持不懈地记录着这样的行刑，这已成为不变的惯例：卡图什分子们前往巴黎市政厅，坦白罪行，直到结束

---

① 原名圣日尔曼奥克塞卢瓦教堂，始建于公元 7 世纪，因靠近卢浮宫而被称为卢浮宫教堂。

② 又译沙滩广场，是巴黎市政厅前的广场。

他们的无眠之夜，踏上死刑的搁脚凳[7]。人群始终在那里，宫廷有时也被描绘（别忘了摄政王对于腐烂尸体的独特审美，他那些病态的庆祝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在这段酷刑密集的时期之前，比瓦也对描述惩罚的场景乐此不疲。1716 年 6 月，他记录了一次对制造假币者的行刑。那是一对同居的男女，在临上绞刑架之前还在戏弄法官。显然，他们也让他着迷："那个女人打扮得很雅致，还带着漂亮的饰物，仿佛要去勾引死神。她只有 22 岁，漂亮可人。"这使得接下来的处决更加令人惋惜。

马雷，一般来说他对宫廷生活的关注远大于平民生活，但有时也会关心一下社会新闻及处决。1724 年 3 月，他为两个独特的故事深感震惊：

> 前几天，人们活活烧死了一个蒙马特的赶驴人，罪名是他为了不同寻常的目的给母驴挤奶。他成了众人唾骂的对象，他的舌头和手都被割了。他的叔叔一直陪着他，在一辆双轮马车上，叔叔劝他交出舌头，伸出手，让他同意被活活烧死。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人其实从来都没跟母驴怎么样过……然而，这事已无可挽回了。

同一天，马雷还讲了拉佩雷勒——皮塞居尔先生的贴身男仆——的故事：

他总是干净利落地切下朋友们的头和胳膊，再夺走他们的财物，并尽可能地清理他们的尸首，丢进粪池或是河里。有人在船上发现了一颗头颅，由此牵扯出谋杀……在得到他分尸的详细证据之后，他被处以车轮刑。

突然现身的民众，不是爆发欢笑就是大怒：对他们来说过剩的情绪就如同蜜蜂对于蜂巢那样自然。如果说记录者们展现的是这样的形象，就说明他们无法想象平民阶层对各种事件能有什么见解，或者是有相互作用。

随着冉森派争论规模的不断扩大，事情也发生着改变。民众言论如此丰富，以至于记录者们开始改变态度。那些倾向于法院派或是冉森派的，或同时支持这两派的记录者们学会利用达成一致的公众以及这种全新的氛围，他们努力诱导着这一切又或让自己去适应它们。他们也不再为公众的漠然而忧心忡忡。关于这一点，当1720年整个法院被流放到蓬图瓦兹时，埃诺院长曾伤心地写道：

于民众而言，我们的缺席等于剥夺了他们仅剩的保护，但他们对于我们的远去，表现冷漠。80年来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枷锁已经让他们习惯沉默地忍受，而他们那超乎寻常的不幸，已让他们变得麻木不仁。[8]

这是真的吗？不管怎样，快到 1723 年的时候，情况会发生巨变。

其实，这些日记和回忆录的真正主角都不是平民而是宫廷生活，是摄政时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各种丑闻。历史记录者们乐意记录宫廷生活，皇亲国戚通过各种公共庆典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他们的地位也通过呈现给公众的奢华而新奇的场面得到加强。马雷对讲述这样的故事充满热情。他难以抑制，用冗长的篇幅记录下王室高贵的成员，他们举办的那些活动让他乐在其中。从 1717 至 1720 年间，在不做任何价值评判的前提下，他讲述了在王公贵族间流传的大量轻浮的轶事、各种淫秽的文字游戏和下流的小故事，没有客套亦无评论，有的只是娱乐与诙谐。王室风度尽失，加上马雷的讲述方式，产生了惊人的阅读效果：人们对肆无忌惮的宫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旦那些玩世不恭的游戏暴露于公众眼前，就将会是危险的。

从 1720 年起，马雷的语气发生了改变：由描述变成了揭露。愤怒伴随着担忧出现在他笔下。到了 1722 年，他甚至还谈到对宫廷的“憎恶”：摄政王的情妇换得太频，“受宠”的女人不计其数，摄政王荒淫无度。“他还想出一些丑恶的游戏，”马雷记录道，“王室就在这样的放荡中取乐……他们随处做爱。”就连同性恋都成了老掉牙的话题。

宫廷的华美形象崩塌，在这样日常而公开的奢靡之中，大厦将倾。荒淫中隐藏不了秘密，因为如此“堂而皇之地放荡”，宫廷变得名不副实。它开始解体，位于灾难核心的是摄政王，他被公众骂得狗血淋头，人们也看不到国王为复兴它付出任何

努力。1721 年 7 月，“有人谈到一次在杜伊勒里宫的夜行，摄政王正跟一群女士一起散步。他被三个男人羞辱得很惨，他们粗暴地对待他，他的情妇也没有幸免。”马雷没有注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机会，而路易十四的一个眼神往往就足以诠释礼貌和修养。尽管马雷从来没有关心过这种“荒淫”可能给公众舆论带来的真实影响，但他对于这些事实的曝光，还是显示了民众、宫廷与国王三者间的关系有明显的改变。在这个全新的公共的领域之中，社会（公众）的目光被宫廷持续吸引着。在宫廷与巴黎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用于批评与评判的空间。

警方记录：1725—1740 年，秘密警察和言论迫害

从 1724 年到 1781 年[9]的警方记录，价值非常独特。由于保存的方法比较特别，其中以 1725 至 1740 年的记录最为完整。之所以会有这些记录的存在，是出于警察总监的特别要求。在一些特定的公共领域里，他有众多暗桩：皇宫、杜伊勒里宫附近的散步广场、法院前的广场，还有各种名声或多或少有点狼藉的小酒馆，甚至还有人被安插在入市税征收处，以及郊区边缘的关卡。这些人领取薪金，去探听这座城市的“传闻”，他们很难深入“民众”的核心圈子，因为民众总会飞快地发现他们。暗探每周需提交一次报告，警察总监对这些报告望眼欲穿，因为他也要将它们定期呈报给国王。路易十五对报告的内容很感

兴趣，总是让他的私人助理大段大段朗读出来。国王感兴趣是一回事，他也会迅速惩罚那些在众多报告中逾矩的人，或是那些传播被禁止的观点的人。

暗探们的报告通常是以书信或活页纸的形式送呈警察总监。它们被钉上皮夹封面归入巴士底狱档案，保存于阿斯纳图书馆。这些手稿出自不同作者之手，字迹、文笔各不相同，关于巴黎这座城市的说法也多种多样。有些人对这份工作充满热忱，栩栩如生地描述着他们所观察到的一切。另一些人则显得仓促或漫不经心，仅满足于简单罗列传闻。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看出暗探对警察总监多么服从：要想拿到高薪，就得避免惹怒他。如果他注意到任何错误或者疏漏，那个懒惰或玩忽职守的暗探就会遭到直接或间接的训斥。警察总监期待每份报告都有一定的独创性，如果只是一些普通的谣言，他可不会感到高兴，并且会强硬表明自己的态度，一个暗探写于1726年2月18日的报告表现了这一点：

> 大人，本周我没有向阁下提交报告，因为我只能如我之前所做的一样，提交一份写满坊间流言的报告。但正如您跟巴赞先生（警方首席秘书）所说的那样，您需要的是更重要的内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要让自己更巧妙地潜伏[10]，所以我再次重申我的需求（指更多的资金需求）。这样，一个月之后，我的报告一定会大有改观，您也一定会对我满意。[11]

“苍蝇”们也需要自我保护，若想让他们“更好地混入人群”，势必要支付更高的酬劳。于是，便有一连串抗议的花招、对补助的要求、强硬的讨价还价。比如其中一个人花很长的篇幅为自己辩护，其中不无批评和嘲讽，那是1726年12月11日写下的：

> 我听从您的命令，全心全意为您工作。由于缺少机会，我才没有出人头地。但是真相一直在我左右，这需要机会和更多的资金。这个任务很棘手，对我的生活与名誉都有威胁，所以得到的钱越多，可以告诉您的事就越能让您满意。如果一个月不到300里弗尔①月薪，我无法胜任。为了出入那些重要人物去的高档场所，需要旅费和动辄三四十乃至五十索尔②一顿的餐费，还要置办行头，这些都让我非常苦恼。[12]

暗探们的工作很特别，有风险，并要从中获利。他们肩负着探听平民怨言的重任，也需要出席一些高档场合，需要好的衣服，昂贵的餐费……暗探们并不总是精于乔装，很可能在街头巷尾被轻易认出。为了做好工作，需要巧妙地隐藏痕迹、厚颜无耻，并且对警察总监忠心耿耿，最后这一点不那么容易做

---

① 里弗尔是旧时通行于法国的一种记账货币，相当于一法国古斤（巴黎为490克，各省为380至550克不等）银子的价格。又译作“锂”“图尔锂”或“法镑”。

② 索尔是法国货币单位“苏”的古称。

到，因为通常“苍蝇”都是从那些小偷小摸或者坐过牢的人里招来的。警察总监要求得到第一手的信息，而有些懒惰的暗探根本不去探寻，只依靠一些报纸上的新闻。

这类风格的报告接近小说和手抄报：信息以一种原生态的方式呈现出来，不掺杂任何评论。除了取悦警察总监，满足他无尽的好奇心，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扎堆的信息都非常混乱，也没有按重要性排序。从不堪的两性畸形人到反对战争的咒骂，或是巴黎街头对王室狩猎的尖锐批评，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它就是搜集消息，既不需要发现事件之间的联系，也不需要言之有理，更无需从这些偷听到的话中提炼出寓意。这些手抄小报表达含混不清，一个 20 世纪的读者很难理解到底在说什么事[13]。

总之，持续不断地阅读这成百上千的报告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效果：就连报告的作者们都没发现，一种批判的视角于这些看似肤浅的报告中逐渐显现。报告中逐渐出现得罪人的思考、尖刻的话语，有时甚至会强烈质疑那些道听途说的事，语气始终强硬。这些小故事的作者们从来都不应该批评：他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批判，而仅仅只是听和记，却不做评判。他们的记录，被原封不动地传递出去，无需通过梳理背景而加以润色，也没有在文笔上进行缓和处理。可是，正是这样的写法，恰好推动了那些众所周知的批评之辞的蔓延。“苍蝇”们不祈求任何谅解，或许当他们在卑劣言行中掺入一丝幽默时，他们心中也怀着一丝隐隐的快感。1728 年 9 月，[14] 他们中有人说道：“据说红衣主教阁下给国王赐了个新教名——

‘和平者路易’，这让我们觉得还不如尊称他为‘狩猎者路易’呢！”

一连串的批评之辞虽长却鲜活，吞没了新闻本身，最终显现出真实而粗暴的言语，写作从来不能使之变得温和。这种生硬取决于话语表达的条件：速度要快，不能遗漏任何细节，说出看似最危险的内容，所传达的就是自己亲耳所闻，这意味着18世纪是口头表达的世纪，要的就是快速简洁，伴随着意味深长或一语中的。“苍蝇”们无所顾虑地照单全收，之后又原封不动地上报给警察总监。还有，因为倾尽全力地追查言论（他们抓捕着那些妄议时事的人），揭发言论，这项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街头满是批评和不满的言论，全都反映在报告里。这种粗暴不一定是所采用的形式的效果，但确实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此外，民众言论的地位正悄然发生改变：它从让人发笑的传言中脱颖而出，四处蔓延。它不仅将成为信息的素材，以及一种获得消息并引导政府的方法——在那时公众舆论一般被认为是飘忽不定并粗俗的——而且还是某些满载反对策略的地下出版物的重要支撑（此处笔者想说的是一份冉森派的报纸——《教会新闻》以及它不容忽视的影响）。

第二章

引人入胜的言论：控制、侦讯与反抗

18 世纪初的回忆录作者们以特定的方式看待民众言论，仅仅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才会关注他们，不会用他们的言论来支持自己在社会政治上的观点。警方报告始终在那里监视并告发着。然而，随着言论日趋泛滥，对它们的处理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三种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将再次关注警方报告和它们难以觉察的变化：民众言论仍然遭到追查，但它的出现，甚至成为掌权者的消息来源；至于手写新闻，它们披露了大量轰动事件，上层人士很爱看，但是这些新闻总是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让读者处于一种真假难辨的独特状态。有一份特别的报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那就是《教会新闻》，它将《乌尼詹尼图斯谕旨》之后的一连串事件公之于众。它拥有如此与众不同的推广策略，让最卑微的言论得到重建。它引导公众舆论的方式对于君主政体和它臣民之间的关系上产生了切实的效果。

警方报告中泛滥的民众言论

1728 年，国王的首席大臣弗勒里对所有反对《乌尼詹尼图斯谕旨》的冉森派教徒、神甫和主教们发起猛攻。到 1730 年，有 300 名教士被拘捕，几乎同等数量的教士被强行驱逐或开除出自己的教区。与此同时，在圣梅达尔教区的公墓里，帕里斯执事的墓地出现越来越多的奇迹。此人死于 1727 年，享年 37 岁，他生前一贫如洗，居住在圣马塞勒区的一所破房子里[1]。因至死反对《乌尼詹尼图斯谕旨》，帕里斯成为 18 世纪冉森派教徒们神秘且标志性的代表。他十分愿意与自己教区的穷人们待在一起，并为此拒绝了圣职。

起初出现在执事坟墓前的是一些腼腆的祈求身体康复的病人和静待奇迹出现的人。但事态发展得很快，人群涌向墓地，数量超乎想象。1732 至 1760 年，有 250 名狂热的冉森教徒被捕，被关押在巴士底狱或是夏特莱监狱。警方不得不每天派人监视墓地，并记录下那些病态的人及其周围人的交谈和预言。当局面失控的时候，当局决定以国王敕令的方式于 1732 年 1 月 27 日关闭墓地，直到 1807 年墓地重新对外开放人们才能重新踏入圣梅达尔。

从 1730 年开始，警方报告就充斥着这些事件和喷薄而出的四面八方的民众言论。日夜操劳的暗探被街头的传闻所震惊：

无论何处，无论何时，都有人在谈论被绑架的教士或墓地里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谈论着国王和他的主教们，还有法院的法官们所持的立场。

此时的警方报告所呈现的动荡的公众思想是自然的，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但更让人感兴趣的却是暗探们对言论爆发的反应。“苍蝇”们都惊呆了：在报告中，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惊诧，以及对于每个人都在传播的“思想”和其不同寻常的传播方式的担忧。这种惊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感到奇怪，一些“最无知的民众”居然持久而大胆地支持一方；另一方面，他们为这些被表达出来的顽固的信仰和思考性而困惑。靠追查不当话语和谣言而领取薪水的警方暗探们发现，自己面前是一股言论的洪流。这些言论无所畏惧，对它们所不认同的主题和争论（包括神学的）都清晰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

从那时起，报告的语气发生了改变：言论是那样咄咄逼人且形式多样，以至于暗探们也试着让警察总监了解它的新面目。他们最早意识到，一直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公众言论逐渐带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倾向。他们忠于自己的工作，精心报告自己的见闻，然而这一次他们更加深入平民阶层的核心，在冉森派的教区（圣罗赫教堂、卢浮宫教堂、圣雅克都奥巴教堂和圣马塞勒区圣梅达尔公墓）之间走动。他们记录着，不再带着轻视。有时他们会为自己所听到的言论感到震惊，以至于时不时会以第一人称进行写作。1733 年 7 月 1 日，他们中的一个写道：“即使一切都那么糟糕，我也不会感到惊讶。”[2] 事实上，没有什么

跟以前一模一样了，那些原本针对宫廷和王室日常的怨言持续不断，变成了逻辑复杂的谣言。面对这样的现实，“苍蝇”们无法确定，到底是他们沉浸在幻想之中，还是身处一些有组织的言论之中，在一两年前他们根本不会对此怀疑。那些年，一切都变了：暴乱不再是因为诸如面包价格或某次王室庆典上的侮辱行为之类的事，生活突然被新的民众言论和意见包围。正是这些言论和意见改变着民众的面孔。

警方报告就以这样半惊奇半担忧的方式提醒当局注意底层的骚乱，至少要了解民众突然开始思考的新活力。言论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告知统治者它的变化、它的表达方式和强有力的确定性。报告文字传递着惊奇，隐约露出一丝挑战当局的迹象。

首先，令他们惊奇的是，民众表达他们意见和愤恨的方法，是如此公开，仿佛一切都自然而然。“有人直接说……有人大声说……有人高声宣称。”这些话语直言不讳，无所畏惧，受坚定的信念和明显的热情驱使。于是，我们会在暗探们的笔下看到这样的语句：

> 巴黎被言论的洪水淹没，每个人都在大声、公开地诉说。传单被分发到小商店里，人们都很坚持他们的想法。

> 无论大人还是孩子，每个人都在思考，都在关注每天发生的一言一行。

我们听到的都是些没文化的人说的话，诸如挑水人和脚夫们，都在以不合适的方式吵闹发言。

每个人都想知道该支持还是反对。

下层人居然会理性思考，这是很神奇的，它使暗探们的笔几乎凝固，他们认为这意味着有问题。“不会有什么好事，”他们这样写道，“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有一场暴动或残酷的内战。”

他们的报告方式表现出一种意识（或清晰，或混乱），民众的牢骚正迅速并且不受控制地变得越来越坚固，越来越有组织性，其坚定和韧性与过去民众表现出的善变和摇摆截然不同。

现在，轮到大臣和警方高层互相质疑了。1733 年，弗勒里写信给警察总监埃罗，关于巴士底狱囚犯的审讯记录，即所谓“与冉森派有染的不法分子”，他写道：

丝毫看不出你能把事情弄清楚，因为在这些不屈不挠的死硬分子身上，存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甚至在那些败类身上也有。这让我们得不到一丁点供词，也就无法了解清楚。[3]

以大臣为代表的君主政体是那样惊讶，以至于只能用超自然的理由来解释“败类”的活跃思想，认为民众可以思考简直是超

自然的。

报告记录的各种檄文和传单、散落在地上的便条以及各种小册子上的信息，转述着舆论和谣言，有时能揭示谣言与那些煽动性文字之间的关联。关于“谈事色变”(frisson parlé de l’événement)，语出皮埃尔·雷塔[4]，它们最终采用了一种连续的叙述，既赋予事件意义，又不是简单罗列在 18 世纪 20 年代听到的那些辱骂之辞。民众言论的泛滥改变了消息传播的常规，舆论在大家的眼皮底下被制造着。然而，大部分暗探依然认为：“真理”不可能来自于最底层的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话，他们奋力寻找更权威的话语源头，尤其是在涉及一些很严肃或很庄严的事件时。在调查关于国王之死的传闻时，暗探会千方百计证明这样的传言来自上等人的房子里：

> 1732 年 1 月 30 日：有人说国王已经很久没有生命的迹象了，他可能是因帕里斯教士事件而遭到报应。可以肯定的是，这可不是什么街头流言，而是出自某些高档场所，甚至是要人的官邸。[5]

那个时代，一只“苍蝇”要想上报与国王生命息息相关的事会有些顾虑，然而，一旦有某些知名人士的话做支撑，那么可信度就立刻上升了。

因此，警方报告不知不觉地揭示了巴黎大舞台上种种根本性的变化，它们将变化传递给警察总监，用这样一个通知所有

人的过程来代替对言论的驱逐，从长远来说，这会改变报告本身的语调和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报告变得更加积极了：乍一看它们就是叙述、告发，现在那些逐渐冒出的令人目瞪口呆的话语和捕捉到的公众言论，证明在一些民众的公共领域有一些突然并且不可预料的活动。一个新的领域在他们的眼前展开，虽然暂时还没有任何方法能将其变成权力领域，但我们已经可以觉察到，各种力量之间的新关系有待考量。

手写新闻

手写新闻极少写到底层平民，但偶尔也会提及他们。毕竟手写新闻的优先受众并不是平民，然而那个时代的人担心手写新闻对平民的影响，它们让记录者和警察们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勾起他们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解释这种渗透全民的信息？

事实上，它们是被秘密编辑的、手写的活页，与官方报刊存在竞争关系。其实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官方报刊所发布的“真相”早就被王室预先审查过了，因此它们与现实根本就没有关联。而手写新闻则提供另一种匆匆写就的与官方对立的信息，告诉读者国内外发生的事。它们被寄到订户手中或秘密分发，绕过诸多省份，穿过围墙，传递着关于王室、表演和书籍的消息，传播着讽刺诗、小故事还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

新闻。消息来源主要是国外，那里的审查制度没有那么严。这些消息为每个人所觊觎，其中包括警方，因为后者有时需要从中汲取内容充实他们的报告。手写新闻如同传环游戏，从一个人手中传到下一个人手中，一会出现，一会不见。它们根本不是为了迎合某种深层次的需要，也没人会为它们显而易见的不可靠担心，因为“人们在巴黎这个城市能学到比其他地方多得多的东西，他们的所学也比其他地方更不可信”[6]。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在他的《巴黎图景》中屡次指出，存在于新闻、传播者和读者之间的狂热：

> 你会看到他们坐在杜伊勒里宫、皇宫以及阿斯纳图书馆前的长凳上，在奥古斯丁河岸①或是别的地方。每周三次他们都在认真阅读，不分年龄、不论身份，都被政治新闻深深吸引。[7]

面对那些贪婪的读者，必然需要呕心沥血的传播者。梅西耶这样描述他们：

> 一群饶舌者在卢森堡公园的树荫下谈论着欧洲政治利益，构成一幅奇妙的图景。他们命令着国王，安排着君王的财政，还心急火燎地把军队从北部调往中部。[8]

① 位于塞纳河左岸。

对于传播者而言，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都不知道：

> 我正处于新闻匮乏的巨大恐慌中，在圣梅达尔对面的房子里没有一件荒谬的事情，我什么都没法报告。有个玻璃工人，他……[9]

机构、内容与被镇压

手写新闻的机构、内容与被镇压的方式是一个整体，有些时期对待手写新闻会比别的时期宽松一点，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氛围的变化。

当警方高层对手写新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传播者们的工作室就会大方开放，便于寻找。普通人对此了如指掌，需要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去那里寻找信息。一旦开始镇压手写新闻，小报的生产有时就会采用很不同寻常的秘密手段。他们会曝出一些臭名昭著的审判，或者只是简单地罗列密密麻麻的国王密札①和关押命令，目的是为了制止那些被认为可疑的交易。

得到官方许可的工作室运行起来都比较简单。一份 1724 年

① 尤指法国大革命前国王不通过法律手续发出的秘密逮捕令。

的警局记录记下了它们的程序：

> 那些想向公众发布新闻的人必须先提交两份样本给警察总监审核。警察总监过目后，会删去那些他认为不恰当的字眼，之后再将修改过的一份样本交还给个人，总监处保留着另一份样本，以便与公之于众的新闻比对。[10]

所谓“官方许可的工作室”其实就是在警方监管下工作，警方可以对其内容进行审查、扣压、删改和剪除。一旦审核通过，工作室就会开始选址[11]，之后便会尽可能入驻不稳定的区域，如屋顶阁楼、车间或是小酒馆的地下室。它会有一位编辑，一位“新闻主编”，一位编务，最为重要的是一批信息员。也需要诸多抄写员负责誊写消息。这些抄写员被死死地监控着，因为他们素来有自己制造新闻的恶名，自己发明创造，或者给那些小故事加点料。之后由一小撮流动商贩或临时工将这些手写的报纸送到顾客手中，或者送往外省那些忠实的、急不可耐的订户手中。

很容易发现，这些新闻工作室中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员。既然手写新闻“要有针对性地满足公众的好奇心”[12]，那么信息员要到处发掘新闻，也会从全国各地招募人员。有些人专攻文学或是戏剧，有些则游走于时尚的约会地点，从杜伊勒里宫走到皇宫，途经卢森堡公园，一路收集流言蜚语。这就是口耳相传的新闻传播者。在郊区，在各种争吵与社会新闻中，有些小

酒馆的老板也成了信息员。

最受尊敬的是豪宅里的佣人、随从、跟班、门卫还有马夫们，只要给他们钱，他们就能经常提供所谓的“小道消息”，即那些大人物的爱情和放荡生活。当然，也不能忘了那些“驻外人员”，正是他们把从荷兰或是其他国家的报纸上读到的新闻传递回来，并在关于法国外交政策的评论上添油加醋。

这些匆匆编写而成的手写新闻的读者，主要是上流社会人士，有巴黎的也有外省的，订阅价格昂贵：1728 年，每个月需要支付 6 个里弗尔才能每周两次收到指定作者的手写新闻。在外省，庄园主们基本衣食无忧，所以有些人会同时订阅好几份（以确保相对的客观）。能得到来自巴黎的消息是一种荣誉，他们也更想得到准确的信息。在巴士底狱有这样一份文件，1750 年一位订户向朋友抱怨：“请给为您提供手写报纸的人写封信，让他给我们提供真实的，至少是可信的消息。”

有些新闻作坊更为出名一些，有些则实在不稳定，这得归咎于那些粗心大意的暗箱操作者，他们总是伏在小酒馆的桌子上写作，换地方比换衬衫还勤。

鉴于对新闻的渴望，新闻作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竞争始终都是狂热而公开的，有时甚至不顾廉耻。当形势比较宽松的时候，可以刊登广告，反之，则最好在报纸中夹杂对竞争对手的诽谤之辞。其实，最大的担忧还是来自国外的报纸，它们占据着临街最好的房子，拥有一批忠实的订户，加上如蛛网般分布的信息员。它们渗透在法国的每个角落，令那些更缺乏安

全感的新闻作坊不胜其烦[13]。

在手写新闻中，抄来抄去是一种你情我愿的习惯，这只需要一些信息员，对技能也没什么严格的要求，正如一份写于1730年10月20日的巴士底狱的资料所记录的那样，关于拉米（绰号茹尔当）和他的同谋：

> 科尔塞先生是杜布莱夫人[14]家的膳食总管，杜布莱夫人家在菲耶·圣托马斯的维维恩街。他也是一个设在杜布莱家的并不为女主人所知的地下发行机构的负责人。大家都坚信他从他的女主人那里窃取新闻，滥用着她对他的信任。这位负责人雇佣了6个人为他建立与巴黎及外省之间的联系……而科尔塞先生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只能依赖他的兄弟保罗，后者是为阿尔让达尔伯爵安排日常饮食的贴身男仆。因科尔塞很少去自己的办公室，那6个抄写员便可以在相互隐瞒的情况下各自成立自己的机构，每个人都努力为自己赢得订户。
>
> 于是，这些抄写员们在公共工作室的活计结束之后，就会带着窃取的信息前往各自的秘密机构，为自己的订户写作。这些并不忠诚的抄写员们所编的报纸几乎没有让人感兴趣的内容，而且为了能在一张纸上抄下尽可能多的内容，他们总是把文章改得很短，且报纸的订价极低，就连马车夫的儿子都可以支付每月3个里弗尔或40索尔的订阅费。我们发现蒙马特街上的许多店主和工人都是以这样的

价格订阅的。[15]

顺便说一句，底层读者并没有被忘记：小作坊和小工厂也有一席之地，尽管手写新闻并没有把他们作为优先受众。

一旦社会局势紧张，进入被镇压的时期，手写新闻的制作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投石党运动①和攻击马萨林红衣主教的文章给君主造成创伤[16]之后，手写新闻被视作公害。出于路易十四的厌恶，它们成了严格管制的对象，1662 年国王还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手写新闻，抓捕记者及送报员们，将他们关进大牢或是流放。这样的镇压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消失多少报纸就又会诞生多少新的，更何况送报员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无法控制。从摄政时期到 1743 年，氛围发生了变化：这是新闻传播者们的黄金时代，只有被证实为恶意中伤的人才会被捕。得到批准而成立的新闻作坊遍地开花，唯一的限制就是要把他们的作品送呈警察总监。还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程序：就是先前说到过的警察总监握有修改的权利。可别小看它，在 1738 年，当新的局长马维尔决定让自己成为“舆论领袖”，事态就变得更为严峻，1745 年，出现了一些更加严格的处罚。

从此，警方可以通过手写新闻来达到两个目的：它派出自己的信息员和“苍蝇”们徘徊在新闻作坊周围，以便让自己了解最新情况（警方报告总会表露记者与暗探之间的敌意）。更可

① 又译作“投石党乱”或“福隆德运动”，指的是 1648 至 1653 年间发生在法国的反对专制王权的政治运动。

恶的是，警方自己编造新闻，把它们写进要给他们检查的手写新闻中。他们会插入一些他们喜欢的谣言来替换掉他们不喜欢的，于是在警方与新闻传播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怪圈，使得信息以一副半真半假的面孔出现。这对巴黎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并非没有影响。

暗箱操作与官方镇压激发了新闻传播者们的想象：从巴士底狱的一份资料[17]可以看出，在最困难的时期里，他们是如何想尽一切办法来制造和分发手写新闻的。这事关一只“乌鸦”的被捕，即一位替奥地利说好话的记者。他从 1742 年起就被警方所注意，最终落入警察之手，然后发现了他复杂的计谋和共犯的网络。托勒是新闻作坊的主编，他雇用了 50 个抄写员，并拥有 280 位订户。他的新闻根本不是第一手的。实际上，他们并不像其他新闻走私人员那样，从来自国外的信件中寻找新闻，而是直接使用“在巴黎的奥地利人说的事情”①，这就无法保证信息传递的客观性。抄写员都是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是“逃兵役者”或是无业游民，只能以这种方式维持生计，而不可能深入收集消息。为了避免因虚假信息而被指控，他们想出了一条妙计：“把消息送往国外，让它们出现在国外的报纸上，之后再将这些消息从国外引进，在巴黎兜售，传遍各省。”[18]保密不是件简单的事，但巴黎城内每天上演各种诡计：某些自称音乐家的人总在他们的房间里点着一盆火，只是为了一

① 这段时期法国与奥地利是敌对关系。

收到警报就把所抄写的东西扔进火盆。他们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只会带一份手写新闻的副本回家，有时会把另一份悄悄塞进情妇的长袜甚至大腿之间……这是一项冒险的行为，因为警察很清楚这些女人在这个变化迅速的圈子里扮演的角色。她们陪完了这个男人又陪另一个，贴身携带着手写新闻，而一脸淡定。

或许更不寻常的是入狱后抄写员们的作用……有普索警探的记录[19]为证："一旦抄写员或者新闻作者被关进监狱（在这里指的是主教专用监狱），在高墙之内，他们会重建一个新闻作坊，泰然自若地在那些原本应该反对他们的人的保护下继续工作。"这样的事就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里发生，普索为此很是愤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可不是唯一一个受这些混蛋影响的地方，几个月来，小夏特莱的所有监狱的情况大抵相同。某些人甚至假装服刑，混进监牢来做事。昨天，我们就看到了四个正在写作的人，其中有几个根本就不是囚犯……而只是来参观的。"

手写新闻对当时的人与历史学家们来说都是难以捉摸的、匿名的、不完整的、转瞬即逝的，很少能被精心保存下来，在任何档案中都不见踪影。手写新闻有如一阵疾风，草率写就，匆忙分发，在或明或暗间传递，涌入千家万户，真实性难以核实。警方又害怕又愤怒，追查着它，操纵着它，需要利用它来了解当下的消息，更需要从它那里获得流言蜚语，以对抗被认为是危险的谣言。尽管手写新闻将王国中的大人物作为最重要的读者，对民众言论并不很感兴趣，总是优先刊登王室新闻和外交政策，但其实是普通民众承担了传递信息的任务，而

手写新闻最终也是指向普通民众的。否则，警方可不会如此费心……

无从证实的真假运动

手写新闻是时代的泡沫。尽管文笔生硬且断断续续，但它们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来让巴黎人干着急。每个人都在清晨读到它们时欢喜无比，到了晚上却又因为读到了与前夜相悖的故事而愤慨不已。从本质上来说，它们就是传播谣言，永不停息，一直在变来变去，前后矛盾。甚至对那些最冷静的巴黎人来说，手写新闻也是一个令人快乐却无法解决的谜团。他们从来都不清楚，流传的消息到底是谎言还是谬误，有没有得到证实，会不会引发荒谬的举动。但重要的是，大量的传闻能确保他们没有错过什么正在发生的事。他们对消息十分渴望，同时又害怕被消息欺骗，但这种纠结的情绪并没有让他们心灰意冷，相反却激发了他们对活页更大的热情，街头作者们了解公众的渴望，正是他们于张弛之中推进着报刊工作。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早就预见日后历史学家们会遇到的困难："当历史学家需要从这些伟大的运动中描绘出市民的精神时，他们一定会感到困惑……他们会去别处寻找一些尚未被胆怯、激情和无知歪曲的记录。"[20] 当时的人也有同样的困惑，可他们宁愿困惑也不愿选择官方发行的公开出版物，此举使得警察总监和其他

的高层极为震惊，他们不愿相信在如此严格的审查之下怎么还会有漏网之鱼："巴黎人更愿意相信那些在暗中流传的小册子，而不是政府批准出版印刷的东西。"[21] 然而，国王佯装无视警方的做法，他们的做法加剧了真假难辨的程度，他们从小册子里"撕去内容真实的页面，不顾廉耻地去删改，强调了谎言和诡计"。[22]

新闻是一场战争，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新闻传播者们的策略简单粗暴："每个人都叫嚷着他披露的新闻是确凿无疑的，但最新消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揭穿此前的新闻，早上还是英雄，到了晚上七点就彻底成了狗熊；而到了第二天，当他醒来时，前一天晚上的新闻又让英雄恢复了名誉。"[23]

几乎没人相信新闻是准确的，特别是那些大人物，从马里沃到帕拉蒂娜王妃，从梅西耶到迪比松警长，每个人都在抱怨着成千上万被想象出的，或仅仅与现实沾边的谎言。可是，谁又真正懂得筛选？谁能说他知道真相？你只能说出你了解的情况，那就已经很不错了。"在巴黎，新闻就如同暴风雨后出现的癞蛤蟆，它们在一瞬间出现，又在一瞬间消失。"[24]

巴黎人喜欢暴风雨和突然涌现的癞蛤蟆。对消息的渴望比其他一切都更强烈，而那些最先阅读新闻，并一读再读的人，也是那些对新闻持批判态度的人。大大小小的作者和读者们都有着相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生活在亦真亦假之间，而宫廷、警察和一小撮居心叵测的人用尽计谋操纵着大家所热衷的"很可能的–不大可能的"的消息。要理解巴黎公众强烈的好奇心，

必须认识到至少他们明白了一件事情：他们被愚弄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妨碍人们对更多信息的不断追求，即使只是为了证实些什么，为了找出被隐藏的真相，抑或为了构建起自己的身份，无论男女只要是思考公共事务的人都可以构建他们的身份，他们甚至把这样的思考当成一种责任。

民众被毒害了吗?

手写新闻会以一种令人不安的速度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在怀疑的背后其实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公共事务应该保持秘密状态。没什么比发现再也不能保守秘密更让人惊慌的了。18 世纪初，上层抱怨着信息的泛滥。1717 年，迪布瓦首相就对《乌尼詹尼图斯谕旨》的影响感到恐慌，他从伦敦写信给摄政王，原文如下："有人在家里读手写新闻，在街头出版手写新闻，每个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件大事。"

罗马（指教廷）和君主事务被贩夫走卒"絮絮叨叨"，简直不可想象，更何况人们还发现宫廷中有些卑劣的仆人居然在推波助澜。其实，这些消息本来就出自宫廷，渗入民间，之后又伪装成新消息重返宫廷：

> 某个怯懦的朝臣写了一些无耻的诗，通过宫中的仆人们传出去，传到平民的菜场和集市上。又从集市传到手艺

人的耳中，后者在为王公贵族们服务之时又传给他们听。于是，不需要多少时日，这些话就会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蔓延开，带着最完美的伪善语调：“你读过了吗？我来告诉你。所有的巴黎人都在谈论这事了。”[25]

王室接触平民，平民巴结与宫廷亲近的大人们，而宫廷相信这些新闻仅仅是因为满大街都在传。这种谣言的无意识传播方式让当局者害怕，所以他们使用各种阴谋诡计，用他们所特有的矛盾方式来篡改民众形象，以助长这个过程。首先，民众不应该被告知，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了，那就应当为他们提供仅指向他们的信息。民众会轻易相信这样的信息。然而，另一种情况是，大人物们自己也被“传闻的合理性”所说服，这些传闻之所以能持续传播，是因为民众相信它。民众的言论起初是不被当回事的，但最终却出于政治目的被重塑。可就是在对它的否定中反而激起了它的表达。

然而，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而言，仍然认为公众需要被指点，（“各个阶层都需要书籍，他们都享有脱离无知的平等权利，”[26] 梅西耶写道），却又不想让他们享有获得信息，或者形成个人观点的权利。于是，这种观念是呈螺旋状的，民众被归咎于他们的轻信，旧调被重新提出：民众无需对公共事务认知清楚。

历史学家、手写新闻和公众舆论

对那时的人而言，手写新闻像是重重迷雾，历史学家发现了它们，至于它们对舆论的影响，他们同样也很困惑。关于这个主题，近期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27]。

有些人（以达尼埃尔·莫尔内和罗伯特·达恩顿为代表）认为——当然，他们的观点也有细微的差别——民间流传的各种各样意图坚决的小册子、煽动性的招贴和手写传单，损害了君主形象的神圣性，破坏了国王与臣民的关系。另一些人（如米翁肖尔·茹）认为小册子的作者们“利用了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来大肆宣扬他们粗俗且居心叵测的作品”。丰克–布伦塔诺在其关于费加罗的作品中指出[28]：“新闻工作者们散布消息，他们也许对国家首脑、宫廷、王室和大臣有敌意。到处都有反映大众意见的新闻工作者涌现。”面对这些矛盾的表述，夏蒂埃有不同意见，他认为“阅读和信仰”之间有直接联系，这是存在争议的，并将目光集中于传递民众不满和世俗化的政治活动上：“认为对君主制离心离德不一定是思想作用的结果。它的出现可能源于日常活动的即时性、未经思索的姿态，以及逐渐司空见惯的话语。”[29]

让我们稍微变换一下角度去思考另外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时常在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笔下出现，也会一再被夏蒂

埃提及：巴黎充斥着真真假假的消息，可能导致饱和。换句话说，人们的反应虽然很强烈，但也是很迅速、很短暂的。尽管有些时候，他们也许会很冷漠，但依旧是很短暂的。人们马不停蹄地从一种情况过渡到另一种情况，张贴得层层叠叠的告示确实能煽动民众，但他们忘得也很快。“将告示撕去的人也就是张贴告示的人，否则长此以往，街道就会被混杂着神圣和亵渎内容的纸给塞满：主教训谕、江湖骗子的广告、法院的逮捕令、行政法院的撤销逮捕令的决议……寻狗启事、领圣体公告、灵魂契约。”[30] 这还不包括招贴、诽谤文章以及自相矛盾的手写新闻，它们在头一天晚上写好，第二天就被淘汰了。

故而，气氛经常被煽动，重要的不在于身边的消息是真是假。因为人们经常处于中间地带，这使得他们很烦躁，充满骚动。舆论也知道与新闻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去想象谁是谁的由头。此外（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到“恶性言论赖以生存的环境”一节再做讨论），民众舆论不会因持续阅读小册子或招贴而涌现；它们不是直线发展的，也不会将大量的阅读作为争论的基础。在文字与读者之间存在距离，他也许是笑眯眯地读着，然后很快忘记。就像梅西耶一再清楚分析的那样：“那些我们今天极为渴望的被刻画得极为精致的细节，半个月之后绝对会变成让人漠不关心的东西……日常记录会落入意味深长的遗忘中……人们经过、观看（阅读）、微笑、耸肩，之后便不再想起。”[31]

的确，非常清楚的是，除了报纸之外还有很多谈论政治的

方式。人们日复一日的行为和习俗在面对政治和王室的各种事件时被塑造出来，巴黎的氛围有助于人们产生这样那样的态度，对国王的支持或反对都是根据每一天王室的不同表现评判出来的。这些都是可以看见的，不管其回应是激情洋溢的、郁郁寡欢的或是咄咄逼人的。

公众舆论与众多现象有关，正是这些现象使得舆论参与进来并激起它的思考：这些现象涉及各种不同层面。舆论可能与国王有关（国王要求的王室庆典或公开行刑），可能与阅读有关（即阅读布告和报纸），但更多的却是与行动有关：一旦领不到薪水，罢工就开始了，公众群情激愤走上街头，就什么是合法之举展开抗议。面对某些具体事件，“关于……的看法”是出于不同的动机而形成，它们不仅依据事件本身，而且根据其形式与形态，甚至所发生的地点，按照自己的机制展开。形成不同看法的动机没有层层叠加以便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日益巨大、可控且有效的舆论。与这一过于简化的模式相比，机制是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这些舆论形式可能会与事件的产生方式相适应，与能够产生并表达思想的争论相适应，与对看到的和听到的事件的表达相适应。于是人们越来越肯定自己的认知与评判权在被构建着。这是 18 世纪的新气象之一：与禁令相比，思考的合法性占了上风。反抗是有效的，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条件下，它推动了勇敢与自信，它们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功绩。那么，思考还需什么分寸？舆论不是海浪，不断地壮大只是为了拍打光滑的海岸。相反，特殊情况会引发有条理的评判，

它们在不久之后可能会出于其他原因，而产生其他的思考形式，甚至与最初的思考没有必然的关联。从大量或引发批评或博得赞同的事件中，会产生与最初相去甚远的信念，实质在于它的新姿态——如请愿的合法化，有权进行反对的思考，不再依附于某人，拉开个人与国家的距离再思考。从这一基本态度出发，对事件的解读发生了改变，同样改变的还有精英们的态度，他们不得不承认下层人也在传播社会知识。可见手写新闻是快速又庞杂的信息变化的一个积极因素，但并非核心。

教会新闻

在日记、回忆录、警方报告和手写新闻的笔下，民众言论的地位摇摆不定：极少有人能保留其原样，有人对它的异国情调感到吃惊，有人严禁其表达，还有人因它的突然出现而错愕不已。它被监视、被压制，被作为消息来源之一。警方懂得如何操控它，该在哪里打击它。言论被拒绝、被收集、被利用，它历经各种各样变化多端的反应而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清晰，围拢在明确的事件身边，正是这些事件逐渐改变了它的轮廓。

《教会新闻》，冉森派的主要出版物，其存在的主要意义在于：据我所知，它是给民众言论如此多空间，或者说是如此吸引公众舆论的唯一一份报纸。它的推广策略是，民众是冉森派

所有活动的最佳、最积极的评判者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民众掌握着罗马、教会和君主永远想要践踏的真理。

《教会新闻》首发于1728年[32]：其主要目的是将《乌尼詹尼图斯谕旨》的始末及其影响告诉他们认为不偏不倚的公众。虽然冉森教义的第一波浪潮似乎已经被终结，1711年乡野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①被完全摧毁，然而对冉森派教徒们的强力打击反而激发了冉森派教义在社会底层民众中传播。1713年，《乌尼詹尼图斯谕旨》将凯内尔的著作《福音书道德沉思录》(*Les reflexions morales*）判定为禁书，民众的反应格外激烈。掀起了一场政治论战，法院的极力辩护使不承认凯内尔神父的两个提案遭到了激烈抨击。这两个提案是关于开除教籍的。凯内尔认为教会应该拥有权威，但他同时加了这样一句话：

> 对于被不公正地开除教籍的担心不应阻止我们行使自己的权利。只要人们还爱上帝、爱耶稣、爱教会，出于慈悲，他就无法脱离教会，哪怕他被某些人恶意驱逐。(让，9，23)

法院拒绝禁封此书，因为害怕来自罗马的开除教籍事件会削弱国王或臣民的权利。神甫和教徒们狂热地支持这一态度，针对教皇的权威展开广泛的抵抗活动，否认教皇在上帝与国王

① 这一修道院是冉森主义的中心。

间扮演的角色。然而，事态愈演愈烈，冉森派教义追求纯粹与绝对，要求神甫和信徒不向任何事物妥协，其中包括君权。

《教会新闻》讲的就是这场“战争”。它类似文学报刊，出版周期并不固定，但是频率很高，大概三周或者一个月就会出一期。通常情况下，它的容量是 4 到 8 页纸（有时会更少），介于报纸和书籍之间。在《教会新闻》里，人们可以读到主教训谕、冉森派或耶稣会士的批评文章、索邦大学的论文概要，甚至还会读到一些详细而冗长的故事，叙述了在冉森派堂区发生的各种灾难性事件、少数狂热的冉森派教徒、那些拒绝领圣体的人，当然还有关于法院的争论、整个法院被流放、国王主持的最高法院会议，以及法院对国王的谏诤书和皇家敕令，都是这个世纪中期值得注意的事件。《教会新闻》的原则就是将冉森派从 1713 年《乌尼詹尼图斯谕旨》——所有不幸之源——颁布以来所受到的迫害“呈现于公众眼前”。下面是《教会新闻》第一期的卷首语：

> 自 1713 年《乌尼詹尼图斯谕旨》颁布，教会已经历经各种巨大的不幸，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不幸一直在不断加重。对此深感忧虑的虔诚信徒认为，正是这灾难性的教谕造成了一切，它将成为对教会影响最广泛、最引人注目、最痛苦的事件。其结果已经很好地证实了这些观点，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会让它们更加确定无疑……许多教士还固执地认为这只不过是留待神学家们讨论的学术观点……

并不适合信徒们参与或知情……我们都知道，形势愈发严峻……大家都迫切地想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将所有事实更好地展现于公众的眼前呢？只有通过这份名为《教会新闻》的小报了。

消息从法国的四面八方传来，来自巴黎的最多也最详细。无需言明自《教会新闻》创刊以来，就被当局视为心腹之患，当局总是不懈追捕它的作者们，但总是徒劳。《教会新闻》从来没有停止过发行，而文章的作者们以及报纸的编辑们也从不会被捕。但负责印刷和兜售的人却经常被捕，饱尝巴士底狱高墙内的辛苦。如果说《教会新闻》让警方尤其是埃罗总监不胜其烦，那么对于回记录作者们来说，则对它推崇备至。马雷、比瓦、巴尔比耶都怀着深深的敬意大量引用它的文章，为它一直挑战当局——每一期都能找到颠覆性的内容——并总是在与当局玩的“捉迷藏”游戏里获胜而感到高兴。它始终存在，可是一旦人们想要触碰它时，它就消失不见。《教会新闻》对历史记录者们也有同样深远的影响。它集神奇与现实于一身，是挥之不去的幻觉，嘲弄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其中包括国王和教皇，都让人震惊。并且就算它的发行网络如此有名，却从来找不到它的作者。当巴尔比耶描述这份近乎神奇的报纸的运作原则时，他毫不掩饰自己惊奇的语气：

当《教会新闻》的作者开始起草新闻时，他们会把使

用过的作为资料的便条全部烧毁。之后，再将自己的文稿交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在重新誊抄之后将原稿付之一炬。第三个人会带着抄写好的稿子前往印刷处，再带回印好的报纸在巴黎城内分发。我猜在城市不同的街区，可能有20个工作室，也就是说有20个人，每人负责100份左右。将报纸送往这20个工作室的不是同一个人，应该会有20个不同的人肩负此任。工作室的负责人将100份报纸的钱付给将报纸带给他的那个人，额外免费得到一份。同样还有负责印刷事务的人，他也知道将印好的报纸交给谁，自己才可以拿到钱。一旦某天早上，有人逮捕了这些人中的一个，其他人马上就会警觉起来，稿件就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结果就是，不管他们抓住了谁，曲柄都照常运转。[33]

显然，它“运转”得很好。

尽管这一出版物极为特殊，它和我们先前说到的历史记录者和回忆录作者的作品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我们可以看见它带给底层人民什么，在那些或让人兴奋或痛苦的时刻，它对普通民众的言论和行为是什么态度。我们也可以先试着去了解言论在叙述策略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毕竟这些讲述都是为了给读者们留下记录和回忆，为了让人严肃认真地评判那些被认为应受谴责的事件。

《教会新闻》中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在所有神学

类书籍和论文中，都会讲述那些重要的时刻，让人得以了解那些影响到平民日常生活的事件。大量生动的对话被嵌入故事里：有时是刚刚做完弥撒的教民间的对话，有时是神父与信徒间的交谈，还有时是下级警官与堂区教民间的激烈争论。举个例子：主教下令让一个神甫“调职”，这位即将离开堂区的神甫主持了他最后一场弥撒；在主日讲道时，他宣布这是一个强加于他的决定，并一再声明自己对冉森派的信心。弥撒行将结束时，出于对事态的担忧，警察到场，警务人员和警官们想要控制可能发生的骚乱。《教会新闻》讲述着信徒们的言行，他们与神甫话别，并反对警察的干扰。这些都被事无巨细地写下来，主要人物的名字，他们说的话，他们怎么哭泣、下跪甚至试图说服警察：这是不公平的。

《教会新闻》总是很细致地关注普通人的行为，他们每一个行为都是珍贵的、重大的且有交流意义的。这种叙事方式与比瓦、马雷和巴尔比耶有着显著的区别，对于他们三人来说，底层平民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轻蔑、粗心与惊奇的情绪中摇摆不定。而《教会新闻》信任民众的所言所感，同时鼓励民众参与事件。“激发公众舆论”总是和“鼓励世俗教徒参与”[34]相伴相随。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教会新闻》相信公众舆论，二是它坚信世俗教徒们有能力做决定。在那个时代（那可是1728年）这是非常新颖的，产生的结果至关重要。事实上，没有任何其他的记录者或报纸会为民众话语拟制出版计划。《教会新闻》对民众言论的态度与别人截然不同，民众言论是它的基础和支柱，不

难看出它为普通男女开辟了与冉森派教义规划的路线不同的道路。于冉森派教义而言，民众表达仅仅是个开始。

讲故事是种策略，《教会新闻》的策略就是大众化：一旦反对谕旨的战争打响，它就必须依靠最底层的信徒了。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信念。巴尔比耶曾经写道这是“一个持续运转的曲柄”，而近来卡特琳娜·梅尔（Catherine Maire）[35]则把它比为一种“以想象的公众为对象的机器”。

任何时候《教会新闻》都不会编派它所面对的当局。事实上，它特别注重收集某些事件影响当局的方式。它不可能囊括所有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事件，只有涉及谕旨的事件才会出现在《教会新闻》上，在成千上万的纸张中找到关于其他传闻的做法基本都是徒劳。没有记录者们深爱的有趣的传闻，没有珍贵独特的轶事，甚至连当时引起轰动的重大诉讼案、骚乱事件都没有见到，更不用提比如1750年的多起儿童绑架案，1775年的粮食短缺。就连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这一在当时充斥各大官方以及地下报刊的事件，它都鲜有涉及。关于这件事，直到1757年3月30日，它才有一些影射（而刺杀发生在1月5日）。至于1775年路易十六的加冕礼，只字未提。相反，纸页上满是与冉森派教义相关的新闻，在这些文章中，民众出现了，这是其他任何报纸都不曾有过的。必须强调的是，《教会新闻》不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也不具备大众性，它的存在只是因为受到威胁的冉森派教义恰好遇到了人民。这里肯定存在一个矛盾：尽管《教会新闻》花了大量的笔墨格外精细地描

绘民众的世界——这是其他媒体习惯避开的话题——将他们的一举一动和啰啰嗦嗦的话语搬上舞台，但它依然脱离民众活动的其他方面。人们不可能不去思考，第一次给予民众这样的地位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一旦意识到他们有能力去思考教会和冉森派教义，就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们对一切公共事务发表看法。不仅如此，《教会新闻》的读者被要求为他们自己所披露的真相作证：这使得他们，作为个体，会更有能力谈论自己与国家间的关系。

关于镇压的故事

《教会新闻》记下了警方的所有镇压行动，镇压的对象有神甫、堂区教民以及所有疑似冉森派的嫌疑分子。镇压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以至于人们都难以感受到它的存在了。以 1728 年为例：诺阿耶主教（巴黎大主教）一度被认为是反对《乌尼詹尼图斯谕旨》的，但是，10 月 28 日，他突然宣布自己接受该谕旨。于是每个人，包括警察和民众，都陷入恐慌。从那天起，《教会新闻》花了大量的篇幅刊登反对神甫和信徒的申诉书及密札。警察登门拜访有嫌疑的神甫，搜查他们的房子，还强行将若干教士带到警察总监埃罗面前。“在巴黎，人们都在谈论有关威胁、绑架、逮捕甚至更糟糕的事。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被人们称为‘苍蝇’的家伙们占领了圣热娜维耶芙山……一个

名叫加拉尔的执事被关进了巴士底狱。”还有其他的故事，比如一群警察冲进圣埃蒂安教堂的神甫们家里：

> 这次突击惊动了所有的街区，先生们搜出了200多个参与集会的人，信奉宗教的善男信女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们证明自己的情况多么值得同情。许多勤勉于堂区事务的女孩和妇人们都认识他们，她们流着泪抱怨令人不满的不公，有些人甚至跪了下去……警务人员都被打动了。[36]

到了1728年12月，情况并未发生改变。于是，人们像念祈祷文一般讲述着他们所忍受的各种烦恼：一个名叫瓦纳鲁的警官和勒纳尔警长被派去执行这项恼人的任务。当时他们怀疑莫贝尔街区加朗德大街上的制帽商，结果他们所到之处都被人跟踪，四处受到指责。那位名叫舒瓦西的制帽商，错就错在拥有大量教士客户。那些满大街流窜的“苍蝇”就此认定那里为冉森派教徒的据点。瓦纳鲁和勒纳尔在光天化日之下“屈尊”来到了被“苍蝇”们指定的小店。勒纳尔警长几乎是一进门就认出了自己的朋友舒瓦西，并为自己的出现向他道歉，声称是受了国王之命。他小声嘟哝着自己只是在一些店铺查走私货物。“然而，他还是怀着一丝羞愧离去，向埃罗复命。”

可能有人会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不久之后，还是在1728年，警方报告上也讲述了同样的事情，并着重强调民

众的气愤之情。在1728年10月16日的报纸上，我们可以读到：

> 据说将圣埃蒂安教堂堂区的三位教士逮捕入狱引起了全体神职人员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据说之所以将他们关押起来，是因为他们被怀疑是教会报纸的执笔人……不管怎样，人们都说这甚至比宗教裁判所还可恶，每个人都视弗勒里为暴君。
>
> 自从诺阿耶主教发布宣言后，一切都陷入混乱。还能向谁倾诉对红衣主教的不满……整个巴黎一片沮丧……人们高喊着弗勒里和诺阿耶是混蛋和异端分子。

“苍蝇”听到这样过激的言论，为这样的骚动而震惊：

> 人们惊讶地谈论着昨天巴黎人为暴动所做的准备。听说甚至需要一些警务人员去控制圣婴喷泉处的挑水妇女，因为她们把张贴在教堂门前的三份主教训谕涂上了泥。[37]

到处都在窃窃私语，说警察总监本人也被那些需要严格执行的命令弄得不胜其烦，“他甚至也恳请国王收回成命，毕竟没有任何理由就去迫害公众是不合适的。”关于这一点，巴尔比耶有着奇特的评论，似乎开始怀疑埃罗内心的信念：

我们不可能知道关于冉森派埃罗先生到底是怎么想的。从其行为看，他在做他应该做的，也是出于职责不得不做的事。但是他手下有四分之三的人，包括办事员、警长和下级警官都是支持这一派别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所揭露的事情比实际存在的要少得多。"（这会不会也是巴黎的"骚动"？这意味着就连警察都是亲冉森派的。）只有勒纳尔警长和瓦纳鲁警官还在忠心耿耿地工作，泰然自若地执行任务。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忠于宪法的"警长和警官。[38]

喷薄而出的民众言论让"苍蝇"们错愕不已，时而甚至让他们感到恐惧：

可以肯定的是，听到的话全部都是未受教育的人在反对体制，就连挑水的妇女或锁匠们在他们家门口，都会公开反对，毫无敬意地谈论罗马教庭。[39]

因而，《教会新闻》既没有想象也没有滥写：它们所披露的都是确确实实被警方报告记录在案的事。这两种性质的资料在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下相互呼应了。当然，它们叙述的方式不尽相同：《教会新闻》把警方的行为置于特定的背景下，每个事件都具备同样的特点——可耻的镇压和屈辱的不公。每一次事件都会陷入令人悲叹的境地，同时号召人们不要消极应对。

“我们对此不能无动于衷。”《教会新闻》如是说。这其实也是报纸的策略。无论是指令还是揭发，都应产生效果：之所以记录下来，就是为了用这种叙述方式刺激读者，强化他们内心的信念。

马雷谈论了由《教会新闻》完成的大量文献工作。我们还可以说，它的叙述表达为街头言论筑起了一道水泥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座基石。因为它的存在，言论有了支撑点，可以相互依存、重新活跃并伴随着阅读被传播出去——这是它的新颖之处——并且通过关于冉森派的争论渗透到其他领域。其他任何一部历史记录都没有给予民众言论这样的地位。在推广、交流、揭露的过程中，《教会新闻》开创了一个超出预期的体系。手写新闻让言论爆发，加以扩散；警方报告以小故事的形式讲述它们；《教会新闻》则集中于个体意识上，给它们施加另一种影响。此外，它公开批评下级警官、警务人员和当局的方式，使得批评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得以确立。

《教会新闻》的启发是宗教性的，但它带来的变化是惊人的：正是它，让最底层民众的话语变得有效。

个体的地位

《乌尼詹尼图斯谕旨》的历史就是一场战争，一场民众的战争，《教会新闻》记录下这场战争，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平凡而卑

微的个人身上：他遭遇了什么，如何反应，他的经历非凡、孤立且非典型——但对于很多其他人又很普遍。

在街道上的男人或女人，都不再像此前的记录那样，是人群中的无名氏，或只是一些非同寻常的、涉及谋杀或是冒险故事的主角。他们就是与众不同的个人，有着独属于他们的特点，存在于一系列对他们影响深远的事件中。关注无名的个体，是《教会新闻》众多故事的主题之一，无论他们来自巴黎还是外省。然而，《教会新闻》的信息网络十分宽泛，它从各类出版物和作品中获取信息，发布与每个教区主教态度相关的讯息以及法院的各种活动。民众的地位并不固定，只有当他们突然出现时，才会拥有确切的地位。他们会以最原始的方式被展现，表现出民众如何承受围绕他们发生着的历史。

《教会新闻》管理着这些个体，同时又给于他们信任：信任那些贫穷、卑微、患病者的话语和判断，就如同信任主教一样。它以全新的方式将单独的个体从大量无名的人群中抽离出来，完全依托于与他们相关的事件。这是一种新颖且明智的方式，它将有意识的个体视为有能力的主体。

在这里，我们早就习惯的，历史记录者和回忆录作者们关于 18 世纪的传统视角被颠覆了。民众之所以独特，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可怕行径——偷盗或是谋杀——容易轻信或是过于天真，而是因为他们存在于自己的历史中，历史正在以他们所见的方式被固定下来。他们对于人和事的评价让他们获得尊严，或许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作为一股有影响的力量而得到认可。

怀疑与批评的正常状态

作为个体为人所知，民众有了名字也有了鲜明的个性，他们还被引入某个群体中。《教会新闻》在面向读者介绍他们时，通常会使用代词“我们”，这便让每个人都融入集体中，在面对当前的形势时，就再也不会陷入孤立的境地。“无论是那些想要逮捕我们的人，还是让我们在法院出庭的人，无论是神甫、世俗教徒们，还是那些质询我们的人，不管他们相不相信，这都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40] 当人们的生活与情感被刻画出来后，当他们被重新赋予鲜明的个性后，“我们”的使用可以将所有人凝聚成一个思考和反抗的整体。当《教会新闻》对王室和教皇的权威提出质疑时，读者们会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置于与之相同的立场上，因为它一直在说“我们”。修辞学在此得到了很好的运用：通过对个案的描述将读者变成其中的一分子，《教会新闻》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一片新天地，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融入共性的事业中，同时又不会抹煞属于他自己的历史。比如，在那些涉及警方镇压的故事中，会引发大量对警方高层的批评。让巴黎人仇视警方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二者总是呈势不两立之态，可以肯定的是冉森派事件决不是第一个引发二者对立的原因。相反，对于国王秘密而微妙的反抗就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做到的了。《教会新闻》挑起战争的方式或可作为

范例，读者早就与之融为一体，所以心甘情愿，更何况他们被视为行动的主体以及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群体中的一员。从那时起，他们便会追随着反对国王的精妙言论，成为新思想的缔造者之一，试图在对王室应有的尊重与反抗之间达成和解。

> 对于一个明君，我们不会评论不佳，可是也要相信，就算我们对他不那么言听计从，也并不意味着他有什么不好，我们只是不服从他，并非不服从上帝……我们对他说……就算是君主也无权将教会的法律变成国之大法，而他受到误导将谕旨当成了教会的法令……一旦涉及信仰，没有什么力量有权迫使人们保持缄默。

我们还能举出其他例子，证明报纸用狡黠的方式地将自己的批判立场转嫁到读者身上，并让读者以为这是他或同伴本身就持有的观点，同时还向他们保证，这样做并不会对君主造成损害。将君主与信仰剥离开来，在当时看来，这可是个激进的立场。然而这种激进会因为君主只能赞同这样的态度而得以缓和。不服从国王成了一种自然状态，但这并不是在质疑君主的贤良，亦不改变对他应有的尊重。在这样的修辞手法中，违抗命令被去除了戏剧化的成分。难道在 18 世纪之初，还有什么比拒绝国王的命令更为严重的吗？这种去戏剧化为批判与反对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在这里读者坚信他们可以一直爱戴国王，而国王也一直会爱他们。

作为能力的话语[41]

《教会新闻》的作者们确信所有男人与女人都有能力参与这场关于神学的争论，并对其产生影响。他们的能力应该得到承认，他们的话语证明着思考的能力。故而，为了得到承认，必须揭露所有成为阻碍的事物。在对冉森派有特殊意义的两个历史时期，《教会新闻》尤为关注最底层信徒的请愿形式，并充分利用他们的愤怒：一是在事关要不要融入基督教文化时；二是在涉及告解证事件和拒绝为冉森派教徒做临终圣事时。

考虑民众难以了解当时发生的诸多事件，《教会新闻》在这一领域会做得更加精细。观察到人们的渴望（跟警方的密探们所做的一样），它记录的都是在它看来“下层人”被限制知道的事。自从诺阿耶的主教训谕（意味着他接受了谕旨）被公布以来，当局传递信息以及民众持怀疑态度接受信息的方式都加剧了紧张局势：传达新闻的布告被有意贴在了高处，还有哨兵在附近巡逻，以防它们被群众撕掉。在广场和十字路口有负责监视的低级警务人员。“尽管哨兵们在密切监视着布告，还是会有人用泥浆将其覆盖掉，又或是在哨兵们看不到的时候将它们撕毁，甚至在天黑以前，它们就几乎全都被撕掉了。”把布告贴得那么高只不过是个没有任何效果的诡计，只会引来嘲弄，更何况主教训谕旁还贴着《乌尼詹尼图斯谕旨》的原文。他们居然

还很有心地将这份“出自教皇之口，愿所有信徒共受的”谕旨仅用拉丁文公布，足见“有多么害怕会引发骚乱或是使自己难堪”。《教会新闻》流利地讲述着公众的反应：

> 或许你会想要知道这种奇怪的方式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人们对布告的看法。在这座伟大城市的各个角落，你都会看到，每个人依据自身情况，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交谈着，关于这一事件竭尽全力表现出自己最自然的基督教徒的灵魂。起初，关于这份新的布告，大家都很震惊……人们读着，却完全无法理解。[42]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每个人都在表达，人们饶有兴致地以自己的方式思考，每个人的思考方式都不尽相同。一个十分生气的女人如此表现：

> 她感到十分惊讶，一个人们希望她视为信仰和行为准则的东西，居然以一种她完全不懂的语言被公布出来。其他人还使用了一些更激烈的言辞与表达，我们都不敢说。[43]

为了更好地理解谕旨，每个人都展开想象，拉丁语阻止不了任何人，因为布告的读者们已经建立起了坚固的同盟。认识或是能读懂一点拉丁语的人会努力地“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告诉那些语言不通的人”，这便在巴黎的广场和每个十字路口渲染

出一种奇特的氛围：布告贴在高处，下面的人抬着头，有人要撕掉它，他身边围着一群人读着拉丁文的只言片语；周围躁动的人们，听着别人读出来的内容，并将它们转达给最底层既看不懂也听不明白的人。稍远一些还有一些喋喋不休且义愤填膺的评论者们围绕在人群周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低级警察们，后者尽管面露尴尬，却也不得不因为职责所在而坚守岗位。所有人都知道这种传播方式是不公平的，会造成知识的不平等，这诡计着实太低级太拙劣。当民众先是低声抱怨接着开始反抗时，《教会新闻》的作者们站在了他们一边：一场真正的论战出现在报纸的字里行间，围绕着是否要赞同训诫尤其是基督教的训诫。耶稣会士们遭到强烈的谴责，因为他们不希望信徒们阅读《圣经》，甚至不让他们阅读任何传统教理书。而冉森派的立场是支持信徒们的："坚持一个可笑而错误的问题简直就是浪费时间，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要剥夺民众的基本教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理解神学所有的条条框框。"[44]

《教会新闻》要么探讨民众对于知识的渴望，要么就在报纸上再现想要了解真相的人之间的对话。于是，有了马丁·博德里耶的故事。他是一个马车夫，因兜售禁书而被戴上枷锁，之后又遭到巴黎和鲁昂最高法院的驱逐。他起初被关在夏特莱，后来被转移到了巴士底狱，在那里，一位耶稣会士探视了他，把他教训了一番：

耶稣会士卑鄙地指责他之前的仆人身份，以为这样就

可以羞辱他。耶稣会士用轻蔑的语气对他说一个卑贱的奴才是不可能成为神学家的，“奴才”一词被重复了好几遍。然而，对囚犯而言，类似的指责并不能像说话者所以为的那样对他造成侮辱，他回答说，除非是被迫成为神学家，否则任何人都不能无视自己的宗教，只要你稍稍了解一下基本教理就会知道谕旨是违背教会精神的。[45]

知识与社会等级出现在《教会新闻》的字里行间：读者不可能置身事外，即使他们发现报纸的小伎俩，也会想起在教会成立之初，最底层的平民曾占据的重要地位。从1728到1730年，由《教会新闻》引发的争论开启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涌现了诸多与冉森派教义相关的事件。18世纪初，承认民众言论的能力毫无疑问会显现出信息的强大与新颖，以至于听众当即就会利用所听到的信息。《教会新闻》确实玩了手腕，但是它也确信自己会被底层人民听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可能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1748—1750年：巴黎医院事件

对冉森派的镇压是严酷而阴险的，然而我们可以进行以下思考：由教会官方和君主确定的目标果真都是合适的吗？他们的计谋会不会在某个时期适得其反呢？事实上，慑于冉森派教义对巴黎人民不断增长的影响，当局开始涉足一些他们认为影

响较大的地方。在把堂区神甫们都调走之后，巴黎的教会负责人们决定“清洗”那些以疑似冉森派神甫和世俗教徒们为主的大医院。事实上，无论是仁爱医院①、比塞特雷医院②还是萨比里埃医院，都有无数人友善地为穷人和病人提供服务。尽管深受民众爱戴，这些“虔诚的世俗教徒们”还是被突然免职了。

> 1749 年 4 月 10 日，虔诚的世俗教徒们像五十年来一样前往探视仁爱医院里的病人。他们行动一致，从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汇聚起来。尽管彼此并不认识，但是，因为他们经常相遇，仁慈之心很快会让他们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在博蒙大主教眼中，这种行善之举变成了伤风败俗的行为。有人推断说这些世俗教徒们很可能是冉森派教徒。只要被怀疑与冉森派有关，就要让这些先生们远离仁爱医院。[46]

这一决定引发了骚乱与悲愤。医院是最敏感的地方之一。要知道对于穷苦人来说，医院是他们最熟悉也是最可以寄托不安之心的地方[47]。在底层民众的生活中，医院是一个在他走投无路之时可以去投靠的地方：无论是善良的还是不善的人，无

① 法国的若干城市都建有名为 Hôtel-Dieu 的医院，用于收容孤儿、贫民和旅行者，主要由教会掌管。其中 Hôtel 一词源于拉丁文的hospes、hospitis，意为热情好客，故在此翻译为仁爱医院。

② 比塞特雷最初是路易十三于 1633 年专门为残老军人所建的医院。后来，在医院被毁坏之后，在此建立了同名的监狱，后文会有所提及。

论是病人还是流浪汉，甚至是囚犯。触及民众生活中象征慈善的中心——在他们的想象中，这里就是慰藉恐惧之所——是一件严重的事，不能无果而终。

医院事件并不止于此：尽管有些犹豫，但克里斯托夫·德·博蒙大主教[48]还是驱逐了唱诗班指挥，限制着某些神甫们的活动。为了不让他们忧心，他在谈论自然神论和加尔文教义时，甚至还谈到某些德行恶劣之人突然闯入禁闭室……他从不使用冉森教义这个词，而只是说仁爱医院可能会是一个“新的热内夫”(nouvelle Genève)。一个细节引发不满：图书馆里，“所有的法语书都被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主教大人让人送来的拉丁语版的日课经和一些念珠……”[49]还有更加荒诞的传闻：为了能继续为医院里的穷人们服务，神甫们乔装打扮成世俗教徒的样子。当然，有大量的陈情书被呈报给主教以及各位大臣，向他们抱怨这些新的决定对这三所主要医院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在某次事件之后（有人在一个小孩的书里看到了帕里斯执事的祈祷文），教区的本堂神甫前往比塞特雷医院的小图书馆。他根本不顾孩子们的哀求，没收了所有能找到的东西。其中一个孩子奋起反抗，说：“这就是您口口声声对我们说的，我们可以将您视为可敬的父亲和听我们告解的善人！是您从我们手中夺走了上帝。您想让我们去领圣体，可您却又搬走所有对我们有用的书，那可是为初领圣体所准备的。”本堂神甫继续他的走访，为了确认冉森派教义没有在围墙之内肆虐横行而一个接一

个地询问神甫们。此时，用法语祷告又成了问题。事实上，本堂神甫曾因此指责神父们："让穷人们用法语祈祷，你们会成为嫌犯的。"其中一个被指责的神甫回答说："的确如此。可是，只有这样他们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回答一语中的，直指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它所讲述的故事里，《教会新闻》的叙述策略都是清晰而有效的。在各种牵扯之下，每个事实都能与这个、那个人（大街上的一个女人，或是医院里的一个孩子）相关联；于是，这个人就会将自己代入事件中。此外，出于理性，它坚持报道被其他媒体轻视或是佯装不知的事，即人们对于信息、信仰的文化反应，对人们受教育能力的探讨，对读者角色的定位。它坚持仆人与主人一样拥有尊严，让平民有可能参与到他们所知道的、看到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中。

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战争。阅读这些文本，我们可以看到"正统的"主教们和神职人员们是如何严肃而审慎地待人接物。当局对于"穷人之地"（指医院）的介入，那些侮辱、人员调职、年幼儿童的呼声，足以证明他们所面对的是怎样尖锐的矛盾。通过"命名"镇压之举并给文化争执以广阔的空间，《教会新闻》让民众言论赢得了自信并让其反抗和挑战的能力得到更好的运用。

1750—1756 年：拒绝为冉森派教徒做临终圣事

当出现告解证事件和拒绝为冉森派教徒做临终圣事的问题时——即要求濒死之人出具神甫的证明——就为事态的扩大做好了准备。这时，《教会新闻》又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详细地记载了这些波及普通民众及宗教人士生活的事件。从一则又一则描写得惊心动魄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发生在巴黎或是外省的故事里，教士断然拒绝给垂死之人做临终圣事，因为他们没带告解证，无法证明自己与冉森派毫无瓜葛。在萨比里埃医院，有人要求40名修女出具告解证，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羞辱：

> 甚至还没等到人死前那一刻就要使用告解证。他们折磨这些可怜的女孩，要么交出告解证，要么就让她们说出做告解的神甫的名字，便可将其停职……他们甚至用密札威胁她们，毕竟，为了在谕旨问题上争取更多的民众，他们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他们说除了对神甫和修女们进行严格的终身监禁之外，什么都做不了。[50]

克里斯托夫·德·博蒙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了“煽风点火者”，狂热地推动着他的斗争行动，在巴黎的某些教堂里，甚至可以听到这样可怕的主日讲道：

> 在讲坛上，人们心怀恐惧地听到这样滔滔不绝的布道：宁可把面包拿去喂狗也不能让它们成为叛乱者的食粮。[51]

但有一个麻烦：如果要修改与医院相关的规章制度，就需要国王的声明。1751 年 3 月 23 日，这份声明由地方各法院全体会议呈报给了最高法院，为医院拟制了新的管理规定。经过认真讨论，最高法院于 7 月 20 日召开全体会议，对声明进行表决，讨论应该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部分修改，还是上书国王请求他撤销这份有悖于以往所有规章制度的声明。最终以 70 对 45 的表决结果，第一方案获得通过：声明中的条款做了些许改动，只有符合该条款时，声明才能被执行。很快，在巴黎，一份印刷品以极快速度传播着，它告诉公众都做了哪些修改以及为什么要这样修改，它就是《详解 1751 年 7 月 20 日对 3 月 24 日的声明的修改及其动机》。

接着，国王与法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1751 年 8 月 3 日，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奉召到贡比涅面见国王。气氛并不融洽，在接见他们之前，国王让他们干等了超过一天的时间，之后又将原定会面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一个半小时。几乎是一踏入国王的书房，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就听到了国王的训斥：

> 我召你们前来是想告诉你们，我对法院关于我于 3 月 24 日发表的声明所做的决议十分不满。我决不允许它们被执行，只希望我的决定得到坚决而纯粹的贯彻。[52]

得到这样的答复，法院并没有让步。当《详解修改动机》

一文被明令禁止出版之后，法院再度于 8 月 30 日上书国王。比塔尔和他的妻子维尔纳夫只不过是印刷并分发了这篇文章就被国王的一纸命令送进了巴士底狱，甚至都没有在警局履行任何手续。他们在狱中度过了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一如人们在报道中常见的那般饱受苦难。

9 月 5 日，国王对大家的谏诤书做出了回应，重申了对其声明的执行命令。期间，拒绝为冉森派教徒做临终圣事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同时还伴随着毫无意义的骚扰，惹得民怨沸腾。为了得到一张告解证，人们不仅要接受《乌尼詹尼图斯谕旨》，承认帕里斯执事是个遭天谴的家伙（已经够过分的了），还要交出他们所拥有的书籍。禁书都被付之一炬，其中还有很多常见书籍，如《耶稣基督启蒙录》(*Initiation de Jésus-Christ*)和《有关告解圣事及圣体圣事》(*Instruction sur les sacrements de Pénitence et d'Eucharistie*)，这两本书深受民众喜爱，几乎每家都有，有些还是口袋本。“整座城市都在低声抱怨”，《教会新闻》如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大声宣布再也不去聆听训诫或是做忏悔了。又一次有新的事物出现了，《教会新闻》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鼓励。像 1730 年一样，《教会新闻》不再详述对冉森派教徒的镇压，转而强调纯粹的个人意识，在某些情况下——告解证是其中之一——纯粹的个人意识可以反抗国王的命令。在涉及“个体”的领域中，这是一次质的飞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可以理性地掌控自己的灵魂。这一空间是不可触碰的，在这里，只存在个人与上帝的对话。无论是谁，个

人、教会领袖亦或王权都不可轻易涉足于此。法院越是与国王对抗，民众就越是强烈地支持法院。一个缺口被打开了，取而代之的是法官们的政治支持。反抗国王不再是错误，而是职责所在，在濒死之人与上帝之间，容不下多余的命令。直面忏悔和死亡的内心不能被有悖于信仰的镇压行为所玷污，那时，《教会新闻》又一次替穷人的认知和他们的内心信念辩护，信念应该得到尊重，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底线，哪怕是国王也不行。总之，在上帝与个人之间“正式”建立起一个地带，而君主应该从这里撤离。在拒绝为冉森派教徒做临终圣事这一事件中，宗教与政治联合起来了，于是便埋下了被颠覆的隐患，而在当时，或许根本没有人对这一隐患有充分的认识。

这场激战的核心——主要是为了了解个体的产生——1752年2月27日，一篇署名普拉德先生的论文出现在了索邦大学。这本不算什么事件，如果文中的有些提议没有被视为“危害社会安定”的话。巴黎大主教又一次活跃起来了，他发布了一条主教训谕，明确指出宣扬“所谓符合理性的平等的权利，就是普拉德先生想让所有人来到世界都带有的权利”，本就是桩耻辱的事。在《教会新闻》里，这件事得到高度关注，报纸上满是拒绝做临终圣事的故事以及对普拉德先生论文的评说，为的是强调人人平等的理性思想。日常之事很好地映衬了文中的分析，同样，普拉德先生的思想也滋养着那些反对告解证的人们。于是，对那些敢于违抗国王和教会命令的著名人物的描写，十分有效地印证了这一思想，即每一个理性的人都可以理性地要求

精神自由。《教会新闻》的笔调越来越激进：事件与思想间的不断变化，为个体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去维护他们的信仰。

拒绝做临终圣事的长期争论演变成了一桩政治事件[53]，当法院最终遭到长达几个月的流放（1753—1754）时，事情被激化了。自从国王做出流放法院的决定，君主制就开始衰落。于是，路易十五试图与法院达成和解，去接受大量的劝谏和最高法院的意见。1755年，路易十五在巴黎召集了26名主教，询问他们该如何中止告解证（早在1752年他就尝试过同样的努力，但是很快又撤回了命令）。然而，一切并没有真正结束，因为1756年10月16日，一封来自教皇的通谕表面上看赞同这一决定，其实只是缓兵之计，只是再次重申拒绝为公开自称为冉森教徒的人做临终圣事。

从宗教到政治

如果想用几句话来为这份影响广泛甚至可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下报纸作结，就需要再度重申它的民众视角。它为之竭尽所能，却也仅限于那段历史时期，即《乌尼詹尼图斯谕旨》影响到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时。面对整个18世纪层出不穷的各种事件，它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透过这些有限的事件，它们依旧塑造了一些自由的新领域，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裁判。《教会新闻》中关于拒绝为冉森派教徒做临终圣事的故事，

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正是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此时国王与臣民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臣民有可能不再顺从国王。此外，宗教与政治两个领域也在悄然转变，它们的联系日益紧密，也对个体的态度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还伴随着新的特点。

《教会新闻》的读者有充分的理由将自己有决定意义的才能施展到众多其他领域，而不仅仅只是涉及与冉森派相关的领域。冉森派的出版物紧紧抓住公众舆论来反抗君主和教会，在这份秘密发行的报纸中，言论被视为合情合理，它拥有着任何其他新闻或是故事都不曾赋予它的全新地位。它决不可能一无是处。

第二部分

谣言：形式与动机

巴黎充斥着耳目、言论和诅咒：城市的民众都热心于用围观和讨论来满足好奇心[1]。巴黎贪婪地享用各种谣言与表演，却难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任何事情都能激起巴黎人的兴趣，这一特点也成为历史学家分析巴黎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让我们花几分钟来看几件事：只需要读上十几页书商阿尔迪的记录，就立即可以感受到当时处处充斥着谣言与表演的氛围。阿尔迪是18世纪下半叶巴黎的见证人。

1769年6月8日。巴黎盛传新教皇已暴毙，这一传闻持续了好多天，有人甚至谣传教廷大使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罗马的消息。后来人们才知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闻，是因为国王宣布了一个名叫勒帕普①的人的死讯，他是一位死在荣军院里的战士，享年100岁。

1769年9月4日。这一天，新桥周围有5家商店开业，他们为公众提供阳伞以便在过桥时遮挡阳光。每把阳伞要6个德尼尔，人们在桥这头付好钱就可以拿一把伞，走到桥那头就须归还。这样吸引了大批人群。

1769年12月9日。这一天，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幽灵回荡在卢韦先生家的某个房间里，他是制造弦乐器的，家住小十字街，与圣奥诺雷只隔着一条街。不少人受好奇心驱使前去一探究竟，渐渐形成了争先恐后的人

① 法语中，教皇被称为“pape”。

潮——这对急切想要获得新消息的巴黎人来说并不是什么让人惊奇的事——最后惊动了警察总监大人，于是下令搜查那幢房子及其周边区域，甚至还在房门口加派了哨兵。

1771年9月27日。一大群人围观一块重达62875磅的石头，长10法尺①，宽9法尺，厚5法尺。它将被作为圣热娜维耶芙教堂三角楣的两个角之一。从上个礼拜四开始，人们就马不停蹄地将它运往那里，大石来自孔弗朗的采石场，在荣军院的港口上岸，途径地狱之门和圣雅克教区，石头一直被瑞士军团的战士们用滑条车拖拽着运输。[2]

巨石、教皇之死、鬼魂萦绕的屋子、穿过新桥时打的阳伞，一切都足以让人吃惊，足以自娱自乐，也足以与人分享。然而，巴黎人也同样关心国家和教会的运作，关注司法和物价税收；他们评判着王公贵族也评判着法官，评判着公务员也评判着为数众多的佃农；他们了解警察和他们拐弯抹角的手段。他们对社会和政治事件的看法建立了新的形式且是基于一些赋予他们力量和逻辑的动机。这就是我们将要审视的，我们会从各种原始资料出发展开思考，这些资料包括警方记录、日记及回忆录。

① 一法尺相当于325毫米。

第三章
多变性与碎片化

那些被许多人陈述的观点，那些于公众间流传的批评，并非是以混乱或重复的状态从天而降，而是从具体情况中产生的。它们的强度会有所变化，有时某个领域会放大它们，促进它们的发展；它们被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地表达出来，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被添油加醋，或被某些标志性的故事补充，这些故事会让流传的话语更具想象力。

对公共事务的评判建立在总体形势上，这意味着它们的地位与构成经常会变化。面对千变万化的情形，这些观点被确认，被再度确认，最后销声匿迹，又或是附着于其他事件上，借助新观点或表达形式而重新抬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衡量舆论，然而有时会有办法将公众意见凝聚起来。这些方法有其固有的生命力，伴随着画面、文字、语言，有时甚至还有暴力；它们飞快诞生又飞快死去，抑或相反，它们会停滞在不断重复出现的词句中。舆论不是各种道听途说的“关于……的意见”的堆积，它是摇摆不定的洪流，形式不断变化，内容和强度也不断改变。舆论几乎不可能是自发的，它总是互动的，并以某种方式调节着，由此产生

形象，其中一些因为得到支持而不断发展壮大，而另外一些却会很快没落，因为并没有得到大众的接受。

让人惊奇的首先是它的流动性。言论与批评总会忠实于街头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这让广泛传播的事件和传闻得以为每个人所接受、所操控。无论生活在大楼、街区、市场还是堂区，都可以轻易接触各种言论。言论内外间的流动性让情感和思想得以即时传播，时而偏激，时而严肃。正是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传闻，将开启——或许也不尽然——真正的评判，开创“关于……”的舆论。舆论和它的制造者一样，在时空中迁徙。这样的变化到了上层人士（日记作者及君主制的权威们）口中，就成了舆论是任性而多变的。至少，它是难以捉摸的，它总是在这边诞生的同时就在别处湮灭，因为它的形式和动机已然陈旧。甚至可以说，在巴黎，它有成千上万种理由进入千千万万个家庭，拥有成千上万种形式，却始终没有哪一种能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公众舆论”。由于它形式多样，所以总呈现出碎片化，这取决于它赖以生存的兴趣的多样化：也许此处谈论的还是关于工作的规章制度，而在彼处却是两场罢工。人们看到流浪汉与低级警务人员间的冲突，于是评判警察。今天，人们认为公开执行死刑是不公平的；明天，王后要去行安产感谢礼，人们又会去关心君主制“运转”如何；而昨天，墙上张贴的布告还在讽刺摄政王，却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它。

分散的碎片化符合社会的流动性及信息传播方式，信息不受等级和阶层的约束，席卷整个城市，其中既有传闻、谣言，

也不乏重要消息。人们从所见所闻中获取消息，也许并非有序，但也绝非完全无序。于是，评判依托消息而形成。尽管后者很快会被遗忘，但并不能阻止人们了解和掌握它们的渴望。这是在真实与虚假中艰难的游弋，有时甚至不得不停留在“可能真实”的一边——如果可以的话。

观点和舆论不仅关注集体事件，也关注琐碎的小事。对个人和个体新闻给予特殊的关注，这并不是说公众可以准确地辨识出宫廷与君主政体，例如他们并不知道国王和王后所代表的可能是不同的利益，无法将王妃与情妇或情妇与王太子妃区别开来。舆论动机的个性特征与公共事务所呈现出的戏剧性相吻合。后者也是多样化的，迥异的个体上演着一幕幕场景，并且被分别评判，这些评判会被传播出去。旧制度时期，政治生活无论对个体还是政治家都同样重要。宫廷本身也做出了表率，其政治建立在围绕在国王身边、又保持距离的人们之上。事实上，在宫廷社会里[1]，每个人的等级和地位决定着自己与他人的差别。每个人的地位都是确定的，这种秩序得到精心地维护，故“个人的社会存在可以通过自己及他人所给予的表象而完全得以识别。某一社会立场的‘实在性’只是舆论对它的评判而已”[2]。在宫廷代表制体系中，重要的是其他人如何评说每个人的地位。如果说每个人在这个体系中暴露无遗，在可能的情况下，公众非常关注地位和差距的变化就不足为奇了。更何况，18 世纪时，信息——如我们所知——并非统治手段，因此，那个时代的各种事件，包括王国所发生的大事，都只能零碎地表现出来，或者通过要么晦涩要么极

尽卖弄的方式才能被看到。秘密是一条准则，只有那些故意要让公众知晓的举动才具有可见性，于是公众的目光因无法窥见全貌而变得更加敏锐。他们充分利用每个细节：在他们看来，每个事件都有深意，他们从自己掌握的或是在大规模隐瞒下偷偷获取的情报碎片入手，探寻更深层次的意义。这不仅可以解释舆论的分散性，也可以解释人们对独一无二的特殊事件的极大兴趣，以及从缺失的信息中受益。这还可以解释为何难以对某些事实准确分级。事实上，政治事件的秘密性越强，那些最小的事件被赋予的重要性就越大，否则便无法明确知晓它到底重不重要。民众舆论承载着暗中揭露的重任，因为知道自己被排除于政治之外而变得更加毒辣。

危险的嘲笑：招贴与讽刺诗

墙上贴满了“可恶而充满煽动性的招贴”，这令当权者们深感恐惧，但撕下它们也是于事无补，因为那些张贴它们的人知道该怎么做。

> 1768 年 11 月 9 日上午，有人在市场上发现了一张新的恶毒且充满煽动性的招贴，它被强力胶精心粘在了一块板子上，之后整个板子又被粘在了墙上。它的内容是如此骇人，以至于警长把它从墙上弄下来之后，还用了一块布

把板子蒙住，让人在里头一点点地将布告从木板上刮下来。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更多人看到它。[3]

我们承认这是蒙蔽群众的常用手段，为的就是不让他们知晓。然而，巴尔比耶和阿尔迪告诉我们，类似的招贴依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些人，例如阿尔迪，为此感到惋惜，这样做只会“扰乱民众”，让他们造反。还有些人，例如梅西耶，则认为招贴实在太多，尽管可以吸引民众的注意，让他们面带微笑地读，但转身也就忘了。然而不管怎样，冷漠也好，娱乐也罢，摄政期以降，招贴成为表达反对的常用方式。这些招贴都是匿名的，以一种蹩脚的方式写作，拼写毫无章法。尽管如此，它们依然通过揭露或谴责而在城市中留下印迹。它们互相评论，互相转述，满足人们贪婪的好奇心。它们还承袭民众惯用的尖锐讽刺。一旦民众开始批判某事，它们就会公开嘲弄、讽刺，于是难以得知究竟是招贴激发了讽刺，还是它们自己借用了这一习惯的谴责模式。事实上，招贴及其尚未成熟的原生状态更符合传统社交中的口语表达。

公众舆论借由嘲笑、玩笑与愚弄表达出来。阿尔迪说，当难以采取直接行动时，讽刺诗是“巴黎人发表意见的惯用手段，是精神武器”[4]。饶舌是件可怕的武器，尤其像女人不绝于耳的唠叨，是最让人害怕的。用词激烈、滔滔不绝、富于煽动性，这些话语尖锐刺耳，让警方高层都目瞪口呆。

讽刺且带有诽谤性的公众舆论，是在面对断章取义的信息

时的自然表达：嘲讽的力量和毁灭性的言论足以抵御事实的冲击，使用它们的人深知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赞赏是蠢才的风格”[5]，谢弗里耶在他的《年鉴》中如是说，他特别强调讽刺对于消灭对手的重大意义。讽刺诗也会歪曲事实，因为众所周知，事实有时难以捉摸，而且政治事件的“真实性”又从来不可能完全公之于众，人们所能掌握的不过是事实的零星片断。疯狂地攫取片断，改动甚至篡改词句，为的是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整个局势，那是当局从不可能向公众完全澄清的局势。讽刺的笔法赋予作者表述权，如不使用讽刺，他就会受到约束，甚至更糟糕的是被禁言。就如让－克洛德·拉维在为弗洛伊德的书所写的再版序言里所述，那是“被禁锢的压抑”[6]。讽刺诗在话语的整体缺失中赢得一席之地，“(巴黎人）贪婪地吸取着批评、讽刺与嘲弄”[7]，这种难以抑制的贪婪在缺失中扎根。对消息的诽谤与嘲讽，得以让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了解一点所谓的秘密。它与阿谀逢迎是截然相反的模式，后者支配着宫廷与王公贵族们，尤其当他们出现在公共场合时。“恩宠”如此重要，意味着前途与荣耀；嘲弄的力量显现出来，并逐渐渗透到没有溜须拍马的地方，即尚未被这一刻板程式所同化的公众中。[8]

介于古代与现代之间

一旦事件发生，民众所做的就不仅仅是评判它们，也要依

据当时的社会氛围来诠释事件及王室的举动。一旦民众不满的时候，就会顺着这种情绪去解读国王和王后的个人轶事。君主和王公贵族们陷于各种批评交织而成的网络中，他们的缺点和过失都被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他们的形象、态度、公开讲话构成评判的基础，借以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显贵们的生活因紧张的社会局势而得以为人所知，每一个可供批判的微小举动都足以用来评判整个政治形势。

对君主形象“异乎寻常”的解读彰显出他们的重要性。这种解读通常是矛盾的：纠结于复古的需求和变革的热情，几乎没有中间地带。

一个历史时刻将会证明这点。1728 年，一篇关于《乌尼詹尼图斯谕旨》的文章横空出世，特别围绕诺阿耶主教态度的转变进行阐述。这位曾经支持冉森派的主教，发布了一条为民众所不齿的主教训谕，宣布赞同谕旨，要求执行谕旨。街头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人们深陷被大主教抛弃的苦痛中。人们公开斥责这条主教训谕，也第一次将国王的所作所为解读为背叛。于是，对国王形象的认识也进入了新阶段：怎么看都是令人失望的。与传统的君主相比，他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国王似乎被无视了；在人们所期待的新的宗教和政治表现上，他也是令人失望，因为国王拒绝采纳。这个自相矛盾令人失望的君主进退两难，在要求国王继续以传统的名义行事的同时——他不会再这么做了——他又被指责无法理解业已在他的臣民之间产生的政治上的改变。这相反的两端造成了紧张的情绪。

1728年，国王被民众视为不务正业。人们出于对路易十四的怀念，改变了对路易十五的看法。太阳王竖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当政治上的困难愈发严重时，他的形象得以进一步强化。事实上，摄政期的种种表现足以让人忘却路易十四统治末期的惨状，而只显示出太阳王的伟大与威严。路易十五被路易十四的阴影笼罩。在打击冉森派的那些年里，国王的每一个举动都惹来巨大的非议。国王喜欢狩猎，这原本是一项显示男子气概的传统活动，也是每个王公贵族都应该热爱的活动，但到了路易十五就成了众矢之的。国王应该爱打猎而不爱打仗，这是路易十四积极推崇的观点（但他却为战争耗尽国力）。可是，人们在私下嘀咕的却是路易十五是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只知道与鹿群开战，如果他喜欢打猎，就应该喜欢打仗，二者相辅相成而不能只择其一。

随着一个奇怪的逻辑转换，国王又因残暴而备受谴责。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国王热衷于战争，那他将永远摆脱不了被人称为“残暴”的命运。但如果他只是毫不收敛地热爱狩猎，那么他所谓的残暴就会是平庸且微不足道的，毕竟打猎并不能让他得到什么。然而，事实为证，有人讲述了一则关于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被国王身边的一个瑞士卫兵强奸了。女孩的父亲满怀愤怒地上书国王，请求严惩凶手。但路易十五对此不以为意，没有履行诉讼程序就把那个瑞士人给打发了。此事一出，巴黎一片哗然，更因小女孩选择了轻生（她还不满九岁，完全无法承受这样残酷的打击）而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于是人

们纷纷私语，国王是个野蛮角色，如果真是这样，最好能让他去战场上证明一下。

也许国王是很野蛮，但他还体弱多病，常年卧于病榻之上，这成为他遭人诟病的又一原因，尤其是对于那些想让国王成为强悍的征服者的人来说。然而，一旦国王生病，民众又极其关心他的病情，并为他的每一次康复而欢欣鼓舞。可即便如此，国王的行为依旧不尽如人意。1728 年 11 月，市场上的妇女们像往常一样前去祝贺国王康复。与路易十四截然相反的是，国王根本没有让她们进门，并拒绝接受她们的祝福。受辱的女人们回到巴黎，严肃发誓从此不再遵循这一惯例，连最循规蹈矩的妇女们也有了这么激进的改变。国王不按惯例行事，那么她们也会痛苦地离开，她们觉得路易十五和教会一样，对底层民众开战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路易十五并没有听从臣民们要求改变的呼声，他时不时还保留着过于传统的做法。1728 年的皇家庆典备受瞩目，因谕旨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加上对神甫们的迫害，民众对国王及其政策越发持怀疑态度，从而议论纷纷。因此，当国王和王后抵达巴黎时，警方密探记下了广大巴黎市民对路易十五沿途所施小恩小惠的不满之情。有人听到了尖刻的批评，谈论着“滥用”。咖啡馆里，有人说就算国王要愚弄百姓，至少也得表现得大方些。另一个人回嘴说：“那还不如把那些钱发放到堂区，让那些神甫们分分算了。”[9] 这些观点透露出双重意味：一方面，民众并非一群毫不犹豫接受施舍的动物；

另一方面，应当对堂区神甫们给予信任和必要的恩惠，而不是制造这样可耻的氛围——在每个礼拜天的主日讲道结束后，人们总能看见最优秀的神甫们被捕。所有的不满都是有理由的。

稍后还有一件事让民众的信仰和信念感到难堪。1728 年 10 月，王后因一直没有生出儿子并为此深感对不起国王，决定前往巴黎圣母院及圣热娜维耶芙做九日祈祷。对此，人们感到“荒谬至极”。民间爆发激烈的讨论：

> 有些人说，上帝也许可以赐给法兰西一些男孩，可不管怎样我们都应顺从上帝之意。另一些貌似并不信仰上帝的人说，上帝根本不会屈尊来管理人间生育之事，关于这一点，其实只是动物本性使然……另有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闹剧，无论是九日祈祷、朝圣、赦罪或是其他的宗教仪式，都是人类发明的——这冒犯了上帝。还有人说，其实王后只要待在凡尔赛祈祷就可以了，根本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地前往巴黎——这简直就是异教徒的做法。[10]

这些意见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是批评之辞。无论如何，国王和王后都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要么被怀疑没有遵从神的旨意，这对于君主来说是极为严重的；要么他们就被认为狂妄自大到违反自然规律，居然敢要求上帝屈尊去操心那样一件事（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观点，国王和王后居然被视为具有一部分的动物本性，这完全背离了神圣化……）。这根本

就是个死胡同，更何况王后驾临时——据说——毫不谦恭也没有下车，就像路易十四和他的妻子一样。

混迹于人群中的警方密探们听到这些对持续多日的公开祈祷的不满之辞，有的人甚至说："王后怀不怀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就算陛下生不出儿子，我堂堂法兰西也不会没有主人。"这堪称是对这一做法的极限挑战，几天之后还有人补充说："如果说国王是上帝选派给人民的，那么上帝一定是在极其生气时挑选的国王，我们应该视其为暴君。"

对国王和王后的批评，在王室极力打击冉森派教义时出现，从中可以看出公众态度的转变。紧张局势的出现，是因国王无法满足相互矛盾的要求，因为他总是让人失望，他废除了一些对民众依然有效的惯例，却又固执地保留着对他们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陈规。与《乌尼詹尼图斯谕旨》相关的诸多事件，加上堂区教民们对教皇及君主控制的有效抵抗，使得反对国王的话语愈发坚定。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国王做了什么，没做什么，都通过"警方的绑架"和关押而被民众认知。那么，因为民众的不满，王室典礼中的每个细节都会被作出不利的阐释。公共舆论将王室的行为作为对当时各种事件的补充说明。

小故事在话语中的作用

每当稍有动荡的政治事件引发公众的关注时，巴黎城里就

会涌现出许多与之相关的小故事或令人不安的社会新闻，它们和事件的发展过程相伴随。在街头，对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事件的评论是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形式散布开来的，其中有一些与现实吻合，似乎将事实用容易理解、貌似合理的方法讲述出来。又好像这个社会中的政治生活总是以讽喻或传说的形式被讲述出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制约每个人，并与令人难以理解的信息相匹配。公众察觉到社会政治上发生的事与这些半真半假却从来都无法考证的故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自由地流传着。它们的作用之一是拉近民众与事件的距离；于不透明的背景下揭示意义；以耳熟能详的趣闻或是"民间"故事的方式，占领远离政治的领域；让人们逐渐了解国家秘密。1723 年的摄政王之死，1732 年圣梅达尔狂热的冉森派教徒以及堂区的关闭，是三个盛产故事的时期。这些故事半真半假，使得民众得以度过当局以神秘色彩遮掩的一些关键时刻。故事、传闻、社会新闻掀起了帷幔的一角，表达着"难以表达的事物"：对于岌岌可危的现实来说，它们是令人安心的隐喻。

摄政王死于 1723 年 12 月 3 日，三位作者记录了此事，分别是比瓦、马雷和巴尔比耶。尽管围绕摄政王之死，他们笔下的故事各不相同，但都表明在当时特别的氛围中难以获取真相，而且都反映出民众对这出传奇剧的感受。

让・比瓦讲到，摄政王临死前要求选几个侍女陪葬，他想靠和她们的聊天排遣黄泉路上的孤独，接着便开始为他的"悲惨生活"伤心。马雷更慎重一些，他的故事处处体现出作者的

谨小慎微，几乎每一则都用“据说”开头。据说，摄政王临死还跟他的情妇在一起；据说那时已经很难找到一个愿意给他放血的外科医生了，这时他众多侍妾中一位名叫萨布朗的女士说：“没必要给他放血了，他刚刚在妓女身上放过了。”他还说，一旦摄政王死去，他的尸体一定会在悠悠众口的各种“咒骂”声中穿过巴黎城。至于巴尔比耶，自诩为唯一一个了解真相的人，他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当事实“越是被隐藏，它就越真实”：为了将摄政王的心脏埋在圣宠谷，他的尸体被开膛破肚了，说时迟那时快，他生前驯养的一条丹麦狗扑了上去，飞快地抓起心脏，一口吞下了四分之三。巴尔比耶补充说，这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诅咒。因为这种狗的名声很好，不会特别贪吃。还有各种疯狂的故事在巴黎流传，关于心脏和狗，关于被啃噬的尸体和嘲讽的公众。这里，显露出一种粗暴的社会想象，是关于错误与惩罚的。有人问一位男仆，是否看到关于心脏的一幕，他回答说：“没有，但是我看到他的灵魂穿过地狱之路。”剖开的尸体、游荡的灵魂并非随意取道。无论是尸体穿过城市时人们的窃窃私语，还是狗吃了摄政王的心脏，其实都是殊途同归。众多小故事只是为了更好地阐释民众的感情。摄政王之死遭到鄙视，这显示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里人们对他的怨恨。这种有失偏颇却绝对可怕的怨恨只有借助于画面，才能得到真正的表达。心脏被狗吞下，无疑是最具冲击力也是最生动的一幅。它显示了民众一种阴暗的残暴心理：作为臣民，他是不可能“噬君”的，但是王室的一条狗却可以吞下他的心脏。既然

摄政王可耻地死于交媾之时，人民就可以羞辱他的尸体，狗也可以啃噬他的心。一切都已就位，只待小国王路易十五长大成人。正是那些可怕的、让人惊愕的讽喻让这种决裂得以隐晦地表达出来。

另外一个故事让女人尤其是最底层的妇女们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帕里斯执事死后，很多人前往他的墓地哀悼、冥想。渐渐地，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治愈效果。于是到处都有人在谈论奇迹，很快人们蜂拥前往墓地，狂热的善男信女们请求救赎，滔滔不绝地谈论着预言。这些人中，女人比男人要多得多，她们任由自己的身体浸淫于各种挑战着时代的理性、精神及肉体的奇闻轶事中。她们的反抗虽无声却激烈，通过预言，反对宗教和全社会所遭受的污秽。她们强烈咒骂那些玷污宗教并迫害劳苦大众的教会中人。世界末日常被提及，仿佛这一巨大的变数会让世界在回归上帝前沉沦。这一现象引人担忧，在弗勒里的命令之下，警方高层要求诸位密探、暗探和“苍蝇们”不间断地前往墓地监视，以便将狂热分子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上报，也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潜入人群，窃听人们关于此事的私语[11]。几乎没有人谈论此事，但是，坊间流传的许多故事都在批判女性的贞操，认为她们都是放荡神甫们的牺牲品。“人们乱哄哄地聚集在一起反对罗马教廷，以极端鄙夷的语气谈论着它，有些人说，教皇的信仰其实跟一条狗没有区别，也与那些捍卫教皇法的人别无二致。”[12] 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就跟狗一样，妇女们是他们的牺牲品，这样的表述是刻薄的。每一次，人们都会将放

荡的教士与冉森派教徒进行对比。后者虽然贫穷却总是一丝不苟且尊重女性。每一个地方的人都热衷于谈论某些修道士们寡廉鲜耻的生活，或总主教府上的奢靡之风。1733 年 8 月 12 日，“一则传闻震惊了整个上流社会：圣保罗的一位神甫强奸了某位议员的盲女并使其怀孕。”[13] 接着，国王的官员们成了被抨击的对象：在欧塞尔的驳船上，官员们强奸妇女；圣安德雷艺术大街上又一个年轻的女孩被强奸了，她还那么小；还有一位侯爵被指控强奸女仆并致其死亡，但他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法律根本不起作用。”人们都这么说。

有一次还牵连了警察总监，引得谣言满天：

有人不得已报告说，坊间都在传总监夫人的男仆或是某个随从的风流韵事。据说总监夫人想找人绣一幅适合夏天用的室内装饰品，于是她从圣马塞尔的 100 位绣娘中挑选了 9 位，让她们共同完成这幅作品，同时选了一位男仆来管理这个临时绣坊，据说就是这个家伙，与这 9 个姑娘都发生了关系，并且每个人都怀了他的孩子……几天之内，这则消息就传遍了大街小巷。[14]

无需再举更多的例子。还有人说某个不要脸的神甫一到晚上就追逐女人，莫伯广场的某个加尔默罗会修士绑架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并带着她离开，让女孩沦为他的奴隶。当然，人们也会听到一些截然相反的故事，诸如某些品德高尚的女士前去拜

谒国王，恳请他对政策做出调整：

> 民间有传闻说有个出身高贵的女子，或者至少是举止端庄有着好名声的女子，在凡尔赛的小教堂里，趁着陛下听弥撒的时候对他说了这些话：陛下舌头下含着一枚硬币使得他无法开口说话，如果他不拿掉，他和整个王室马上就会完蛋。[15]

这段时期，奇迹与狂热在圣梅达尔持续发酵。

当某一事件打破社会结构时，总有一些标志性的故事为它提供证明或是反证，为难以支撑的现实提供有效支撑。狂热分子们动摇着社会秩序，他们的预言威胁着社会安定，巩固着民众的信念，民众们本就对冉森派教徒所遭受的迫害印象深刻。于是，有些社会新闻会比其他的更重要，回忆录将之记录了下来。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那些故事都在恰当的时候填补了空隙以便现实得以持续。既然淫秽弄脏了社会，那么主角自然就是女人。贞操于她们是最为宝贵的，可她们也应该为失去贞操负主要责任。因此，自然会有许多关于被强奸的女人的故事。相反，也会有关于贞节烈女想要拯救世界的故事。就算是神甫令她们堕落，也只是想透过教士应受谴责的群体形象推广纯洁的冉森派教义。人们都乐意传播的社会新闻塑造着、解释着事件，赋予它意义，带来某种公众精神。当年轻的女子们激动不安，宣称她们的童贞正受到虚伪的基督教会威胁时，公众

便相互讲述肮脏的故事。故事里，正是那些教士甚至主教们通过应受强烈谴责的强奸行为，卑劣地夺走她们的贞洁。

有些地点特别适合事件的发展壮大。事实上，一些地点足以让事件产生戏剧化的效果，这表现在那些冗长的且或多或少让人心惊的、旨在缓解或强化社会政治环境的故事中。

墓地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偌大的城市中，只有它在生者与死者之间维系着意味深长的联系，它的围墙之内幽闭着所有关于信仰和生命的秘密。在那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把想象带入未知境地，那里黑暗大过光明。作为神圣而不可侵犯之地，墓地经历着各种特殊之事，让人焦虑。有人说，带着恶臭的有毒气体从那里散发出来让人昏迷，甚至有时在夜里还能听到隐隐的爆炸声；人们时常会听到一些难以解释的声响，很可能是那些被活埋的人发出的痛苦的叫声[16]；有时，到了深夜，一些身影悄然出现（都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拨弄着余温尚存的尸体，试着对生前自愿为科学事业献身的尸体进行解剖。墓地是人们熟悉的地方，既充满奇幻，也满是风俗与禁忌。从1728年起，圣梅达尔墓地就充斥着各种事件，在那里，人们毕恭毕敬地埋葬了帕里斯；在那里，病人们得到些许安抚；在那里，狂热分子们大声咒骂也高声请求着，在他们的身上野蛮地烙下了被称为“救赎”的印记。

人群蜂拥而至，只为看一眼上帝的印记。然而，当警察开始执行逮捕计划后，一切都变糟了。“简直是闻所未闻，”人们窃窃私语，“他们居然要来插手上帝的秘密。”况且，每个人都

深知随处可见的著名通告的含义："从国王到上帝，一条信息再明白不过：此处严禁奇迹。"

国王在上帝制造奇迹的地方对他的臣民开战，根本就是罪过。此外，公众还对一件事气愤至极："警察们居然在这里口出狂言，说着以 B 和 F 开头的词①……他们至少应该尊重一下墓地，这里毕竟是神圣之地啊！"[17] 同样地，他们也无法容忍低级警务人员持枪保卫"仁爱医院"，"类似的做法只会令国王和教会蒙羞"。在这些批判的言辞中可以肯定的是：国王不能凌驾于上帝之上，否则必遭天谴，每个人都预言说"国王和弗勒里很快就会受到惩罚"。

然而，民众中又有谁可以惩罚国王呢？于是谣言和故事到处乱窜，传播着君主政体对宗教的亵渎，讲述被过分夸大的事实。人们的诅咒显现出来，据说：

> 人们盛传两个低级警务人员突然死在墓地里，他们为自己大不敬的言行付出了代价，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就地埋葬。

> 人们还说警察总监总是在午夜时分前往圣梅达尔，陪同他的还有两个泥瓦匠，为的是挖出帕里斯执事的尸体，其中一个泥瓦匠正准备抡起十字镐砸向墓地，突然就离奇

① "B"指的是"bordel"，相当于中文的"滚你妈的蛋"，"F"指的是"foutre"，中文译为"该死""见鬼"。

死亡了，另一个名叫塞尔维亚的泥瓦匠也在几天后死去。

之后，在1732年，有人说："一些高级教士们将会暴毙，这是他们因自己的恶毒行为所遭受的惩罚。"

人们经常谈论的社会新闻之所以都是关于"暴毙"的故事，还真不是偶然。在18世纪，暴毙是件让人心惊的事[18]，它剥夺了一个人所有赎罪的可能性，因为他不能领受临终圣事。那时，暴毙代表着上帝对一个人的永罚。此外，如果暴毙之人睁着眼，那么每个人都能瞬间从他眼中读出惩罚的意味。

大部分关于公众事件的社会新闻，显然与现实不符，这些主题的反复出现也绝非偶然。它提醒人们注意，民众更愿意回想的是对自己有利的，或有助于反抗自己当前境遇的事。流传着的小故事（那是从千万个故事中选出来的最便于讲述的故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之所以民众话语可以牢牢掌控它，是因为他们千方百计地去探寻故事背后的深意，并且围绕该意义，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找寻它的源头，建立起自己的信心。

分化的舆论

民众很少达成一致，警方的暗探们就算可以记录不同阶层的不同观点，也是枉然。他们看起来好像并未如实记录一切，大多数报告更倾向于群体性：要么不满，要么满意。这样的表

达方式符合当局的精神，对当权者来说，民众舆论依然根植于某种社会政治的空白中。有时，监视者们所看到的变化，好像既没有让他们修订自己的判断，也没有让他们思考某一观点可能拥有的地位。要知道为了追踪这些观点，他们可是收了人家钱的，也花了大部分时间在这项“事业”上。

公众舆论从来就不是由某一集团发出的，也绝不会用同一种声音表达，不可能没有任何差别，也不可能没有变化。所有相信这一点的人都会得出传统的“下等人”的形象：本能而激情四射的反应，不具备察觉事物的细微之处并进行细微调整的能力，而这些都是政治家们所擅长的。事实上，那时民众与国王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遵循着各自的利益原则，相互间出现了不协调甚至是对立的立场。

举个看似无足轻重，其实对臣民们来说很重要的例子：1729 年 9 月 4 日，王太子降生。这一天，警方的一份报告是这样开头的：

> 总的来说，王太子降生让全体人民尤其是下等人欢欣鼓舞。可以说，他们开始表现出快乐，还自以为是地说王太子定会如他们所愿拥有至福，他们相信国家会从此安宁。国家安宁，在他们看来就是减免赋税，让他们有更多喘息的机会，从此生活也会变得轻松。[19]

直到此时，民众的天空依旧蔚蓝，没有一丝云朵出现在地平线

上，“下等人”期盼着安宁的公共氛围，远离冉森派事件带来的阴影。如果他们期待的赋税减免得以实行，他们的生活会轻松许多，幸福感会增强。每当国王的孩子出生，人民都被描绘得如此心满意足，这只不过是毫无新意的老一套。上面提到的警方密探在他的报告中又用一系列评论来显示出民众的不同意见和担忧，与报告开头所言截然相反，已经有人开始操心国王和王后关系的改变。王后终于生下男孩，她对于国王的影响会日渐深重，这并非坏事——可是，人们担心她会让她的父亲，波兰国王，无论是取道圣日尔曼莱昂还是万森讷，最终目的都是来辅佐国王。这样的想法让人不寒而栗，却也让那些希望弗勒里倒台的人们满心欢喜。这些预测表现出民众的担忧：无能的国王放任他的妻子；而弗勒里，一位大臣，滥用职权，试图取代国王。王太子的降生开启了其他的剧本，改变着路易十五统治之初各种错综复杂的局面，那段时间真可以用“灾难性”来形容。

在巴黎人眼里，手工艺者代表着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参与各种国家内部冲突，在同行的煽动下容易群情激愤[20]。时事对他们而言从来都是多艰的，经济困难总是他们最先感知，以至于面对王太子的降临，他们抱怨说：“都是因为他，国王才下令让他们关了店铺。”在他们看来，不让赚钱与当时的情景极不相称，“如果有人可以为他们提供节日期间享用的吃喝用度，他们或许也会很乐意这么做”。[21] 唱颂《感恩赞》的同时应该取消人口税。他们的怀疑压制了他们的喜悦，为了抑制喜悦，他们

抱怨着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举措："如果做不到，"他们说，"我们就不该抱有希望。"

沉闷的气氛，与报告开头第一段话所呈现的热烈大相径庭。而且，矛盾的消息接踵而至，甚至都不给人留下任何思考的时间。

更糟糕的是，一种不祥的征兆笼罩着每个人，告诉他们王太子的诞生根本不会带来任何慰藉。事实上，凡尔赛的居民们（乡巴佬们）只是想借此喜庆之机向国王递上一份陈情书，为的是"重新赋予他们已被剥夺的特权"。然而，很快，一张告示就被张贴于大街小巷："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向国王提出任何请求，否则将被关进监狱。"这种做法让人不满，不过是提个请求而已，至于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掺杂如此深重的惩罚吗？面对这则消息，人们变得愈发愤怒，控诉着弗勒里，后悔曾想让王后对国王施加有益的影响。满街都是招贴，在小酒馆里，人们谈论着一个"野蛮的"国王。

当国王决定在弗勒里的陪同下出席 9 月 12 日在市政厅举办的庆典时，民众倍感失望，那里将举行一场"丰盛的晚宴，还有节日焰火"。这则消息不仅没有让任何人感到喜悦，相反，还深化了人们对国王所下的"野蛮人"的判断。在某个十字路口，可以读到一张"义正言辞"的招贴，称王太子为"和平者"，而他的父亲——国王则是"忧郁者"。

随后，在国王的授意下，一切到此为止：他恼怒于自己的所见所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所收到的报告大为光火。于

是，他下令停止一切庆祝活动。1729 年，街头的人们在经过短暂的休整、一闪而逝的希望后，再度忧心忡忡。“人们都在说如果弗勒里继续抓捕冉森派教徒的话，王国里就要发生暴动了。”[22] 9 月 26 日，一些讽刺性的招贴出现在了圣玛德莱娜教堂门口，文章大肆抨击了国王和巴黎大主教。此外，因为国王不同意减免赋税，人们就大肆攻击他的野蛮，甚至开始期盼“陛下但凡能做到他那伟大的曾祖父的四分之一就好了”。

“王太子事件”表现出在面对充满希望的未来时，人们最初的反应，还表明巴黎的社会群体会依据他们所见不断做出调整。君主制下的举动与迹象可以做出如下解释：民众依托它们来表示赞同、反对或协商。态度是多种多样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认真阅读警方报告和街头流言，我们可以看出显而易见的逻辑性。民众思想转变的速度极快，方式惊人，这与君主制本身的细微变化密切相关。民众通过一些零碎的、微乎其微的事实，改变着自己的看法和立场。这些不断的修正彰显民众的极端多变性——正如那些文章中所说的，他们的“本能态度”——表现出民众愿意对公共事件做出快速反应，他们从来就不愿被置之一旁，也不愿囿于一成不变的态度中。

一些情形扰乱着公众，因为他们无法获取真相。于是流言分化，产生若干版本，这些版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遵循某种逻辑，且都貌似有理。1762 年，一则社会新闻让公众不安，它还将带来诉讼和公开行刑：拉绍，国王的侍卫，在拿刀刺伤自己留下诸多伤口之后，宣称自己刚刚与两个怨恨国王的人展开

了一场恶战[23]。这一事件很快产生了重大影响。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1757 年）的恐怖之举还令人记忆犹新，况且这一年依然还在驱逐耶稣会士。此外，所有的社会新闻都以或真实或假设的方式再现着国王之死，这通常会引发强烈的不安。但凡提及国王之死，就决不可能无足轻重。无论是内心渴望还是深感羞耻，这个幽灵始终萦绕。唯有再现，才能释放想象；让人尽情谈论，才能分辨出哪些人利用它来迫害另一些人，后者因对国王的生死无动于衷而“罪大恶极”。这样的社会新闻从来都不会被漠视，正因如此，拉绍事件的谣言迅速传遍巴黎的大街小巷。这让警察总监叹息不已，他很清楚公众越是对此感兴趣，真相就越是难以查清，因为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不同的版本。在一封给警察总监沙尔汀的信里，国务秘书圣弗洛朗坦忍不住写道：“我觉得它（指这个故事）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那我们很快就能知道真相，可是现在，有太多人对它感兴趣了。”

随着谣言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知道真相，警方只能同往常一样，让密探们渗透到首都的各个角落，去探查“是谁毒害了人们的精神，赋予他们不同的思考方式”。从那时起，一旦涉及与国王性命攸关的事，就要迫不及待地了解公众的反应以及此事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影响。警方严肃认真地工作着。一只“苍蝇”首先要前往位于白日大街和圣奥诺雷大街街角的咖啡馆，那里通常都会聚集着“大量卖呢绒、布匹和丝绸的商人”。接着，他要前往另一个外科医生们喜爱的小酒馆，

下午的时候再前往位于维尔里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那是检察官和执达员们爱去的地方。弗朗布瓦西耶负责监听花园和散步广场上的谈话，达莫特则负责在郊区转悠。所有人得到的消息都是一样的："每个人讲故事的时候就好像他都知道一样，可又都伴随着不知所措和些许沉默：可是……啊，上帝！……这实在是太草率了……那些人没被逮捕实在太遗憾了……说这些话的时候，配合着他们的神情，痛苦而忧虑。"大量证据表明民众是真的难过。然而，密探和"苍蝇们"还是被那些大相径庭的话所震惊，每个个体对于所发生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并且一刻不停地将它传播出去。"每个人讲述的方式都不尽相同""好多话南辕北辙，不可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已经有了百余个版本"……一个名叫德拉艾的密探，主要负责监视各大咖啡馆，他在呈报给警察总监的报告中如此总结：每个人在听到只言片语之后，就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编故事。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用那么多种方式来讲这个故事，连自己都不清楚该相信哪个。

形形色色的故事让警方高层大为光火，因为它们将民众置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声势浩大的谣言让法官们变得更加审慎：法院于 1762 年 2 月 1 日批准逮捕拉绍，并判处他绞刑。然而，这个可怜的侍卫只不过是想吸引国王的注意力，想通过这种诡计（他声称与其他想要刺杀国王的侍卫起了冲突，这当然是假的）为自己赢得恩宠，并增加些年金，那是事发前他根本不可能领到的。因此，这样的想法早在几个月前就在他心里萌

发了，他让自己身上满是刀伤，再让别人相信是某些想要刺杀国王的杀手所为。国王可能会死，这样的想法之所以严重（它不应出现在任何人脑中）是因为惧怕公众的理性，这会动摇他们对国王的敬爱之情。此外，法院的逮捕令也为宣判提供了依据："所有能够提醒国王关注臣民们的敬爱，或提醒臣民们关注国王安全的事件都为谣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扰乱了公众安宁。"[24]

那么，民众究竟如何看待此事？于卷帙浩繁的警方档案中，基本可以得出以下三种观点：一些人将之与达米安事件紧密相联。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很清晰，更何况此事发生在主显节当天，"又让人回想起上次的恐怖事件，对国王神圣之躯的刺杀"。他们还说，这个侍卫其实已向"达米安迈出了第一步，为的是让国王同意给他增加年金"。[25]他们说拉绍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只是想制造出一个事件，让自己得到国王的关注，并增加他的年金。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某个小旅馆里，国王的侍卫和另外两个人发生了争执。那两个人只是想见见国王并希望得到他的庇佑，而那个微醺且蛮横的侍卫就对他俩大打出手。

第三种观点传遍大街小巷和各个小酒馆："那两个陌生人，很可能是某个不怀好意的集团派来的，必须要斩草除根"，赫赫有名的集团很可能涉及耶稣会士，因为教会正与他们发生着激烈的冲突。

每一种观点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种事关回忆，重新提及

达米安的刺杀，只是不相信国王真会身处险境。第二种涉及凡尔赛附近小旅馆里激烈的争执，在那里，同样没有人为国王感到一丝担忧。只有些更圆滑的人，以恰到好处的语调表现着自己的激动之情，指责两个“想要让国王去死”的耶稣会士。

还有些人谣传说，耶稣会士都是叛徒，根本没有必要相信他们，我们全都沐浴在冉森派教义的光芒中。耶稣会士的拥护者们对此极为不满，并为耶稣会的未来感到担忧。特别是还有人提到，那两人中的一个在刺伤侍卫时大喊：“要铲除压迫宗教和人民的卫道士！”

从逻辑学上看，这些观点都是合情合理的，或者至少都有些许真实的成分。真相依然隐晦，公众依据自己所知展开思考：也许是回忆（达米安），是社会中的日常之事（饭店中谈论的争执），又或者是政治现象（君主制与耶稣会的冲突）。当局并不欣赏这些“争先恐后”的阐述，因为它们分支众多，难以把握。尽管到处都是“苍蝇”，但他们却难以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谣言，也对变化多端的版本心有余悸。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改变都有可能让他们身陷险境，一旦加入政治解释，公共秩序便会受到威胁。面对拥有“上百个版本”的故事，应该这样了结：拉绍被处以绞刑，因为无论如何他都“碰到了国王”，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将民众带入危险的境地，严重威胁着君主制的稳定。

第四章

动　机

民众舆论是多变的、碎片化的，会随着情况的改变而灵活调整，并且从来不乏让其变得激烈的动机。有些动机很容易就能被发现，从各类文献或手稿中可以找到它们。时刻都有各种担忧，既有新出现的话题亦有不断重提的旧话，比如面包的价格、肮脏的街道，又或者是国王和王后来到巴黎时所展现得还算和气的面容。还有些更琐碎的操心事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也会在某个时候让人大吃一惊，使得谣言四起，仿佛每天都有一千零一个奇特故事展现于巴黎人眼前。舆论在似是而非与虚构缥缈间摇摆，在揭露一个秘密的同时又轻信另一个。一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会打破日复一日的单调，改变讨论与思考的方向：打破日常信息的结构，于裂缝中插入意想不到的改变。比如搅扰时代平衡的骚乱，18 世纪充斥着各种骚乱，从来就没有哪一场骚乱会与下一场一模一样，哪怕下一次依旧会让人想起上一次；每场骚乱都有自己的样子，自己的动机，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自己的即兴模式。正是这一切决定着它的新动作、新话语和新故事。骚乱是窟窿，转瞬即逝的事件。有时，这一窟窿可以

自行愈合，让人以为一切都还跟从前一样。可能的确如此，也可能根本不是。

让民众开口说话的动机，和既扭曲又多变的事件紧密相连。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结构不断变化，其逻辑时而相互矛盾，时而相辅相成。谣言的传播并不遵循“理由”这一漫长而渐进的线性链，否则或可预见 1789 年的巨变。那些“理由”本身就是错误且不连贯的，其中每个片断都能制造出这样的时刻：民众坚持自己的话语，并可窥见未来的言论会和他现在所听到的话不同。列举这些动机无需按照什么逻辑顺序，最好逐一描述它们，在有意或无意被营造出来的无序中描述它们，在矛盾中描述它们，正是矛盾让言论的改变成为可能，哪怕是最微小的改变。正是这些微小的改变，产生自发的观点与分析。要毫不犹豫地关注那些简短的、看似无足轻重的片断，正是它们构建起新的组合、新的实践和新的思考。

民众关心的传统对象

两大对立领域占据着巴黎人的思想。为了便于理解，可以称之为自己的领域和他者的领域。所谓自己的领域，就是个体的日常领域，包括他常去的地方和生活所必需的事务，如街头、每天要吃的面包和每天都要面对的法律。与之相对应的，他者的领域，是让他们操心不已却无法企及的，那就是君主的领域，

既阴暗晦涩又光明可见。这是一个不断对民众产生影响的惊人的领域。

日常领域

在分析让民众操心的社会问题之前，应提及一些引人注意的神秘事件和奇迹，再描述独特的18世纪所具有的矛盾的氛围，在这个世纪里，信仰与迷信和启蒙运动掺杂在一起。

奇迹、灾难与怪诞

没有任何报纸、编年记录、警方报告、手写新闻会遗漏现实生活中成百上千的微小侧面，正是它们吸引着贪婪的公众。他们急切地想弄清神秘事件，执着于各种不同寻常甚至难以置信的话题，因为他们把理性和梦想都放在了那里。整个世纪都是如此，天空下的微光、彗星的轨迹、怪胎出生或是国王的儿子们衣衫褴褛地隐于市中，都被热烈讨论着。惊叹之后是恐惧，合理性中夹杂着令人担忧的宇宙论。所有的一切都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关于自然的著作上，以便用各种理由对其做出解释，其中既有上帝也有撒旦和科学。有时，这些事件可以用政治来解释，如威尼斯会发出可怕嚎叫的水怪。1716年4月，比瓦这样解释它的存在："土耳其军队据说有80万之众，他们乘坐

200 艘帆船，意欲攻打威尼斯、科孚岛和匈牙利。”[1] 一旦对神秘事件的解释不尽如人意，民众就知道要等待。1726 年 10 月 20 日，巴尔比耶讲道：

> 昨天晚上 9 点左右，发生了一件事，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空中泛起大片白光，仿佛打开了两扇拱门，刺眼而摇曳的光线从中倾泻而下。观测者们已经对此做出了解释，但这还是让一直在等待某桩大事的巴黎人大吃了一惊。[2]

科学不是总能让人信服的。1771 年的流星雨并不比这个世纪早些时候的那片白光更让人安心。它们所引发的轰动让民众内心满是惶恐，阿尔迪解释说：“这一现象警告了大多数人，也让他们忧心不已。”[3] 一年之后，人们向宗教（而非科学或政治）请求救赎，谣言在巴黎坊间流传：两颗彗星相撞了，这样的碰撞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 可以肯定的是，因为这些谣言，在复活节的两周里（1773 年 5 月 15 日），圣叙尔皮斯教堂和圣日尔曼奥塞尔教堂的告解亭成为人们常去的地方。我们还注意到，在圣叙尔皮斯，大多数人都参拜了圣桌。”

讲到这里，阿尔迪低声抱怨了一下这些在他看来毫不理智的举动。“半信半疑的动机只会造成一种结果，暂时改变的信仰或灵

光一现的忏悔，这些都毫无益处，因为人们只是不得已而委曲求全。”[4]

还有一些让人难以置评的奇怪消息，但却被人们毫无异议地全盘接受了：“一个年仅 18 岁的姑娘在仁爱医院诞下一名裹着包头布的女婴，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身形匀称，可她只在这个世界存活了两天。”[5] 她只活了那么短的时间，使得这个事件恢复常态：一个裹着包头布出生的婴儿并不是一个能持续很久的笑柄。

人们很难理解那些用来装点手写新闻的模范事迹到底要说什么，它们都想让读者相信那些上帝要救赎的不幸者的传奇经历。

> 所有公开的报纸都在讲述着一个年龄在 10 到 12 岁之间的男孩，他又聋又哑，还被父母抛弃。在历经人间各种苦难之后，这个不幸的孩子在仁爱医院落脚，在那里他被雇去做最低级的工作。幸而他得到了上帝的垂怜，在艾贝教堂仁慈的院长先生的帮助下，他被效忠法兰西的索拉尔侯爵收为义子。大约四年前，奉他死去的母亲之命，这个孩子被遗弃在一条大路上。那时他已经无法和人沟通，人们无从知晓这个年幼的孩子都经历了些什么。多亏了艾贝教堂的院长先生，居然让哑巴开口说话了，于是人们得以知晓他是如何历经背叛而沦落的。[6]

如果教士们可以让哑巴开口，那么也许每一个灰姑娘都真的是美丽的公主吧……

信仰与迷信

关于这个问题，从上述几个例子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公众舆论在面对一些只能用超自然来解释的现象时，又或者当它发现自己陷入一群随时准备用巫术和妖术对它进行“救赎”的个体的包围中时，是如何运作的。

信仰与迷信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别，但也可能惊人的相近。在这方面，18 世纪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因为它将理性的力量揉入迷信的氛围里[7]。关于信仰，保罗·里克尔认为，“是一种表示接受或赞同的精神状态，”但他又补充道，“信仰一词在观点与信念之间左右为难。作为观点，它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中遭到否定，这一体系将它置于价值的最底层，但作为信念，它在宗教的价值体系中受到肯定。”[8]左右为难这个词是极恰当的。在 18 世纪里，精英们总是试图弄清信念、信仰和迷信之间的不同。其实就算是精英也很为难，他们总是带着批判的或恶意的目光去看待这三种态度。

巴黎有一种特别的祭礼，在很多资料中都能读到，它展现出信仰的微妙，尤其是当国家和教会都对其推崇备至时：这就是定期祭拜圣热娜维耶芙[9]。

热娜维耶芙[10]，早在 6 世纪初就与世长辞，被埋葬在吕黛

斯山（后更名为圣热娜维耶芙山）。在这里，克洛维斯为皮埃尔和保罗两位圣人建造了一座大教堂。此地很快就成了朝圣之地，在这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治愈奇迹，人们趋之若骛。然而到了857年，由于害怕诺曼人的入侵，议事司铎们带着教堂中的圣物仓皇出逃。直到863年又重回此地，重建教堂。1130年，一场可怕的传染病爆发了，史上称之为“烧灼病”（Mal des Ardents）。面对这场灾难，巴黎大主教庄严召唤圣热娜维耶芙，奇迹出现了。此后每年11月26日，为了纪念此事，巴黎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直到18世纪，议事司铎们又建造了一座新教堂，后来在大革命中成了先贤祠。革命中的狂热让教堂的圣物付之一炬。

在一年一度的“11·26”庆典时，如果有爆发公共性的灾难，君主会指定加入一些特殊的场面，组织向圣热娜维耶芙的圣龛膜拜的仪式。官方的出版物对此有清楚的记载，尤其是德拉马尔在他的《论警察》（*Traité de la police*）中如是说：

> 当公共性的灾难爆发时，求助于圣热娜维耶芙，已成为君主制的一项古老风俗……第一次举行这样的仪式是在公元857年，祈求上帝能解除诺曼人对巴黎城的围攻……
>
> 从那时起，但凡法兰西陷入公共性的灾难中，人们都会去寻求圣热娜维耶芙的庇护，并且总能在短时间内收得神奇的效果。无论是战争、饥荒、洪水还是大规模的传染

病，屡试不爽。有些例子就发生在不久前。

通常由法院来决定是否需要向圣热娜维耶芙求助。接着巴黎大主教会下达精神层面的教令，警察总监会加入其中，跟进此事，确保一切公开顺利，以便让如此重大的活动得以安宁而体面地举行。[11]

仪式由君主发起，根据那些威胁到民众及公共安全的具体情况，法院会决定仪式是否举行。紧接着巴黎大主教参与进来，组织礼拜仪式及精神层面的活动。最后的重担便落到了警察总监的身上，仪式能否公开顺利就全靠他了。仪式是极为复杂的，也为大量文学作品提供了灵感[12]。整个 18 世纪，一共举行了两次这样的仪式，一次在 1725 年，遵从诺阿伊主教的命令，起因是连日暴雨所造成的洪灾；另一次在 1765 年，因王太子病入膏肓，且肺部脓肿导致病情不断恶化[13]。这样的仪式真的有效吗？如果人们相信巴尔比耶的话，1725 年时，雨确实停了。

只有几滴雨，风倒是很大，路都还是干的……值得一提的是，仪式之后，天气确实变了。确实，现在是新月了，然而之前就算是在那些新月的日子里，雨也一直在下。[14]

但 1765 年，仪式结束后几天，王太子就一命呜呼了……

除了这些通常的仪式，当君主觉得某些外部事件扰乱国内和平时，也会利用圣热娜维耶芙。这时不需要去膜拜她的圣龛，

而只要向它“倾诉”，并号召大众共同祈祷。因此，1721 年，当路易十五的身体渐渐康复时，比瓦花了大量笔墨去描述 8 月 3 日白天在教堂向圣龛“倾诉”的情景。

但是到了 1775 年，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向圣龛“倾诉”已无法延缓路易十五的死亡……于是巴绍蒙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据说，圣热娜维耶芙的院长先生去某人家吃晚饭，那儿有好多人，一些年轻人纠缠着他，让他坐立不安，因为他们说这次圣女没有显灵……他任由他们去说，当他们说完所有指责的话以后，他回应说：“好吧，先生们，你们对上天有什么不满？难道他还没死吗？”[15]

我们还可以举出君主在其他情况下求助圣女的例子，直到现在这都还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对它的利用可以确保在民意泛滥时能够有效控制民众。然而，公众对热娜维耶芙的膜拜，有时也并不尽如君主所愿，它本应受制于君主，但有时却会朝反方向发展。1740 年，一场严重的饥荒侵袭了法国包括巴黎的各地，人们聚集在不同地方，都用大不敬的言辞抨击国王。5 月 30 日，情况愈变愈糟，警方密探们的报告适时反映出这一点：

据说圣热娜维耶芙化身为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楠泰尔专门为她而建的教堂里，在祝圣后的弥撒时。主持弥撒的神甫问了所谓的圣热娜维耶芙几个问题，她回答说上帝已

然恼羞成怒……还有人报告说圣女之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中现身是有理由的，她还告诉神甫，上帝对国王感到不满，对弗勒里红衣主教先生不满，总之，上帝几乎对所有的主教和教士们都不太满意，因为他们强奸了法律，如果政府依然一意孤行，继续迫害上帝的选民，他的怒气将无法平息……可以确定的是，尽管有人试图将之解释为精神失常者的胡言乱语，都无法阻止街头巷尾乃至所有的公共场所对它的热议。[16]

通常情况下，热娜维耶芙屈从于王室的意志，但这一次她服从了民意，公然反抗一直乞求她保佑的王室：世界被颠倒了！愤怒至极的巴黎民众，自己“化身”为圣热娜维耶芙，将她置于国王的对立面，而他们曾经是多么习惯接受国王所描述的圣热娜维耶芙。

对圣女的崇拜渐渐显出不同之处，原来它并不需要国王。巴黎与圣女同在，总有成千上万个理由要向她求助。当教会医院没有多余床位时，人们求她让发烧者痊愈。于是出现了奇怪的一幕：熙熙攘攘的善男信女中有人脱衬衫，用来擦拭她的圣龛，以此请求她让衬衫的主人恢复健康。就连巴尔比耶也差点相信了——尽管还抱着一丝怀疑——圣女的恩泽。但是梅西耶在一篇辛辣的讽刺文章中，猛烈抨击着这些行为，尤其反对重建教堂的决定：

但愿我不是在嘲笑圣热娜维耶芙！穷人用床单和衬衫擦拭着她的圣龛……法官、法院还有最高法院的那些人，请求她降雨缓解旱情，求她保佑王公贵族们康复！……我真的看到他们的眼泪，我也曾听到呻吟声、叹息声，而在那种时刻，我考虑到这种祭拜是如此适合那些粗俗、智力有限的人，也和他们的贫穷更为相称……人们要建造一座恢宏的教堂，以便将圣龛放于巨大的穹顶之下，这将耗资1.2至1.5个亿，甚至更多。这样巨大而无用的开销，若用于民众可以让多少人摆脱疾苦！……好奇的人们前去参观建筑，下等人参拜圣女……笛卡尔的尸骨还存放在古旧的庙宇里，是不是也该带他去看看不远处那个创造奇迹的圣龛？如果把圣热娜维耶芙和笛卡尔并肩放在一起会怎样？他们会在另一个世界里热切交谈，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可是，地位卑微的笛卡尔连圣龛都还没有呢。[17]

把笛卡尔和热娜维耶芙放在一起！这绝对是启蒙时代的人们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例如，巴绍蒙的秘密回忆录在1770年，就曾对那些被魔鬼附身，却被圣礼拜堂治愈的人，表达出惊讶，他非常好奇这种治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却不曾得到满意的答复。

不信教的人说，那些被魔鬼附身的都是些流浪汉，有人给他们钱，让他们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些人都是被人利

用的。然而几乎无法相信，教会的‘大人物们’会让人演绎这样一出卑劣的剧目。又或许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真正被魔鬼附身的人，于是出此下策，为的是不让信徒对信仰产生怀疑，毕竟这个奇迹存在了那么多个世纪。事到如今，信徒们的信念摇摇欲坠，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加以巩固。幸运的是，被魔鬼附身的人到处都是，也许，根本就不需要找人来装神弄鬼。[18]

巴绍蒙不相信，却也不是完全不信，他怀疑，又无法怀疑一切。信仰与迷信之间的界线十分模糊，难以找出其中的不同。事实上，先进的科学实践只会将差别搅得更加模糊。描述出来的就一定真实吗？或者正相反，某个可能真实的领域，会不会正是错误滋生的沃土？如果说，迷信其实是“神学和科学层面各种不相容的……实践与信仰的集合体”[19]，那么在18世纪，无论从真理还是从宗教上说，它都是难以被消除的。此外，无论是教会还是君主制都不愿对此进行过于严格的区分。

然而，人们总是在想法对付过度轻信，也总是在与那些利用他们的天真、为数众多的骗子斗争。

1682年7月，路易十四、科贝尔①和勒·泰利耶②共同在凡尔赛签发了一条敕令，规定了一些针对“巫术”的事宜：否认魔鬼条约和相关的疯狂举动，特别关注了渎圣之举和对毒药

① 指让-巴蒂斯特·科尔贝（1619—1683），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
② 指弗朗索瓦-米歇尔·勒·泰利耶（1639—1691），路易十四时期的国防大臣。

的使用。正如罗贝尔·芒德鲁所说：

> 因此，占卜者、魔术师和巫师同属幻术家族，诱导容易轻信的人，敕令将他们清楚分级：不择手段地利用无知者，是不会被判处绞刑或鞭刑的，最多是流放；一旦做出渎圣的行为或是投毒，就得接受死刑。[20]

说实在的，巴士底狱的档案以及警方（或监狱）的资料中满是关于下毒者、淘金者、职业巫师或是伪巫师的诉讼案件。这些案件冗长而繁杂，面对这种困难的情况，专业的警长们（比如罗驰布吕纳警长）做了大量的、有时甚至是重复的笔录。通常有人检举，然后展开预审。我们可以找到为数众多的警方或总督的记录，解释为什么骗子可以轻易得手，甚至会有民众执迷不悟地追随其左右。以淘金者为例，在整个世纪里他们都备受欢迎：一直以来，巴黎人都相信有巨大的宝藏埋藏在王宫的地下，所谓的王宫包括很多地方，诸如卢浮宫、杜伊勒里宫以及它们周边的附属建筑[21]。那些赚取酬金的人，向他们保证一定能挖出秘密宝藏，好多人都相信了，于是在这些古怪的行动里耗尽了自己的钱财与信念，这些行动混合了祈祷、黑夜寻宝、精神召唤，以及直截了当的欺骗性的交易。有些人写了合约，以便尽快寻找根本找不到的宝藏；还有些人醉心于下三滥的交易，指着女人挺起的肚子发誓，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会知道所有秘密。“迪诺在她怀孕之后兴奋不已，让她躺在椅子上，

掀起她的衬裙，在她的肚子上放上一块大石头，对她说这就是她怀的那个孩子的灵魂……”[22]

从这些资料中，诉讼案卷和审讯记录，各种回答和警方的思考，都呈现出一个对比鲜明的世界。表面上看，警察们信念坚定，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到幻术活动的影响。他们的提问与审讯显露出迹象，他们也被那个介于恶魔和狡诈之间的神秘朦胧的领域吸引。尽管他们称所看到的魔法为疯狂之举（“从他们的文字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针对每一个沾染巫术而陷入疯狂的人，他们都有不同的秘方”[23]），对秘方的使用却让他们窘迫，专业的药剂师也并不会全盘否认这些秘方。关于这一点，他们小心翼翼地总结说：“因此，药品的好坏取决于制药者的才华。”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警察想要抓捕诈骗犯，但是他们不确定是否处于魔鬼游走的边缘；一部分上层人士看到魔鬼被驱除很不自在，这种近乎放弃的姿态无异于否认上帝的存在；骗子们永远不择手段，有些人因轻信而上当，糊里糊涂地相信了超自然的解释，成了牺牲品，毕竟超自然的解释可以弥补他们在这个艰难世道中的力不从心。

关于伪巫师们的资料，十分契合18世纪对民众思想体系的思考。这些资料尽管结构简单（预审、诉讼、刑罚），却不足以让人相信这个双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智者（警察，哲学家）本应根除贫苦大众心中的轻信。可相反的是，他们却指出了一个并不可信的模糊世界，每个人都利用模糊而黑暗的欺骗手段赋予自己的世界观以意义。归根结蒂，所谓的“迷信者”

或许与人们所以为的并不完全一样，那些“内行的聪明人”极害怕面对“魔鬼”，他们找各种借口远离它，而这些借口本身就意味着魔鬼的存在。

当然，还是有些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情况，比如神甫戈巴尔·德·曼维尔和他妹妹的案子。他们在1705年11月因替人算命而遭到检举。关于此次检举，控辩双方都毫无疑虑：

> 大人：
>
> 您劳心劳力地清除着巴黎城内那些对公众不利的人，尤其是那些滥用宗教和圣事、用虚伪的虔诚和妖术愚弄民众之人，您要求热心的民众向您告发这样的人。
>
> 那么，大人，在圣热娜维耶芙山上有一位名叫曼维尔的女士，她自称是英格兰国王的亲眷，20多年来一直做着装神弄鬼的生意，每当密使们发现有人想要结识占星算命者时，就会把他带到她面前，她首先通过面相判断人的运势，之后再让他抽取纸牌。她用一把钥匙敲打着另一把钥匙做出解答。而她的神甫哥哥会使用一只拴着细绳的指环，他称之为法宝。[24]

还有许多这样“简单的”故事，因为还有好多人乔装打扮以便更好地骗人。比如另一位修道院长（总有那么多修道院长灵活游走于对宗教的虔诚与亵渎之间）因贩私盐和使用巫术而被控告，他的外表就令人相当不安：

他有一件可以正反两面穿的外套，一面是皮制的，带着铜扣，另一面是黑布的，配以黑色的扣子，便于他随意乔装。他还有一条棕色的大短裤，里面藏着不计其数的东西。[25]

揭穿这样的把戏也比较简单，一旦欺骗显而易见，就不可能有人相信他的话了。然而，还有一些深谙此道的人，说话间不经意就从虔诚转移到幻术，让所有人都陷入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无法明确指出从什么时候起，事态就失去了控制。于是，要掌握零星的真相需要大费周章。雅克·科雄，是家住夏特琳的低收入者，他拥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说服力，于是1754年，他被认定为巫师。无论是这个聪明人还是他的客户都让警方伤透脑筋，于是警方便在卷宗的空白处写道：

正因为他有头脑，才会愈加危险。他正试图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那些并不十分了解宗教的、头脑简单的人。他在驱魔之前，总是先进行祷告和弥撒，这让他的所作所为首先披上了虔诚的外衣，不会吓到那些胆小怕事的人，他就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他们求助鬼神。[26]

这些通灵事件还引发了其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欺骗，就意味着远离上帝，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所

有与魔鬼相关的故事和案件都引发各种猜测，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信仰、信念以及欺骗之间有所重叠而难以区分开来。1730年到1738年间，在巴耶的主管教区，一桩邪事突然在兰德发生，所有出身高贵的女孩都出现了奇怪的症状。阿斯纳图书馆里保存着一份未署名的文件[27]，讲述了这个故事：

> 人们看到即便是最聪明的人也和孩子们一样轻信……人们被说服了，许多人都这么认为，不相信魔法和咒语即是对抗宗教……人们宁愿相信魔鬼是所有神奇事件的缔造者，也不愿将其归功于上帝。

至此，情况已然明了。与此同时，故事还出现了一点改变，而没有朝启蒙方向发展：

> 既然科学是迷信的桎梏，是反对狂热的利器，那么，在一个开明的世纪里，又怎会看到——实际上已经看到了——那些被魔鬼附身的人明目张胆地出现，而且居然还有那么多捍卫者。

几经周折之后，故事的作者自问其中是不是并没有欺骗，并最终以严厉斥责伪君子和不信教者来结束他的话语。

在这样的氛围中，信仰与理智并存，超自然事件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巴黎人经常接触江湖骗子们，后者时刻准备解决

他们的问题，比如爱情的困扰、对富裕生活的渴望和活到500岁的愿望[28]。君主和教会试图制止民众的错误[29]，在他们看来，如果民众盲目热衷于江湖骗术，就会变得十分危险。圣热娜维耶芙的仪式与庆祝活动是一个发泄途径，有助于为自己的担忧寻找出路的民众们发泄过多的焦虑。于是，抓捕伪巫师就成了镇压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有二：一是骗子们应该受到惩罚；二是公众的盲从应当得到正确的引导，信仰应该得到捍卫。这中间的平衡其实很难把握，特别是江湖术士受害者们的证词清晰指出信仰巫术的理由：点金石可以授人以财；秘方救人性命；万灵药导致快速流产。此外，还有证据证明邻里间团结一致，他们相互交换地址和信息，以便结识巫师。从中，我们还可以猜到那些乡野迷信传入巴黎的方式，即通过人口的流动：一定会有某个上当受骗的人这样做，他会回到农村去寻找儿时听人说起过的“秘方”……

18世纪上层非常努力地削弱人们对江湖术士们的“发明”的信任，这些发明导致了很多无知的偏见。抓捕淘金者、点石成金的骗子还有那些向魔鬼祈福的人，在上层引发强烈反响，在他们看来，轻信是民众的一个主要特征。与错误抗争，与那些没有判断能力的容易轻信的民众抗争，都须以牢固信念为基础。然而，无知且缺乏教育的民众总是被眼前的事物抓住，从来区分不了真与假。这种倾向易使他们形成对整座城市造成威胁的态度。要想与幻术和妖术斗争，就必须使得民众相信，教会和君主所呈现给他们的一切都是忠于信仰和真相的。

贫穷，不安全，警察与公正

18 世纪，民众不断抱怨飞涨的物价和粮食的短缺，这成了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所有人都在议论“悲惨时代”(这样的表述不断出现在警察、被告和作家们的笔下)，他们为这样的境况悲叹不已，愤慨不止，对那些他们觉得应该为此负责的人骂骂咧咧。确实，有些年份比其他年份更为艰难，但是通过阅读警方记录，可以发现就算不是灾难深重的年代，这个主题也一直都在，无法摆脱：“公众们只谈论悲惨时代”[30]，“在我看来，时世与日俱艰，每家咖啡馆里都能听到此起彼伏的抱怨声，所有的交谈都只围绕这一个主题”[31]，“据说农村已经破败不堪，人们谈论的都是贫穷和破产”[32]，“据说面粉都是坏的”。

当局担心这些谣言会煽动公众，便试着提醒国王当前的困境可能引发的危险。1739 年，负责审理间接税案的最高法院院长向国王进谏，他忧心于面包价格上涨及其始作俑者——关于警察总监埃罗的谣言，民间认为埃罗用哄抬物价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女儿准备嫁妆：

> 陛下，不断扩散的谣言提醒我们和平的重要性。可是陛下，您的臣民还在忍受缺衣少食的煎熬，外省的很多人不得已与乡野间的动物共食甚至争抢食物。然而享受奢侈

生活的包税者们却对公众的贫穷和焦虑熟视无睹。[33]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一个在18世纪下半叶享有特权的证人阿尔迪，时常会谈及粮食匮乏和巴黎人的躁动。例如1768年，地区派出所的警员们时常会奉命给生活困苦的人分发食物，与此同时，匿名且极具煽动性的招贴再一次贴满巴黎市中心的墙面，它们呼吁暴动，甚至扬言要在首都放火，因为国王是这场灾难的不二祸首：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再把面包价格的飞涨归咎于战争或者小麦歉收。我们之前居然从来没有怪罪过国王，毕竟他才是最大的小麦商啊！[34]

“招贴之战”持续了一年多。每一次，当小心翼翼的卫兵和下级警务人员“撕下”它们，当天晚上就能在其他地方看到它们又被贴了出来。1770年9月11日至12日夜，整个巴黎城都被这些字眼唤醒，它们被贴得到处都是：“如果没有人降低面包价格，如果没有人处理国家事务，我们将会以一己之力好好地参与其中。”[35]更可怕的是，在王宫前的一棵树上，有人挂了一幅杜巴里伯爵夫人的肖像，“肖像之下有人放了一把荆条和一个字母V”。

如此的骚动和如此致命的贫穷持续不断。贫穷如同传染病，最细微的天气变化、政治或经济事件都会引发混乱，加剧骚动，

刺激人们的神经，局势十分紧张，急需有人对此负责[36]。

这个“悲惨时代”引发大量严重的后果：乞讨成为不能容忍之事，警方试图以判决的方式来制止行乞，而这些判决有时过于严苛，以至于它们本身就足以挑起另一场混乱。不仅民众反对逮捕乞丐，连监狱都人满为患，最终也变成暴乱频发之地。1720 年，继约翰·劳的政策所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让囚犯们迁移建设密西西比的残酷决定之后，乡野的圣马丁隐修院监狱群情激愤，城里其他关押犯人的场所也同样如此。类似的，1740 年又是饥荒之年，比塞特雷的囚犯们发起暴动，反对克扣伙食，因为这让他们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并受到疾病困扰[37]。30 年后，阿尔迪再现了发生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灾难节日”：

> 上午快 10 点的时候，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发生了一场暴乱，直到大批增援力量抵达方才平息。两位看守和一位哨兵受了重伤。据说，面包的短缺、判决时间的拖延以及某些看守对囚犯的虐待，是引发此次暴乱的主要原因。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灾难的节日……[38]

大部分时候，民众都是这些暴乱的发起者。其实，在巴黎人看来，监狱就如同医院一样熟悉，他们知道早晚有一天，自己会在那里受到“欢迎”。每一次，一旦感到不公正，民众就会迅速而紧密地团结起来。从世纪初开始，针对过于严酷刑罚的反抗就从未停止。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1720 年，埃拉克先

生——瑞士军队的一名上尉——的一名仆从在服苦役前被公示于众，他被指控对女主人出言不逊。大量群众围观，约有五六千人，人们不断把他从拴着的木桩上拽下来，群情激愤，持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人们才发现，白天的冲突造成了五六个人死亡，而那场冲突动用了200余名警力。

1723年，愤怒的民众聚集在主教专用监狱前示威。因为监狱想把一个囚犯从一个囚室转到另一个囚室，结果遭到了全面而坚决的抵抗。囚犯威胁前来逼他就范的看守们。国王代表和刑事总监抵达现场，决定结果他的性命，之后再对他的尸体进行审判。巴黎人不仅震惊，更对此事非议不断，马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 刑事总监和国王代表被骂得够呛……可以将他的罪行视为叛乱，但罪不至死，再说没有任何人有权决定国王臣民的生死。然而，那些见惯了鲜血的官员和看守们丝毫不尊重生命，他们必定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39]

面对这种不安全的境况，动辄看到小偷、骗子、乞丐之类的人被传唤，民众的内心是矛盾的：他们当然不愿意被偷，他们抱怨着巴黎城中的交易和嘈杂的人群，因为这很容易让他们丢失耳环、手帕、鼻烟盒之类的东西；面对这些，教会基本无能为力。然而，一旦涉及警方的镇压、在大庭广众中惩罚土匪强盗时，之前的这些情绪就缓和了许多。态度发生了很多微妙

的变化，显而易见，镇压的形式、城中所流传的关于小偷的故事，以及底层人民对于以独特方式挑战权力的故事主人公，或多或少有所同情且赞赏的表达，这些因素构成了微妙的相互作用[40]，特别是在灾难深重、刑罚残酷的时代。

通过卡图什的犯罪行为和他数不清的同谋共犯我们可以了解到，从1721年到1728年间警察和民众所扮演的角色[41]。1715至1728年，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卡图什和他的同伙们，谈论他们四处作恶，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抓到。这些梦一般的场景于1721年戛然而止，就在那一年，卡图什被捕了。从1721到1728年，行刑、检举、审判同谋，向民众展现出无数惩罚场面。比瓦、马雷、巴尔比耶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花了大量篇幅叙述卡图什分子们的故事。随着故事的流传，一幕幕场景在舞台和街头上演，当局也传播着自己的话语。

卡图什是可见的，对卡图什分子们的镇压亦然，故而民众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过来。卡图什是巴黎一个箍桶匠之子，从1715到1721年间领导着一个骗子和销赃网络，团伙人数多达300人。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存在让所有人都忧心忡忡，其中包括因约翰·劳体制崩溃而倍受警告的警方，这一体制的崩溃极大影响了法国的商业，使得法国的经济陷入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0–1714）而带来的严重困境中。卡图什集团的成员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大量的手工艺者、工人和旅店老板），大多通过偷盗和销赃来摆脱贫穷。这一团伙下辖诸多“分部”，以至于他们宣称自己代表0.5%的巴黎人。正如吕泽布林克所记

录的那样："这表明关于犯罪的概念，民众所理解的与官方即法律和整个司法体制所定义的大相径庭。"于是，无需再谈论激进的犯罪手段，或是种种边缘行为，相反，应该谈论的是某些本应受到指责的行为为何如此自然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还有那么多人每天都在从事这一行业。在住满郊区工人、遍布下等酒馆的地方，民众"友善地"隐匿着窝主们。

对此警方想出了一个计策：与其对一部分因贫困而不得不沦为扒手或其他犯罪分子的巴黎人采取行动，不如惩罚所有的错误行为，把他们全部归入一伙并为之打造一个充满威胁、危险且阴谋重重的形象。"团伙"一词便刻画出一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形象，激起人们本能的抗拒和报复。故而，对于卡图什分子的抓捕将会动用全部警力，而对他们的审判也会通过极具典范性的惩罚方式，造成恐怖之势。在镇压强盗的热烈氛围中，试图重建一致的舆论，这种一致性本来因法院动荡、约翰·劳的丑闻以及 1720 年的巴黎人骚乱有所动摇了。

然而，警方的计策若想奏效，必须得到主犯卡图什的配合。事实上，在预审中一直保持沉默的卡图什，终于在登上断头台、在人生最后一幕上演之前，决定交代一切。我们知道，他招供的时间超过 24 小时，以至于行刑时间不得不推迟，其间牵扯出了 90 多人，由此拉开了诬告的序幕。当然，这也使得犯罪团伙赖以生存的团结性濒于崩溃。临死前拉几个人垫背，供出同伙或者帮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想显示长久以来与警方对抗的力量。他想公开展现一个腐烂的社会，在这里，穷人、警察、

军队和手工艺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联结着，为某种自然犯罪服务。这早就为国家上层所洞悉，在约翰·劳的时代，在各种财政活动中。通过大量的检举揭发，有742人被告发，329人被审判，其中大多被判处死刑……

作为对卡图什的回应，警方将大量的诉讼与行刑呈现于公众眼前。在这样的背景下，警方与民众变得密不可分。说到底，正是警方将卡图什刻画成了英雄。在对被告让–皮埃尔·巴拉尼，又名卡皮桑的审问中，这一点得到了证实。他是一个年仅20岁的镀金工人：

> 在大夏特莱监狱囚室中的一间里，有一张绿色的床，喜剧演员们身着盛装来到这里，所有被判刑的人都被带到这里，演员们向犯人发问，让他们说出自己的行话隐语，引人发笑。国王的检察长和刑事长官也在那里出现，让他们做鬼验，扭曲肢体，配合喜剧演员们唱歌。公爵先生，即刑事长官，在听到与卡图什相关的歌曲时，爆发出笑声，说："除了他的罪行，卡图什倒也算是个高尚的人。"国王检察长让他的仆从拿来面包和红酒，以便让他们说出更多疯言疯语。[42]

这一场景反复为各位记录者们所引用。这一段奇事表明，警方本就乐于将监狱内部改造成剧院，让犯人变成主角，主角变成犯人。戏剧与刑罚紧密相连，仿佛惩罚只存在于巨大的社

会舞台上。卡图什事件一出，舞台就自动让位给了那些揭发他、抓捕他和惩罚他的人们。行刑当日，喜剧演员们还在一场名为《卡图什或小偷们》的剧目中上演了行刑。兴高采烈的公众们希望行刑的情节在舞台上一再重现。

行刑既有戏剧性的一面，是一次面向所有人的公开表演，也有文学动机：事实上，它有助于将受刑者转变成英雄。当然，这也借助了警方的作用。从 1721 年 11 月 26 日卡图什行刑的当天起，各种挽歌、诗篇、歌曲和故事飞快传遍了大街小巷，生动描绘出这位大盗曾经的“战绩”和悲惨的结局。故事中所展现的场景和形象都一再使用了 16、17 世纪以来那些毫无价值的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形象：卡图什大王，伟大而可怕的强盗头子。

虽然这整个过程是令人满意的（警方的煽动，被告发者及公众的赞同），但它很快就会失去作用，因为每个人对这一事件的感觉并不相同。警方担心与卡图什相关的印刷品大肆扩散，因为这些文本过分宣扬他的荣誉，并不断影射定罪过重。更何况，荣誉属于底层人民，在与权力的抗争中，他们不再默默无闻。[43] 对于警方来说，他们好不容易得来的胜利如果被认作欺世盗名的话，会是极其危险的。于是，他们将传播与卡图什相关小故事的行为定为轻罪，他们逮捕了流动商贩、报贩和印刷工人，与此同时，竭力兜售、散播官方版本——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故事，揭露恶棍卡图什的真面目。这就是《真实的故事》（*Relation Véritable*），它强调的是在盗贼被绳之以法之后，全社

会的欢欣鼓舞之情，正是这些盗贼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警方想说什么？同时塑造英雄和犯罪分子，接着又担心英雄形象的扩散会对社会造成威胁？在创造神话的同时，警方以为占有了所有的形象，因为就是它最终导致死亡；它还想预见到社会对逮捕及镇压政策的指责，与此同时，激发出许多让人心惊肉跳的酷刑，以为这些酷刑与自己构建的社会很是般配；它还想让自己成为这一英雄而阴郁的形象的绝对主人，让劳苦大众远离规划好的道路。

然而，警方实在难以控制公开展现的各种形象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民众会以自己的方式适应神话，并非完全遵从构建者所期待的方式。意义的转变是极快的，特别是这些转变还建立在各种意味深长的形象上的时候。

在众多文本中，卡图什这个名字引发对犯罪原因及严刑酷法合法性的思考：他是个英雄，刑事长官也称赞他为人高尚——尽管只是嘲弄——其实对于民众而言他就是高尚的，只不过民众与刑事长官对高尚的定义并不相同。一个有争议的文本可以佐证，是卡图什与警察总监达让松的对话（见《香街阴暗处的交谈》*Entretiens des ombres aux Champs-Elysées*，作者布吕赞·德·拉马蒂尼埃），以便让警察总监理解卡图什在立法机构前的所作所为。还有那些抨击时政的小册子，正是它们将盗贼们的罪行归咎于冉森派教徒。

在这一特殊时期，群众并未以实际行动参与其中，但却利用这一事件改变了上层强加给他们的意识。新的意识依赖于当

前的社会、经济形势，并找到了批判的生存空间。在警方–被告–公众这一循环中，警方想要建立一种意识，让神话形象以及对神话形象的恐惧得以平衡。而公众却构建出了另一种意识，用神话揭露贫困的秘密及大人物们的罪行。

他者的舞台：国王、宫廷和王公贵族

> 无论距离宫廷是远是近，没有哪一个臣民会不想知道与国王相关的消息，他们的视线亦从来不曾离开过国王。他们总是自言自语：什么样的人才能统治两千四百万之众，他以什么名义这样做？他心安理得地享受所有的财富……身居高位的他，如何看待周围的一切？……每个人都在努力揣测着他，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登上了宝座，于是也就形成了各种轻率的猜疑。[44]

每个人都盯着他者，盯着国王，盯着君主，盯着他的打扮和他的周围；每个人都渴望结识他，解释他的一举一动，时而吝啬、时而慷慨，或者是由衷的，或者是怀疑的。记录历史的人嘲笑着民众对国王和宫廷的热情，认为他们的这种渴望堪比对神谕的期待，也顺带嘲讽了民众的见识。梅西耶又一次带着调侃的语气说："朝臣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士兵们为他而战，法官手持谏书前来，文人窥视着他，哲人抱怨着

他，民众则根据食物的价格来评判他的好坏。”[45]对于他的评价远比下面这句话的意味复杂：国王、王后、王公贵族和宫廷就是一本在巴黎人面前打开的书，他们从这本书中探寻希望和未来。

王室成员的病情总引发各种关切：让近臣们忧心不已，担心影响统治的接续。一旦疾病出现，官方就会督促民众祈祷，当病情过去，就是一片欢欣鼓舞。从孩提到成年，路易十五一直为疾病所扰。从人们“期待的国王”到“让人失望的国王”，他的健康总是人们关注的对象。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着眼于混乱的信息机制和民众的立场。关于这一点，警方报告和手写新闻足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会看到当局是如何管理公众的关切，而民众又是如何了解事件的。

1721 年的小国王还是个孩子，巴黎人民都爱戴他，等待他长大。1721 年的摄政王则饱受诋毁。继约翰·劳的丑闻之后，再加上宫廷臭名昭著的放荡生活，抨击时政的小册子（《猛烈抨击》*Les Philippiques*）都是针对他的。夏天，小国王生病了，让人民非常沮丧，然而从 8 月起他康复了，全城一片欢腾。“欢呼声震耳欲聋。”巴尔比耶说。“快乐得难以想象。”马雷说。“人们沉浸在欢乐中。”比瓦写道。欢快的情绪席卷全城：灯火通明，人们举行各种仪式，放着烟火，唱着《感恩赞》；人们狂欢舞蹈，让巴黎彻夜不眠了好几天，因为这是“资产者和民众们共同的节日”。人们叫着闹着，放着烟火，觥筹交错，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国王”。其实只是拿着国王的肖像，以这样

特殊的方式融入其中，也为自己臆造一个国王。小国王不可能一夜长大成人，可公众却迫不及待地盼着他长大。记录者们大吃一惊，他们指出在公开的回忆中根本就没有过如此欢快的记忆。他们惊奇地写道，“各种身份”“各个等级”的人都参与到公众的欢乐中，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下层人民都在大肆挥霍，只为庆祝陛下康复。跟往常一样，大嘴巴的女人们在官方报告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们乘坐着豪华四轮马车，带着小提琴和上好的红酒来到杜伊勒里宫的花园，在小国王的宫殿前排着长队跳着舞。然而，矛盾很快就出现了，它出现（被听见）在每一次法兰多拉舞和耀眼的光亮中：越是为小国王欢庆，就越显得摄政王被仇视。女人们高呼：“国王万岁！摄政王去死吧！”她们在王宫前跳舞，一边拍着屁股一边喊：“这是送给摄政王的。”当摄政王前往巴黎圣母院唱颂《感恩赞》时，所有人都陷入沉默。尽管摄政王脸色铁青，人们还是在看到维勒鲁瓦元帅——小国王路易十五的监护人时，发出了超过 15 分钟的叫喊。

一旦小国王痊愈，又会产生谣言。它不再忧心忡忡，而是传播仇恨。它讲述着为什么摄政王不招人待见：路易十五可能被下了毒，而且很可能就是摄政王下的……故事为警方的分析提供了依据，正如社会新闻中的故事和轶事那样。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流传，马雷和巴尔比耶认为它是平民百姓捏造出来的，而帕拉蒂娜（摄政王的母亲）和杜克洛[46]在回忆录中却表现出维勒鲁瓦元帅对小国王饮食起居防备重重，以及宫廷中的各种

猜忌。

下毒是这一时期耳熟能详的话题，也是一项犯罪活动。就算下毒是一项可行的犯罪，但是如何理解摄政王会染指这样的行为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他喜欢化学和各种仪器，于是就在王宫里建了一座实验室，在那里，他和一位来自荷兰的化学家一起做各种实验，后者是王太子御医的女婿。有这些就足够了：化学、实验室、摄政王、王太子的御医，一切都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费内隆[①]本人还在当中添油加醋，因为从 1711 到 1712 年间，他一直怀疑王室中多起死亡案件均与下毒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下层平民，人们都在传播谣言。它寄托着（讲述着）人们对于路易十五的期望，也报复着摄政王，因为他该对当前的困境负责，对警方在面对穷人和失业人员时的生硬态度负责。这是一条没有风险的谣言，这一次，不能责怪民众的天真，因为就连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们也都相信了。毒药事件（就在最近）确实发生了，他们不得不信。动机就这样建立起来，并且养育出了一种非常严苛的公共舆论。

1723 年，当孩子又一次生病时，警察总监让其下属的警长们前往自己的辖区，挨家挨户地告诉人们，国王并不危险。警长们的随访笔录里，记下了国王与其臣民之间颇具炫耀色彩的关系，基本保留了自 1721 年以来的“既有优势”，即人民对国

---

① 指弗朗索瓦·费内隆（1651—1715），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宗教界的博学者，是路易十四长孙的老师。

王的爱戴。

1726 年 7 月，新的警报拉响：国王发烧了，脸上出了疹子，王后也病得不轻。后来，他们都康复了。于是，法院便让人们在圣礼拜堂唱颂《感恩赞》，全城灯火通明。警察总监一会儿下令，一会儿又撤销命令，扰乱着并不喧闹的庆祝，但是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牵扯其中，他们窃窃私语："一个新的统治时代即将来临。"[47] 于是，有人庆祝着（也有人咒骂着）对新国王的期望。生病与康复，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

1729 年 1 月，国王又出现新的病情，因为结果可能让人失望，所以局势略显紧张。警方密探们收集到的都是巴黎人的坏心情：

> 有人说都是他的错，他根本就不知道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其实法国人民更希望拥有一个关注自身健康的国王，而不是这样的路易十五。还有人说，人要懂得尊重生命，因为生命于每个人都是弥足珍贵的。显而易见的是，国王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因为他还只是个年轻的学生呢。

等待是漫长的，国王成不了国王，他的乖戾藏于他的外表之下。距离 1721 年已经相去甚远。

1744 年 4 月，国王在梅兹又病倒了，这可是他第一次出征边境前线，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出于种种原因，此次病情成了重大事件，因为就在这时，法国人对路易十五（稍后

国人称他为“被喜爱者”）的好感到达顶点，又几乎是在同时，开始渐渐失去对他的好感。如果详细研究整个过程，从国王出发前往弗朗德尔到他生病，再到他回巴黎，就可以理解国王与臣民之间进行交流的途径，也会向我们展示公众舆论的面貌。它关注最微小的细节，随时准备就国王的行为与国家事务发表意见。

1744 年是一个重大转折，以后它成为了一个谜，梅西耶为此用几句话回顾了一下：

> 我看到的是同一个国王吗？之前那样受人爱戴，现在，就算死了他也不会赚得民众一滴眼泪。这还是同一群人吗？他们曾经那样热爱他们的君主，曾经在教堂的穹顶之下呜咽着喃喃祈求国王康复，但当他病倒在梅兹时却不做任何表示。国王到底做了什么，让他曾经深受爱戴？又做了什么，引发了人们截然相反的情绪？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一会儿受人爱戴，一会儿又遭人漠视？[48]

然而，要想找到这一转变的原因，仅仅从国王身上入手是不够的，这其实是当时的环境与事件相结合的产物。正是这一切造成了之前的热爱与之后的漠然。

为了研究被人们称为“梅兹插曲”的事件，我们找到一份珍贵的资料：保存在巴士底狱档案中穆希骑士所作的手写新闻[49]。

为什么要用这份资料而不是巴尔比耶或达让松的日记，也

不是吕内公爵或舒瓦瑟尔公爵的回忆录？因为穆希手写新闻的本意是为警方提供消息。因此，它后来会变成官方回忆录作者们主要的资料来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警方是如何操控公众舆论的，他们是如何精心审查民众对事件所做的反应，还有那些为他们传递消息的人的。穆希骑士的手写新闻讲述了最新消息，其中包括有人刻意编造出来影响公众的新闻。它们详细揭露了底层人民的痛苦和他们为了不被事件的虚假版本所愚弄而做的一切。

夏尔·德·菲厄，即穆希骑士，1701 年 5 月 9 日出生于梅兹一个体面的家庭，但是家道中落。[50] 他因爱成婚，娶了一位年轻却家境贫寒的姑娘。40 岁时，他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了。他只能靠笔杆子生活，除此之外，他一无所长。他文笔冗繁，这使得他的文章符合正统的要求，但也招来不少麻烦。比如，1733 年，他就各种主题写了超过 12 卷本的文章，却仍不足以维持家庭开销。于是，他决定为手写报刊工作，这既可以弥补他难以成为小说家的平淡才华，又可以满足身为爱凑热闹者的好奇心，还可以出入各种大大小小的场所，以便写作手写新闻。1741 年，他遭遇了第一次不幸：在出版了一部反宗教的作品《一千零一种恩典》之后，他被关进了巴士底狱，服刑一个月。这个插曲为时甚短，因为穆希已经成功地成为了御用新闻人，即当局雇佣的信息员。

他的工作室位于不错的地段，在圣奥诺雷大街上一所临街的房子里。他就在这里接待民间的访客，他们会为他提供各种

消息，带来城市里的各种传闻，有时也会付费刊登“广告”。绝大多数订户所收到的活页都是被警方当局修改过的新闻，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而穆希却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贪婪地搜集各种故事，走遍了巴黎城的每一个角落。每天，他都给警察总监献上一份长长的手稿，这是对他所有调查的精心总结，包括与各色人等的交谈，以及他在各处听到的政治传闻。同样，他也会向总监报告所有针对政府和军队的批判之辞。既当记者又做密探，这家伙还真是卖力呢！可是，就算他有特权也是枉然，到了1745年，他又因为渎职和重大错误而被第二次送进了巴士底狱。几个月后，被流放到鲁昂。在那里，他不断请求重获自由以重返首都。他可怜兮兮地追随着警察总监马维尔，多亏了沙尔汀，他还会被重新带回警局。到了1763年，人们发现他重获自由，作为巴绍蒙的信息员之一，成了他圈子里的常客。穆希为巴绍蒙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就在后者经常被警方纠缠的时候，成了巴绍蒙的“鼹鼠”①。1784年，穆希逝世，终年83岁。

穆希和他的作品之所以受人关注，是因为他的手写新闻融合了官方授权的新闻和警方情报。故而，他向订户们提供的是得到警方批准的新闻，但与此同时，收到酬金后，他也给外省的高官及某些将军抄写本应只呈给警察总监的秘密报告。作为回报，部队官员的秘书们也会向他提供各类军事行动的详细报

① 即潜伏的间谍。

告，这对他的报纸来说是绝佳的素材。有了这些交换的细节，我们就可以更好理解手写新闻的制作过程：原本只应呈给警方的秘密报告被送给了元帅们，作为回报，元帅们又为小报提供消息。多么错综复杂！1744 至 1748 年间那些关乎国王病情的手写新闻，都是送呈警方的。的确，穆希在大家熟知的地方开办了一间得到批准的工作室，并且是警方的眼线。因为信息的双面性，他的手稿得以展现出当时“真实的”一面。还不要忘了，后来，他的新闻成为众多编年史学家和回忆录作者们的第一手资料。正是因为这三个理由，穆希骑士所写的故事才会非同寻常。

1744 年，法国开始插足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国王第一次出征前线（这让一直以来认为国王只热衷于狩猎的民众长出了一口气）。可是，他居然决定带上他的情妇沙托鲁夫人。到了 4 月，他突然病重，这在法国引发巨大惶恐，人们举行了多场大规模的仪式，祈求上天让国王康复。菲茨–詹姆斯主教在犹豫一番之后，要求国王公开驱逐他的情妇，为的是不让他在做临终圣事的时刻还摆脱不了原罪。国王同意了，但对于沙托鲁夫人而言，这无疑是奇耻大辱。过了些时日，国王康复了。巴黎沉浸在欢乐之中，也就是从那天起，开始称路易十五为“被喜爱者”。11 月，他宣布回到巴黎，但原本高涨的欢乐之情突然就变成了沮丧。原来，他又召回沙托鲁夫人继续做他的情妇。巴黎人与国王的重逢被这深深的失望所笼罩。国王以一种沉默的痛苦回应了：他再也不待在巴黎（除了几次短暂的到访，时

间都在一天之内），尽量远离巴黎人的视野。

这一系列接二连三的事件意味着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从 1744 年 4 月到 11 月），人民与国王间的关系时松时紧。我们最好在这个问题上停留一会儿。因为，对于每一个社会角色而言，这种变化都太快了：这里，有国王、国王的情妇、大臣、征战沙场的将军和元帅，以及对政权有重要影响的国王的神甫。此外，一项结合了仪式、话语、祈祷和主教训谕的政策也颁布了，以便用最严肃的方式来规定与王室疾病和康复相关的事宜。此时，不要忘了对新闻有着异乎寻常渴望的公众，他们热切追随此次王室出征的一举一动。多亏了这些新闻，让公众可以确认他们所掌握的信息，这成为他们了解整个过程的方式。谣言潜入首都，民众时时对其做出反应。

通过一系列民众对事件以及仪式的回应，通过他们对国王私生活（即国王让其情妇陪同出征，但后来又在主教的建议下将其驱逐）所持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出公众的态度。除了担心失去一国之主外，还有一个问题：战时，国王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爱情？

穆希骑士的手写新闻，充满激情地追踪着日常细节，同时也反映出信息传播的政治条件：当局显而易见地想要引导民众的思想，同时，话语和祈祷所构成的严密网络旨在创立一种共同语言，以表达臣民对于国王万众一心的忠诚。作为警方的信息员，穆希不得不呈现出公众的真实反应：即他们有时试图摆脱被强加的内容，并进行自我构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于警

方而言，他便没有用处了。

总之，1744 年是路易十五统治中的重要一年：从漫长的摄政时期的结束，到国王碌碌无为的统治，人民等待的时间太长了。在这一年，人民对国王的爱戴得以加强。一旦日后需要回忆路易十五与其臣民的良好关系，那么 1744 年是一个支撑和提示。人们会想起那些日子里民众突然爆发的欢欣雀跃，还有他们给国王取的名为“被喜爱者”的雅号。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1757 年）之后当局的所有行动，都将依托于 1744 年的各种仪式，以便驱散普通人思想中可能存在的“弑君”合法的念头。故而，通过故事和回忆录，围绕着国王，民众的一致性应该会被再次构建，被描述成忠贞不渝，至死不变。于是，可以说：“1744 年，面对国王的病情，人民还是那样忧心忡忡。”

在经历了国王童年时期那漫长且让人情绪高涨的等待后，路易十五与其子民间的良好关系着实难以建立。待国王长大成人，人民“伤心地”发现，国王根本就不在乎他们。这种情况引发了警方的密切关注，穆希也向警方进行了详细汇报。1722 年时，整个宫廷回到了凡尔赛，国王没有去巴黎的习惯，而且弗勒里似乎还对国王施加着不利的影响。缩在后面的路易十五无法像他伟大的前任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太难以接近，甚至脱离宫廷，任由人民无尽思念他的曾祖父，尽管后者可能是个专制者，但他至少给公众留下了平易近人的印象。要想“看见”路易十五只能通过军事游行，每年两次，分别在萨布隆平原和维内特举行；或者在他偶尔途经巴黎时。不幸的是，无

论在怎样的场合中，路易十五都不会轻易让人靠近，他的侍卫们总是把公众赶得远远的。更要命的是，国王从不接触那些得了瘰疬的人[①]，也不领复活节圣体。

密切关注公众舆论的穆希发现了态度转变的迹象。他是在对英格兰宣战的公开声明中，以及王室表明参战意向中发现的，他写道："人们奔走相告，说国王将发起下一场战役。"国王决定出征，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他终于有所行动了，准备参与君主制最基本的活动之一——战争了。

> 公开出版的新闻提到，在对敌作战之时，陛下想要御驾亲征，舆论为之欢欣鼓舞。有人说，这样有魄力且坚决的举动一定可以创造奇迹，不仅可以彰显陛下的光辉形象，还足以让他的军队打败敌人……这些传闻让好久不曾开心的人们在态度上缓和了许多。

国王亲上战场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何况那是在18世纪40年代，人们经常将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进行对比。与无所不能的太阳王相比，路易十五简直就是个沉痛的失败者。秘密警察的报告不断重复着：无论是在咖啡馆里还是在公园里，每个人都为只醉心于狩猎却从不亲自打理军政事务的国王感到悲哀。于是人们带着嘲讽的语气称他为"和平者路易"，更平和

---

① 旧制度下的法国，人们相信，只要国王触碰那些得了瘰疬的人，病人就会康复。

一些的，则称之为“大猎人”。或许狩猎的确是国王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只有当国王对战争的热情与狩猎相当时，狩猎才是有意义的。狩猎是对战争的模拟，为战争做好准备，但如果只迷恋狩猎，那无疑是贬低王公贵族和国王们的身价的。热衷于战争的国王是强大的，但面对鹿群时，路易十五无法构建起英勇无畏的形象，更何况，他还经常在狩猎过程中被贴上心狠手辣的标签。既然这样的心狠手辣与战场上的丰功伟绩无关，那么它就只能破坏高贵血统及战争中英勇无畏的形象了。

穆希从得知国王御驾前往弗朗德尔时起，就着手收集民众的正面反馈，并提交给警察总监一份深得其心的报告。他写道，国王“很快就会深受人民爱戴了”。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刻，在这样的欢乐之中可能已经掺入些许担忧：听说沙托鲁夫人也许会陪同她的情人——国王上前线。人人都在谈论这种可能性，让刚刚平复的公众舆论又激荡起来。战时，君主夫妇的形象应该得到捍卫。战争是一项重要职能，根本不应该公然出现国王的情妇来搅局。在战争这一宏大而重要的舞台之上，没有随心所欲之说。更糟糕的是，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时刻，王后似乎被遗忘了，她不仅被国王所抛弃，也被周围的大臣们抛弃。穆希于 1744 年 4 月 23 日满怀担忧地写道：

> 越是临近国王出征的日子，对其所作所为的批判就越是强烈。如果公众得知大臣们都不前往王后处议政，得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就不在意王后，那他们不仅会很吃

惊，还会极为不满。人们到处议论纷纷，国王得到的都是不良建议，他居然就这样听从了。

路易十五公然违背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举动：一旦国王御驾亲征，内阁就应该搬至王后处，以确保各种事务象征性地继续进行。当公众得知国王给王后"送去了一个封印好的包裹"时，据说里面装着国王的命令以及给王后和孩子们的信，他们震惊了。这还真是罕见！这种对待王后的绝无仅有的态度动摇着人们的思想，不尊重传统，是征战沙场的一个凶兆。在写给王太子的信里，路易十五"表达着自己对臣民们的爱"，但他却拒绝公开这封信。保守这种秘密是容易招致祸害的，穆希提醒了警方这一点，并强调说这封信的公开也许最终会"消除公众心头的怨念，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国王从没爱过他们"。

国王无视王后、王太子和民众（无视传统），但公爵夫人依然大方地出现在他左右。民众为此感到愤慨，以至于警方对屡禁不止的负面言论忧心忡忡。于是，在手写新闻中，警察和宫廷会掺杂一些虚假消息，来让民众放心：比如不断提及情妇是否陪同出征尚不确定，有人在私下里向国王提了许多慎重的建议。有个问题被明确指出：性与战争难以相容，至少在涉及王室形象时是这样的。抹煞二者间的差异不仅会遭天谴（"我们极有可能战败！"人们到处这样嚷道），更为无礼至极的讽刺诗和小册子敞开了大门。战争需要男子气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路易十五都欠缺男子气概，又因公爵夫人的出现而突然遭人

诟病。其实，关于同行女伴，国王最好不发表任何意见。可是权衡之后，劝谏者都被他晾在了一边，他还是决定将这位并不合法的女伴公之于众。必须承认的是，有些人为公爵夫人申辩，认为如果没有她，路易十五是不会有兴趣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的。统治者以民众情感为赌注，他以为自己幸福了，民众就会幸福。这可真是大错特错了。关于幸福，民众有自己的定义。与战争相关的传统不能被轻易改变。在民众期待已久的时刻，突然插入两性消遣，这简直是重大的政治失误。当国王的坚持让一切变得透明时，这一错误便愈发深重了，因为从巴黎到梅兹，每经过一座城市，两幢公寓之间都要建起一条横跨大街的户外走廊，连接国王和情妇的房间。民众所看到的是一个可悲的形象，而历史记录者们（巴尔比耶是其中一员）严肃地批判着国王，认为他笨拙地挑战着当时的各种规定，值此关键时刻还在挑衅战前的种种礼仪习惯。王室的权威接连两次被削弱，一次是国王夫妇形象的败坏，另一次是国王身体不良难以带领军队获得光荣。战争几乎可以肯定会失败。

为了表达不满，民众开始借助于各种故事（穆希的报告中特意提及它们）。有人说（当然是假的）克莱蒙公爵刚刚过世，因为想要追寻“光荣与爱”，出征前线时，他让自己的情妇女扮男装跟随左右，但后来她得了重病不得不褪去伪装，露出真面目。克莱蒙公爵觉得丢人便躲了起来，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有人说他死了，其实是人们宁愿他死了。这则关于克莱蒙的故事，只在那个时代流传了片刻，并没有刻意提及或让人想起国

王。但是，违背战争与宗教法则的人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无论是公爵还是君王……

从那以后，公众所接收到的信息被篡改得越来越多。有人故意散布谣言，说国王其实是“忽视”沙托鲁夫人的，这种看似疏离的情感再一次让公众惊愕不已。关于这一点，穆希记下了有趣的细节：“人们很清楚，在宫廷所批准的新闻中不存在轻率的言论，没有什么比每天晚上散布于公众中的简报更精炼而准确的了。”他讲了那些人是如何被挑选出来进行秘密新闻写作的，他们的故事又是如何被修改和修正的。整个操作机制尽收眼底。这一独特的反常现象一再得到确认，一种并未正式存在的舆论，却受到最广泛的关注——根本就是在撒谎。此外，在另一些简报中，人们敬重国王，讲述着围绕在他身边的掌声与赞美。穆希也指出：“法兰西的任何一位国王都不曾被这样爱戴过，可是人们都知道这样炽烈的情感最后都会因谎言被揭穿而形成鲜明的反差。”

国王生病了，接着沙托鲁公爵夫人被驱逐了，于是，终于成就了“被喜爱者”。正是这一系列断断续续的事件（国王生病，王室忏悔，驱逐情妇，国王康复）引发了公众一连串又惊又喜的情感。但也有些人并不赞同菲茨-詹姆斯主教——驱逐公爵夫人的主谋——为国王所做的盘算和对他施加的影响。[51] 巴尔比耶以矛盾的方式强烈指出此事的不妥。他首先严厉地批评驱逐情妇及其陪同侍女的做法：

她们被勒令离开城市且不得不放下四轮豪华马车上的窗帘，唯恐遭到下等人的辱骂。她们只能随身携带一些符合被驱逐身份的物品，甚至还不如此前被流放的法院……

后来，他又补充说：

在巴黎，关于驱逐的消息让公众开心不已……公众总是不假思索就对一些重大事件大加赞赏。我始终坚持，这样的举动是有失体面的，这样的公开谢罪无异于一桩夸张的丑闻。要尊重国王的声誉，让他怀着信仰死去，但是，也要有尊严与威严。这种教会招式有什么用？只要国王发自内心地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表现出真挚的悔恨，就足以掩盖外在的一切。驱逐沙托鲁夫人是英明的，但考虑到她的远行，安排得应更加合理些……我并不知道国王三个月后会痊愈，但我认为这一行为是轻率并且欠考虑的，在有争议的时候，过于倚重教会对王室的影响了。[52]

从最后一句话中可以看出冉森派运动的影响。当然，虔诚的宗教人士（以菲茨–詹姆斯主教为首）从中看到的是上帝反对王室通奸的旨意。

于民众而言，公开的忏悔也好，对情妇的驱逐也罢，都让国王的形象得以恢复。此外，身体康复后，呈现在公众眼前的便只有骁勇善战的国王了，这可是他们多年的夙愿啊！君主制

重新变得纯粹且顺利运行，处处洋溢着欢乐之情，国王也成为“被喜爱者”。从这一点看，人们正努力恢复路易十四那个光荣且尚武的时代。这不仅能让人淡忘曾经的伤害，如拒绝接触瘰疬病人，不愿意在复活节领圣体，还会让人再次憧憬一个新的王权，因此能产生国王的另一项功能，即向民众征税。“所有人都认为国王是为了荣誉和国家的前途而战，”穆希写道，“为了让国王荣耀地完成这高贵的事业，没有什么比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更重要的了。”

庆祝仪式直到10月才告一段落，国王终于重新回到了人民心中，为整件事留下了圆满的记忆。国王与死神擦肩而过，他的康复加上为不当男女关系的公开赎罪，修复了民众的创伤，也让他们再次爱戴君主。此间各种仪式所表现出的政治、社会、文本策略都只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在君主及其臣民间建立起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

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更何况巴黎人那么密切地关注来自国王和宫廷的一举一动。从1744年11月到1745年1月，穆希再次一点一点地向警方提供情报。他发现民众总是与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保持一定距离，并努力让自己主导自己的态度。

国王将于11月14日回到巴黎，此消息一出，警方就发现，民众爆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狂躁之情。特别是在某些特殊场合，比如菜场或集市这种下等人聚集的地方，人们总有零星却明显的躁动。为了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穆希将这些地

方一一走过，于是得到了一则在巴黎坊间流传的消息：国王可能会“召回”沙托鲁夫人。事实上，尽管有些忿忿不平，但民众们还在商议到了路易十五圣驾回銮之日，他们到底应该涌到街上去庆祝还是应该呆在家里；在表明自己的立场之前，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消息。他们不是很相信谣言。在心腹们的帮助下，穆希发现民众获得了更多的情报，并努力鉴别真伪。巴黎人十分清楚各个新闻工作室的地址，于是他们纷纷前往，满心疑问且满怀忧虑。菜场的妇女们组织起来，来到穆希骑士的工作室，恳求一位名叫奥吉耶的职员告诉她们更多消息。这种有组织的充满怀疑精神的询问是一种新兴事物。面对这些发生在经当局批准的新闻工作室前的活动，穆希按照警方的要求做出解释：比如，他的职员们会极力否认沙托鲁夫人可能被召回的传闻。否认之后，他们还会号召民众兴高采烈地出现在圣驾回銮的道路两旁。穆希强调说：记者们努力地“让她们（此处指那些来自菜市场的妇女们）明白，当她们再见到国王时，只要表现得开心就好，这样，上帝也更愿意给臣民们赐福。”他有些草率地写道：“她们满意地离去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稍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将会造成国王和臣民间关系的破裂。事实上，在回到首都的那天，国王真的召回了他的情妇，巴黎人也切切实实用空空荡荡的大街欢迎了他。据说，只有那些伴其左右的四轮马车在高喊“国王万岁”，连窗口都看不到人，更别提灯饰了。晚上 11 点，巴黎城进入梦乡，杜伊勒里宫也熄了灯，“就好像国王根本不在那儿一样”。多么严厉的指

责啊!

八天之后，沙托鲁夫人暴毙，终年27岁。菜市场中，人们用各种恶毒的话语和抨击性的招贴来迎接此事。震怒的国王再也没法待在巴黎。从那天起，一旦有人胆敢在他面前提及他生命中的此时此刻，他都会大发雷霆。在此，我们可以援引《塔那斯黛丝》(*Tanastès*) 的例子。这本书于1745年出版，算是比较成功的著作。《塔那斯黛丝》的作者是博纳丰小姐，一位女性，书中描述了国王与沙托鲁夫人间的爱情，还有国王在梅兹所生的那场病。警方的报告中说："该书虽是一本童话，却影射了国王、王后、沙托鲁夫人、黎塞留公爵和红衣主教弗勒里，并对他们进行了侮辱。"[53] 国王对于这本印刷了100余册的小书十分不满，把它的作者关进了巴士底狱，后又将其幽禁于修道院中长达14年之久。

审问时，博纳丰小姐的理由是需要钱，她辩解说书中所写皆来自公众言论，她的解释称：

> 她是独自一人写作并依靠想象完成此书，只不过是使用了民众在公开场合关于国王生病期间及此后各种事情的言论，她把这些用到了书中，根本没有想过后果，也并非出于恶意。她还发誓，越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越深陷痛苦之中，无法自拔。[54]

我们在巴士底狱的资料中还找到了博纳丰小姐与警察总监长达

十年的通信：这些从未中断的通信表明国王不可能原谅她，也表明在这一时期国王与民众关系断裂的程度之深。

该怎样做出小结？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王室的疾病”是一个多么丰富的主题，又给公众舆论和警方提供了多少素材。民众的担心是极为重要的，有助于当局更好地了解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刺激他们进行自我表达，国王生病时（也可能还包括其他王室成员的病情，当然都不如国王的重要）是一个可以看出当权者与其臣民之间关系变化的契机。当然，他的每一次生病并非都可以像1744年那样让人们获得如此之多的信息。不管怎样，是特殊时期还是此处所描绘的短暂时期，我们都要感谢集记者与密探于一身的穆希骑士，是他告诉我们一个旨在有效煽动舆论的信息体系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各种机制得到如此有效的运行，以至于从舆论一产生时起就可以掌握其发展变化。之后，与人们的预期相左，可以看到舆论渐渐消失，并摆脱那些看似渴望迎接它们的人。群众想要与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保持一定距离，也与仓促的集体商议保持距离（在菜场和市场上的集会），后者经常会构建起他们的某种行为模式。多亏了穆希骑士的报纸，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台前和幕后，看出警方的阴谋诡计和民众为了不受愚弄而付出的努力，逐渐了解“操纵–信息–接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找出巴黎人民批判甚至改变事件发展方向的理由。

不连贯性和矛盾性是这一时期舆论的主要特点。公众有时

期待国王做出最符合传统的举动，有时又要求国王公然与过去决裂，有时他们还期待君主的举动能够与自己当下的需求不谋而合。一旦需要形成某种大体一致的意见时，他们又总是难以定夺。路易十五会在诸多教训中明白这一点。

特殊的转变

时代了解那些扰乱日常生活的变故，正是它们将平静的时日带入无序与混乱中。战争、传染病、宗教纷争、政权更迭都是特殊的转变，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与精神结构，让他们不得不迅速反应，去面对那些破坏生活和憧憬之间平衡的事情。

暴乱就是这些变故之一。18 世纪，因叛乱、抗议面包价格、反对绑架儿童而产生的暴动、面粉战等为这个时代打下了烙印。尽管不如 17 世纪频繁，也不如那时激烈，但这些决裂性的举动依然是诸多历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55]，也引发了众多思考。在试图对它们进行全方位解读时（从中可以找到大革命的起源吗？它们为政治觉悟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吗?），个中差异令史学家们震惊。此时，我们只想知道在已被描述出的舆论变化的内部，它们代表着什么，因何而起，又是如何构建的？它们追求的关键是什么？那些改变，无论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都是从暴力泛滥起开始发挥作用的吗?

多亏了警方档案及政治轶事录，诸如编年史，让我们得以分析1720年4月、1720年7月、1725年、1750年和1775年的几场暴乱。这是五个有意思的时期，因为几场暴乱的主要动机都不尽相同：1720年4月之所以会发生暴乱，是因为一系列针对游手好闲者、乞讨者和流浪汉的镇压命令。1720年7月，则是因为约翰·劳体系的崩溃及其经济政策的失败给人们带来的深深失望。1725年，是一场因面包价格飞涨而引发的传统暴乱。至于1750年，则是为了回应警方所做出的清洗巴黎"流浪儿"的决定。1775年的诸多事件，因其规模之大而让人震惊，它们不仅关乎物价，更关乎贸易和粮食自由交易的新政策。通过对这些暴乱动机的简短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民众的立场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已然摒弃那些传统的（甚至过时的）辩解之词：只有当民众挨饿时才会掀起暴乱。其实民众所在意的不仅仅只是填饱肚子或饥饿的身体，18世纪的暴乱与政治形势及经济环境息息相关。每一次的群情激昂都会产生特别的回应。通过对当局回应的解读，可以看出其行动的意义。"每一次反抗都意味深远，"让·尼古拉在他为《16—19世纪的民众运动与社会觉醒》所作的序言中如是说；愤怒的时代聚集起各种意义，然而，这种深远的意味并非一成不变，它总是介于偏激和理性之间，它展望着未来，在重建旧秩序的同时也加入新规则。就算颠覆真的有影响，也并不意味着民众的激情会按线性发展。因此，1775年的种种事件会比1719—1720年间的那些筹划得更加周密。

1720年4月

3月20日，警方下令严肃整顿乞讨行为。凡是流浪者和无法出具证明的人都要被逮捕，而且“那些身体健康、年龄合适的人将被发配到殖民地”。全城掀起抓人的狂潮，许多人被强行送往路易斯安那。镇压在怨声载道中展开：贫困已经成为重要议题，大街上随处可见处境悲惨的人，警察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贪污腐化和挪用公款却在暗地里大行其道。一位巴黎人都熟悉的警长（卡伊），曾是密探出身，经常敲诈勒索旧货商、地毯商、各种商贩和零售商。一项针对他的诉讼被公开受理：卡伊，身为达让松警察总监的手下，曾经负责于1709年冬向穷苦百姓分发取暖的木料，但他实际上只下发了其中一部分。人们还发现，他在负责征兵时，扣留了大量钱财并向共事的看守索要金钱。然而，法院释放了卡伊和他的同伙，也并没有对达让松采取行动。民众直接面对司法的不公正：在对着密探和警员时，他们总表现得义愤填膺。受到暴力要挟的青年男女们于1719年夏天发起反抗，其中包括150个被迫从巴黎迁往拉罗谢尔的女性，她们公然反对负责押解的低级警务人员，后者便朝她们开枪，导致其中六人被击毙。到了1719年9月，又有一系列并非自愿的结婚仪式在乡野的圣马丁隐修院当众举行。灰心丧气的公众目睹了被迫成婚的年轻男女，两人一排，鱼贯而行。

此举让 180 个年轻的女子和 180 个年轻的男子结为夫妇。圣西蒙①也见证了这野蛮的场景：

> 当局一点都不关心民众的生存状态……晚上要么把他们关在谷仓里，禁水禁食；要么就把他们关在附近的沟渠中，让他们爬不上来。被关押的人发出可怜而愤怒的叫喊声……施虐者如此野蛮且惨无人道，只会让谣言愈演愈烈。[56]

1720 年 3 月的敕令让人气郁难平：不足八日，就有超过 5000 人被关押，其中包括大量手工业者。这不能不引发恶果。很快暴乱就开始了，突然、精确、野蛮，并且集中在局部地区。在圣安托万大街、圣母桥、西西勒国王大街，不断有人袭击并刺伤低级警务人员，手段极其残忍。毫无怜悯之心的人们连尸体都不放过。某个低级警务人员的事例可以作证：他因重伤被送进“仁爱医院”，却被那儿的病人了结性命。民众的暴力无法协商，非常清晰，不容改变，他们确信自己是对的，这是回忆录作者们由果溯因而得出的。我们引用了圣西蒙的话，比瓦对此也持相同的观点，还有巴黎法院的书记员德利勒，他在记录

---

① 圣西蒙（1675—1755），即圣西蒙公爵，本名路易·德·鲁弗鲁瓦，法国政治家、作家，早年从军，1702 年放弃军职；尽管路易十四厌恶此人，但最终还是让他常住凡尔赛宫。路易十四死后，圣西蒙于 1715—1723 年间出任摄政委员会成员。摄政期结束后，圣西蒙退居自己的庄园。从历史学角度看，圣西蒙最大的贡献在于其撰写的长篇《回忆录》（*Memoirs of Duc de Saint-Simon*，写于 1739—1751 年），该书对 1691—1715 年间路易十四的内政外交作了详细记述。

中写道："人民是对的。"[57]

人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突然爆发的愤怒所表现出的不仅仅只是面对不公正时的集体情绪，还有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尽管时代没落，但个人自由依然是不被允许的，有人甚至被逼迫结婚。对私生活的僭越被视为不可容忍——例如当街绑架：所引发的效应是快速的、残酷的、无法协商的。

对于剥夺"公众出门的自由，否则他们就会被抓起来送往密西西比"[58]的做法，法院最终还是介入了。国王召见了达让松，在继续严格执行之前命令的基础上（国王坚持"任何人，无论身份地位如何，胆敢反对3月10日及当前敕令者，皆处以极刑"[59]），又颁布了一项新的命令。当然，逮捕令只有警长签署之后才能生效（直到1750年都还是如此）。此外，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情况出现，负责抓捕流浪汉的低级警务人员们在执行任务时，应"结队而行，且身着制服"。

1720年4月，群众针对司法不公和警方腐败展开暴力活动。在暴动期间鲜有言论，却有很多残忍之举。这是一个孤立且快速的时期。30年后，当警方重蹈覆辙，民众的反应与1720年如出一辙。1750年的闹事者们就跟此前所描述的因5月命令而闹事的人一样：受害者们（警方密探和下级警官们，因疑似绑架儿童而遭到群众的袭击）会被拖到警长家门口[60]。这被视作合法性被破坏的标志。直接性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对在1720年就被确定下来的合法性，正是围绕着回忆与理性的机制，才能组织起所有的运动。1720年民众因不愿受到动物般的

对待而诉诸暴力，到了1750年，则加上了回忆与清晰的逻辑。

1720年7月

不安源自另一个范畴，它源于某种影响到每个人的非典型的政治、经济经验。在司法档案中几乎无法觅得与此次事件相关的痕迹；也许正因为如此，E.富尔在关于约翰·劳体制的分析文章中又一次抛出“暴乱”的字眼，且更愿意用下面这句话来诠释“社会新闻”，即“在不区分等级亦无社会性区分的人群中，自发形成的集体心理反应”。究竟是不是如此，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都知道，约翰·劳体制[61]在为旧制度的传统经济模式创造出独特而新颖的形势时，激起了希望也带来了失望。经济手段是全新的，也是极冒险的：用（难以把控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减轻国家债务，为了推动经济，对银行业实行中央集权，由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央银行担保而向市场上大力投放银行债券、发行货币、征收间接税以及发展殖民贸易。

这一政策嫁接了三个附加因素。每个人，无论阶层，不分国籍，甚至不分性别（好多女人都做着“投机生意”，她们都是投机者）都有可能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直接参与其中。在康普瓦大街的众目睽睽之下，18世纪初最为鲜活的画面一幕幕上演。所有人都表现得极为疯狂：有人投机，有人觊觎着投机者

们鼓鼓囊囊的口袋，还有人在这项狂热的运动中匆匆开辟了可以赚钱的小手工业。康普瓦大街上所呈现的是现实，亦是幻象。人们已然疯狂，每天早上疯狂的人们聚集于此，所有匆匆赶来的人都相信自己在国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无需任何中介。每个人都尽可能具体地参与，这宛若一种幻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或者至少都是可以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

第二个因素是新财富之轮的有效性：一切都清晰可见。每天都可以看到投机活动在人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一日破产。这样的透明性加剧了事态的疯狂：几天里，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出乎意料的赢利，或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损失。金钱被搬上舞台，舞台的背后是数不清的灾难与暴行。有些人因破产而自杀，还有些人因贪婪而不顾廉耻地欺骗别人。此外，财富的增加与减少不遵循传统逻辑：富人可能突然间一无所有，小手工业者也许可在一天之内赚得 300 里弗尔。

财富的颠倒让这一体制充满诱惑力，梦想近在咫尺。某些时候，人们几乎以为存在另一种社会秩序，不再有任何的规律和法律制约财富的获取与分配，只能靠运气。大人物们非常忐忑，“我想如果上帝不出手的话，最后仆人可能会变成主人，而主人们亦会变成仆人。”迪努瓦耶夫人于 1723 年写道。[62]

在康普瓦大街上，社会融合令人印象深刻：教士们常与仆从们来往，富家小姐太太们也经常接触收入低微者以及小手工业者。这种不大可能的现象引发了大量的故事，尽管难以证实真伪却也多少符合情理，于是便在街头巷尾和小酒馆中肆意流

传。穷人发财的故事总是传得飞快，还有某个身材矮小的驼子准备将他的驼背用作托书架，只要有人给他钱的话。也有某个疯狂的暴发户突发奇想要弄些银制的尿壶来满足个人需求等。财富颠覆了一切，但还有些人沉浸在从前的社会习惯中难以自拔：据说某个仆人，被突如其来的钱财冲昏了头脑，都忘了自己需要改变一些习惯。一不小心，他还会出现在自己的豪华四轮马车之后……

不同寻常的背景下，失望与希望同样强烈。于是，1720 年 7 月 16 至 17 日，暴乱发生了，激烈无比，并且往往在需要为事件负责的某些场所：发生在银行门口的冲突，有人甚至在约翰·劳居住的宫殿前摆放了一具尸体。

女人们总是积极主动的。“她们想给男人们打打气”，巴尔比耶这样解释。民众中时而也会混杂着守卫，一起谩骂制度及其制定者。惊恐万分的马雷这样描写：

> 一切都在异乎寻常的不安中展开。约翰·劳的马车夫身受重伤，他的仆人们作鸟兽散，因为他们的主子一直待在宫殿里……尽管有守卫，可人们还是砸碎了他住所的玻璃，守卫们其实也在协助民众，他们告诉民众自己才应该是第一批了结那家伙性命的人。

稍后秩序重建了，毫无例外地，历史的记录者们又一次为民众恢复平静的能力感到惊讶。1720 年 7 月的暴乱不是一个孤立

的事态，其结构和被体制激发的民众参与形式一致。巴黎人的愤怒让他们重新走上了几个月前的老路，首先是银行，接着开始寻找给他们带来苦难的始作俑者。等到体制倒台，其缔造者失去权力，就恢复了平静，同时，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也得到了“正常化”：一个单纯的手工业者不再奢望豪华的四轮马车，每个阶层都回归自己的传统。其实，他们从来都不曾离开过。

1725 年 7 月，1775 年 5 月

相隔 50 年，两次暴乱撼动着巴黎城。其间，1750 年，全城起义反对警察当街绑架年幼的孩子[63]。1725 和 1775 年的两场暴乱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发生在面包价格持续飞涨之后，并且人们都相信粮食短缺并非自然现象，而是人为哄抬物价以牟取暴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饥饿阴谋”[64]。这些谣言和阴谋长久以来都有人在研究，史蒂夫·卡普兰证明了这些谣言建立在怎样的事实之上，又是如何扩大的，他还解释说：“那些控诉并非没有根据，亦不乏可信度，它们并非空穴来风。”因为 1725 年“王室享有直接购买谷物的优先权，政府也会让那些在理论上自负盈亏的个人来操作”。

其实，关于这两次暴乱，我们更想了解的是它们的过程及造成的影响。

1725 年，郊区圣安托万的民众情绪爆发出来，这一地点本

身就极具象征意义。事实上，郊区是相对独立的，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多是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享有特权的“国中国”，郊区并未被纳入巴黎的司法体系中。这是一片自由之地，没有什么行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可以脱离警方的监控也不受行会职业义务的约束。于是，它吸引了众多流浪汉和轻罪犯人，他们定居于此，把这里当作避难所或藏身处。与中央政权之间的距离让郊区得以保持原始的面孔：他们不知道权利和特权能够维持多久，因此格外珍惜自治的机会，郊区的居民享有广泛的言论与行动自由，具备批判精神，面对当局始终保持警惕。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权利和自由，人们会更勇于表达，他们群情激愤，拒绝与当局谈判。追溯动乱的暴力之源，其实是妇女间的争执[65]：一位女顾客走进一家面包店打算买 4 古斤面包，老板娘向她要 14 索尔，但她只想付 12 索尔。于是女人们开始聚集起来，她们拒绝了男人们让其保持安静的要求。暴动就这样开始，警卫们最初的几声枪响根本恐吓不了任何人。

警方温和地与民众商谈，想让他们通过法律而非暴力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这种尝试失败了，调停人很快到场，比如圣玛格丽特的本堂神甫，但他们不是引来阵阵倒彩就是被痛打一顿，拉贝警长不得不落荒而逃。人们再也不相信所谓的公正和警方，他们宣称只有自己才是权利和正义的化身。“没有公平的价格亦无公平的工作。”暴乱者们大声疾呼，表现出他们在面对合法权益时的集体受辱之情。既然司法体系遭到质疑，那么它也就无

法平复人们心头被侮辱的感觉。这样的机制是符合逻辑的，之所以拒绝调停和谈判，是因为想要推翻不公正的司法体系，无论如何都不能与这一机制展开有效合作。

镇压措施很快就有了，两人被处以绞刑，并禁止人们围观行刑过程。然而，让人吃惊的是，暴乱持续发展。在暴乱发生之后的几个月里，整个巴黎异常敏感，从警方报告中可以看出民众的不满。女人们引导着行动。她们的言语和举动让全城火药味十足，最让她们恼怒的是警察总监和德普里夫人，即波旁公爵的情妇。招人恨的奥布勒瓦尔死后，1725 年 4 月，埃罗取代了他的位置，一时间辱骂性的檄文贴满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提醒大家提防警察总监："他根本不敢出现在公众面前，因为市场上的妇女们会拉长他的鼻子。"[66] 不管在哪儿都只能听到恶性言论和辱骂之辞，妇女们还组织起来去拜访法院院长和警察总监，提醒他们当前的困境和飞涨的物价。但她们只得到了从窗户里丢出来的施舍品，面对这些不合时宜的政治言论和举动，她们心灰意冷，公开表达对傲慢的大人物们的不满，以及对漠不关心的国王的担忧。波旁公爵"放声大笑，而其他人都在哭泣"，国王"什么都不想地离开了巴黎"。在市场上饱受讥笑的警察总监回敬说："既然你们没有面包，那么就去吃菜梗好了。"

于是，巴黎人转向了王后，这种态度是符合逻辑的。原因有二：一是国王让人失望透顶，二是 1725 年的运动是一场以女性为主的运动。女性无论是在言论上还是暴力上都担负重任。于是，她们就自然而然地转向握有实权的女人，即王后，提醒

她注意她的职责，让她参与政治，这是表明她们共同立场的举动。

一切并没有停止，檄文和恶性言论并未消失，警察总监为此忧心不已：首席秘书迪瓦尔写信给警察总监，提醒他注意城中不安的气氛：“您将看到这样蛮横无理的态势发展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67]之后他见证了辛辣尖锐的“告法国人书”：

> 既然强加于我们头上的不公正是没有下限的，那么，就该由我们，法国人，来为他们的权力加上界限。是时候拿起武器，推翻暴君了……虽然我的办法有些极端，但是，当错误已经根深蒂固，就只能用血与火来洗礼……没有其他办法了，因为法院所有的谏书都被证明是无效的。

1725年是充满暴力与公开批评的一年，人人都想在司法与法院机制之外参与社会和政治争论。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人们都会回忆起那珍贵的一年，在那一年里，人们想为自己做主。当暴力被镇压，没有大范围的骚动，但仍能在话语中找到蛛丝马迹，它们仍在持续发酵，接着又与冉森派和法院反对王权的政治事件纠缠在一起。几个小时的暴动只是插曲，却能产生文章，之后充满斗争经验的思想和文字使得日常冲突围绕着子虚乌有的气泡展开。

1775年5月爆发了面粉战[68]。路易十五已于一年前离世，没有任何人为此感到惋惜。泰雷总管始终牢牢把控着粮食交易，

让人憎恶。他总是担心资产阶级和民众会知道某家公司霸占着粮食贸易。因为使民众挨饿而受到指控，他在国王逝世后不久就被免职了。杜尔哥接替了他的职位，开启了粮食的自由贸易，让人越发怀疑泰雷时代的不法勾当。1775 年 5 月，暴乱开始。杜尔哥当即认为是自己的敌人、旧的食品公司代理人们挑起的。他没有考虑到，这其实是长久以来围绕生计问题积攒起来的紧张的社会关系导致的。他认为这也许是场由外国势力挑起的阴谋，也有些事情似乎证实着他的想法：有人看见身着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们当街派发黄金，为的是挑起民众暴动……

在查阅相关档案和更新过的史料之后，我们发现这次暴动不仅仅只是在我们以为的地方发生着，其表现形式亦与我们所认为的大相径庭。然而，它实在难以捉摸，因为无论是在各种历史记录还是当代的轶事中（梅特拉、阿尔迪、勒努瓦等等）都统统使用了“阴谋”这个词。警方的审讯记录表明，他们向嫌疑人提出的问题都基于一个基本的想法，即强盗和煽动者们组织了整个运动。于是，再次阅读这些文章并非易事，因为要试图发现与提问的要义所归纳出的不一样的东西。

然而，1775 年 5 月，一个阴谋被揭露出来：巴黎人都知道，在第戎和凡尔赛，农民们发起了不同寻常的运动，他们包围了市场，用激烈的（甚至是威胁性的）话语对抗政府和飞涨的物价。一些历史记录者们担心为数众多的妇女们会发挥作用并引导人群：“女人……我们都知道，在某些灾难中，她们比男人更危险。”[69] 但总的来说，在目睹巴黎城挤满人之前，似乎每

个人都顺应着可能发生的危机，以此表明自己早已习惯于关乎生计的民众运动。“人民已经习惯了在粮食短缺的日子里对小麦商做出过激之举。”孔多塞写道[70]，同时泰雷强调说：“这项群众运动本身很普通，它在路易十五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几乎在每个省都发生过，它不断展现出令人伤心且不祥的场面。”[71]

此次运动原本极为平常，甚至都没有引起历史记录者们的注意，直到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人群穿过圣马丁门和沃日拉尔门进入巴黎，先是奔向各大市场，之后遍及全城和郊区，几乎洗劫了所有的面包店。蜂拥而至的人群其规模之大让人震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悄无声息地引导着一切，态度坚决甚至还很惬意，都没有遇到什么阻碍。“这着实让人难以理解，”阿尔迪写道[72]，“我们看到一群叛乱的下等人绝对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没有任何阻碍。”兴高采烈的反叛者、微笑而善良的低等警务人员，巴黎就这样被彻底占领了。这一切足以表明，这是个阴谋，煽动者无处不在。事实上，没有人想到下等人可以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发起暴乱，所以才有了这样一则传闻，有强盗或是其他什么人撒着金子引导人群。警方受到批评，此外，这也将成为警察总监勒努瓦的最后一次行动，很快他就会被解职，取而代之的是阿尔贝。

事实上，情况更加复杂：1775 年时，民众满怀愤怒。此前，唯一一次在凡尔赛宫前集会时，农民们就曾前往王宫，强烈要求国王出现在阳台上。据说路易十六与他们进行了“亲切和蔼的”交谈，并保证下调面包价格。路易十六的声音被淹没在了

一片骂声中，与此同时到处都张贴起了招贴和檄文："你曾经把穷人踩在脚下，现在，我们也要让你尝尝这种滋味。"[73]

可以看到，最初上层还持温和的态度，所以一开始巴黎警察们的和气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也许当他们看到大量农民突然涌进首都时，也曾感到恐慌。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的骚乱，警长们（德索尔莫、罗兰等）决定交出面包。法院本身也忧心不已，颁布了一道旨在平息事态的禁令：禁止人群集会，但同时也宣布将会恳情国王下调面包价格。这道禁令于傍晚张贴出来，直至深夜还有人举着蜡烛迫不及待地前去观看。杜尔哥为事态的变化而烦恼，匆匆赶去凡尔赛宫面圣，请求国王强硬表态。第二天，法院知悉，国王在御临最高法院时撕毁了这条禁令，并责成宪兵队队长抓捕肇事分子。法院妥协了。于是一切都发展得很快。到了 5 月 11 日处决了两个人（一个是办报人，另一个是个假发师）。孔多塞解读了事件的寓意："人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政府如此可怕且不可理喻，遵循它自己的原则……无视自己造成的偏见，拒绝公众舆论，在司法制度面前不愿意做出任何牺牲。"

在此需要再次强调，"公众舆论"的严密性与高层所认为的是不同的。此外，某些轶事（例如梅特拉所写的）尽管有些犹豫，却可以让人觉察出某种东西。有两件事可以引发我们思考：1775 年，巴黎人见证了政权的更迭；因对路易十五失望透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路易十六身上，期待着他的第一次行动。首先，他们强烈希望国王能在首都加冕，然而路易十六还是选

择了凡尔赛。梅特拉在某篇文章里写道："然而，国王坚决要求去兰斯，拒绝前往巴黎很可能伤了人们的心，但也不至于让他们想到暴乱啊。"即便如此，人民的失望也是实实在在的，毫无疑问地改变了他们的感情和态度。在这一悲惨时期，杜尔哥所做的新决定让农民和那些没什么资产的人感到无所适从。贸易和粮食流通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只是让那些有钱人的财富持续增长的又一手段而已。长期以来，人们抱怨着、争辩着，也咒骂着所谓的"合理价格"，这得到法院、一部分教士和一些官员们的支持[74]。1775 年物价的突然飞涨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这其中夹杂着人们对新经济思想的抵触，以及对国王的特殊要求：国王应该是其臣民们的公正君王。凡尔赛、阳台上的国王、法院被撕毁的禁令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表达出民众想直接与国王交流的意愿，而且这一意愿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后来，请愿遭到了国王的强硬拒绝，后者不仅支持杜尔哥，还残酷镇压人民，而他自己却始终与首都保持距离。

在兰斯加冕被认为是复古之举。信赖杜尔哥过于新式的思想，又被视为是不祥的现代主义。事件又一次在看似矛盾的理由中铺陈开来。在复古与现代之间，从一种强大的思想出发，即向国王请求合理的价格是合法的，在国王与臣民间维系直接关系也是合法的。

至于阴谋论，我们可以持怀疑的态度。有资料显示，在巴黎被捕的 145 个人中，有 100 个领薪水的工人，12 个小商贩，15 个农民。审讯记录和警长们的报告都表明那群"快乐而果

敢”的人是工薪阶层。也许的确有煽动民心的人或强盗混迹其中，但事实上却根本找不到什么阴谋的痕迹，所谓的挑事者也都是些普通的男男女女们。

如果要对这些有规律地震撼着 18 世纪的暴力活动进行总结，我们可以着重指出无论是在公开的言论中还是在那些批判（或辱骂）的话语中，我们都没有看到比其他平静时刻更激烈的表达。暴乱并没有让人去揣测（在一些司法文件中）言论中的强调意义，“爆发”不仅仅只停留在这个层面，暴乱也绝非言论或者民意的安全阀。在那些并不暴力的岁月里也同样存在粗鲁的言论。此外，暴乱之所以让人震惊，是因为它在极短的时间里反映出人民群众长久以来对于自己与国王、与权力、与经济甚至是与警方权力关系的思考，他们出于愤怒而临时起意的举动，其实是对上述关系深思熟虑的结果。

缺少协商或坚决不肯让步，表明公众可以利用时机——尽管时间很短——来践行某一合法行为，而不受权力话语的制约。事实上在暴乱的日子里，人们有时会回过头来看看，好像这才是国王真正的臣民们应该做的。选择简单而直接地面对面，坚持民众自身的合法性，也在几乎把“他们”遗忘的国王面前显示出自身的存在。所以说，暴乱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存在，如同一个活生生的人，与国王相伴相生，不断提醒国王去爱他的子民。一旦君臣关系看似恢复平衡（通过暴力、风俗习惯或者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为之不懈努力的结果），暴乱就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政治觉悟的进步。同样，暴乱也不能用于量化

失落之情，第二天的心情可能比前一晚更加沉重。它只不过是一个插曲，在暴力中总结出长久以来人们所承受并思考着的境况。每一场暴乱都会被记住，但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会不断累积。这份回忆随时准备接受新看法，迎接新挑战，无论是新看法还是新挑战都带着它们特有的观点和情感。

这就是为什么暴乱之后总是风平浪静。让当时的人（回忆录作者们、精英们甚至国王）感到吃惊的事情，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只是平常而已：以暴制暴，不能让人真正屈服。暴乱用自己的行动和符号表达出足够多的意义，所以继它之后的风平浪静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更何况几乎每一次，当局都会做出让步。情绪到达高潮形成恐惧，同时伴随着一种让人不安的情感：恐惧是有理由的。

第三部分

反对国王的言论或巴士底狱的档案

（1661—1775）

只要有人说了或是写了反对国王的话，谋划或策动反国王及王室的阴谋，被人检举说了“不恰当的言论”，那么他们都将被送往巴士底狱。在那里，他们为自己辩解或请求宽恕，勃然大怒或写下长篇大论；警方勒令他们澄清与君主的关系却从来都不认真听他们说话，因为在警方眼中，只有疯子和内心黑暗的人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举。在监狱的高墙之内，言论相互争辩，激烈交锋。然而，警方却坚持从各种“坏话”中找出动摇政权的诱因，使得那些被长期关押的犯人们不得不一遍遍做出政治解释，即便如此，监狱对他们肉体和精神的摧残都无法摧毁他们睿智的思考。

关于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事件，皮埃尔·雷塔写道：“最好是……系统地分析一下保存在巴士底狱和夏特莱监狱档案资料中的‘煽动话语’。”[1] 他是对的。多亏了他，笔者才得以辨读所有保存在阿斯纳图书馆里的巴士底狱档案资料。笔者把他的提议掐头去尾，在此保留了自1661—1775年的所有关于煽动话语的资料；同时，笔者还对他的方案进行了删节：受篇幅所限，本书并没有包含夏特莱监狱的档案资料。雷塔所说的“暗地里的流言”，就存在于这些档案资料中。笔者不是很确定他要谈到的到底是“流言”还是“暗地”，所以只是简单地认为在此处，从那些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历史上国王与其臣民关系的若干特殊时期，无论是错综复杂还是独一无二，都牢牢把握着对于时代的集体感知。笔者还认为，在试着理解民众对国王爆发的不满情绪之前，在理解

这些奸诈恶意的告发之前，首先应该了解巴士底狱的档案资料所反映的当权者的忧心忡忡，那是他在面对矛头直指自身的批判之辞时所表现出的担忧。资料并不能反映真相（可千万别这么以为）而是提出问题：是什么样的现实导致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结果？紧接着，可以从中发现民众思想的变化以及臣服中所涌动的反抗之情，还要将这一切与抓捕惩罚（有时亦是挑唆）他们的司法机制相联系，最终引发对公共舆论的思考。它们是公众在对事件的认知、对国王的认识、对警方的担忧和对个人自行评判公众事务的意愿中构建起来的。那么，舆论的出现如同需求和知识的出现，有些扎根于旧式符号体系中，有些则紧紧围绕着对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国王的强烈认知。认知的内容固然值得研究，但是也不要忘了，最重要的方面也许是对合法性的信念，正是它激发了这些新视角、新观点。

对阴谋和煽动话语的大力追查，只会因为君主制的关注而加速民众言论规模的扩大。四处打听负面言论，使得新的更灵敏的话语传播得更加广泛；此外，如果有人想毁掉别人，最简单的方式莫过于向当局揭发他大不敬的言辞。事实上，镇压机制所触发的正是它所着力避免的：谣言和虚假消息在被查禁的过程中不断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镇压成就了言论，后者于流动之中一再改变状态与表达方式。按照这一逻辑，负面言论重获新生，它们被重复着或变化着，塑造着意义相互依赖的王室形象。

从 1661 年到 1775 年：一段历程，一种方法

这段时间很长，涵盖了路易十四统治期、摄政期以及路易十五在位的那些年。1774 年国王去世，1775 年面粉战打响，开启了路易十六的统治。这段历史（指路易十六的统治期）原本很有趣且值得研究，但是关于这段时期的巴士底狱档案近乎全失，从 1777 年起就基本找不到任何相关文献。对于 18 世纪末期的研究，应借助于其他资料，比如夏特莱监狱的档案，以弥补已经开始的针对檄文和小册子的研究[2]。

一个太阳王，一段温和与荒淫并存的摄政期，一个获称“被喜爱者”的路易十五，但他做得真不怎么样。如果一定要用寥寥几笔勾勒出这一时期民众对国王的集体感情的变化，或许可以说，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末，人们从一个光荣的、吓人的、严厉的，当然最终是殚精竭虑的国王（路易十四），到一个令人期待的、盼望的国王（摄政期，路易十五统治前期），终于等到他长大，弗勒里被边缘化，结果迎来的却是一个让人失望的、很快就一败涂地的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的下场更惨，先是失败，紧接着就被推翻。然而，这样回顾这段历程太简单了，无法令人满意，我们的工作不止于此，因为“事件的真相掌握在那些亲身经历的人手中，在他们经历的时候，正是真相驱使着人们，而此处所谓的真相并不仅仅只是历史学家们

所构建出的‘客观’现实”[3]。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历史学家们都是“回溯地”看，也就是说，当电影结束时，他开始追溯开头，其视角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结局的印记。于是，有必要尝试其他方法，但这经常是令人劳累的工作；笔者总是幻想着可以在一堆资料中工作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带着天真的直觉，将文本与臆想的现实联系起来，让我的思想去发现最微不足道的事实，那是为史料所遗忘（或不承认）的事实，甚至能找到那些历史书中不曾出现却始终真实存在的角色。[4]这种矫情而天真的（可能也是生硬的）方法使得提问越来越多样化，或可颠覆许多确凿无疑的事。

什么是“煽动之辞”？是谁说的？

在同质性的幌子下，巴士底狱所有的档案和若利·德·弗勒里的遗赠[5]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那些诸如“负面言论”“不当之辞”“居心叵测的话”之类的专栏，掩盖了大量重要且不尽相同的事件和行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这种专栏中充斥着各种轻度违法活动：包括侮辱性的话语，针对国王的阴谋，写给国王的“应受谴责”的信件，反对王公大臣的匿名信，检举一些毫无根据的阴谋，对国王的各种要挟，不祥的预言或胡说八道的占星术，分发炼制的丹药，对下毒的怀疑……各式各样，可以列个很长的单子，其中也不乏大逆不道的谋杀和时时想要

结果国王性命的威胁，它们都将撼动整个权力体系。不良的动机和叵测的阴谋掩盖着同样的思想和未竟的梦想，以及早有预谋甚至已然开始的行动。政权为了自己的名誉，只得与这一团模糊的敌人相抗争。

上面所说的这些轻罪中，尚未提到1726至1729年间所逮捕的为数众多的流动商贩，因为他们从事与出版业相关的活动，兜售一些“不好的书”——通常都与冉森派相关。因关闭圣梅达尔公墓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使得大量狂热分子被关押。还有手写新闻的记者，各类檄文及小册子的作者，都在60年代遭到大规模抓捕。到了1771年，又发生了莫普事件。当然，这些我早就考虑到了（不阐明这些骚动的特殊形式，怎么可能理解当时的舆论状态?)，但却没有审视资料中的细节，既然其他历史学家们所感兴趣的都是狂热分子和与出版业相关的轻罪[6]。

以上也未包括1757年达米安事件之后被揭发或被追查的煽动言论，正是它们构成了若利·德·弗勒里的遗赠。我们所掌握的1661至1775年间的巴士底狱档案有200余份[7]，它们记录的大部分事都有着错综复杂的情节并跨越漫长岁月。就算逮捕令突然出现，事件也不会停止：警方支持镇压，找寻同谋，尽可能找出人们暗中反对国王的真实动机。监狱之内，日益形成审讯–反审讯体系：囚犯可以与警方最高负责人通信，以便把想法转达给国王；囚犯也可以书写回忆录，表明自己的立场或悔恨之意。这样的方式有时可以持续20年不变，当然有时并不用20年，只是我们完全猜不透惩罚措施为何如此多

变，简直就是随心所欲。无论如何，当恶言被说出，阴谋被揭发时，我们本以为一切都可以结束，然而恰恰相反，一切才刚刚开始，档案会显示当局处理“糟糕的舆论”是多么困难，而“糟糕的”思想又是多么多变——如果可以用“糟糕”来形容它的话。

1661 至 1775 年间的 200 余份文献，单从数据上看无法进行任何量化分析。事实上，还有几千份被批判的文本，它们有的被警方命令或密札直接通缉[8]，有的给了普通人在警长面前抱怨的机会，成为被逮捕者的笔录[9]。我们会错过每天在街头出现的言论，但它们会在秘密警察的报告中反映出来，这些报告之前已经在本书中多次出现。因此，笔者并未对这 200 余份文献进行量化阐释。而只是对被怀疑或被逮捕之人的社会身份进行必要的说明。

最显眼的是女性，如母鸡般的长舌妇们（这难道不就是她们的美名吗?)，但她们的排名在所有犯人中仅名列第六。众所周知，这些女人或多或少有些尖刻的聒噪之辞，可以在各种市场和公众场合被听到。尽管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们所受到的监视和惩罚并不比被关进巴士底狱的其他案件少[10]。

更让人吃惊的是，被巴士底狱的高墙所困的轻罪犯人们的社会地位涵盖得实在太广泛。当然，他们中有侯爵、王室成员、巴黎或者外省的教士及神甫，我们还能找到数量相当的士兵、小酒馆老板、精于马术者、葡萄园主或农民、学徒及商店实习

生、从事小手工业的男男女女。还不要忘了两类重要的人，他们的出现可谓万众期待：仆从和佣人（达米安就是仆从），以及一个又模糊又不稳定的圈子，包括记者、抄写员、写手和司法人员（一个咄咄逼人的文字世界）。

气势汹汹的国王和危机重重的国王

国王将爱传递给他的臣民，也要求臣民爱戴他，他的部分权力就建立在上帝和加冕礼所赋予他的直接权力上。王室用所有的华丽词藻来形容君主对其子民无尽的爱，这一至高无上的馈赠，只有当臣民们给予同样的回馈时才是有效而有意义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对国王的爱戴都应该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国王可以决定他爱的形式（战争、和平、税收、国内外政策），但人民却决定不了他们的爱。这样的不对称从来都是没有理由的：君主制的华丽词藻占据头版；国王与其臣民之间，人民与国王之间，关于爱的铁律是不可侵犯的。不爱戴国王就是背叛，这一点仅用于评判臣民。既然爱戴君主是种义务，那就会有相应的惩罚：不爱戴国王就是犯罪，要受到极端残忍和粗暴的惩罚，是连神律中都不曾出现过的惩罚。否认对国王的爱戴，或质疑国王对臣民的爱（通过批判性的观点或是不当的举动）都是不忠且背信弃义的变节，其阴险狠毒不亚于不忠不义。不爱戴国王，这已不是普通的犯罪，而是对最高法律残忍的侵犯。

在衍生出旧制度政治的符号体系之外，又产生了一个双重的国王形象：既气势汹汹又危机重重。既然臣民不爱戴国王就会受到惩罚，会被大肆追捕，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气势汹汹的君主形象，同时也产生威胁。于是，“无比爱戴国王”与不爱戴国王就成了同一个现实的两个不同版本：爱的馈赠与索取，它象征性地构建起国王与其臣民的关系，亦构建出一个矛盾的国王形象。爱民亦为民所爱的国王，依赖于惩罚机制，还无时无刻不受到失去民心的威胁。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国王形象游走于爱与失爱之间，它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却又激发暗示了爱的不可分割的相反面。

阅读印象

起初，我按年代顺序粗略阅读资料后，留下的是单调无趣的印象：它们看似前后连贯，其实只是不断重复，都拥有相同的格式、同样的语言和雷同的结构。无论是辱骂之辞、批判之语、挑衅的话，还是尖刻的指责、恶意中伤抑或大声说出的针对国王的阴谋，面对它们的表达方式，我们只能耸耸肩，因为在我们看来它们根本没有区别。仿佛从路易十四一直到 18 世纪末，人们已然习惯于用抱怨的方式来诠释公共事务；仿佛在这段时期，所谓政治的愤怒无非是在玩弄相同的字眼，甚至连语气都是一样的。君主一直饱受批评。事实上，无论是愤怒，还

是对国王及王室成员们的激烈辱骂，又或是对君主生活的抱怨，都是真真切切的。这些怒气似乎具有双重现实性：一方面，国王本身的疏离感（尽管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做法不尽相同），让臣民们远离政治；另一方面，王室那些高高在上的言辞又再三强调国王与人民之间相依为命的联系，并锲而不舍地渲染这种关系。于是，有些人只能在这种使了手段的方式下，感受到国王与人民之间所谓紧密相连的关系。

在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分析之后，笔者最初的印象得到了改变：它们不再是单调的重复，相反却勾勒出一幅对比鲜明且有些扭曲的画面。从中可以看出两大方向，表现出国王及其政策的整合与变化。这两大方向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共存，同时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第一种在一片颂扬声中出现，显得有点反常，它是由国家不可侵犯的基本法引发的，基本法提醒臣民要爱戴他们的国王。这样的符号体系强迫人民在恐惧中景仰他们的君主，并为他的健康与智慧祈祷[11]，同时也滋生着一种持久的想象，即刺杀国王虽难以实现但却是必要且正义的。在对王室强权的屈服之下，寄居着巨大的颠覆力量，半路杀出的弑君者尽管让人难以置信，却始终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从 1661 到 1775 年，关于一个疯狂幻想的传闻得到广泛传播：国王之死是拜某人所赐，此人宁愿下地狱也不愿意跟广大人民一起苟活于拜国王所赐的困境之中。这则传闻以多种方式被传播着，有人跃跃欲试，也有人付诸行动。于是动机产生了："什么能阻止我杀了国王?"成为

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中最让人惊讶的表述之一。什么可以阻止呢？……惯常的姿态发生了改变，于是我们看到，还会有许多改变发生。

第二种（与第一种共存）表现出思想的其他结构：引发批判，影射政治舞台上与国王的新关系，质疑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国王形象，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被强加的君主形象。国王或多或少都会对这样的挑衅做出反应。可以说，一些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迫使国王和人民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关系（这种改变是相互的，但却并不平等）。

关于这一切的记录并非线性或逐层递进的：动机一个接一个地形成，有些留了下来，有些被遗忘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批判的机制永不停歇。笔者在文献中找到一句话，写于 1753 年 4 月 27 日，可以于众多侧面中总结出第二种态度："你英勇的臣民值得拥有一位超越他们的国王。"

第五章

“谁能阻止我杀了国王？”

人们称他尚帕涅，事实上，他本名约瑟夫·博塔，37 岁，是威尼斯大使的仆人，后被捕入狱。1684 年 3 月 30 日[1]，在他的审讯记录中警长写道，他说起话来“总像个疯子”。这一天他被捕入狱，因“威尼斯大使先生前往拜会博内特夫人，约瑟夫陪同前往并在候见厅等候主人，在火炉边他大放厥词，说道：‘谁能阻止我杀了国王？’”挺不同寻常的是，此事并未引发很多讨论，人们都只在谈论发生的越狱事件，手写新闻里记道：“几天以来，先后有十人成功逃离巴士底狱，他们打碎了门和窗户。”

杀了国王……“国王被预先设定为会被杀，可能是王权的一大特点”[2]，或许，认为臣民会想要杀害君主，也是王权的一大特点。当然，历史上有过著名的先例，比如雅克·克莱芒和拉瓦亚克，但这都不是最关键的。用匕首刺入国王的身体，是所有人想象中的一部分，仅仅只是因为这一举动完全融入君主制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系统中。事实上，国王被杀了，君主制可毫发无损[3]，国王的政治之身是不朽的，王国的政论家们高声

宣扬这一点。另一方面，作为上帝派到人间的使者，国王独自审阅国家机密，领导臣民，宣布战争或和平，用仁爱治理国家，至于什么是仁爱，他可能根本不知道。社会阶层按照某种结构来划分：国王位于金字塔顶，而庶民位于最底层。但最底层的庶民却可以爆发出威胁到顶端之不朽国王的力量。想要挑战国王，反对他那捉摸不定的爱，其中就包括谋杀，这被认为是可行的。最普通，最卑微的臣民们之所以开始自然而然地涉及"国王之死"的主题，是因为他们被迫与君主建立直接的关系，正是君主提供给他们的言过其实的消息导致了这种直接性。绝对王权是自豪而骄傲的，也是强硬而难以妥协的。1719 年国王的一纸命令引发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决裂就能为此提供例证：

> 国王们都会将自己的决定归于上帝，以保证自己的权威。他们本应为其子民造福，但他们却没有倾尽全力去实现这一点，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小心谨慎地隐藏或是透露出一点点政府的秘密。[4]

这个摘录来自大量讲述国王如何热爱自己子民、并要求子民完全臣服的文献中，国王的幸福是在这些最不可知的秘密中构建起来的。很容易理解，这种忠诚伴随着它激进的另一面：臣民杀国王，他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反常却又绝对的行为里，他知道，自己仍是国王的子民。颠覆是服从的反面，同样也是最耻辱的谋杀，这种神圣的罪行会让身体和灵魂在地狱中沉沦。

杀了国王（你是国王）① 是最底层民众社会表达的极端形式，它形成于君主制所精心构建的思想意识中。比如，国王现身亲近臣民，他无数次出现在他们面前，只须轻轻触碰，便能治愈他们的疾病。至于臣民，他们追寻着这种有形且具有象征意义的联系，这对他们来说意义无穷，也使得他们一直心甘情愿地屈从于这种可见的关系。臣民们之所以渴望亲近国王，是因为王室总在不停地宣称，国王对他的子民多么温柔。此处是路易十三在解释，自己为了巩固统治所采取的措施：

> 我们在执政期间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让人们明白，我们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子民，为了让他们幸福快乐，我们费了多少心思，由此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国王对他们是多么温柔善良。[5]

每一位君主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着慈爱，亲近子民：例如，与人们预期相反的是，路易十四比路易十五更容易接近。我们都知道，路易十五对巴黎极为冷淡，他再也不想横穿这座城市。在 1750 年因非法绑架儿童而引发暴乱之后，他更是极少在巴黎停留。接近国王的渴望是君主制表演的一部分，这种表演在激起人们渴望的同时，又驱逐着它。这种表演处于一个复杂的符号体系中，不同的君主或多或少会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

---

① 在法语中，杀了国王（Tuer le roi）与你是国王（Tu es le roi）的发音极为相似，作者在此玩了个文字游戏。

编排。亲近国王的需求[6]深入臣民的内心，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意识。一旦人们怀疑或是相信君主迷失了方向，并且将人民置于国家基本法所规定的君主制原则之外，那么想要接近国王的渴望就会变成杀死国王的意愿，无需其他工具，匕首或短刀就好。这种不可闻不可说的举动刚好反映了崇拜之情：事实上，热爱国王和杀了国王正是同一立场的两个方面，源于君权的原则。

如果臣民出于自身的愿望接近国王，他不能超越君主所规定的界限，一旦越界，他就会受到威胁。前文我们已经提到了国王的双重形象：气势汹汹又危机重重，于是君主控制着臣民的接近程度，并依据其个人的意愿来判断这种接近是正常的还是过分的。1684 年发生在圣安德雷的玛丽–热娜维耶芙事件可谓是这一不简单的机制的标志性事件，接近国王的需求与国王的断然拒绝最终酿成了一项严重的罪名，即“不怀好意接近国王罪”[7]。圣安德雷的玛丽–热娜维耶芙，24 岁，当时没有工作，曾在多个家庭帮佣。她来自诺曼底，住在凡尔赛附近一家名为锡壶的小旅馆堆放干草的小屋里。不知所措的她听从一个“年轻而伟大的男子”的建议，让她前往王宫面见国王，为此，她先要去借一身得体的行头。那个年轻的男子还补充说他刚从那里回来，确信国王在召唤她。出于对这番话的信任，她设法进入守卫森严的大殿。在阅读了她的资料（她很快就会被关进巴士底狱）之后，拉韦松评论道：“我们已经给人们指出接近国王的捷径。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佣，她很轻松地进入了王宫，

只有在进入餐厅时被禁止了，因为害怕她会下毒害国王。”[8]事实上，她一进入守卫森严的大厅就有人把大门关了起来，“她在那儿待了三个小时让自己暖和起来，之后卫兵们把她带了出去并给了她几枚银币，因为她实在穷得叮当响”。深感失望的她（这是她自己说的）爬上了王后的豪华马车，砸碎了马车玻璃，守卫们强行把她弄了下来。这一举动直接将她带进了巴士底狱，在她的审讯记录中，她努力为自己辩护，说她之所以来到凡尔赛，“就是想看看国王享用晚餐，弄清楚陛下召她来做什么；她想与国王交谈，跪倒在国王面前，她根本没有想对国王做任何不利之举。”[9]其后，想要接近国王的渴望（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以及通过国王获得救赎的期盼就演变成了气恼与报复；国王感到有威胁，他惩罚并关押了一个仅仅只是想“跟国王说话且跪倒在他面前”的女子。圣安德雷的玛丽–热娜维耶芙的故事包含了公众想象的全部因素，正是这种想象驱使每个人前去面见国王，之后又将失望幻化为仇恨。正是在这样奇怪的关系中（主要是由君主制引起的），存在着气势汹汹的国王的另一面——危机重重。

1661–1775 年间绕不开的主题

有些人想要杀了国王，并坚信这就是自己的使命：那些年里，这样的动机始终存在，无论是在路易家族统治期还是在摄

政期。其间还插入了1757年达米安对路易十五的刺杀，另外还有一个接一个的类似事件出现在巴士底狱卷帙浩繁的档案里。他们言辞激烈，没有丝毫拐弯抹角；他们决心坚定，深知所冒之风险。我们提过拉瓦亚克与雅克·克莱芒，之后还有可怜的达米安，尽管他确实不义，但量刑也着实过重。为了寻找论据，我们追溯到古代，发现有时候弑君是必要且有益处的。看起来，时间对这类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哪怕是在一些与时代紧密相连的特殊事件里，弑君的动机也一直存在于一些人的脑海中，这与时间无关。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同的表达，从中能感受到隐约的愤怒：

人们对陛下总有许多不满，甚至有人说，在离他不远的农村里，有个老大带领着三个弟兄躲在小树林里，一旦国王从那里经过或者在那附近出现，他们就会杀了他。（1678）

有人说，上帝保佑我不要失手，一定要一枪命中他的脑袋。（1679）

他要刺杀国王。（1684）

他要去杀了国王，根本不顾自己可能会被判处死刑。（1687）

他可不能像拉瓦亚克那样。（1687）

应该杀了国王，并铲除他的军队。（1701）

挫骨扬灰也要杀了国王。（1703）

一命抵一命，只要国王死了就行。（1710）

我一定会一枪打死他。（1716）

我要乔装打扮一下出现在那家伙面前，一刀结果他。（1722）

在小树林里等他出现，一枪打死他，哪怕被分尸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就是条狗。（1722）

挖了他的眼睛。（1752）

达米安会上天堂，国王就该被杀死。（1758）

力挺弑君者和谋杀理论，建议将其付诸行动，献上糟糕的祝福，愿不祥的革命终结陛下的好日子。（1762）

> 他承认心中涌上一股可怕的使命感，为了平息心中的狂怒而杀死国王。（1765）

当然，我们猜得到，与这些直截了当表达出的意图共存的，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表达，它们也都符合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争论。研究这种被“直白”表达出来的动机是件有趣的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它们的形式都极为相似。动机勾勒出一种典型的场景，据说有时可以从中提炼出“蓝皮丛书”[1]里的故事。

以白刃为主要武器，行凶者总是躲在小树林里等着国王，显然国王总会带着随从或是军队；行凶者从不认为自己会失手并且总是亲自上阵，不借助任何中间力量（例如使用毒药）；没有商榷的余地，只需一刀即可让他当场毙命；这是一种牺牲，一种献身，因为可以用自己的死换得国王的死，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死刑根本不在话下，“一命抵一命，只要国王死了就行”。所有细节都在讲述一则可能的故事，有人能直刺国王的心脏，而在那样的包围中，没有人可以活着回来。接下来的惩罚（死刑、分尸）对于那些早就准备好的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下地狱：“达米安会上天堂。”杀了国王的人能挽救君主制并得到它的敬意。他超乎法律与上帝之外，甚至脱离了苦难。通过对国王神秘形象的解读，通过对国王赐予爱或是拒绝爱的符号体系的解读，一个英雄被刻画出来了。

---

① “蓝皮丛书”指的是法国从 17 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一些廉价的民间读物。

从一个秘密到众多秘密

“国王只有执行自己的计划以及取得成功时才是对上帝负责的。然而，他们……有时出于善良，会愿意解释自己之所以那样做的理由。”[10] 一般来说，国王与秘密是一体的，国家事务就是他自己的事务，他不是非向公众交待不可的。故而，当国王出现于公众视野中时，看似公开实则满腹机密。从哈贝马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 18 世纪的精英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揭开了公共事务的面纱，了解其众多方面并且构建出一个可供批判的公共空间，在那里，可以讨论国家“事务”。哪怕是一直习惯于秘密质询的司法也终于浮出水面，诉状和卷宗一经公开就被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他们饶有兴趣地想要知道法庭上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11]，这为睿智的公众提供了理解与探讨的途径。君主制下的司法机构并不喜欢这样，它更倾向于引入秘密程序，暗中执行某些关押命令。从警方的资料中可以读到这种被强制的沉默，有些话语一旦传播出去就会让传播者身处险境，尤其是那些反对国王的话，最好从来都不要被人听到。巴士底狱的文献中有一份简单的资料可以表现出关押命令是如何在暗中进行的：1678 年（具体日期不详），尼古拉·马丁，圣克卢的葡萄园主，被关进巴士底狱，罪名是说了国王的坏话。同年 3 月 1 日，他被遣送到比塞特雷小屋。我们没有找

到任何与之相关的审讯或是预审记录，所记录的仅仅是“他的坏话使人战栗，我们不愿意这些对国王不敬的言辞被更多人知晓”[12]。

想要保守秘密的愿望及君主制将秘密作为统治原则之一的做法，反映出臣民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形式。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怀揣一个重要的秘密且只能说与国王听，于是要求与国王单独会晤，并且希望只有自己与国王两个人。这样的态度很常见，但却并不被容忍。它对当权者所造成的恐惧并不亚于那些传播“杀了国王”的愿望的人。掌握着一个连国王都不知道的秘密，对国王来说是一种耻辱。它不仅仅只是威胁，甚至可以被称为重罪了。事实上，国王行使自己的职能，并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获取秘密，所以，自以为知道的比统治者还多，就已经是一种背叛了。因此，在君主与臣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既真实又颇具象征性的表现，其结果是矛盾的：国王无需获取秘密，臣民则认为秘密是让自己接近国王的唯一方式，一旦他讲出秘密便意味着分享了国王的领域。

秘密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掌握它并想将它传播出去的人都应受到谴责，并被认为是对王室命运有害的。于是有人被判谋害君主罪，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关于国王的不恰当的梦”，他们为了摆脱那样的梦，会先去忏悔，之后就会被带去见国王。另一些人将在巴士底狱或比塞特雷待上很久，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掌握一些足以让国王暴富的秘密，或是在某些隐秘之地可以发现大批宝藏。漫长的惩罚还会降临到这样一些人头

上，他们渴望自己能暗暗向国王揭发出某个意图对他不利的人的名字，或对宫廷或王家军队不利的人的名字。只要涉及这个领域，就没什么是无足轻重的，就连“固执的”占星师都不曾幸免，而他只不过是“怀着强烈而罪恶的好奇心预测了一下国王和王子们的命运”[13]。那是在 1701 年，占星师弗朗索瓦—亨利·德·巴尔迪被关进巴士底狱，为期一年，之后他被逐出巴黎，与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一直陪伴在他左右的女人。他的审讯记录是意味深长的：“是不是没有人告诉他，法律禁止任何人替国王占星，因为这会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亵渎宗教，而且法律也不允许占星师们了解王室的命运。”为此，弗朗索瓦—亨利·德·巴尔迪回应说：“他之所以要为国王占上一卦，其实是故意的，他要让国王统治期内久负盛名的那些事件展现于他眼前。”于是罪恶与亵渎便出现了：国王是上帝选中的，他的未来不容任何人窥探，否则就会使他屈从于那些无法摆脱的经济规则和人道原则。巴尔迪的无礼是罪恶的，没有人敢预测国王生命中会发生的事件，更不敢提他的执政时长。至此，一种全新的接近国王的方式被刻画了出来，这是他众多臣民所梦想的方式之一，但却会危及国王的职能。

无论是微不足道的还是迷惑人心的，是真心实意的还是星相占卜的，那些人们只愿意透露给国王的秘密总是有着骇人听闻的可怕意图或是对弑君的渴望；它们是王室下最让人忧心的一种偏离，无论它们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成为王室追查的对象。

幻象与天赋，炼金术与毒药

对于君主政体为防止机密泄露和可怕的梦幻所采取的举措，我们不应感到惊讶。路易十四的统治核心接二连三遭遇不测，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投毒事件”。人们为这些故事所着的笔墨并不逊于“铁面人”① 以及路易十七的生死。然而，从 1679 到 1682 年间所发生的严重事件应该并非简单的轶事，也不仅仅只是具有轰动效应的历史杂志中的故事。它所涉及的不只是某个事件，而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造就了轻信与犯罪，就连国王身边的人都被卷入其中，甚至还威胁到了国王本人。

没有必要回顾这些事情，无需太多笔墨（关于这些事有大量的文献可供查阅[14]）：对下毒的恐惧之情如鬼魅般萦绕着 17 世纪。一些重大事件在王国中产生影响，比如 1676 年的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事件；公众谣言只提到毒药粉末以及女人们对自己的丈夫实施的秘密谋杀，据说是因为她们对长期在国王军队中服役的丈夫们的粗暴言行极度恼怒。实际上，它掀起了一场深刻影响各个阶层的社会灾难，从王宫到城市，从城市到乡村。荷兰战争（1672—1678 年）将法国弄得筋疲力尽，终以在奈梅

① 指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一个戴着面具的犯人，关于此人的身世一直是历史学界的谜团，但铁面人到底是谁，法国史学界尚不明朗。

亨签署的协议而告终。此外，1672 年，旷日持久的巫术诉讼案终告结束[15]：路易十四下令清空监狱，但仍有一些法院，如鲁昂法院还在不断地关押巫师。罪恶的巫术不复存在，但人们开始信奉鬼神，相信占星、药粉以及炼金术，而这些都掌握在江湖骗子们手中。并且，这种信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各个轻信者脑中。为了描述这种奇特的现象，我们曾经用过一个词“魔幻精神”。或许，在这样复杂的文化中可以更好地看到，因理性带来的社会及宗教的剧变所产生的深深忧虑，就算理性足以让人放弃迷信，罪恶的巫术也无法于顷刻间销声匿迹。无论是在王宫还是在乡村，人们都相信命运，信奉傲慢无礼的魔鬼，相信可以带来爱情和财富的春药。僵化的宫廷，刻板的礼仪，为了得宠而不择手段的竞争，造成了诸多非理性的信畏之情，于是众多占卜者、药粉商和骗子们随时准备趁虚而入。江湖术士们一点都不担心他们可疑的炼金术生意，因为对男女巫师的大肆搜捕，反倒使他们更为安全，更何况他们还发现，这个社会依然需要他们，尽管它正不知不觉地开拓着其他理性形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中，形成了诸多奇怪的江湖医生–占卜者网络，他们试图通过硫化物、黑弥撒以及孩童祭祀[16]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等级。那时，医学专家尚未出现，官方的药典还极为复杂。与 15、16 世纪一样，人们相信健康动物的肝、肺和脑子都是有疗效的；同样的道理，那些从生病的动物身上取得的器官则一定是带菌的；于是人们可以利用从药剂师或各类清洁用品店获得的化学品与草药制成混合物，这些人经常与食品杂货商混迹

一处，因为后者可以从其他遥远的国度进口制作配方的东西。“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任何人都不需要任何借口就可以得到那些最危险的物质。”[17]司法机构的文献里大量记载着人们对邻居义愤填膺的控诉，后者总是在深夜将得罪过他们的人家的猫、狗甚至牛毒死。

警方总会收到关于下毒案件的举报，其中还掺杂真假难辨的传闻，可能来自人们的告发，也可能只是小酒馆里道听途说的谣言。警察总监拉雷尼严阵以待，作为首位在首都任职的警察总监，他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怀疑这一严重问题已经波及各个阶层。因为对假币分子保持高度警惕并展开追捕，他得以接近一些作恶多端的团伙，这些人打着魔术和炼金术的幌子，制造假币或配制毒药。事态日益扩大，尤其是他发现几乎每一个大白于天下的投毒故事里都有上层人士的参与，有男人也有女人，有时甚至是宫廷中的重要人物。于是，最高法院显得不知所措，任由更高层的权威人士施加影响。于是卢瓦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要求拉雷尼深入推进此项计划。1679年4月7日，阿斯纳委员会诞生了，它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火刑法庭”；这是一个拥有特权的法庭，无需任何庭审就可以进行秘密审判。于是，我们会了解接下来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这个法庭于1679到1682年间，一共控告了442人，宣布了104项判决，其中34人被判处死刑，无数人被判监禁服苦役等；这几年中还有许多遭到怀疑的有身份的人，法庭犹豫是否要将他们处以与无耻投毒的下等人一样的罪行，最后按照

密札的要求将他们囚禁在那些作为国家监狱的堡垒中（贝勒岛、萨林斯、萨勒塞……）。事情远不止于此：蒙特斯庞夫人被控采用犯罪手段，试图让丰唐热小姐远离国王，却险些危及国王本人。就在这时，拉雷尼担心事态无限扩大，便遵从国王的命令，中止了审判。火刑法庭于 1682 年 7 月 21 日解散，但它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它让国王看到周围人对他的憎恶，他为此感到恐惧却又无法公开而光明正大地去解决这些问题，甚至都不能让民众相信他。

在这段昏暗时期，整个社会风雨飘摇。通过阅读审讯记录，我们会知道这些事件是怎样一步步被推至顶点，又是怎样在人类思想上烙上虔诚、巫术与残暴混合的印记。女玻璃商人拉若利被控谋杀儿童，她于 1681 年 3 月 9 日讲述了自己在水塘里的发现：

> 两个约摸 7 个月大的孩子的尸体，是两个男孩，被切成了好几块，有人在殷红而新鲜的血水中将他们拼了起来。正是因为触碰到了孩子的尸体，她发现他们尚有余温，于是她问米尼奥，这两个孩子是不是被活祭的。[18]

于是我们知道毒药事件已不仅仅是一桩简单的社会事件，也不仅仅是一桩失去控制的事件。在这个惊心动魄的世界里，交织着上帝、魔鬼和鲜血，就连君主政体本身都无法完全摆脱，恐惧与困扰凝聚于此，填补了因巫术诉讼案件的缺失而产生的空白。改变是缓慢而深入的，整个 18 世纪，我们可以看到这一

动荡时期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它们是多种多样的：1676年，巴黎人民就开始在一些地方发动暴乱了，因为有人绑架了他们的孩子；在那些黑暗年代里，出现过许多异乎寻常的交易，很多孩子莫名失踪，在某些暗黑弥撒上，可以见到堕胎和用孩童祭祀。稍晚一些，1720年和1750年，巴黎处于动乱期，谣言的内容里既有麻木不仁的警方，也有嗜血成性的国王。从拉若利所看到的血腥场面到麻木不仁、嗜血成性的路易十五，转变虽然微小却意味深远：事实上，公众舆论与意识依然存在于同一个领域中，在这里神圣与魔鬼夹杂在一起。只是这时，罪恶被大胆地归咎于国王本人了。于是，这一切勾勒出一幅与此前路易十四所展现的完全不同的君主形象，这时的国王陷于身边人与他们的同盟——下等人所共同构建的危机中。

在这段艰难岁月里，借由炼金术、护身符及幻象所构成世界的名与实，臣民与国王各种形式的关系继续存在着。总的来说，不管年代相隔多么遥远，我们都能在巴士底狱的资料中找到那些因“对国王不利的计划”而遭到指控的人，他们基本都被怀疑向国王投毒，要么是在他的糕点上涂抹砒霜，要么就是在他的必经之路上扔下一块有着致命毒药的手帕。1683年，让娜·罗兰，一位面包店主的遗孀，被怀疑“对国王的性命居心不良（欲取国王性命），因为她带了些小杏仁饼和蛋糕前往枫丹白露献给陛下，通过这种方式她成功地得到国王的接见，之后她使用了隆尚修道院提供的武器，并且随身携带了一封伪造的信件，声称自己是女修院院长夫人派来的”[19]。然而，卷宗上甚至都没有她疑似投毒

的记录：1683 年，给国王送糕点就已经不言而喻是一种大罪了。

1687 年，人们逮捕了一个在国王用晚膳时前去拜访他的德国人，而且他在上书中称自己知道一些秘方可以让妇女们绝育或是在她们怀孕期间流掉孩子。

年复一年，总能看到这样的猜测，其中大部分并没有证据，但都被施以重罚。人们通过拜访国王的可疑之人或是丢弃在路易十四常去的凡尔赛小教堂里的日用品来察觉阴谋；人们追寻着护身法宝和假冒巫师，同时还试图用真真假假的药方来规范过于丰富的药剂学。这样的担忧并未随时代变迁而有所缓解，它总是在这样那样的时期突然出现，不仅表现出君主制的忧虑，也反映出部分民众的精神状态，在这种极度悲惨的日子里更甚：比如 1709 年的冬天和接下来的大饥荒便招致为数众多的指控，因为人们祈求神灵，希望通过神秘的炼金术让国王死去。一个名叫杜布莱的女人被长期关押在巴士底狱里，因为她在 1709 年站出来反对大肆关押穷人，并且大放厥词地说了许多威胁警察总监的话。除此之外，她还有个惊悚的身份：假冒巫婆、淘金者及魔鬼之友。正是在困境的中心地带诞生了反抗，而暴乱又滋养着始终存在的古老信仰中的残余势力。

“你会杀了国王……”

有时，有些人会认为自己肩负着刺杀国王的使命，他们说，

这样的使命是通过梦境或是奇异的幻象而被赋予的。在关押了许多危险的想入非非者之后，国家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着暂时的平静，摄政期内只在 1721 年发生了一桩略显严重的事件[20]，直到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才重新拉开了序幕。关于 1758 年，我们可以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社会的不安是多种多样的。在对国王性命的担忧中，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耶稣会士还是冉森派教士应对此负责。在混乱不堪的政治背景下，1757 年打开了社会想象的缺口：国王之死是可能的，因为达米安已经接近了国王，并且用一把小刀付诸了行动；国王之死又似乎并不可能，因为他并没有死，那一刀并未刺中要害。这一领域的界限非常清晰，一些人将之与那些古老的话题联系起来，另一些人则沉浸在当下的现实性中，社会表达有所改变。国王之死的可能与不可能被拿来进行比较，它们相互对立。于是有了双重态度，有的寄希望于国王的生命，有的则期盼着他的尸体：渴望堪称绝对禁忌的死亡。然而，在这样的混乱中，在渴望解开所有损害君主政体阴谋的警方的高压政策之下，某一事件诞生了，看似无足轻重，却能立刻让警察、医生、法官和主教们共同商讨，共同行动。研读文献让我们得以了解到当时社会思想的错综复杂，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在一起，社会思想受到了最令人不安的政治风险的侵蚀，即国王之死。更为有趣的还在于，有人找到了将个人历史与国家最高权威人士的历史连在一起的方式。在他的记录中，自然而然地将个人历史融入集体历史中。他的言语和妄想都围绕着被谋杀的国王形象展开。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从1758年到1779年，故事跨越了21年，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21]。托兰时年26岁，原籍瑞士的格吕耶尔，职业是仆人，在巴黎仅仅生活了五年，受雇于德丰塞玛涅先生，后者是德沙特尔公爵的副总管。托兰十分爱慕自己的女主人德丰塞玛涅夫人，故而在她突然离世后，他伤心透顶。正是夫人的离去引发之后的所有事：某天晚上，托兰叫醒了所有仆人，他受到沉重的打击，声称自己听到已故女主人的房间里发出持续不断的声响，他说他听到她在叫他，喊着他的名字。于是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女主人的床边，示意闻讯赶来的其他仆人，他再也不能说话也听不见了。他让人给他拿来纸笔，从那天晚上开始，连续15天，他用笔讲述着所发生的一切，使用的是某些不识字的人才会用的语音写法[22]。通过一系列奇怪的提问与回答，他明确指出是女主人命令他禁食40天，为巴黎的守护神圣热娜维耶芙祈祷并做弥撒。女主人还说，只有当他完成所有的“功课”之后才能痊愈。他同时还透露自己掌握着一个秘密，却不能告诉任何人。就在托兰宣布一个秘密存在之时，事情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在接下来的21年里，在这脆弱的基础之上，一切只会越来越复杂。他所谓的秘密直到1758年（或可说特别是到了1758年）依然还是教会、警方甚至医学界，高层和权威们所担忧的对象，尽管他们依然不知道那是什么。

医生被带到托兰身边，以神的名义要求他将一切和盘托出，与他同行的还有苏瓦松市的主教菲茨—詹姆斯，而并非托兰自

己的忏悔神甫。菲茨–詹姆斯从 1742 年起就是国王的首席指导神甫了。这可是位远近闻名的主教，在 1744 年，当路易十五在梅兹病重时，他明确表示要将新晋宠妃沙托鲁夫人发配到远离该城的地方，否则他就拒绝给国王做临终圣事。我们再回忆一下，1757 年 3 月在达米安刺杀事件两个月之后，菲茨–詹姆斯用毫不含糊的言辞指控耶稣会士为其同谋。

在各种问题的逼迫下，托兰终于揭开秘密，那是这段日子里所有人都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事。最后他终于写出了女主人的旨意："你要去杀了国王，为了证明你可以做到，你必须装聋作哑。"他当即指出自己并不会付诸行动，因为这毕竟是"反教会的卑劣之举"。这是他的原话。虽是卑劣之举，但托兰终究被选中了。然而，一旦秘密被揭露出来就在托兰周围引发了轰动效应：巴士底狱（他已经被关在那里了）的高层们都被调动起来前往警局，同时被喊来的还有主教，由两位神甫协助他，警察总监本人、首席国务秘书，以及著名的警长罗驰布吕纳，他以灵活的手段审讯危险的犯罪分子而出名。

两年中资料急速堆积：高层间的通信、警方记录、医学报告纷至沓来。每两天就会有一份重要文件被塞入档案中。尽管相关记录间隔的时间略长，但依然还是有规律地出现，直到 1779 年。是年，托兰被监禁折磨到身心俱疲，重病缠身几近疯癫，因为父亲的过世和母亲的请求，他将重获自由。他先是被转移至万森讷城堡中，之后会被流放至他的祖国——瑞士。

他的审判之所以旷日持久，自然是因为当局将此案与 1757

年这一致命的年份联系在一起。还因“国王之死”如幽灵一般萦绕着所有人，制度法规淹没在证据–反证、试验–考验的体系之中，无法成功识别逻辑或是理性，也无法把握让托兰产生幻象的社会动荡；制度法规甚至从来分不清让托兰身陷其中的梦幻和幻象，仿佛真理总是在幻象中流露出来，又或者幻象可以有效地传递真实的信息。秘密与幻象也毒害着法官和医生们的精神世界，前者致力于揭露骗子的阴谋，后者却声明托兰疯了。可从来就没有人把托兰的故事与滋养它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为了探寻真相，证据汇集成册：它以惊人的方式证明自己不确定也不可能将事件纳入政治逻辑中，而这本该是让事件变得不那么严重的首要方法。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18 世纪中期，医生、神甫、法官甚至高级政客们都无法一致“命名”托兰这个仆人身上所发生的事。1672 年之前，大量可疑而危险的举动都可以被扣上巫术的帽子。到了 1758 年，对于社会的某些成员来说，杀了国王依然是个梦想，是一种渴望或称为现实，梦想与幻象滋养着这一渴望；可是机制已经完全失去了为这些事件命名的能力，还被诱入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有着与之并不相称的诉讼现实。仿佛到了最后，在托兰所宣称的所有话语中，只需要“可能”二字就足以推翻医学、教会甚至司法那些或新或传统的派别。

唯一确定且有迹可循的回应，是长达 20 年的监禁——至少让这一事件有了名字。如果整个事件没有被命名，那就不会被审判，而只会被搁置一旁。针对托兰身心所遭受的巨大折磨，

人们组织起有力的回击。

然而，每个领域的权威都曾试图对托兰的情况做出反应：医生们认为他在胡说八道，却苦于找不到证据；以菲茨–詹姆斯主教为代表的教会认为这是一桩阴谋，旨在通过毒害一个容易幻想的仆人，让他又聋又哑之后便可以实施可怕的行动。这一阴谋可能“是撒旦指使的”，菲茨–詹姆斯主教在与托兰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后如是说，正是这句话让人相信魔鬼的活动一直都在。至于警方，他们全然迷失了方向，但是坚决执行着一种最有效的处理方法：巴士底狱国家监狱。与传统调查方式一样，警方想要犯罪分子供认罪行，既然有秘密有幻象，那就应该有供词。但也正是这样的尝试让托兰在支支吾吾中一会儿招供，一会儿翻供，最终，他也没有供出任何有助于司法机关展开工作的有用的话。

就算某天罗驰布吕纳警长在他的审讯记录里写下：“这个可笑之人想在巴黎上演一出好戏。”这不是为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也并非想弄明白一个仆人的秘密将会在怎样的社会政治舞台上表演，而仅仅只是为了避开实实在在的危险，以轻描淡写的方式告诉人们，在巴黎，任何事情都会滋生谣言……为整件事作结的是一句让人震惊的话，写于 1779 年，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总结了警方对于此事的一无所知和无能为力：“这是一个危险的疯子，尽管他几乎蠢不可耐，却并不具备欺诈的能力，但就是他让国王忧心忡忡。”一切大白于天下，却并没有什么意义。在这些解释性的词汇中，托兰的行为在各种类别的词语所

交织而成的网络中被“肢解”，从逻辑上看这些字眼是相互排斥的，一旦将它们堆积于一处就会发现，根本无法为整件事定性。

在读完托兰的文字和声明之后，会发现一些其他因素，它们清晰地证明某些臣民是如何将自己的经历与王国中的大人物们联系在一起的。当托兰或多或少地列举自己的理由并努力为自己申辩时，并没有人听他说了些什么，因为他所依赖的仅仅是生活中有限的几个人，而这几个人根本无法为寻找阴谋或哄骗供词的警方提供证据。当托兰宣称这起受人指使的谋杀并不会令他惊讶，也不会使他被迷惑，他是想说只要国王谋杀的场景被演绎，国王之死就是可能的。连这个警察都不想听。

另一方面，当他听到女主人授意他去完成最可怕的犯罪时，他的内心就将之视为对自己的惩罚，这样的惩罚与他的罪人身份是相称的。德丰塞玛涅夫人一直对他很好，故而她的命令只能与托兰自己的罪恶联系在一起。他说，两年前他就与故乡的一位姑娘定下婚约，但其实他更想要的是另一位已婚女子。于是，上帝要惩罚他阴暗的念头，便让他接受艰巨的考验：刺杀国王。托兰当然知道这种非分之想虽极具诱惑却无法实现，他只能求助于祈祷和圣化。

最终，于托兰而言，受人指使去杀死国王是“有诱惑力的”，与他渴望与有夫之妇的关系一样充满“诱惑力”，更何况杀死国王比后者更加难以想象也更为忤逆。托兰痛苦（几近疯狂）地将自己的私生活搬上了皇家政治舞台，而这一舞台还在

达米安刺杀事件的阴霾下并不安宁。针对这一矛盾（国王之死的可能与不可能），托兰似乎插入了另一种动机：充满诱惑力的、让人极度渴望的国王之死。为此，他具备通常容易得到认可的精神状态。他的故事（可能也还有其他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深深融入公众舆论之中，不仅仅存在于那个时代的集体结构中（比如国王之死），也同样存在于传统的现实中——权力、欲望、女色——还有那些为所有人所遵从的价值观里，比如荣誉。

言论及其历史渗入集体历史的场域中，借助着易被接受的社会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在巴黎上演了一出好戏”，但却是危险的戏，因为它让国王本人忧心不已，却又几乎没有让权力代表者们听见什么，因为它让自己成为公众意识的一部分，其现实形式却并不为他们所知。托兰所说的话并没有被当面与他交谈的那些人听进去，他们也就无法识破这些事件的意义。托兰并没有什么秘密，但他是“他者”，这个人作为臣民，只能通过这样笨拙而脆弱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融入历史之中，也正因为如此，才不可能被听见[23]。

不可能的无辜

围绕“谁能阻止我杀了国王”这一动机展开的一系列行动、检举揭发、诡计和虚假的观点，不管它们是否真的构成威

胁，君主政体都一律严惩。哪怕是有人出于忠心——这是他自己承认或宣称的[24]——错误地检举了另一个对国王出言不逊的人，那么他也是有罪的。任何人，无论是出于心机还是天真，但凡使用了国王之死这样的话语，那么就都是有罪的。任何人一旦有了这种念头就必然会受到惩罚，通常是旷日持久的监禁。意图对国王不轨的控告已是老生常谈，将所有沾染此动机的人拖下水。即使是为了获得奖赏，或要祸害邻居。就算他们试图通过保护国王免遭真实的或想象的暗算，以便让自己的英勇行为引起国王的注意，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免受惩罚。但凡提及“国王之死”这样的话题，哪怕只是含沙射影地提及，也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不受波及。忠诚与背叛并存，自以为忠诚的人顷刻间就会成为背叛者；对国王的热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掺杂可怕的动机，但凡有一点想法都会被判有罪。于是，无辜变得不可能了，而且，在整个路易十四及后来的路易十五统治期内，通过那些想要接近国王的人的事例可以看出，最终他们都只会被永远驱逐出国王身边。

1671 年，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玛格丽特·当格勒贝尔姆斯，奥尔良的一名药剂师之女，自首说她“意图谋害国王”。后来逮捕她的下级警官和审问她的警长都发现，这只不过是她想象出来的犯罪，出自她自己的脑海，漏洞百出，不堪一击。然而，20 年又 20 年，人们发现她一直在巴士底狱，之后她被押解到了昂古莱姆监狱，最终被关押于巴黎的女子监狱里。她的健康亮起了红灯，双眼几乎看不见了。1716 年，她写信给摄政

王说：

> 她于1671年被捕，到了1682年又被重新关押，这么长时间以来，她在巴士底狱及昂古莱姆监狱待了超过24年，其他时间都在基督教协会，现在她被关在圣−肖蒙，处境十分悲惨；她请求还她自由，让她去一个更适合她当前惨状的地方。[25]

摄政王同意了她的请求。45年之后，玛格丽特·当格勒贝尔姆斯重获自由。在批注中，我们可以看到："因幻想的犯罪而遭起诉。"这份卷宗被归类存放于弑君罪的文件中。

因所谓的意图对国王不利而遭到错误的指控，雅克·维吉耶，巴黎法院的律师，于1694年3月3日被逮捕。蓬查特兰于5月2日写信给巴士底狱的负责人：

> 他将只会见到拉雷尼先生（时任警察总监），我写信给您并不是为了向您重复这一点，而是想告诉您，您有必要密切关注这一点，那就是让他见不到任何人，甚至包括巴士底狱的狱警。[26]

7月21日，维吉耶得到批准在露台上散步。很快人们发现，为了弄死他，一项阴谋正在展开。他最终还是会被弄死的，因为据说他被卷入了一些"阴暗而奇异的事件"中。1789年，

他的卷宗批注如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巴士底狱的，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死在了那里（可见，根本没有谁是无辜的!）。"就算他竭力否认，也还是逃不脱罪责。无论是维吉耶还是玛格丽特·当格勒贝尔姆斯，他们都被认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洗清罪名。

民众深知，尽管"国王之死"的动机足以牵连自己身边的所有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反应是激烈甚至极端的。1703年，一位做高级家具的细木工为自己的侄子感到担忧，那孩子正跟随一位师傅学手艺，而这位师傅时常说些反对国王的话。因为觉得师傅的话会将徒弟诱导成为当局者眼中的罪犯，细木工于恐慌之中告发了那位师傅。他的本意是为了让自己的侄子不受罪责的牵连，然而，却牵连出了更多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根本就不应该对此事负责的人，还有那些仅仅只是碰巧在场的人。

1705年，一个年轻人想取自己父母的性命，他没有使用匕首或者毒药，因为他知道或者说他相信还有一种更为有效的武器。他向警方自首，正是在父母的授意下，他想去杀了国王。于是他被关进了巴士底狱，之后将会被转移到比塞特雷监狱，没有人知道他是否重获自由[27]。可以肯定的是，"杀死国王"是一种极为强烈的表达。不管是谁，只要表达出这样的意愿，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表达出来，都会让自己及身边的人命悬一线。

在这个世纪晚些时候，在达米安刺杀事件之后，因为该事件将会引发更多的猜忌或指控，甚至包括那些承认自己听到过

煽动言论的人，一旦落入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检举之中，就不可能为自己的清白辩解。针对亚当·博格埃尔的指控之荒诞，让人惊讶于命运对他的惩罚：亚当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德国人，几乎不懂法语，在一所嘉布遣会修士学校帮佣。某一天，当他得知这些修士们差点被驱逐，便发了一通感慨。某个听见他说话的人以为这个佣人所说的是不为人知的隐语，其中提到他要杀了国王。在巴士底狱，对亚当·博格埃尔的审讯极为艰难，因为他的法语贫乏得很，他否认一切，讲述着自己的过去，讲述出身的贫苦还有他上手很快的箍桶技艺。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发抖，这使得前来审问他的警长提出了这个问题："难道他的战栗和痛苦不能证明，他因为自己想要对国王不利的罪恶想法而追悔莫及吗？只有悔恨才会造成这样的情绪，因为害怕被惩罚。"在被长久关押期间，亚当写了诸多德语书信，也有一些是用难以辨认的法文写的。有人将它们翻译出来，于是，我们可以读到："我出身贫寒，我的内心羞怯而悲伤，根本不懂得任何礼仪。"他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精神遭受重创，他写了一些古怪的文章，糟糕的德语中夹杂着一些拉丁语和法语词汇、音符、看不懂的字母以及无法辨识的东西。之后他被转移到男子监狱，有记录表明在那里他发出了让人心悸的吼声。监狱长要求给他开点药，于是整部关于这位佣人的卷宗就在这样的请求中完结。然而，故事的主人公甚至都不懂法语，而且仅仅只是某个人自以为听到他咒骂国王而已。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做了与国王之死相关的事，无论

是付诸实践了，还是听到其他人将之付诸实践了，就都不可能是无辜的。唯有骇人听闻四个字可以解释那么多想象的、窃窃私语的，甚至仅仅只是梦中的举动。有时候，警方会毫不犹豫地说起这些“骇人听闻”之事，因为这让他们着迷，也使得他们从不怀疑罪恶产生的原因。下文讲的是一个名叫本雅明·克吕兹–克罗尼耶的人，他因怀有对国王不利的秘密而遭到指控（1684 年 4 月）：

他中等身材，头发黑密而卷长。脸很长。因为天花皮肤产生了溃烂，尤其是在鼻子旁边，就像是一张肉皮做的网，比脸部的其他部位都要高。他的眼睛非常小，非常黑，也非常明亮，眉毛十分浓密。他的鼻子油光光的，鼻孔硕大无比，好像通过鼻孔就能直接钻进他的大脑。他的嘴唇完全不对称，上唇比下唇要厚很多。他的牙齿非常白、细且小。他的下巴很尖。这样的一张脸孔很容易让人展开想象，将他描绘成可怕的对象。他的思想活跃，机智而风趣，但却并不能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他总是激情四射，可他的面孔总会让人联想到残忍与复仇的快感。

我忘了说了，他衣衫褴褛，系着一条并不搭配的领带，还有一道劣质的蕾丝，却没系带子。[28]

第六章

“你英勇的臣民值得拥有一位超越他们的国王”

尽管“国王之死”这一主题贯穿整个时期，但并不能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国王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一直僵化不变。事实恰恰相反，从 1661 年到 1675 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就了一段激荡的历史。在这期间，民众对诸多事件提出质疑，重新构建对国王的情感并给予国王形象新的表达。这些变化依据不同的方向渐次展开（又或者是无序地展开），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如暴风雨前的乌云般堆积起来；它们描绘出一幅剧烈多变的风景，也为批判的构建留了空间，批判其实是与众多常规形态并存的。回头审视这段漫长岁月，会发现一系列舆论，它们既遵循编年体的模式——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政治形势的更迭交替，呈线性展开——也依据一些近乎一成不变的方法，从传统中汲取精髓。

那些历久弥新的话题（国王之死是其中之一，好国王受奸臣的蛊惑是其中之二）与转瞬即逝、不断变化又着眼于当前事件的观点共存，意味着将不同的时间概念交织在一起。未来的表达依托于突然爆发的现在，而时常为当局所诟病的舆论的不

稳定性，只不过是对某一新领域的重塑。在这个领域里，公共事务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侵占。这样的“侵占”被高调展现，有时纷乱嘈杂，而且总是引发争议，它重塑着民众观察问题的方式。

国王形象受到各种特殊因素的干扰，发生着改变，甚至是剧变：让我们分析一下产生变化的特殊时刻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不是针对不可避免的国王的去神圣化（当前的诸多研究已对此进行了深入阐述），而是针对舆论的变化。正是在这些变化中，民众合法地成为了社会角色，成为（尽管在此使用这样的字眼略显过时）政治领域的对话者，他们正着手让自己在这一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过程时而突然发动，时而骤然停歇，其间夹杂着失望之情，或对国王的效忠之情。而国王则通过其他方式担负起自己的职责，维护自己的权威。

故而，话题与记录交织在一起，国王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哪怕是他的行为方式遭到质疑时。正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每个人都在应对、批判，使得国王本人也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或是从行动上做出改变。那些因为出言不逊而身陷囹圄者的卷宗让我们更好了解到君主政体的担忧有多么沉重，民众的新意图又是多么坚决。通过被国王拒绝的言论和行为，我们可以逐一审视君主政体及其政策。尤其是从1744年以来，说到这一年，人们都能回忆起国王在梅兹重病的事情。对人民与路易十五的关系而言，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更何况还伴随着冉森

派不绝于耳的争论，之后便开始拒绝为冉森派教徒做临终圣事。18 世纪中期，有一种观点认为，臣民有足够的心力去评判国王，这样的举动有时可以改变他们传统的从属地位；十余年后，1757 年，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让人意识到舆论的状况和警方的担忧；之后从 1762 年（驱逐耶稣会士）到面粉战，民意沸腾，很多人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因此，从本书的第一部分开始，不知不觉中，按照编年体的体例，我们已经浏览了数个统治期，越来越丰富的主题交织于其中，或至少它们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社会各阶层中。鲜活的字眼，跌宕的言论席卷整个社会，有的被遗忘，有的被记住，有信念也有激情，记录历史上的特殊时刻，那段时期里，国王的臣民时而表现得漠不关心，时而又合情合理——当他们不再哼唱那些以示抗议或愤怒的歌曲时。这些时刻并不总会被教科书作者们公开写入课本中，因为现实总存在于转瞬即逝的剧烈动荡中，历史学家们并不总能察觉到这一点。然而，正是这样略显独特的记录，它本身就是社会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让我们涉足其中，吸引着我们的兴趣。最后，为了再次让人大吃一惊，我们将着眼于镇压的形式与理由（二者将颠覆现实性的形式），以及漫长的监禁生涯在某些人心中所构建起来的想法：巴士底狱里堆积如山的通信和回忆录，和被关押者的卷宗表现出的政治思想的强度，也与高墙之外的思想遥相呼应。

1744–1749 年

此前，两种相互矛盾却从逻辑上可以理解的集体态度交织在一起。自从镇压冉森派，对教堂和神甫们实行监控，法院纷纷表明立场以来，私下里人们窃窃私语（有时也写下来），虽然对国王的尊重依旧，其实仅仅只是对其命令的妥协。主教们“呼吁”与教皇和国王决裂，巴黎最高法院上谏国王，建议给民众留下思考的空间：既然他们可以评判神甫和法官，那就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评判国王。我们已经说过，警方和君主政体在面对民众时是多么震惊，因为此时的民众不仅坚定果决，而且无论什么时候针对任何事情都能表明自己的立场。于是，某种东西悬在了将君主及其臣民连在一起的丝线上方。

然而，到了 1744 年，人们见识了国王御驾亲征的场面，激起他们对于路易十五异乎寻常的敬爱、忠诚和骄傲之情。国王突发急病也让他们极为痛心，他们用近乎圣徒传记式的笔法写道：

我们永远地失去了这珍贵的宝藏，
曾经的我们视它如瑰宝……
可是最终，世界厌倦了幸福，
纷争四起，战火滔天，英雄的光芒照耀四方！

危险激励着他，整个欧洲为之战栗，
从埃斯考河岸到莱茵河畔，
他将激奋的异教徒撕成碎片……
上帝啊！我们看到了怎样可怕的一幕！
那边是胜利的车轮，这边却敞开坟墓，
不祥之声嘈杂沸腾，直达天幕……
巴黎的城墙，噢，圣洁的守护神
难道你不再能够守护你的臣民？
全新的恐惧让我们震惊，令我们难以忍受，
这最令人敬畏，也最让人伤悲。
妻子……出发……会有什么等在前方？
自然泯灭了，艺术亦不再有回响，
新的埃克塞基亚斯，在奔跑途中跌倒，
依然斗志昂扬，没有奢华的排场，用尽最后的力气，
他向我们倾诉：无惧伤痛与死亡……
一如星辰的诞生注定湮灭，
最炽烈的激情，最美妙的节日，
皆为铺垫让人心悸的死亡。
运气好一点，感激多一点，
就让我们将祝福与敬意奉予上帝。
元老院，也让我们要快乐，
立法机构对我们温情脉脉。
法兰西，膜拜上帝之手，

就是它，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

给予英雄无上荣光，给予父亲无限敬意。[1]

然而，正当表达与评判成为习惯时，出现了一桩不幸而丢脸的事：遵照菲茨–詹姆斯主教的命令被迫离开国王的沙托鲁伯爵夫人，不久之后又悄然回到国王身边。很快，巴黎人就知道了国王对伯爵夫人的恩典。“这则消息终于使得巴黎公众群情激愤，于是，关于伯爵夫人沙托鲁女士的各种传闻纷至沓来，一谈到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话可说，只是这一次，人们尽量小心谨慎，以免被关进巴士底狱。”[2] 民众的窃窃私语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744 年 12 月，伯爵夫人去世了，“在一片纷扰之中……据说是脑袋里长了个脓肿，因为绝经而引起的，她曾因为失宠而终日闷闷不乐，也可能是因为复宠而乐极生悲……”

1723 到 1744 年是舆论建设的关键时期，这是一段独特而自主的时期，因为舆论受到各种新事件的滋养而不断发展。主流政见与冉森派不合，在人们好不容易为“骁勇善战”的国王欢欣鼓舞之时，又突然对他深深的失望。动机很是微妙：国王回归了传统形象（指路易十五终于像他已故的曾祖父路易十四经常做的那样走上了战场）却又很快失去了民心，因为他孱弱的身体和对爱情的不忠（国王一度轮流宠幸了三姐妹，但三人后来全都暴毙身亡），与此同时，民众言论持续而快速的发展扰乱了当时的公共氛围。巴士底狱档案里所记录的，都是对冉森

派的镇压，其实就是对各种言论的镇压。警方力求找到最合适的办法，来“中止迅猛而可怕的流言”[3]。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找出那些口出或手写不逊之言的人“杀一儆百”：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因为“公开的不逊之辞所针对的已不仅仅只是官员了，甚至直指国王本人”[4]。人们牢牢盯住手写新闻和《教会新闻》，巴黎最高法院于1745年5月18日颁布了一项决议：“禁止任何人传播小道消息或手写新闻。”其实镇压早就开始了，因为在1744年，莫德斯特·布吕内，最高法院的执达员，被指控写了一则名为《沙尔特勒的看门人》的可怕故事。事实上，他充其量也只不过是那篇骇人听闻的短文的复制者，却被关进黑牢长达18天，之后被送到警察总局，时任警察总监的马维尔将他关入比塞特雷监狱。直到四年之后他才重获自由：“时年59岁零4个月，时常为胸闷所扰，这是他在黑牢和监禁初期就落下的病根。”[5]

无论是写还是说，一旦违反规定就会被扣押。然而，一位冉森派的神甫，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因为“在弥撒时做了个鬼脸”就遭到指控，而后被关进了巴士底狱，当然，他可能还被怀疑私藏了一些《教会新闻》。他写信给警察总监：

> 总不能因为我在圣弥撒期间做了个鬼脸就判我有罪吧！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了鬼脸，就算真有此事，那也不是故意的，有可能是面部痉挛或者是突然觉得有点痒，甚至也可能是我为了不让自己分心而做出了一些努力，恰

好通过面部表现了出来。更何况我早就见过那些血淋淋的事实，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从来就没有过那样的想法，更别提付诸行动了。[6]

几年之后，他被逐回他的故乡布卢瓦。

因此那些年间，我们从巴士底狱的资料中可以看到的只有报贩子、檄文作者、《教会新闻》的兜售者和出言不逊的人，他们“特别想知道是该支持还是反对”。除了他们，还有从巴士底狱中释放出来的逃兵和骗子们，因为他们同意参军服役。

1748 年，气氛愈发沉重；镇压冉森派的规模不断扩大，新任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夫·德·博蒙于 1746 年 8 月走马上任，加紧了对冉森派神甫及其追随者们的镇压。根据达让松的描述，他的所作所为就像“一匹被激怒的公狼”[7]，让每个人都觉得（有人）触动了他的内心深处，触及了他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信仰。此时也曾出现暂时给人安慰的缓和：从 5 月起人们得知，亚琛会议之后，有关“和平”的预备性谈判条约终得签署，欢乐之情传遍整个巴黎。然而，这种欢乐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有传闻说（该死的是，它居然得到了证实！）法国要“放弃”所有已经到手的城市。付出了那么多却没有任何回报，国民血洒疆场换来的一切，就这样被国王视若无睹？时下流行的尖刻咒骂，据说出自那些说话粗俗的女人之口：“你笨得跟和平条约一样！”[8]这样的表述如同口号，充满嘲讽又易于

达成共识。

一桩意想不到的事加剧了个体舆论的沸腾，将人们推向更深层次的不满：1748 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它没有那么剧烈，因此史料中并没有过多的记载。这也证明了一些人的想法，于传统记录之外，依然存在被遗漏的历史时刻。然而正是在那段历史中，民众锻造着自信，为自己也为他们的政府打造着新模式。事实上，在亚琛协议的条款中，有一条极易被人忽视，因为它被淹没在取消胜利的战果之中，那就是将夏尔·爱德华·斯图亚特王子逐出法国。王子想要重新夺回英格兰的王位，法国曾表示愿意为他在苏格兰登陆提供便利。突然遭此羞辱，王子遂开始反抗。他不仅拒绝离开巴黎，还以极快的速度在亚琛，在参加会议的大臣们的眼前张贴印刷好的抗议书。不仅如此，他还到处散发让国王不满的檄文，因为后者更倾向于通过承认阿诺夫尔家族的继位来兑现英法间的和平承诺。

因为此事涉及国际政治，所以臣民们自然无权干涉。可是这位王子着实受到巴黎人的爱戴，因为他风度翩翩，慷慨大方又友好善良，所以，在巴黎一直生活得十分惬意。无论是在歌剧院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能做到路易十五从来不肯为他的城市所做的事，于是人民也对他的友善报以情谊，像对待自己国家的王子一样让他在这座城市随意进出。夏尔·爱德华·斯图亚特对巴黎人的想法心知肚明，于是他堂而皇之地摆弄着“这座对抗宫廷的城市”[9]。无论是在咖啡馆、小酒馆，还是在其他

公共场所，每个人都谈论着他，都在读他让人起草的“公开抗议书”[10]，当局不敢禁封他的抗议，尽管当前的氛围让他们十分不满。

“1748 年 12 月 10 日。国家事件”：这是巴尔比耶在叙述整件事时所使用的字眼，这是一件让所有人都觉得难堪的事，使得人们不仅仅只是与国王意见不合，而是对他加以鄙夷了。这天，夏尔·爱德华·斯图亚特跟往常一样前往歌剧院，并没有发觉自己处在一群“便衣”的监视之中。“他被人推倒在地后被抓住双臂和双腿，有人抓起一根绳子将他捆了起来，牢牢绑住他的双臂。”[11] 他被押解至万森讷城堡，与此同时，另外 39 个跟他有密切联系的人被送往巴士底狱。[12] 大街之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一队警察，以防暴力事件发生”。外交部长对事态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传言无比担忧。12 月 15 日，他写信给贝里耶：

> 之前国王被迫做出逮捕爱德华王子的决定，很可能要么是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别有用心，有人会借此散布与事实和动机并不相符的谣言。为了让您更好地了解或揭穿这些不实的指责，我在此向您提交一份详尽的陈情书，包括王子被捕前以及他被捕后一直到现在的主要情况。但请您在使用这份资料的时候，切勿将其交与他人，也不要进行复制，请您着重考虑此次事件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和它已然挑起的言论。[13]

紧接着，这份陈情书对细节描述详尽，人们撕去了封条，扣押了王子的个人物品。最后，出现了这样的话：

> 国王不能再推迟履行陛下此前已经认可的条约，更加不能容忍出于人们对爱德华王子的喜爱而变得如此难堪的事情，爱德华王子几乎无处不在，所有公共场所都有他的影子，他似乎已经把自己视为陛下首都中的一分子了。于是，尽管陛下有些勉强，但还是做出了逮捕王子的决定。

逮捕王子的过程就像是一起绑架，一切就在这样的诠释下进行。一段时间以来，绑架在巴黎频频发生，神甫和冉森派教徒们对这样不堪的命运再熟悉不过。民众忧心忡忡，他们信奉宗教的内心深受打击，对王子的绑架瞬间点燃了所有的不满。所谓秘密逮捕，其实是公开的，尽管发生在晚上，但地点却是歌剧院，在那里，总有许多爱看热闹的人聚集在马路上，看着他们的王子和随从从豪华四轮马车上下来。绑架恰好被他们尽收眼底，凝结成怨恨与忧虑。如果说国王可以秘密绑架一名王子，那就意味着这样的威胁笼罩着所有人，胆大妄为的国王是没有底线的。于是，一种情感产生了，大胆果敢与因循守旧交织在一起：一边是传统上对王室成员的尊重，尤其当他们是别国王室成员时。出于对其所在国的尊重，应该表现得热情好客

（“绑架”一位王子是绝对不被认可的，更何况他还是来自异域的王子）；另一边则依托于现实，即对冉森派的镇压，用以建设这样一个思想，当国王想要侵占民众精神领域时，君主的权力就被滥用了。国王早就被视为专断者，现在他又像是一个背叛者和叛逆者，一个在暗中准备不义之举的家伙。于是，民众脑海中所构建出的这些形象是格外强大的，因为它们得到了毫不客气的文学作品的支撑。在那些作品中，国王被说成暴君，他力主的和平不仅被认为是“愚蠢的”，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人民的权利与国王的权利，到底哪个更重要？

这是一个奇特的氛围：上文提及的陈情书表明当局是多么害怕此次事件引发的谣言，为了防止骚乱，借和平之机，他们举办了数场庆典。巴尔比耶和达让松都记录下了民众的反应：没有人高喊“国王万岁！”，有些地方，庆典的装饰品被付之一炬，或是被激愤的群众撕毁。民众所关注的即他们一直以来所期盼的，是减免赋税，这是路易十五许下的“第十条”承诺，前提是如果和平能实现的话。因担心它不能兑现，各类出版物号召大家拒绝纳税。内阁要求法院否决那条“该死的建议”，却遭到后者的拒绝。政府找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改变顺序，将“第十条”承诺变为“第二十条”；在国王宣布了这项决议之后，法院被迫做出让步，但是民怨沸腾。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名叫埃默里的密探于 1749 年 6 月 16 日呈给警察总监贝里耶的报告中所说的：

在普罗可布咖啡馆①里，迈罗贝尔在谈到正在进行的改革时说，简直就是扯淡……宫廷最大的乐趣从来都只是大肆盘剥民众，并做出不公正的裁决。[14]

无独有偶，密探迪瓦尔也在他的报告中讲了类似的事：此事涉及一位嘴碎的官员，发生在他的假发师那里。“这位官员，”迪瓦尔写道，“前往假发师戈茹那里，当着另一位残疾军官阿泽马尔先生的面，复述了某部反对国王的作品，说陛下任由无知无能之人摆布，他所谓的和平是不光彩甚至耻辱的，因为要交出所有已经攻占的城池。与之相反，匈牙利女王和萨瓦公爵总表现得睿智而谨慎，他们的大臣也更加见识多广。”[15] 接着，针对国王的举动，大量谣言突然涌现，迪瓦尔密探接下来的报告会围绕同一个主题展开，还有许多被关押者的资料也记录着对国王的辱骂之辞。事实上，1748 年以来，普瓦松小姐、勒诺尔芒之妻、蓬帕杜侯爵夫人、国王的正式情妇，据传是一个：

所有男人都梦寐以求的情人，拥有女人最完美的身段。圆圆的脸庞，每根线条都恰到好处，精致的面容，堪称完美。无论胳膊还是手臂都无从挑剔，双眼不仅大而且美，更有一种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女人眼中看到的火辣、聪颖和炽热。她举手投足风情万种，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

① 该咖啡馆建于 1686 年，是巴黎最古老的咖啡馆。

的焦点。[16]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迪福尔·德·舍韦尼那样近距离地接触到侯爵夫人并对她发出由衷赞叹的。作为大使的引见人，迪福尔·德·舍韦尼在王宫执行了为期半年的公务，这将使他成为国王的近臣、也是宫廷的核心要员之一。蓬帕杜侯爵夫人引发人们激烈的仇恨，为出言不逊的小册子提供了素材，各种大不敬的言辞被张贴在公共场所，比如各类建筑物和市场前的广场上。所有人都在抨击她和路易十五。公众不仅对国家政治感到失望，还极端鄙视暴虐好色的国王，他的爱情从来没像他的前任路易十四那样受到尊重。相反，他的情人总是遭人诋毁，因为愚蠢的国王轻视巴黎，打击深受巴黎人爱戴的王子，哪怕是在人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意愿时，他还一意孤行地暗箱操作甚至动辄绑架。在这些充满新式批判的目光看来——它们背后还有好战的法院支持着——与路易十五的爱情相关的举动都是错误和罪过。不要忘了，还有一段时常会在回忆录里被提及的国王与年轻三姐妹之间的三段感情，这被视为乱伦之举，严重违背道德。于是，尖刻挖苦的指责之辞满天飞：

国王接连与三姐妹发生关系，这样的举动让他的人民感到丢脸，如果他再不改变生活作风将会招致噩运，无视王后的国王根本就是个奸夫。法兰西将会倾覆，因为国王都不去复活节领圣体，这会让他的王国被上帝诅咒的。

这样的嘈杂声不绝于耳，如同空气中的粉尘一样扩散，最终构建出让人大跌眼镜的国王形象：遭到人民鄙视的叛逆者。在此，已不用再列举发生在1749至1750年间其他众多针对国王和侯爵夫人的批评之辞：有人写了讽刺诗，还有人在暗地里策划阴谋，更有甚者想要获得奖赏，便声称了解有碍于他人性命的虚假计划，坚持不懈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比如我们偶然在文献中看到的这句话："当一位王子终日沉迷于女色时，杀了他就成了一种责任，或者至少可以让人公开这么做……感到羞耻的就不仅仅只是他的爱情，还有他的国家和他自己，如果他能感觉到的话。"[17]

为了更好地回忆，必然要提及一个人：达莱格尔，马赛的一位家庭教师。除了某些学识渊博者，还有谁能想起这个于1749年底被关进监狱的人？因为他检举了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可能会威胁到蓬帕杜夫人性命的阴谋[18]。等到人们再度发现他时，已是1789年，那时的他在夏朗通惶惶不可终日，并在几个月之后死去。也许，有些人会在擦肩而过时认出他来，因为他在巴士底狱时有一位名叫拉蒂德的同屋犯人，二人于1756年成功越狱。听说因为侯爵夫人对国王施加的影响，所以关于征税的第20条承诺应该归咎于她。为了保护她，达莱格尔想到了一条计谋，正是这条计谋害得他锒铛入狱。他想要告知蓬帕杜夫人她身边可能发生的坏事，"他打算草拟一些信件，告诉她民众的议论，其中包括某一专门针对她的阴谋，主谋是一个名

叫莫勒帕的人”。细节是意味深长的：正是街头的传闻帮助达莱格尔完成了他的故事。他并不是抨击时弊的文章作者，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将自己所听到的故事尽可能进行重构的人。只是，那时舆论的传播方式也不似以往那样，由作者将早已准备好的思想传达给被动的公众。达莱格尔在狱中还给蓬帕杜夫人写了数封感人至深的信，希望能得到她的谅解。伴随通信的还有警方的记录，无比直率地总结着他的情况：“这家伙变得暴躁不堪。他虽然有些想法，但都不是什么好念头，他焦躁不安又喋喋不休。其实，他更适合去万森讷而不是巴士底狱。”[19]

1749 年围绕着逮捕（即对斯图亚特王子的逮捕）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使得政治氛围变得非常奇特。动机围绕着伦理道德展开：公众生活应合乎伦理道德。既然国王主导着公众生活，那么他所呈现给公众的就应该是他自己及周围人的英勇形象。否则，就不要让他来主导。从绑架王子事件开始，所有分散于个体意识中的，用于构建不满之情的事件（冉森派事件，糟糕的和平之后的战争等等）都变得更加强大，并制造出一种得到写作和话语支持的集体情感。面对这一切，纵然是最严酷的警察也无能为力。对这一短暂而精确的时期进行研究，会发现一种突然形成的对于自身和君主制信仰的新状态。新状态下，每个人都在思考，思考自己也思考他人（国王），思考着他的所作所为；新状态下，每个个体都要求君主政体构建它的形象，君主制越是想消除人们内心的想法，人们对这一形象的要求就越高（拒绝为冉森派教徒做临终圣事就是其中最显而易

见的例子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这句话“你英勇的臣民们值得拥有一个超越他们的国王”，短短一句却意味深远。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对君主制的赞同，它的形象长驻人心。这句话中，没有颠覆之意，亦无羞辱之词；隐藏于其中的是强烈的批评。写下的句子表明对国王的失望，说明国王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对国王的忠心始终可见，但有时还要伴随着严格的要求：国王应该超越他的臣民。这些道理如此自然而平常，如果它不是被包含在“你英勇的臣民值得拥有”如此这般的国王这样的表述里，都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一点。此处，国王的臣民们对自身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是英勇的，没有谁能轻易否认这一点。他们征战沙场；他们交纳赋税；他们通过法院的争论，学会抵抗上面的命令；他们支持神职人员，捍卫信仰的方式；他们热爱他们的国王。正是出于这样深沉的内心信念，才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如果国王是个众望所归的君主，那么，他自然应该超越臣民，拥有无上荣耀，为人诚实公正，态度一丝不苟。如此这般的交替转换，“英勇的臣民”，“超越他们的国王”是赠予与回馈的传统形式。只是在这里，赠予源自臣民，国王应该用至高无上的伦理道德与之相呼应。因为臣民们的主动性，因为他们的英勇，才形成了并不平等的相互关系（国王更胜一筹），也正是这种不平等维持着君主政体的完整职能。

“你英勇的臣民们值得拥有一位超越他们的国王”表达出一种境况，在这一境况中，同一人以独特的方式与不同的人联系

在一起。国王公正而强悍的传统形象在新的框架中被重新表达出来。因为臣民们拥有了自己的地位，会思考，会行动，因此是值得的。至此，国王形象的动机也发生改变，即便它依然包含着大量关于国王与臣民关系的传统内容。

1757—1760 年：关于达米安事件，或保存于国家图书馆中的若利·德·弗勒里遗赠中的“煽动性言论”[20]

我一度放弃了巴士底狱的档案，转而捧起了若利·德·弗勒里（巴黎法院的总检察长）遗赠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资料，它们被存放在国家图书馆，并被冠以“关于达米安事件的煽动性言论”之名。这决不意味着这一时期，我们在巴士底狱中找不到因为出言不逊而被关押的人。在若利·德·弗勒里遗赠的六卷本手稿里，清晰地表达出，国家最高层在面对 1757 年 1 月 4 日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时所持的战略立场。这些手稿包括警方的调查和报告，总检察长本人与总督及国家管理者们的通信，也包括在法国境内随处可以听到的谣言和呈报给高层的对“煽动性言论”的检举。

刺杀事件一出，巴黎就下令外省的总督和指挥官们中止一切不实的谣言，并警惕煽动性的言论。一时间，从法国的各个城市中都传出大量消息，总检察长先生怀着一腔热忱对这些消息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精心整理。我们可以读到代理检察长们记

下的各自城镇的气氛，而在总督和市长们起草的详细报告里，讲述着他们的人围绕这一主题在乡村、城市乃至大街小巷中所收集到的信息。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猜到这些不同级别的官员对于权限的争论和相互间的敌对状态，尽管他们都被要求报告当前的形势。正当敌对官员之间纷争不断时，我们读到了来自巴黎的回应，努力安抚着这些互相忌妒的官员们，勉励他们说大家都只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对煽动性言论进行围追堵截。1757 年，差不多每天巴黎和外省间都有大量的通信，那年之后通信便不再频繁：从中表现出担忧以及镇压的意愿，与之相应地组织了无数场大众祈祷、弥撒和唱《赞美诗》——为了庆幸国王逃过了刺杀一劫。着实有些匪夷所思。人们惊奇地发现围绕零零碎碎的小事，居然可以堆积起那么厚的信札，那都只不过是些道听途说来的模糊小事，大部分都无足轻重，几乎无法把控，亦不遵循惯常的程式。这一现象引发了众多评论，人们思考着安全有效的方式，用以对抗无法捉摸的模糊言论。监视无处不在，仿佛整个法国，无论是在家中还是教堂里，无论是在乡野还是山间，所有人都被怀疑在散播着反对国王的可怕情绪，而主导这一切的就是有组织的团伙（冉森派或者耶稣会），他们的目的是扰乱整个国家，使之陷入混乱。

浏览六卷本的遗赠，与预期相反让我们大为讶异的是尽管它们对镇压表现出无尽的忧虑，却对舆论或集体表达没有任何关注。此处的话语是匆忙付诸行动的计谋的产物。这些厚厚的手稿也证明了另一个现实，即煽动性言论的存在：它们暴露出

君主政体混乱而矛盾的意图，以及对民众“不良意愿”的根除是如何以一种激起它、甚至创造它的方式进行的。当局只不过是在毫无根基的沙堆上构建错误的信念而已。于是我们可以认为，若利·德·弗勒里的遗赠，全部围绕着达米安事件这个中心，它们首先是一份记录下当时政策的资料，其次才是对法国当时境况的展现。因此，从逻辑上说，它也是言论的产物，而那些言论毫无疑问是当局要制止或惩处的。关于这一点，资料上说得很明白。消息网络的建立，本意是为了收集各种窃窃私语的恶性言论，结果却常常刺激着它的出现和传播。无数检举揭发、道听途说、毫无意义的传闻充斥着文献记录，它们不断膨胀、壮大，被严格而专横的审查制度训练出来，每个人都在捕捉别人有意无意的话语，有时甚至可以从他人的面部表情中，或是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引发的坏心情而做出的一些模糊手势中一探究竟。长时间的通信或警方的干涉都与这些脆弱的表象有关，但却并未对它们的沉重感到吃惊，没有质问其合理性，甚至都没有发现正是自己的干涉具有煽动性，让曾经只敢“低语”的言论变得真实、充满活力，直至成为真正的危险。这是一种方式，提醒国家留意那些秘密组织，正是它们让它去面对一种无从证实但却可以被控制的事物——言论。言论的地位并不重要，它不仅可疑，而且只可能被反对君主政体的派别所“授意”。若利·德·弗勒里遗赠中表现出，国家高层已经感受到了那些反对派们处心积虑、恶意打造的产物，并采用行政、司法等手段进行镇压。然而，没有人关注臣民们的话语，甚至

都没有人关注这些话语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剧本在别处上演，远离普通民众，尽管人民是唯一的讨论对象。剧本依据某个计划上演，早已具备自己的理由、动机、信念，进入它严格框架内的只有只言片语、道听途说的谣言和模糊的呼喊，根本没有人关心它们的根基到底是什么。

一旦弄清楚这些遗赠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结构与内容的差距，笔者就可以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所有的言论，以便更好地探讨所提及的事实与事件。被记录的话语和文字、被揭露的剧本都各不相同，彼此的“发源地”也存在巨大差异；笔者决定将这个由各种不甚连贯的情况组合而成的不协调之物视为警察机构的产物，并涉足其中，探寻业已存在的社会认知的意义与深入形式，试图想象可能的未来、立场和形式，这些都有助于发现民众言论的原始形式，尽管这些言论可能被断章取义或被挑唆。在试着挖掘内容的同时，不应忽略行政手段和警察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它们促使了内容的产生。

负面言论赖以生存的环境

恐惧，正是恐惧，鼓励人们在闲聊中相互揭发，就好像那些话是真的一样。这与闲言碎语的诞生地无关，那些揭发它们的人是如此恐慌，以至于他们都无法区分，有些话只是出自小酒馆的醉汉之口，有些只是弥撒结束之后同堂区教民之间的随

意闲聊，还有些话是在私人宴会上大家闲聊时随口而出的。有些人甚至揭发他们在乡野间听来的话，其实只是季节工们在收获时的闲聊，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或多或少会用礼貌的语气论及时事。还有些人在旅行途中，认为自己听到了一些含沙射影的暗示，或是发现了某些混蛋。此外，一些正在与雇工商谈的雇主，会发现雇工对薪水、工作条件或生活困境表示不满。

一旦发现可疑的迹象，邻居、亲朋好友们都会立即前往市长或是有相应职权的官员处告密。他们的动机与其说是让他人受到惩罚，不如说只是为了明哲保身，因为当局告诉他们，发现可疑事件而不报告就会将自己牵扯其中，陷入危险的境地。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成为一桩社会事件，其实，这一让人印象深刻的举动本身并未造成巨大的冲击，在当局看来，最大的威胁在于这次刺杀所带来的影响。所有人都知道，一旦危及国王性命就不存在赦免的可能。无论他们心中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当务之急都是部署尽可能多的警力以防不测，毕竟警方都是严肃且具有威慑性的。无论是听到了恶性言论还是目睹了可能与君主政体唱反调的情形，都不能思考，亦不能迟疑，否则就有可能被认为赞同这些言论，或者更糟糕的，会被认为参与其中。担忧的背后是这样的想法：某个人所说的话必然会牵扯听过此话的人。当我们了解到生活及居住模式如何塑造对他者的认知，而这种认知通过各种并不连贯的行动、反应、连带性与反连带性——它们塑造着城乡的社交形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那么，对于上文所提到的关于社会关系的概念，就不会感到不习

惯。对他者的认知，对邻居带来的消息的传播塑造了民众，并让他们感到自己参与其中，说着或否认着。故而，1757 年时，当局不惜一切代价驱逐恶性言论，为的是不让达米安的大逆不道之举传染给其他人。在这里，我们所能看到的揭发形式，恰恰是对政治职能进行明确解读的结果。

被揭发的言论勾勒出三种状况：以编年体的方式记录的这段漫长时期，从达米安事件直至 1765 年，它们首先集中于刺杀之前的种种迹象，之后聚焦于对犯人的审讯以及最终的判决，再后来，从 1760 到 1765 年（甚至到 1770 年），它们开始批判国王的政策和他本人。

“过不了多久，你们就能听到骇人听闻的事”，这样的话出现在菲代勒·阿马布勒·肖沃——圣艾蒂安大街一家商店店员写给他亲戚的信中。两位收信人一位是佩龙的议事司铎，另一位是家住苏瓦松的姑娘、库旺小姐[21]。他的信写于 1 月 2 日，到了 2 月，他就被检举了。此前，他的姨妈，库旺小姐就曾战战兢兢地在回信中说：“求你了，别再给我们写什么新闻了，谈谈你的健康状况就好。”仅仅只是一封信中的几个字，就足以给收信人带来深重的灾难。恐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些人开始搜肠刮肚地回忆曾经读过的文章或是与他人的交谈中可能出现过的不利之辞。1757 年 7 月 9 日，一家小酒馆的老板，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前往米特里法官的府邸，只因他的妻子跟他说了一些事，他觉得非同小可，必须马上报告：

他的妻子告诉他，好几个星期以来她都满心担忧，原因在于一个她并不认识只是来他们店里喝酒的收割工人，与他同来的还有许多收割工，这个家伙说了好多无礼的话，说是有人对他施了魔法，为此他专门咨询过一个男人怎样才能摆脱魔咒，那个男人告诉他，要想摆脱魔咒就得干些坏事，其中包括对王室不利。他也只是说说，并没付诸行动。但是，老板娘却被这些话吓得要死。[22]

这个收割工人很快就被找到并被关了起来，他的名字叫弗朗索瓦·莱皮纳。

有人想起了可怕的魔法，还有人在并不那么确定的记忆深处，忆起了某些人可能讲过的话，想起了夜间又或者是其他什么时候，有人在暗中举行可疑的集会。有人在地下密谋，还有些蒙面人，尽管难以断定到底是谁，但都在做着于政权不利的事。人们揭发那些讲故事的人，那些可怜的讲述者与历史同在，在那段历史中魔鬼和居心叵测的家伙们破坏着世界秩序。1757年，有迹象表明许多被判有罪的言论最后都被证实只是平常之言而已。当局者们在接到举报之后，根本不做认真的判断，尽管有时他们也会感到犹豫。在刺杀事件发生 20 天之后，一个总督写信给法院的法官们，他说：

或许我即将透露的事情与达米安事件无任何直接的关联，但无论如何，它都不可能是无意义的，也不可能不值

得关注。我要说的是埃莫尼埃的布歇，从1750年起，他就不断警告国王，自己察觉到一些危及国王性命的计划。狂热分子们做着令人费解的事，他们建造了一座木制的小型宫殿，在里面放了一尊代表国王的蜡像，每一天他们都对着蜡像做出刺杀的动作，嘴里还大喊着咒骂陛下的话。[23]

还有些人之所以被揭发，据说是因为挑唆达米安刺杀国王：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有人甚至编排了一出戏，舞台上的人戴着面具化着妆，其中就有人扮演国王，“为了让达米安练就刺杀的本领，他们甚至特意从岛上弄来了一头野兽训练他；扮演国王的演员还负了伤，为此还闹得不太愉快”[24]。无论消息是可靠的还是微不足道的，当局都如临大敌，他们恬不知耻地进入故事所营造的虚幻世界里，在那里预言和魔法胜过任何真实性。已经过去的事，曾经写过的字、说过的话都被等同于当下而“一视同仁”。国王治下某些臣民心中的恐惧可见一斑，他们随时准备抽取记忆的片断，以便将自己从无处不在的可能的罪名中挽救回来。

稍后，从1758至1760年间，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庆典、教会活动和惩罚性的审判展开，它们都标志着事件的发展，首先关乎国王的康复，其次是对达米安的处决。既然国王并没有死，那么有必要针对他那微不足道的轻伤而开展大规模的祝祷活动吗？那些对公众活动持漠然态度的人都是怀疑的对象：有些人被指控，是因为当乡村的钟声响起，召唤他们去庆祝国王

康复之时，他们还在田间劳动；邻居们怀疑身边的人，只因在听到国王被刺的消息时，他们的眼中没有泪水。被追查的不再是言论，而是人们的表情，人们以为他们还记得事情发生时自己的表情。一个手工艺者路遇热泪盈眶的女人而感到无比惊讶，于是女人回嘴说“他居然对国王被刺之事无动于衷”。大为讶异的男人反驳道“这不幸的事远不至于悲伤至此啊”。几个月后，他就被捕了。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可以证明，冷漠只会加剧愤怒。让·米罗，一位已经50岁的木匠，家住图尔附近，对他的审讯引发了独特的反响，因为他只不过是总结了散布于法国街头巷尾的众多传闻而已。他被邻居罗歇检举，说他在维修座钟时说了国王的坏话：“那天，就在人们开始为刺杀事件祈祷时，他前往锁匠博热先生家与罗歇闲话家常，他们都没有听到萨翁尼埃尔的钟声，罗歇解释说那是祈祷的钟声，而他回答说：什么！那该死的家伙居然失手了！”罗歇坚持指控他，他想要否认也是白费功夫，还说当时他还补充道，《圣经》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说人们曾要求上帝赐予他们一位国王，后来他们觉得自己真是疯了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上帝回答说已经给他们赐了一位，而他们却后悔了。几天之后，得知路易十五康复的消息时，他又不合时宜地大放厥词：“如果他死了，就没什么痛苦了。”让·米罗从来都不承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但还是被关进了巴士底狱。[25]

对他的惩罚同样严酷。当时，揭发那些对达米安过于严苛的判刑持保留意见的人，是个不错的主意。但对达米安的审判

几乎没有受到重视，通过他的审判多少能够掌握一些他的动机。其实，一直以来警方所审判的和民众所检举的，都是民众与国家意愿的对抗。在国家看来，当国王受伤时，民众应该沉浸于巨大的悲伤之中，无比仇视可恶的达米安，对路易十五的爱戴也不会有丝毫减弱。但君主制的宣传说服不了所有人，于是，一旦有人拒绝遵从被要求的举动或话语时，就会被视为不法分子。没有听见乡村祈祷的钟声，没有流泪，这都是对国王的大不敬。事实上，危机时刻对国王的爱戴应该是可见的。冷漠是一种罪过，邻里之间相互揭发，只因他没有表现出痛苦之情或者忽略了要求所有人都参加的集会。忠诚的言语要表达出来，否则，就是有罪的。每个人都得全身心地关注事件，要对路易十五满心崇拜，为达米安感到羞耻。凡是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的，都以不忠论处。

1757 年 1 月 4 日，这一天渐行渐远，各种揭发和检举愈加彰显出人们的政治立场。当局的恐惧也逐渐转移，他们不再去追捕那些对各类仪式不满的人，当务之急是要纠正对国王及其个人或政治选择的质疑。因此，在若利 · 德 · 弗勒里遗赠最后的几卷里，出现了建立在批判之上的揭发：反对国家司法，反对国王近来对杜巴里夫人的激情。到处充斥着让人担忧的谣言，有时能听到人们小声说最好不再有国王，或者，如果再来一个新达米安，情况可能就不会这么糟……当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我们发现，这或许是所有代理检察长、法官以及警方各界第一次意识到，在法国国内，国王遭到民众的集体漠视，这

种感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处理，不再是只要抓捕所有有谋逆之举的人，所有出言不逊之人，以及所有表情麻木之人就行了的。赌注更高了，当局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不应只依赖于个人的检举揭发，因为那根本就是个无底洞，而应该面对当前不断恶化的氛围展开行动。

如果说恐惧是揭发的原动力，那么，想要陷害他人就是另一个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针对他人的指控其实都是虚假的。然而，检举的力量如此强大，使得那些被冤枉的人也不得不承担后果。那些年里，如果想要毁掉一个人，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做法更简单的了。话语的力量得到大幅增强，它们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因为当局对所有值得怀疑的言论都充满忧虑且用力打压，话语如同利箭可以直穿对手心脏。

于是，存在已久的私人恩怨终于找到了出路，有人利用当前的局势努力让自己的宿敌一夕毙命。一个让人吃惊的故事让我们得以了解整个过程：1770 年 2 月 18 日，库德雷庄园的领主写了一篇长长的报告，揭发“他的”神甫布朗西安。长久以来，他们俩都会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一起喝汤”，谈论当时当地所发生的事。然而两人几乎总是难以达成一致，而且领主大人一直怀疑神甫对信徒们施加了不好的影响。于是，事情再简单不过，某天晚上，气急败坏的领主决定检举神甫。在报告中他写道，多年以来，布朗西安一直怀有不满之情。他还假借一个平常的冲突来深化自己的指控，关于建造一座新磨坊而引发的争议，事实上，村中的确存在不满，但领主认定神甫与当前的争

议脱不了干系。他写道：

> 在与我的交谈中，他指责我，因为我刚刚建了一座新磨坊。对此，他说，我想让他们（村民们）去那里磨谷子，还因为我刚刚建了个新的马蹄铁匠铺，就在庄园旁边，可以为他们以及我自己提供便利；这就损害了那些被称为拉比耶的马蹄铁匠们的利益，这些家伙一直以来都为我提供着物不美价不廉的服务……他甚至胆敢跟我说这样的话（因为我被气得发抖）：我的父亲和英明的祖先们决不会做这样的事，而我会遭到所有人的仇视，我的房子如果着火，都不会有人来帮我灭火。如果说那些国王可以侥幸躲过谋杀，那并不意味着我也会有这样的好运……他会号召全村人奋起反抗。因为这是个能够通鬼神的巫师，是船夫之子，是个犹大。为了让信徒们更加虔诚——就在这一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布朗西安取消了我所在的库德雷庄园教堂的礼拜和敬神之礼，甚至在礼拜天和节日都不做晚祷，要知道这可是从1156年起就已经确立的官方制度啊。[26]

由此展开的调查结果显示此事很可能是真的，鉴于微妙的机制，调查还引发了更多的猜测或者说加剧了前者的不确定性。例如，妓女总会吸引怀疑的目光：她们与那么多人亲密接触，一定处于最黑暗的充满恶意的中心。在巴黎，有很多写给警察

总监的信都出自那些老实却不谨慎的人笔下，他们揭发妓女，说她们徘徊在造反的边缘。“应该净化我们的国家，”某个人在抨击一位洗衣女时如是说，“这个女人真是人尽可夫，可以跟任何男人睡觉。”净化国家，这样的表达在这一时期经常被半高贵的人（商人或教士）所使用，他们随时准备表明对君主制的忠心。还有人描述了另一个女人的情况，她是位年轻的花边商人，总是忙于接待冉森派教徒们，所以被怀疑参与了冉森派狂热分子们的集会，而且轻易就能献出自己的身体。然而，就算会招致报复，似乎也制止不了告密者和随时准备跟踪线索的调查者。为了让这个女人被逮捕，告密者给出了这样的终极理由，极适合当时的不良氛围，也正是在那样的气氛之中才会有那多人被捕。他说道：

> 她的做法穷凶极恶，会传染整个巴黎。最好是找个警务人员去拜访她，逼她指认所有她认识的人，如果她照做了，我们就会得知许多关乎国家及君王安危的真相；如果她不肯就范，那么她的拒绝就足以证明她是有罪的。[27]

署名拉斯普泰勒，文科硕士。

揭发妓女是一回事，检举神甫则是另外一回事。然而，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在法国的很多村庄里，在主日讲道或是日常讲道中，神甫们的抱怨越来越多。1763 年，在拉瓦勒，一位改革派教士遭到指控，因为他在圣维内朗堂区的一次布道中公

然挑衅了忏悔秘密的不可侵犯性。事实上，他只不过是为这一秘密进行了激烈的辩护，其中甚至谈到如果达米安在忏悔中将他那可怕的计划告知于他，他定会尽全力阻止他的犯罪行为，在不违背忏悔秘密的前提下，让达米安改变决定。对于听布道的人们来说，这些已经足够。听众中有一个小贵族，忙不迭地给主教写信，说：

> 尽管这位教士看起来并无异心，只是想要增强忏悔者们的信心，但是，主教大人，这样的布道还是不够慎重，我甚至认为他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所说的话与关于此事的决定背道而驰，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提及任何与弑君者有关的事。

这位改革派教士很快就会被迫远离他的堂区教民，因为他冒险涉及了一个领域，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有危险的领域，但凡与此相关的任何言论，都会为其人招致不幸。

有人潜心研究神学和教义教理，揭发那些在他们看来违背宗教信仰之事。还有些人更激进，或者说更居心叵测，因为他们会编造神甫们所说的坏话，用以报复这个在乡村说一不二的家伙，毕竟大家都知道，村民们并不总是心甘情愿地支持他的。于是，有了莱尼耶的故事，他是皮奈公国的一名本堂神甫，在刺杀发生几天之后被指控，因为他在将临期第二个礼拜日的主日讲道中说："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些预言家被关进了监狱，

至高无上的希律王①肆无忌惮地享用着臣民们的女人，通奸之人大多都是王公贵族，这成了如今最平常不过的事。”告密信有个无比天真的结尾：“我是从皮奈公国的税务官加亚大人和他的妻子那里得知此事的，他们俩也参加了当天的弥撒。”这一下，当局开始怀疑这件事了：那些话语过于激烈，与主日讲道素来的风格不符（尤其是在1757年1月17日）；另一方面，告密者本人并没有亲身聆听那次讲道。调查很快在村里展开，村民们分成两派，一部分村民有些迟疑地证实了此事，而大部分村民汇报的都是其他言论。不，本堂神甫莱尼耶根本没有在那个礼拜日提到过希律王，但他讲到了“所罗门和他无耻的举动，他从来没有谈及任何与宫廷有关的事”。[28] 事情到此为止。在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从各种消息之中，人们发现皮奈公国的司法官员们与本堂神甫展开了争论，于是整件事再无下文。”

在这个由各种报告、陈情书、检举信、匿名信和强烈的指控所组成的迷宫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分裂的民众，正是1757年的事件造成了他们的分裂。乡间的传闻表现出村民与领主、村民与神甫间的内部对抗，甚至表现出存在于政权拥护者内部的激烈怨恨。此处，警察们厌恶本堂神甫；彼处，神甫与庄园领主争斗不断。至于村民们，更是多种情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既有对镇压的恐惧，又有面对各类事件时的惊慌失措，

① 希律王（前73—前4），即希律大帝，又称大希律。罗马帝国属国犹太国国王，希律王朝的创始人。

也有冷漠（因为经常面对谋杀，所以变得麻木不仁），以及对君主政体依旧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尊重。无论是在书信中还是陈情书里，都能让人感受到对国王真实的热爱，人们其实是在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忠诚，哪怕有些方式是批判性的，甚至是对当前困境的沮丧抱怨。一封个人信件和代表图尔所有穷苦人民的集体意见，可以告诉我们民众的感受。尽管他们的话是动人的，但表达方式却是拙劣的，这只会加深我们这一印象：有些人还因优柔寡断而痛苦不堪。在普瓦捷的一位修女，觉得有必要给主教写信，用只言片语告诉他尽管自己远离国王，但还是觉得心绪纷乱，因为她觉得他是个“可怜的没有宗教信仰的陛下”。她承认自己不喜欢在修道院里，不喜欢被其他修女所影响，因为她们总是在批判国王和法院。她不知道该想些什么，于是在想“初修院里是不是隐藏了太多事情，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在这里并不快乐，而她们本来或许可以为国家出更多的力”。她提出以后再也不要对孩子们说“当修女真美好”。从这封特殊的信里可以看出修道院里的女人们是多么虔诚、天真而幼稚，但它同时也针砭了时弊，于是又很快表现出自责，因为作者本人居然胆大妄为地思考了国事。

1765 年，图尔的穷人们给国王呈上了一份请愿书，内容微妙而模糊，请愿书的开头表达着对君主的忠心，也夹杂着对公众氛围的非难。“依着所有民众的想法，好像所有人都觉得对国王没有了应有的尊重，要知道我们的国王还是个不错的君主，还称您为‘被喜爱者’呢！”接下来的话与开头全然不符：

所有人都吃不消了。枷锁过于沉重，我们承受不起，乡间光景极为惨淡，农民连汤都没得喝，高级神职人员们对此漠不关心，本堂神甫们自诩为高级神职人员甚至都不登上讲坛，除非为了私利而羞辱堂区教民，因为教民们拒绝支付本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赋税。

诚然，这封请愿书饱含忠诚，并将非难的矛头直指教会高层，但是大众对于君主尊重的缺失为当局敲响了警钟，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意味着图尔的穷人们根本不曾脱离这一批判性的阴暗之地。有一些态度更为鲜明的穷苦人，为自己的疾苦大声疾呼，控诉国王就是困境的始作俑者，祝愿国王和王后被“比达米安更胜一筹的人”挫骨扬灰。还有些被逮捕的流浪者在乞求施舍时受到羞辱，于是诅咒着让他们落入悲惨境地的人，祝愿他即刻死去并对他上次逃过一劫而感到遗憾……有些人大声疾呼只要“法兰西失去双眼”，就能让一切变得更加美好。

“有些东西失去了就不会再回来。”米歇尔·德·塞尔托在谈及16、17世纪的神秘主义者时如是说。在这里也同样适用：有些逝去的东西是再也不会回来的。此处指的是缺失、滥用、民众意识开始分化、撕裂。然而，还应该加上一句：“有些东西仍继续存在。”应当给它们命名。与国王的关系一直存在，只是它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有些矛盾。在1757年，无论如何人们心

里都只有他，无论他是失败的还是缺席的，无论他是否被爱戴着。然而，与国王的关系呈双向运动，关系与对关系的背叛共存，于是与国王的关系也便分化成诸多画面。正是这些画面微妙表露同时也创造着公共舆论，甚至，可以说是“关乎”政治的。长久以来，有什么事一直发生着（1757 年只是让它得以被强调），是它让人民涉足政治，与此同时，当局依旧焦虑不已，把公众舆论想象成摇摆不定之物，认为这些舆论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私利，或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民心早已不复当年，他们的政治思想越是遭到否定，就越是要崛起，哪怕有些笨拙，哪怕尚存犹豫。既然已经有些“居心不良者”将民众牵扯于政事之中（《教会新闻》已经做得很明显了），那就不能无视民众在其中历练出的自己的思想。

在仔细阅读了若利 · 德 · 弗勒里的遗赠之后，是时候提出一种假设，用以对比当前史学界的立场，他们认为 1757 年是一个决裂的时刻。在仔细认真地将恶性言论的内容与其制造者联系在一起之后，在将若利 · 德 · 弗勒里的遗赠作为行政甚至刑事文件进行研读之后，我们可以抛开这一观点，即遗赠所包含的话语是全新的。不要忘了，这些遗赠可谓这一领域的一手资料，而且在 1757 年之前，警方尚未展开规模如此之大的调查。无论是警方的报告还是巴士底狱中被关押者的审讯记录，都无法表达出与之相同的意图或是谋篇布局，以至于几乎没有历史学家会青睐这两种资料。这就是为什么若利 · 德 · 弗勒里的遗赠看起来很像对根本变化的反映。文献会让我们落入陷阱，资

料也可能具有欺骗性：不管怎样，它们都是戏剧性作品中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在阅读之前应该先思考这个舞台上隐藏着什么，又压抑了什么。

从检察长的遗赠中所读到的内容，并没有让笔者感到惊讶。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在提醒我们，这么多年来，在接二连三的政治动荡中，总有些什么在窃窃私语。当然，达米安的刺杀是一桩不可忽视的事件，因为它又一次激活了当时的想象，让国王之死的念头重新活跃起来。然而，弑君之举好像并没有在被写下、传唱或依然窃窃私语的舆论中，加入任何基础性或决定性的东西。让我们回顾一下 1748 年（亚琛和平）和 1749 年（逮捕斯图亚特王子），以及拒绝为冉森派教徒做临终圣事和《乌尼詹尼图斯谕旨》。1757 年 1 月 4 日于当局而言是个关键的日子，甚至可能完全颠覆他们的认识。于民众而言，这个倒霉的或者说期待已久的日子完完全全地印证了一个长久而秘密的认知，就算有人为国王哭泣，也还是有人在面对邻居的泪脸时露出漠然的神情。

逃过一劫的路易十五不得不面对“早已存在”的公众舆论，可以看到君主政体依然采用传统的而非改革创新的举措来应对民众言论。仔细研读检察长的手稿，它表现出政府机构已经完全陷入它自己制造的大量作品中：资料是支离破碎的，证据是明显缺失的，审判都没有下文，通信却无所不及，远比人们关心的某个不确定对象要多得多。怎么可能看不出若利·德·弗勒里所做的这一切首先揭开了一种幻象：存在一张由各个别有用心的团伙所构建的网络，就是他们影响着民众言论。事实上，

没有任何网络遭到摧毁，没有哪个阴谋因此败露。弗勒里的遗赠表现出，在各种让人惊奇的混乱与无序中，政府是多么忧心忡忡，可他却连看都不看一眼有影响的网络所绘制出的精确地图。唯一可见的影响就是恐惧：当局的、领主的、神甫的恐惧，还有工人的、农民的和流浪者们的恐惧……

突然爆发出的舆论，指出指责或仇恨君主的动机，其实它们早就在日常话题中得以构建起来，诸如司法不公、生活困苦、宗教等等。在他们的认识中，王室形象是双重的。国王是当代的人物，他应该为时代的艰辛负责，也应该为他在宗教、政治或个人生活中的言行而受到批判。同时，国王也是个值得纪念且神秘的人物，他迷失在那个巫术、预言和虚构出的神秘事件大行其道的时代记忆里。若即若离的国王，既现代又神秘，有时还会带上《启示录》般的色彩，尤其是在冉森派教徒们的描绘下。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之上，他应该对悲惨的时代（贫困与战争）负责，与之并存的是与他这样被神化的人物的传统关系形式；然而，这种关系形式在面对冉森派的质疑和意识的个体化时，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分崩离析了。

若利·德·弗勒里的遗赠证实了全民恐慌，当局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方式去影响公众舆论。这些资料以其独有的方式见证这些年所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在对各种事件、独立的话语或越辩越明的批判之中，与之相应的思想正在渐渐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观点的转换，也不意味着达米安事件刺激了意识的飞越。文献巧施诡计，让历史学家们掌握了“负面言论”，不

但要把言论置于长时段的历史中来解读，还要会根据包含这些言论的资料、特别是产生言论一切的一切来解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用这种方法进行解读，将会别有洞天。

1760—1775 年：逃跑的国王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巴士底狱及犯人们身上。相关文献虽汗牛充栋，笔者依然能从中读到别样的历史。关于社会的历史，其理性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把民众关进巴士底狱是公平合理的。或是关于一个国王的历史，尽管这违背他的意愿，但他还是每一天都想摆脱统治伊始时留给大众的印象，而让自己在未来成为一个普通男人（“从国王身上，我看到的就是一个普通男人，一个跟我一样的人，无论从自然属性上看还是从社会属性上看”，佩利斯里案），之后在一片冷漠中死去。

达米安之后：余波未了

政治上举步维艰。这可以从许多小事上感觉到，比如贵族们抱怨自己不受尊重，抱怨地位比他们低下的人不再顺从，好像他们觉察到某些社会组织已经与他们保持距离了。他们的传统权威好像不起作用了，因为他们直接请求警察总监为他们做

主。1758 年 7 月 4 日，阿特・德・沃内夫人控告了她的仆人们，于是他们被关了起来，几个月后刑满释放。她的信言辞激烈，可以感觉到他们那些人的惴惴不安：

> 我要向您控告我的两个仆人，他们是夫妻，因为他们蛮横无理且胆大包天，应该将他们严惩，以儆效尤，要让他们学会身为仆人的顺从和对主人的尊重。我记得曾经在埃罗先生（前任警察总监）当政时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他是这样回答我的：女人们之所以觉得不公平，是因为她们从未要求过我给予她们公平。要想解决问题，就只有让下级屈从于上级，这才是公平而明智的原则。[29]

德・沃内夫人喋喋不休的抗议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担忧。确实，很少会有人将这样一件发生在主仆之间的口角报告给这么高层的领导，这种事情通常都是被带到警长面前处理就行了。请求不经过审理就将人关押，表明日常规则的轻度失常，也可能让社会氛围更加动荡。德・塞纳克夫人也遇到了同样的事，那是在 1758 年 7 月 26 日。她抱怨的是圣维克托城堡的官员们，当时她正乘着马车从枫丹白露度假回来。那些城堡的“检查员们”根本没有给予夫人应有的尊重，他们不仅搜查了马车，还对她进行了搜身，这样的举动是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便将此事报告给了国王的首席秘书。

> 他们根本不在意我的名字和身份，阿努尔（她儿子）还跟他们大声重复了很多遍，他们全然不顾我的气愤，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与我的身份完全不符，也根本没必要做那些，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当阿努尔提醒他们我是谁时，他们以挑衅的语气回答说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向您描述那些检查员们是如何恣意羞辱我的。[30]

一位警察找到相关人员对质，那些检查员们不承认有过冒犯之举，只说他们当时检查了德·塞纳克夫人的马车并且请她下了车。卷宗的留白处，与大多数时候一样，写了一行小字以安排接下来的事情："抓紧审理此案。"在1758年，绝不能让这种事拖延下去。因为根本就没人知道，这种事情的后果到底会有多危险。

因为大量针对警方的言论，形势变得愈加复杂。从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1758至1760年间所承受的重压，正是这样的压力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就连警察内部也开始出现相互揭发，一些恶意中伤的信件不断出现在警局里。卡多·德·孔戴，巴士底狱的低级警阶狱警，给警察总监写了若干揭发同事的匿名信。被一名警探（阿马尔先生）告发后，他被判戴枷示众三日，外加九年苦役。此前，他被短暂监禁在巴士底狱，又被罗驰布吕纳警长就"恶意信件"进行审问，后者可谓是这方面的专家。在信中，他以极严肃且粗鲁的方式批评

着自己的同僚、警探以及下级警官们。他们似乎都古怪可疑：

鲁利耶：欺骗过贝里耶。

布古安：假发师之子，吹嘘着自己的密探身份，实际上却支持着辖区里的窑子。

库塔约：巴黎最混蛋的流氓。

比奥：他爸不过是一介脚夫。

维尔高丹：曾经被国王的侍卫驱赶。

迪罗谢：巴黎最大的皮条客。

穆特隆、迪努瓦、鲁塞尔曾经都是男仆。

费里以宗教之名带女孩子去他的房间卖淫。

马雷（著名的密探）：佣人。

埃默里（也很有名，尤其是在书商界）：私生子。

阿尔博拉：男仆。

这就是您的下属，服从您命令的那群人。[31]

为了杀一儆百，以儆效尤，对卡多·德·孔戴的处罚尤为严酷。警察总监贝尔坦对沙尔汀刑事长官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您还记不记得，几天前我对您和总检察长先生说的话：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巴黎城里，到处都充斥着匿名信、恐吓信、谣言或是恶意中伤的诽谤，就连最值得尊敬的人都无法幸免，于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杀一儆百，才能制止这种放

肆而有害的风气。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去做了。

所谓的杀一儆百真的有效吗？警方的报告似乎恰好给出了反证。报告记录了卡多·德·孔戴第一天戴着枷锁示众的情形：

> 上周三，孔戴被套上枷锁带到了新桥，他在那儿喝了半瓶红酒，看押他的人把他的帽子摘了下来放到他脚下的石子路上，很快帽子就被民众投的零钱装得满满的。第二天，在特拉瓦十字广场又再现了同样的情景。

一味地镇压通常只会引发讥讽和嘲弄，一旦镇压变得残酷，就会引来民怨沸腾：1758 年时千万不能口出狂言，莫里索·德拉莫特先生，旅馆接待处的看门人就因此而吃了大亏。他在位于圣日耳曼奥塞尔大街的一家饭馆吃饭时，言辞粗暴地谈论了一些事情，有点动怒，还不合时宜地说："本来呢，人们是应该爱戴君主，但是他也应该值得人爱戴呀。"[32]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观点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可还是有人将此事报告给了警察总监，也许就是饭店老板，一个名叫帕亚尔的男人——如果我们相信密探库塔约，就是那个被卡多称为"巴黎最混蛋的流氓"的人的话。于是莫里索·德拉莫特被捕了，他被转移到夏特莱监狱，还被怀疑掌握并制造侮辱性的小册子（尽管他一直否认这一点），因此他被巴黎法院判处绞刑，在格列夫广场行

刑，这次没有任何拖泥带水，于 9 月 11 日行刑。在舍农，警长对他进行审讯的记录中，莫里索表明了自己对君主的态度，他认为法国人“根本就不应该屈从于一个仅仅凭借出身就当上国王的人”。本着杀一儆百的原则，警方想要通过严惩达到效果：“要让那些该死的法国人闭嘴，他们简直不识抬举，以辱骂国王、大臣和法院为荣。心慈手软只会刺激并加剧犯罪。”严酷的镇压刺激并加剧民众的恶劣心情。格列夫广场行刑之日，人群蜂拥而至，巴尔比耶用了三页纸的篇幅来记录这件事，人们窃窃私语，甚至高声说：“谁也不能因为简单的几句话或几个字就将他人杀死。”这确实是那些年的关键所在，祸从口出，动辄性命不保。莫里索没有交代出任何同伙。他的行刑时间是傍晚五点，行刑前，他在绞刑架前做了 15 分钟祷告。巴尔比耶补充说：“据说从离开夏特莱监狱时起，他就请求人们为他祈祷，他说自己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33] 他是对的，接下来的几天，巴黎城内的各大广场上铺天盖地的煽动性檄文证明了他的话。此外，其他人还在不停诅咒国王和蓬帕杜夫人。抓捕、镇压和新一轮纷至沓来的匿名信让警方恐慌，也使得专横审判的数量持续增长。从那时起，不断有新的关于国王和他“该死的情妇”的阴谋被检举揭发，有人预言迎接侯爵夫人的将是血雨腥风和致命的毒药，因为她才是所有不幸的罪魁祸首，尤其要对造成民不聊生的七年战争负责。关押的命令引发强烈反抗，招致更多密札。游戏永无止境，但有些人所受的苦难比其他人要多得多，比如塔韦尼耶先生，在 1749 年因激进的思想而被捕，从

1750 年起便被转至圣玛格丽特监狱[34]。他的疯癫让他成为巴士底狱最后一名囚犯，直到它的大门于 1789 年 7 月 14 日被人民砸开。之前他想尽办法求得谅解以重获自由，在 1759 年时（没有选对好日子，然而被关在圣玛格丽特监狱里，他又怎能知晓法国的舆论形势），他寄出了数封冗长且措辞激烈的信件，抱怨着自己的处境，他想要报复，并且表达出内心最深切的愿望："我提倡废除密札，它们不应被用于出身良好的年轻人身上，而只应用于危害国家的重罪。"他已被卷入一起针对国王的阴谋，被控诈骗，他的处境只会更糟；被关进巴士底狱后，他已经一无所有，于是便在漫长的岁月里写了大量文章，他的文笔刚劲有力，有时呈现出病态（监狱耗尽了他的生气），他诅咒着父亲、母亲（我就是在这样狂躁的状态下出生的）和国王："令人吃惊的是，身负'被喜爱者'之名的路易十五，居然让他福泽之下的人民生活得如此悲惨，甚至还不如他养在森林里的野猪和小鹿，只不过他不能活生生地扒了这些人的皮罢了。"1775 年，他在一封短笺中指出："我觉得胸中有积液，而且失血过多。"1784 年，巴士底狱的监狱长请求批准他每天在室外放风半小时："这名囚犯太需要放风了，我认为自从他被关进巴士底狱以来就没离开过他的囚室，已经 25 年了。"1789 年，巴士底狱的大门被攻破了，在他面前敞开了，而他的精神已完全失常。

对氛围的描述并不是要放弃叙事口吻。可以肯定的是，巴士底狱的文献极为丰富，有些情节甚至惊心动魄，不能将它们

全部讲给读者听是极大的遗憾。然而，值得注意的首先是，要理解在1760年时，各种言论、文字、檄文、小册子已经开始具备独立的生命，尽管有时镇压会危及它们（绞刑从来都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是却从来不能将它们斩断。这一进程在那些年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着，其迅猛之势没有什么可以比拟：宫廷和城市都充斥着匿名且满怀恶意的文字，成为日常的现实；有人为此感到惋惜，还有人表示赞同。严酷的惩罚抵挡不住前进的潮流，政治已是全民皆可分享之事，谁都可以谈论与批评，无论地位高低。每个人都得到批准，可以说话和思考，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发表自己的看法。间或会有镇压，但从来都不能削弱什么，它会引发的不仅仅只是颠覆的新形式，更让人们的认知和思考水平不断优化。这一时期的独特之处在于争论的形式日益多样化，批判的精神更胜于所批判的内容本身。从那时起，路易十五渐渐变得不再重要，好像已经没有人关注他的地位或他那岌岌可危的身体状况，唯有政治成为让每个人都感兴趣的事。为了跟上这股潮流，我们需要关注重大公众事件，因为它们震撼着这一时期的法国。

战争："木偶般的军队用一系列仆役般的举动摧毁着我们的一切"

推翻普鲁士国王。这一计划使得法国必须维持并加强与维

也纳和彼得堡之间的联合，同时还要努力确保波兰的独立，波兰的国王与王后正是法国王太子妃的父母。让人吃惊的是，弗里得里希二世①攻打萨克森公国②，路易十五决定出兵支援后者，他承诺派出 24000 名精兵，然而内阁对此似乎并不上心。凡尔赛方面于 1757 年 5 月 1 日签订了第二份条约，明确了法国需履行的多项义务，但可获得的利益甚微。然而，路易十五依然寄希望于这样的条约有助于推翻普鲁士国王，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实现"法国与奥地利（天主教）的大陆共管，以便使荷兰依附于法国，这样法国就可以充分调动荷兰的军队和资源以对抗英格兰"，米歇尔·安托万在他关于路易十五的传记中如是说[35]。

召集军队的做法招致无数批评，到处张贴着声讨的檄文。24000 名法国人，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路易十五甚至都没有亲临出征现场给他们鼓劲，因为国王一刻都不能离开他的国家，于是他们在与德国联军共同作战时遭遇了两场惨痛的失败。第一次是 1757 年 11 月在罗斯巴赫迎战弗里得里希二世的军队，伤亡惨重，伤心与愤懑之情乍起（人们很快就知道自己的军队是多么无能，而指挥官们又是多么愚蠢）。第二次就更糟了，发生在 1758 年 6 月，战场在克雷菲尔德，又是一场败仗。整个军队士气低迷，因为这下所有人都认清了普鲁士军队强大的实力

① 弗里得里希二世（1712—1786 年），普鲁士第三代国王，又译腓特烈二世，史称腓特烈大王。

② 德意志境内的古代公国，公爵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帝侯之一。拿破仑在 1806 年将萨克森升格为王国。

和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面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协同的联军面前。于是所有人都将不满转向宫廷，认为它应该对惨败和耻辱负责，特别是当国王于1758年9月向法院颁布敕令，要求国内各个城市、郊区和乡镇无偿向国家提供捐赠时。或许公开讨论这个话题并不明智，可关于这一点并没有过去的经验可循；人们开始猛烈抨击，给国王写无数匿名信。人们不再沉默。在写给国王的信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膜拜（只是感情不再似以往那般尊敬），同时，人们也会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告诉国王他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国王已变得如此“疏离”，这在写信人的语气中可以感觉得到：法学学士图什大人因写信给国王而被捕[36]。尽管他的文笔洋洋洒洒但不乏小心谨慎：“我知道一个将死之人是不配与伟大的国王交谈或是给他写信的，还需要一张金口才能完成此项任务。”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表达自己的想法：

> 如果说所有神圣而人道的法律都得到了严格的遵从，那么，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外省，怎么还会听到受压迫者以及破产者们的悲惨呼号？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几近失望而无法重新振作，与其在光天化日之下靠乞讨为生，他们宁愿砸锅卖铁摧毁自己的国家。混乱、怒火已侵袭了您的军队，缺衣少食、生活困顿是当前最自然的图景……啊！大人，我不说了，我害怕再说下去您要发怒了，可是如果我保持沉默，又意味着背叛。

事情很清楚，矛盾出现了：什么都不说意味着背叛，说了就是国王眼里的罪犯。基于这样的经验教训，沉默在那些年中变得不再可能，正是沉默让文字和笔尖充满愤怒。

但凡涉及战争和时代困境，无论是小说家还是其他行业的人好像都没有被巴士底狱束缚。然而，巴士底狱就连百岁老人都不放过：时年 109 岁的小说家康斯坦[37]，始终保持着激情，1760 年 2 月他写道：

> 在这个王国里，王室掌控一切，有豪华的宫殿、巨亩森林和最纯种的猎犬，此外还有各大官员替他们分忧，有各位朝臣供他们取乐，又肥又胖，总之很开心。然而，与此同时，乡野间却是另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人们看到的只有苍白且了无生气的行尸走肉。宫廷之中，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嬉笑打闹，然而乡野间，人生下来则是注定忍饥挨饿。

他很清楚自己将会去往巴士底狱。果然，没过多久，他就“梦想成真”了，但鉴于他年事已高，当年 4 月他就被释放了。

对镇压的无视，让人们获得了最大的勇气。皮隆，市政厅一位负责收定期租金的工作人员，1761 年他抱怨沉重的赋税，痛斥国王“恨不得将尚在母亲腹中的婴儿都给生吞活剥了”[38]。身边的人想让他闭嘴，却没有成功，因为皮隆气愤

地回答说："这会让我怎样？大不了就是被关入地牢，这样更好，就不会有人说我是个混蛋了。"所有人都知道，对国王出言不逊是会受到惩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耻辱。区别在于——尽管很少会被表达出来——这是国王与其臣民之间关系的重要转变。尽管巴士底狱是一座监狱，但并非异教徒的聚居地，也不仅仅只有皮隆一个人这样想：坏话只在国王看来才是一桩罪过……除了他以外，还有很多人会前往巴士底狱或夏朗通，只因反对这场"愚蠢"的战争以及这位"再也不能给臣民带来幸福"的国王。的确，国王有些心不在焉了，在最具君主制意义的行动（战争）中，他都逃避着自己的责任，也就只能任由他的臣民指责了。

1762 年：驱逐耶稣会士

它被鼓吹成一场胜利：1761 年 4 月，耶稣会被起诉。拉瓦莱特神父，马提尼克岛教会的最高负责人与米蒂地区的批发商们保持着大规模的商品贸易。他破产了，债权人便向法院上诉，要求赔偿。5 月 8 日，巴黎法院判处耶稣会偿还欠款。几个月里，民众蜂拥而至，前往法院聆听辩护。他们毫不遮掩自己的开心，拍着手嘲弄着几位出庭的耶稣会士。法庭辩论中，法官们批评耶稣会的身份地位。经过长时间的商议，法院终于裁定了两项判决：26 册由耶稣会士所写的书籍被焚烧；国王的子民

们不得再前往耶稣会的学校学习。整个巴黎陷入一片纷乱嘈杂中，1761 年 8 月 6 日的两项判决被心急的读者们争相阅读。巴尔比耶这样描述着当时的情形：印刷厂前门庭若市，报贩们手中没有足够的报纸，但客户们却希望能够人手一份。每个夜晚，印刷工人们都加班加点，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公众都还记得，当年耶稣会士是如何仇视冉森派的。9 日是礼拜天，人们排着队，只为一睹判决或是听别人念出它的内容。尽管这是法院的决定，公众普遍感到高兴，但还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有失正派，而且过多谈论此事会陷入危险：不管立场如何。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耶稣会的人都会受到同样的惩罚。这一事件刺激着围绕达米安刺杀事件所展开的无数次讨论；又一次，阴谋家们，或者说那些知道危及国王性命的消息的人都遭到了逮捕。一位名叫雅克·兰盖的修道院长，自称耶稣会士，大声宣称自己是 1757 年刺杀事件的同谋，支持弑君谋反的理念。他将于 1762 年 12 月 29 日被绞死[39]。

驱逐耶稣会士解放了言论，从那时起，国王之死和对达米安的回忆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脑海中，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

有人宣称“达米安是位圣人”，还有人说“如果他们确信绞死一位圣人，未来国王会遭受跟达米安一样的痛苦，那么他们定会绞死圣人”。耶稣会士离去了，人们以为可以抬起头，以同样的方式羞辱上帝和国王，因为这二者在漫长的岁月里深受他们的不良影响。耶稣会士留下的空位成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现实已经不再重要，哪怕那是事实：书籍被公开焚

毁，学校被关闭，耶稣会士收拾着行囊。整个事件中突然彰显出另一层含义：这是法院的胜利，国王与罗马教廷终于合二为一，上帝回报了他的信徒，人们长久以来坚持的信念得到证实，这是公众精神的胜利。耶稣会留下的空间很快就被一股激情所填满，它甚至超越了争论和驱逐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更应该看到一些事，被关押者的文献一直在表现的事。镇压的对象依然是匿名信、对蓬帕杜夫人的议论、一些想入非非者以及未来的达米安们，这与过去那些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然而，如果我们靠得更近一些去观察就会发现，警方所追踪的不再是行动和文字，而是一种态度，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生动而活跃的想象力"，因为正是这种想象力强化了民众的反抗精神。话说得很明白了：他们追踪着沸腾的激情，然而调查越持续深入，激情就越发狂热。仅仅只需一个例子就足以让我们一目了然，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例子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主人公名叫皮埃尔·戴里维耶，1762 年 11 月 26 日被密探达拉耶逮捕，因为他在咖啡馆里大放厥词，说了许多对政府和官员们不利的话[40]。毫无疑问，皮埃尔说了很多恶性言论，人们不知道他的身份，也许他曾经是"最近一场战争中负责食物供给的众多人员之一"，这几乎可以肯定。无论如何，他不停抨击政府的所有军事行动，也丝毫不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应该把他作为杀一儆百的例子，关于他，罗驰布吕纳警长和圣-弗洛朗坦公爵交换着意见。"如果不严惩他，"公爵写道，"就会纵容越来越多的反抗者，毕竟他们现在的队伍已经很庞大了。"逮捕他之

前的调查记录已经很清楚："长期以来，这家伙操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激进的狂热分子，自以为学识渊博，充满理性，比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强太多，正是这样的想法使得他无论对君主还是对政府都没有尽到责任。"

这是一场关于狂热与推理的审判，不仅仅在这里，还会出现在未来的许多审判中：事物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立场在不知不觉中转移。批判精神日益公开，这一点确凿无疑，因为警方的反应是首先归咎于"理性"。

1763—1775 年："愿上帝保佑又聋、又瞎、又哑的国王"（语出 1768 年物价飞涨时张贴的檄文）

1762 年，这一年《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相继出版，同年，巴绍蒙开始出版他的《日记》，这本日记一直到 1779 年。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得以出版的回忆录，虽然在"日记"的统一名头下，但却是由三位不同的作者共同完成的：巴绍蒙出版了五卷本；迈罗贝尔编写了十卷，直至他因为饱受法院的斥责，于 1779 年自杀；穆夫勒·当热维尔律师——因写作《路易十五的私生活》而闻名法国——编写了剩余部分[41]。《日记》开篇就讲到对耶稣会士的驱逐，巴绍蒙本人对趣闻轶事、社会新闻和有趣的细节极感兴趣，乐于描绘事物滑稽、混乱且有趣的一面。他记下了传闻、辱骂之辞，对文学作品的滑稽模仿和对在逃的

耶稣会士的讽刺，他的作品中满是简短的故事，传播着谣言和激动人心的事件。他乐于强调公众的激情，而这正是一个被战争拖得摇摇欲坠的政府所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他的文字透露出对言论自由的喜悦，无论是在沙龙里、书本中，还是公园的长凳上，都能听到自由的言论。巴绍蒙热烈欢迎思想的盛宴，从他颇受好评的日记中可以感受到作者溢于言表的激动与振奋。它们怀着热切的渴望，向公众展现出这样的形象：激情四射亦不乏批判。日记没有捏造任何事实，而是于混乱中重塑勃勃生机，在失望与希望之间，正是它激发着思想。国王很近，国王很远，国王很近。

或许，这根本不是将国王骑马雕像安放于杜伊勒里宫前正对着平转桥的广场上的最佳时机。这件事发生在 1763 年 2 月。因为整个过程需要三天时间，所以大批群众亲眼目睹了这一声势浩大的工程。他们中有嘲笑者、反对者，当然还有大量的“苍蝇”一如既往地扮演着他们的角色。有人高声谈论着让国王小心一点，嘲笑着国王和他的马，这些人都会被送进巴士底狱关上几个月。国王和法院之间的气氛又一次紧张起来，事关新的税务，对此人们知之甚少。刻意保守的秘密让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人们谈论着国王御临法院时的劝诫。1763 年 5 月 31 日，国王御临巴黎最高法院，如此庄重的仪式吸引了大批民众，却不曾听到任何人像过去那样高喊“国王万岁！”。公众几乎永远都不会知道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其实，取消旧赋税只是为了增加新的征税名目。公众对当局的新举措十分不满，认为这是

不公平的，于是，他们强烈赞同法院颁布的法令，指出：这些强制性的举措“会颠覆国家所有基本法”[42]。除此之外，法院还着手准备资料以批判财务情况。此时的法国正为自己的财政状态担忧不已，尤其是围绕预算、支出和收入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早在1759年，一位名叫罗多夫·埃费·德·西布尔的瑞士人就被国王下令逮捕并关进了巴士底狱[43]，罪名是起草了“关于财政的小册子”。他在巴黎散发着一份名为《法兰西王国整体财务及秘密现状（1759）》的手稿副本。从那时起直到1767年，他先后被关押于巴士底狱、夏特莱和比塞特雷。他的观点有点像诗，有点像悲剧，打破了沉默，深入君主制最隐秘的地方之一。仅仅看看他的手稿目录，就知道他有多么大胆。目录如下：

国王的正常收入

总收入

国王的正常开支情况

支出概览

收支平衡

某一特定时期的国家收入

收入概览

被终身让渡和指定的国家收入

1755年以来法国的异常情况，

主要指与英国的七年战争以及其他情况。

这份记录只包含开支和收入的详细情况，字里行间没有任何注释。即便如此，它本身就已包含了太多内容。

那么 1763 年的这本小册子到底讲了什么，使得它可以“无缘无故”地在民间广泛流传？它被命名为《国家财富》，难道就只是简单讲述看似公平的赋税吗？它出自一位法院推事之手，作者侥幸逃脱巴士底狱的厄运，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他很高兴能够思考如此严肃而重要的主题，在此之前，是根本没有机会涉足于此的。“人们甚至都在讨论它，希望能得以实行。”巴尔比耶如是说。巴绍蒙则以他的方式记录下同样狂热的民众，在当时的境况下居然有人可以告诉他们，他们最想知道的事情，那就是赋税。

在舆论的交锋中，我们发现底层民众终于开始表达了。从可以收集到的并不高雅的言论中，我们可以读到立场不同的各种观点；所使用的语气与此前单纯的咒骂，或是对糟糕的、不忠于宗教的、放荡的国王的斥责都有很大区别。安娜·阿波琳娜·约瑟夫·舍瓦利耶，她是兰斯的烟草零售商，丈夫名叫尼古拉·勒纳尔，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公众在判断公共事务时的能力[44]。这种迅速普及的能力让警务人员和警察总监大吃一惊，毕竟长久以来，他们以为只有他们和那些大人物们才具备这样的能力，可现在却发现（或是从一些片段中透露出来）最普通的人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勒纳尔夫人于 1765 年 12 月被加布里埃尔·皮奥举报，后者是兰斯城里的一位办事员。他说自

己听到勒纳尔夫人在她的小店里说了些“干预国家及宗教事务的话”。检举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女人擅自分析的能力。她看过新闻，然后说“王太子身体不好，其实与其让王太子死去，倒不如让国王死了算了。因为一旦王太子继位，他将会把耶稣会士重新召回法国。她还说，国王和法院都是无神论者”。第二天，尽管她的丈夫很努力地想让她闭嘴，她还是说了些其他消息，并明确指出王太子之所以一直身体不好，是因为“被法院”下了毒。短短几句话却意味无穷：与其让国王活着，不如让王太子活着，授予国王和法院无神论者的称号，想要重新召回耶稣会士，复现下毒的幽灵，让人回忆起当年那些毒药猖獗的日子……

罗驰布吕纳警长同以往一样，前往巴士底狱录口供。勒纳尔夫人急切地（也谨慎地）为自己辩解，讲述着她非同寻常且略显古怪地爱戴国王的方式，这便勾勒出国王与其臣民间的微妙关系。的确，她全身心地爱戴国王，而且也知道应该将这种爱戴体现在言语中（她不断重复着人们想要听到她说的话：仅仅爱戴国王是不够的，还要落实在一言一行中）；每个清晨和傍晚，她都不忘为他祈祷，但这并不妨碍她担忧王太子的身体健康，因为她知道王太子的“胸腔里长了个肿包，一会儿空一会儿满”。她还解释说她完全不理解，怎么“之前在宫廷中如此得宠的耶稣会，突然间就成了耻辱的代名词”，而且还被所有人遗忘了。她坚持对国王的忠诚，指责办事员肆意夸大自己的话，并用一则故事作为结尾，她说，她想起曾经读过的一则故事，

苏珊被两位老人指控为别人的姘头，可是达尼埃尔却证明了她的清白。因为她的毫不退让，所以没有得到宽恕。她在巴士底狱关押了很久，丈夫疯了，她本人也得了疝气。1767 年，她请求将她和丈夫送往总医院接受治疗，让他们在最后的日子里能够“生活在一起”，“以结束他们可悲的一生并缓解身体上的痛苦”。

当然，人们会发现勒纳尔之妻的话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她忠诚于国王的辩解牵强且混乱。如果她对国王忠心不二，又怎会断定他是个无神论者。此外，面对罗驰布吕纳警长，需要表现得很“坚决”，并尽可能证明自己无罪。无论如何，勒纳尔之妻公然支持耶稣会士，觉察到国王与法院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她的头脑中还萦绕着过去与谋杀及毒药相关的幽灵。她胆敢将责任归咎于无神论并以此猛烈抨击国王和法院，君主和法官们对此极为敏感，拉巴尔骑士的故事足以证明这一点。拉巴尔出资支持编撰编年史，他的事件曾经激怒了伏尔泰：鉴于他对宗教的亵渎，因渎圣罪（他曾嘲讽了一个带有耶稣像的十字架）被判于 1766 年 9 月 1 日在阿布维尔斩首，最高法院在审核之后维持了原判[45]。众所周知，指控他的罪证都是从民众中获取的，这些人从来不被允许表达真实的想法，却勒令他们宣称对不信教所感到的恐惧。我们知道伏尔泰也曾大声疾呼：“与最高法院和轮值法院①对待冉森派的做法相比，宗教裁判所真是小巫见

① 法国旧制度时期的法院，因为各大法院轮流前来进行审案而获此名。

大巫……我们好不容易摆脱了狐狸却又陷入狼群之中。”[46] 在这里，伏尔泰把耶稣会和冉森派相提并论，他继续指责公众舆论，不幸的是，他没有过多注意到公众舆论引起的方式。

从 1764 到 1775 年，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包括 1768 年的粮食短缺，路易十五与杜巴里夫人的丑闻，莫普撤销法院，国王逝世。有一位记录者，是个有信仰的传统人士，其实是冉森派教徒，恐慌地见证着这一切：他就是书商阿尔迪，其手稿被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里，名为《我的消遣》[47]。他对街头的日常活动观察细致入微，详细记录了张贴于首都各处的檄文，讲述着街头发生的一幕幕，以及群众伴随着各类事件和公开行刑所表现出的态度。他的文笔与巴绍蒙风格迥异，他哀叹暴力与无序，狂热与激荡，有时甚至可以感觉到战栗。然而，他是法院的忠实拥护者，热切投身于与之相关的斗争中。当莫普于 1771 年发动政变时，尽管他依然尊重国王却感到无限悲伤。当讨伐性的文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檄文中时，当巴黎沉浸在对莫普的不满之中时，阿尔迪写道：

> 在巴黎各处找到的檄文足以证明全城的情绪有多么激愤，人们多么希望出现一个代表光明与和平的天使，让我们的君主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当前的万丈深渊，他马上就要跌落其中却并不自知，还以为自己的权威在不断增强。[48]

当王室忙于组织各种庆典，以为这样就可以让臣民们沉浸于欢

乐中时，深渊在无限扩展着，于是阿尔迪满怀悲伤地讲述刻意营造出来的虚假的集体赞同：

> 1772年3月1日。这一天是封斋前的星期日，人们在圣安托万镇上目睹了……一场盛大的化装舞会，参与者甚众，其中既有前来履行义务的演员，也有些举止荒诞的人，后者基本都受雇于警方。这一切险些让人相信，有人给了下等人足够多的金钱和衣物，他们才能如此开心地装扮成各种样子。我们确信这其中一定有人就是冲着钱来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有人给了他们钱。我们也同样确信，所有的面具在舞会开始前都堆积在警察局长公寓对面的大街上。然而，为什么要迫使这些人以这种姿态出现或是被检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据说几个化了装的人将会……出现在掌玺大臣和警察总监的住所周围，就是在新圣奥古斯汀街上，并上演一出戏。我们不能假设，这是大臣，甚至就是掌玺大臣莫普本人的意思，难道他想用这样的举动来告诉国王，美丽的巴黎城的市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像在1772年封斋的日子里一样欢乐，并赞同君主。尽管还有那么多国王的臣民依然在忍受着灾难性的革命所带来的痛苦，革命正透过王国里法官们的尸体显现出来？[49]

化装舞会根本就没有用；正如阿尔迪所描述的，还有那么

多人在忍受着缺衣少食和莫普的决定，他从公众身边夺走了他们赖以支持的法官们。巴黎在颤抖，对莫普的仇恨一发不可收拾，每个人，无论是手工艺者还是贵族，都在谈论历史和权利。女人也参与进来，就跟以往发生灾难时一样，因为在灾难中她们总能预感到重大的反常。檄文四处散播，有些是反对莫普的，也有些是他的支持者所写的[50]。法国重回集权统治，没有了法院作为传统的中间人，这让教士们弹冠相庆。教士们欢欣鼓舞，耶稣会士们没有片刻犹豫就回来了。然而，泛滥的小册子充斥着整个法国。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在巴黎城展开了大肆搜捕，甚至挨家挨户地搜查。所有拿过檄文的人都面临被严格处罚的风险。

当然，所有心惊肉跳的事都可以从巴士底狱的档案中找到，因为那里关押着太多人，充斥着不计其数的档案资料。仔细阅读被捕者的情况、他们的动机和所说的煽动性话语，会发现争论的形式发生了改变，甚至改变的是实质。当然，我们也发现一些天真的人，迫不及待地告发邻居或是身边的人，因为他们辱骂了国王。有一个年轻的裁缝，名叫路易·拉波特，就是这样的人。不久之前，他刚刚从比塞特雷医院的穷人院出来，他暗恋亨利埃特，一位修女，是高级修女的女仆[51]。因为遭到对方的拒绝，他决定毁了她。于是，他以修女的名义写了一封辱骂国王的信，寄给了国务委员们。真相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他被关进了巴士底狱，于是他又写信给警察总监沙尔汀，这封信写得如此打动人心，我实在不忍心让它沉默：

> 如果我不能再度拥有她（指亨利埃特），我宁愿自行了断或者让人把我绞死。没有她的世界对我而言实在太可怕了，我感觉大地在我脚下震颤，我宁愿走上天堂或是走下地狱，只为看看我的灵魂是否还在。

然而，在他的谵妄中，他坚持说之所以写一封辱骂国王的信，是因为他“看到国王执政如此不公平而心生愤懑，因为他居然取缔了比他更英明的法院”。这则关于拉波特的故事饱含激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有些像妄想者托兰。那些年间，拉波特们和托兰们将他们的信念、爱情以及对国王的失望之情以一种哀婉动人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告诉人们，国王的出现在他们的一生中是多么的重要，让他们得以将自己的故事与之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的故事都是私人的、可怜的、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悲情的。

然而，从1768年到1775年，被关押者的情况有所改变：基本都是有着进步思想的人，他们当然也批判国王，但批判之中夹杂着高亢的请愿声，“国家应给予人民自由说话和书写的权利”。用词发生了改变，对政治的思考与日俱进；有人甚至提出反对专制政府，认为国王的权力不应来自上帝而应该是国内人民一致同意的。时不时还有人胆大包天地说臣民有权让国王公开账目。

最有意思的还在于人们的意愿，亦称之为权利，即了解当

前所发生的事情并对其发表个人意见。这时的民众可能已不在意国王形象（它着实不受人尊重），当务之急是要坚持话语，这不仅仅是合法之举，更是一项永远有效的权利。修道院长伊阿勒事件，恰到好处地反映出路易十五统治期内舆论实质的转变。他于 1771 年 4 月 7 日被捕，罪名是“在咖啡馆里说了冒犯国王的话”。[52] 事实上，修道院长伊阿勒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问题不在那儿，而是在他的日期为 1771 年 4 月 21 日的审讯记录中提出的一个问题。警察问他是如何将对国王的爱戴与一种奇怪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将两种不可调和的立场放在了一起：在 1771 年，爱戴国王与了解各种情况是矛盾的：

> 这是在问他，他是不是爱戴国王，他是不是并没有带着那些奇怪的思想与城中的各色人等交流，之后又前往咖啡馆，满怀激情地将他所知道的不知真假的消息传播出去，根本不曾想过身为国王的臣民，他本不该用那些新闻来刺激人们的思想。

我们知道，修道院长的回答是微妙的。他语气和蔼地谈到他所认为的国王与宫廷之间的区别，承认自己喜欢读国外的报纸（我们都知道它们所包含的内容），为的是从中找到不同法院的劝谏，他大声疾呼“每个人都应该真心赞美国王，抱怨宫廷”。修道院长的兄弟在写给沙尔汀的请愿书说得更加清楚：他并未觉得人们拥有谈论时事的自由有何不妥。于是，他不禁想

问，这种态度为什么会被横加指责。他还狡黠地补充说："除非您觉得这样的人应当被判有罪：当他读到在国外报纸上经常出现的决议和劝谏时，他会说写得真好。"于是，争论存在一个新的领域之中，而此时斗争尚在不甚明确的地方展开：对公众来说，信息和对信息的判断都是寻常之举；但是对于警方和君主制来说，获得信息就等于背叛。

此后，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公众舆论在此时正式产生，它所要求的不是对象，不是内容，而仅仅只是自身的存在。这可能并不严谨：长久以来，笔者就想通过这本书表现出个体对事件的思考，并从具体事实出发，获得个体舆论的只言片语。现在，他们关心的是君主政体，而将国王置于一旁，因为他们认为国王是缺席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打破了长久以来君主制对他们的禁锢，认为说话不仅仅是他们的能力，更应该是一项亟待确立的合法权利。秘密再无生存的空间：无论是国王还是议员们都无权再使民众们因为间谍的监视而不得不窃窃私语或保持沉默。消除秘密，让言论合法存在，尤其是在涉及公共事务时，这是人们不断提出的诉求。毫无疑问，这种态度意味着巨大的转变，尤其是对于那些沾沾自喜自以为掌握着某个只能说与国王听的秘密的人来说——或许在那个年代里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公众都已出发，前往一个可以让他们拥有不同形式的身份之地。在那里新的情况层出不穷。意识所产生的差距为所有坚持合法性的人提供了新的可能。这难道不是隆巴尔先生想要说的吗？他是巴黎法院前检察长的一名书记员，于 1772 年 3 月

14 日被再次关进巴士底狱，罪名是传播小册子并且身为夏蒂埃的朋友，后者是一个“喜欢所有新鲜事物”的执达员。[53] 他被塞罗警长拘捕，几天后用措辞激烈的信为自己辩解：

> 凭什么指控我？就因为我说了这些话。啊！我的大人，谁没说过这些话？我不知道谁在目睹这样一桩异乎寻常的事件（指莫普的改革）时能够无动于衷。况且，我说什么了？不过是几句含糊不清的话，不会对政府的政策有任何影响，这些话就跟许多其他的话一样，很快就会消逝在它们能够流动的狭窄空间里。

情况一目了然：怎样才能不思考？如何看待那些不思考的人？凭什么以为思考的实质就是颠覆性的，是有威胁的，甚至是有影响的？因为它很快就会消失在其他思想里。1772 年，公众思想极为活跃，舆论的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初现雏形。我们尚未读到米歇尔·安托万在他最近关于路易十五的著作中所定义的“公众舆论”，在题为“舆论的幻觉”部分里，他写道：“路易十五治下，所谓的‘公众舆论’首先指的是巴黎人的情绪。首都是宫廷和政府的瞭望台，也是各种谎言和大话的聚集地。”[54] 1772 年，巴黎人的情绪于“谎言”和“大话”之中，有时也会迸发出不少才华……

不管是不是情绪，巴黎人似乎都对法院所面临的新情况充满担忧，由此引发的烦恼让他们在那个时候不再关心路易十五

的病情，尽管政府费尽心思想让他们为国王祈祷，以表达他们对于国王的热爱。他们并非没有时间，只是不愿意在自己并不关心的事情上浪费感情。事实上，阿尔迪的叙述显得很伤心，因为他发现巴黎人在得知国王于1774年5月10日去世的消息时，所表现出的仇恨实在是有失体面，“实在太过分了”。稍后，莫普被流放，这一消息却引发了抑制不住的喜悦。然而，到了1775年春天又有了新的烦恼：面包价格飞涨，国内民怨沸腾，导致1775年7月的面粉战。这一年，怒气冲冲的舆论转向了新的目标。

在监狱里

所有人都知道，巴士底狱可不是什么好地方：长期关押所摧毁的不只是人的身体，还有精神。更何况，也没有任何规定来对监禁进行管理，被监禁者的处境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局势以及巴士底狱的监狱长与警方高层间的对话。探访、通信、干净的床铺、大平台上的放风，还有重获自由的时间，都取决于他们的对话。

最终，还是由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来决定是否给他们自由或是将他们流放，尤其是在大动荡时期，诸如发生冉森派事件及达米安刺杀事件时。有些时候，国王通过咨询刑事长官、警察总监甚至首席国务秘书，来决定是否释放囚犯。在监狱的日子

里，也让狱警们得以了解他们所看押的罪犯：他是否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悔过；他多大了；他的亲朋好友们是否为他奔走；他所属堂区的本堂神甫们的介入能否起到重要作用。更让人吃惊的是，记录可以明确显示出惩罚的程度：狱警在有些报告中会明确指出某人已经受到了“很好的惩罚”，他可以面对一个全新的未来。“很好的惩罚”是一个主观标准，或许是出于对阴暗潮湿的囚室里饱受病痛折磨者的怜悯甚至是同情。但有时也可能出于别的原因，比如说意识到对于某些人来说，巴士底狱实在是过于黑暗了，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只不过是被人用来杀一儆百而已。

“遏制思想”“消灭反叛者”“给下等人树个典型”，这些都是警方的理由，我们早就强调过了，警方更关心特定事件的细节，而不去分析整体局势，毕竟后者可能包含更宽泛的缘由。证据通常都是站不住脚的，当局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宁愿把那些疑似毒害政治氛围的人都关起来，也不愿他们逍遥于围墙之外。他们对被控者的观察通常仅停留在个人的所作所为上，却从来不曾将他的行为放在社会背景里进行思考，而社会背景恰恰可能是它的成因。而且，罪犯们还经常被冠以“魔鬼”或“疯子”的头衔：说了不当之言，梦想着国王死去，随身携带着小册子，这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唯有“疯癫”或魔鬼般的恶毒可以解释。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警方的态度渐渐转变，原因在于民众言论的泛滥、激情澎湃的批判精神，以及对说国王坏话者的过度抓捕，正是这样的抓捕反而使他们的成长如雨后

春笋般势不可挡。警长们（尤以罗驰布吕纳为代表）和各大监狱的管理者们都发现再将他们指认为魔鬼或是疯子已不足以诠释反抗者们的思想，因为他们总是迫不及待且滔滔不绝地阐述着自己对时事的看法。1764 年，一个名叫波凯[55]的糖果商，住在巴黎某个连同家具一起出租的房间里，在被一只“苍蝇”跟踪了一整天之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是个充满好奇的人，“总是在城里游荡，对每一件微小的事情都充满兴趣”（看到这里并没有什么异常）；他时不时会在旅馆门前停下脚步，这时他就会说自己有时会给国王写信，因为他知道某个与蓬帕杜侯爵夫人有关的秘密，那是他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旅行时听来的。这些话把他带进了巴士底狱，罗驰布吕纳警长在对他进行例行审讯之后说他“脑中充满幻想”。此后，他被关进了夏朗通监狱，并再一次受到罗驰布吕纳警长的审讯，后者在卷宗上批注道：“他镇定的胡说八道让我惊奇不已。”这句话至关重要：在这些被事件所激起的思想里，究竟哪些是理智的，哪些是胡说八道？一旦人们从囚犯们身上找到沉着冷静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时，仅用“疯狂”一词就不足以解释一切了。尽管当局被模糊的不确定性所吸引，但却不想对此有更深入的了解。

然而，更让人吃惊的是：1757 到 1765 年，高墙之内，不计其数的人在专心致志地工作着，他们不断向狱警申请纸笔，而这两样东西在当时都是定量配给的。当局认为，写作是危险的。但是囚犯们认为写作可以缓解病痛和内心的慌乱，于是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写冗长的信件、回忆录，推演数学或几何

的算法，草拟用于改革的政治方案，以展望美好的未来。还有一些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写下长篇大论，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申辩，这些信件在表达新思想的同时，也依旧尊重君主政体。许多人都建议优化预算，重新安排国家的财政开支，草拟可行的小型合约。在阴暗的监狱里，他们思考着自己被关进监狱的原因，在尚不明晰的概念体系中历练精神和勇气，用尽全力与秘密和机密抗争。有些人最终成功地将自己的作品为人所知，甚至还出版了：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博蒙院长[56]，他写了十余部手稿，并成功写就一篇长达 272 页的重要作品，题为《国家监狱中被压迫的法国人的叫喊与呻吟》(*Les Cris et les Gémissements du Français opprimé dans les prisons d'Etat*)，文中批判了大臣、警察总监和监狱管理者们，被呈给了路易十六。这部写于 1778 年的手稿，很快就得到了出版并引起了强烈反响。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对旧制度下人们在监狱里的工作及其对公众的影响进行深入详尽的研究。这是内心信念、文学或是科学和不陷入疯狂的需求的产物。从萨德[57]到博马舍，其中还包括许许多多不知名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激情并不亚于高墙之外的人们，而高墙之外的激情正是警方想要设法根除的。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还能看到监禁生活的凄苦，以及对他们的精神造成的深重且无法挽回的影响：有些囚犯着实难以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从他们的笔下可以看到，作品结构混乱，时不时插入激烈混乱的语句，全篇看起来都像是哀嚎。随着岁

月的变迁，有些文本变得难以辨认，间或有着难以理解的神秘符号，更有无法理解的图画甚至是不明就里的乐谱。每个人出于不同的理由而做出的情绪化表达，都收到了警方的简单批注（“他神经错乱”“他脑子有病”“他血脉偾张，精神癫狂”），正是这些批注让受害者始终待在监狱里，并在逮捕之时就被诊断为精神失常。

与此同时，高墙之外，人们所要求的也是“谈论或书写国家大事的权利”。

结　论

他们说，我写。我所做的就是分析导致这些言论出现的不连贯的动机，给这些言论建立框架并确立其合法性。这些言论有的合乎逻辑，有的自相矛盾，有的是陈词滥调，有的要突破界限，我都对它们一视同仁。我并不想围绕言论构建任何一种整体话语，而只是想攫取某些突显意义的重要时刻，将目光落在最激烈的表达上，并勾勒出它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的印迹。

我目睹了空间和时间如何塑造言论，看到它被绞扭成各种表达形式，紧紧抓住瞬间和难以消磨的知情的愿望。我不去费心猜测言论的真假，只是去呈现使它得以形成的似是而非的情形如何赋予它强大的力量和足够的变数，以至于总是令那些关注它的人忧心忡忡。我将当局和个人的担忧交织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分辨出构成真相的片断。我不曾见证任何一个观点的诞生，亦不试图对其进行考量。我远离对言论追根溯源的过于封闭性的研究（虽然这有很大风险）。我把词语浇注在解释的网络中，那里产生的事件及“思想活动”勾勒出各种可辨认的形象。我从中（有时候）可以读到各种策略，对典范王权的赞同伴随着诡计与挑战。我看到呵斥与感叹有时自成一体，与听来或是打探到的新闻、来自他人的信息或来自君主政府本身的刻板的讲话，以及为了结盟举行的仪式的信息保持距离。我看到一些传奇而且传统的主题被重新激活，与此同时出现了其他

思想实践，与前者相互交错，动摇前者，有时又与其共同组成一个独特的混合物。我注意到激情与不安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构成新的信念，我也格外关注那些强化冷漠或恼怒情绪的重大事件。我勾勒出国王、其话语特权（根据资料来源）及其威严。我为他一连串的形象和职能进行定位，我隐约看见国王亲手摧毁了臣民们对他的期待，推行臣民们严词抵制的新举措。我发现有时个人要表明自己的个性，而与此同时他的意识却受到宗教和君主制政策的滋扰。

当我看到批判的观点构建起来，在遵命与违抗之中舆论渐渐变得有序时，我努力尝试去理解这些智慧和激情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而有时又消失的。我致力于四散的基本点中，这些基本点塑造了这些观点，而非构建出一种会把时代、断裂和特殊性磨平的秩序。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这一切只会造成混乱，然而仔细思考对思想和行动产生影响的动机，我总结出以下几点：

1. 巴黎人民无比渴求了解他们生活中都发生了些什么，这不仅是思考的习惯也是心理上的要求。城市是一个信息空间，居民们聚集于此是为了更好地认知，为了揭开国王和君主政体所掌控的秘密。公众的好奇心不是性格特点，而是让每个人深入政治的行动。

2. 对于信息的兴趣和与之相应的行为都是城市空间结构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君主政体看来，公众舆论根本就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3. 对公共事物的认知始于对他者的认知，这是城市及其形态迫使每个人都要掌握的。巴黎人在面对邻居时的个人态度与他在面对国家大事时所持的立场紧密相联。其他事物的信息和自己得到的消息，是每时每刻在混乱中存在的一种方式。城市空间塑造着个体，让他们去了解他人，也被识别，这是在动荡环境中觅得一席之地的唯一方式。在这种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不可或缺又难以预料。街区强化了城市认知的形式，而君主制的政策经常试图表现出于与首都相协调的样子。它在市民面前表现，以博得青睐或博得同情。然而，仪式所制造出的效果让人吃惊，人们感觉到的是炫耀卖弄而不是交流。不满足于仪式的公众开始寻找其他的信息来源。

4. 公众生活在——他们自己也知道——真真假假之间，在可能与无从证实之间。君主政体对警方的和政治的操控让他们感到不确定性，使得他们更加渴望知道四散开来而形成强烈反差的消息到底包含着什么。公众舆论并没有被这片泥沼折磨殆尽，相反，它变得更加敏锐也更加有力。

5. 当代人，诸如历史学家们总在思考，各种各样的消息是不是让人民疏远他们的国王。怀着严谨的态度，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个人的观点并非总是紧紧追随着过度膨胀的消息及其内容的。有的时候不要妄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在舆论与消息之间还会夹杂着诸多其他的看法或做法，它们在城市空间内产生新的观点流动。

6. 公众浸淫在信息空间之中，这个空间与其说是真实的，

倒不如说是亦真亦假的。这并不像政治家们总以为的那样，会增强百姓的信心和他们本能的激情。事实上，在这些杂乱而悖动之中有什么事情确实发生了，某种确定无疑且坚决果敢的现象，其实就是知情与评判的权利，是期待让国王揭晓秘密的权利。然后，各种传闻与谣言很自然地滋养着每个人对其闻所未闻的消息和奇闻的胃口，这并不妨碍人们开始有了一种意识，即了解政治是合法的，而且这个要求是必要的。

7. 突然涌现的言论令当局感到害怕。恐惧之情使其在整个 18 世纪都偏离了既定的方向，即组织镇压，增加信息管控机构，令其保卫机构禁止那些针对镇压意志的激烈言论。正是君主制的担忧完成了这了不起的壮举。积攒起来的厚厚的资料彻底反映出君主的担忧，然后勾勒出被君主制大肆追查的舆论的概貌。

8. 或许研究 18 世纪舆论的“现实性”就在于：在自我表达的过程中，男男女女们已然成为或者说构建了现在。他们的表述动摇了确定性，推翻了现状。最重要的是，言论戏弄了事件，同时又偏离了事件，它们创造出了相异性的新形式。

注 释

前 言

1. Gilles Deleuze, *Pourparlers*, Minuit, 1990, chap III, p.119.

2. Nathalie Sarraute, "Conversation et sous-conversation", in *L'Ere du soupçon*, Gallimard, "Folios Essais", pp.83—122.

3. Pascal Quignard, *Albucius*, POL, 1990, p.44.

导 论

1. Jurgen Habermas, *L'Espace public, archéologie de la publicité comme dimension constructive de la société bourgeoise* (德语本 1962 年), Payot, 1986.

2. Keith Baker, "Politique et opinion publique sous l'Ancien Régime", *Annales ESC*, janvier-février 1987, pp.41—47. Sarah Maza, "Le tribunal de la nation: les mémoires judiciaires et l'opinion publiqu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ibid.*, pp.73—90. Mona Ozouf, "Le concept d'opinion publique du XVIII[e] siècle", in *L'Homme régénéré. Essai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Gallimard, 1989, pp.21—53. 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中译本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Ed. du seuil，1990。

3. Philippe Champagne, *Faire l'opinion*, Minuit, 1990, p.41.

4. "Tentons l'expérience", *Annales ESC*, novembre-décembre, 1989, numéro spécia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un tournant critique*, pp.1317—1323.

5. Pierre Charron, *De la sagesse*, 1re éd., Bordeaux, 1601, rééd. dans le corpus des oeuvres de langue française, 1986，转引自 C.Jouhaud, "Révoltes et contestations d'Ancien Régime", in *Histoire de la France. L'Etat et les conflits*（sous la direction d'A. Burguiere et J.Revel）, Ed. du Seuil, 1990, p.71。

6. Luc Boltanski, *L'Amour et la Justice comme compétences*, A.-M. Métailié, 1990, p.54.

第一部分

第一章

1. Jean Buvat, *Journal de la Régence, 1715—1723*, Plon, 1865. Mathieu Marais, *Journal et Mémoires, 1715—1737*, 由 Lescure 公开, Didot, 1863, 4 vol。Edmond-Jean Barbier, *Jouranl historique et anecdotique du règne de Louis XV*, Renouard, 1847, 4 vol.

2. *Gazetins de la police secrete, 1726—1741*,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 archives de la Bastille, ms. 10155—10170.

3. Pierre Rétat (sous la direction de), *L'Attentat de Damiens. Discours sur l'événement du XVIII[e] sièc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1797. Dale Van Kley, *The Damiens Affair and the Unraveling of the Ancien Régime*, 1750—177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rlette Farge, Jacques Revel, *Logiques de la foule. L'affaire des enlèvements d'enfants, 1750*, Hachette, 1989. 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p.cit.*

4. Ch. Carrière, M. Courdurié, F. Rebuffat, *Marseille ville morte. La peste de 1720*, Ed. Maurice Garçon, 1968.

5. Charles Aubertin, *L'Esprit public au XVIII[e] siècle. Etudes sur les mémoires et les correspondances politiques des contemporains, 1715—1789*, Didier, 1873, p.2.

6. Charles Aubertin, *op.cit.*, p.27.

7. 与行刑及其相关规矩有关的内容，可参见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中译本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Gallimard, 1975, 以及 Arlette Farge, *La Vie fragile. Violence, pouvoir et solidarités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Hachette, 1986。

8. *Mémoires du président Hénault*, nouvelle édition corrigée par F. Rousseau, Paris, 1911, p.290, translation du Parlement à Pontoise.

9.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AB 10155—10170，*Gazetins de la police secrète*，这些为警察总监而编写的手写的消息详细地记录了宫廷和巴黎城内日复一日的言论，包括散步场所，沙龙以及咖啡馆里的谈论。这是一部关于公众舆论的日记（1724—1781 年）。

10. 原文“me faufiler”，意为悄然混迹于人群之中。

11. AB 10156，février 1726，f° 70.

12. AB 10156，11 décembre 1726，letter de Verdain.

13. 比如 200 年之后，所有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理解《自由报》的“头版”么？

14. AB 10158，septembre 1728.

第二章

1. Catherine-Laurence Maire，*Les Convulsionnaires de Saint-Médard. Miracles，convulsions et prophéties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Gallimard /Jillard，“Archives ”，1985.

2. AB 10164，juillet 1733.

3. F. Ravaisson-Mollien，*Le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1866—1904*，19 vol.，XIV（1726—1737），letter de Fleury à Hérault du 23 avril 1733.

4. Pierre Rétat（sous la direction de ），*op.cit.*

5. AB 10161, 30 janvier 1732.

6. *Lettres du commissaire Dubuisson au marquis de Caumont, 1735—1741*, A. Rouxel, Paris, avril 1736, letter III.

7.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nouvelle e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Amsterdam, 1782—1783, t. V, *Liseurs de gazettes*.

8.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op.cit.*, t. II, *Nouvellistes*, p.97.

9. *Journal des nouvelles de Paris de 1734 à 1738*,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13694. 不具名的是写给普勒蒂埃（Poulletier），里昂总督的亲笔信合集。有注释认为它们出自贝尔热，伏尔泰的通讯员。事实上，我们不清楚甚至也不认为它们都是写给普勒蒂埃的。其中有些简单的消息没有署名，我们有时也搞不清楚它们到底是写给谁的。

10. AB 10838，f° 155，note de police de l'année 1724.

11. Frantz Funk-Brentano, *Figaro et ses devanciers*,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Paul d'Estée, Hachette, 1909. *Les Nouvellistes*, Hachette 1905.

12. *Chevrier, nouvelliste pamphlétaire*, Bibliothèque national, ms. français 22085.

13. 乌德勒支和阿姆斯特丹的报纸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14. 杜布莱先生掌管着一家机构，巴绍蒙的机构很快就会跟他合伙。

15. AB 12385，registre particulier，Lavely et complices，20

octobre 1770.

16. Christian Jouhaud, *Mazarinades. La Fronde des mots*, Aubier, 1985.

17. AB 11544, nouvellistes de contrebande, 1743—1751.

18. AB 11544, f° 135, note de Maurepas.

19. AB 11544, f° 427, note de l'inspecteur Poussot du 12 janvier 1745.

20. L.S Mercier, *op.cit.*, t. V, *Liseurs de gazettes*.

21. Bibliothèque municipal d'Orléans, fonds manuscrits du lieutenant général de police Lenoir, ms.1422.

22. L.S. Mercier, *op.cit.*, t. II, *Nouvellistes*.

23. *Ibid*.

24. *Lettres du commissaire Dubuisson...*, *op.cit.*, lettre VII, 1735.

25. *Anecdotes galantes et secretes de la Cour de France sous Louis XV*, sans date.

26. Louist-Sébastien Mercier, *op.cit.*, t. II, *Brochures*.

27. 这里所列举的史料主要包括：Daniel Mornet,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15—1787* (1933)（中译达尼埃尔·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 Armand Colin, 1967. Robert Darnton, *Bohèmelittéraire et revolution. Le monde des livres au 18ème sciècle*,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Gallimard/Ed. du Seuil, 1988；*Edition et sédition*, Gallimard, 1991。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p.cit.*

Jean Sgard, *Lumières et lueurs du XVIIIe siècle, 1715—1789. Histoire de France à travers les journaux du temps passé*, l'Arbre Verdoyant, 1986. *Dictionnaire des Journaux, 1600—1789* (sous la direction de J. Sgard), Universitas, 2vol., 1991. 还有 P.Rétat 与 Dale Van Kley 的作品，以及一篇未具名的论文，于 1986 年收录到 Daniel Roche par Myoncheol Jou：*Les Gens du livre embastillés, 1750—1789* 中。

28. Frantz Funk-Brentano, *Figaro...*, *op.cit.*, p.126.

29. 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p.cit.*P.108. 译文参考了译林出版社 2015 年 6 月版，洪庆明译，第 79 页。

30.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op.cit.*, t. IV, *Les Affiches*, p.28.

31.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op.cit.*, t. II, *Liseurs de gasettes.*

32. *Nouvelles ecclésiastiques ou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Constitution Unigenitus*, 1728.

33. Edmond-Jean Barbier, *op.cit.*, t. I, novembre 1731, p.373.

34. Catherine-Laurence Maire, "Agonie religieuse et transfiguration politique de jansénisme", in *Jansénisme et Révolution*, actes du colloque de Versailles des 13—14 octobre 1989, Chroniques de Port-Royal, Bibliothèque de Mazarine, 1990, pp.103—114.

35. 卡特琳—洛朗斯·梅尔正在 J. Revel 的指导下写作一篇题为《旧约象征说与冉森主义》(*Figurisme et jansénisme*) 的论文。她曾于 1991 年 3 月向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提交了一份

关于《教会新闻》的报告（在 J. Revel 的研修班上）。

36. *Nouvelles ecclésiastiques*, *op.cit.*, t. I, 1728—1729—1730, 3[e] éd., Utrecht, *Aux dépens de la Compagnie*, 1735.

37. AB 10158, 16 octobre 1728.

38. Edmond-Jean Barbier, *Journal...*, *op.cit.*, t. I, novembre 1731.

39. AB 10160, 26 octobre 1729.

40. *Nouvelles ecclésiastiques*, *op.cit.*, t. I, 3 décembre 1728, p.245 *sq*.

41. 这种表述出自 Luc Boltanski, *L'Amour et la Justice comme competence*, *op.cit*.

42. *Nouvelles ecclésiastiques*, 28 octobre 1728.

43. *Ibid*.

44. *Ibid.*, *2 avril* 1730.

45. *Ibid*.

46. *Ibid.*, *2 avril* 1730.

47. “总医院由 8 个分院组成：萨比里埃、慈悲医院、比塞特雷、圣埃斯普里、红孩子、西皮翁、圣母街和圣安托万街的两所弃婴院。每年要养活 12000 余人，还不包括近 6000 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在这 12000 人中，在精神病院里有 800 个不信教者，还有差不多 800 个疯子，在比塞特雷医院里住着 700 ~ 800 个不信教者，有健康的也有患病的，还有无数乞讨者”，*Ibid.*, 20 mars 1750。

48. 克里斯托夫 · 德 · 博蒙于 1746 年成为巴黎大主教。

49. *Nouvelles ecclésiastiques*, 9 juillet 1748.

50. *Ibid.*, 7 août, 1749.

51. *Ibid.*, 4 septembre 1749.

52. *Ibid.*, 13 novembre 1751, t. VII, 1751—1755.

53. 埃德蒙—让·巴尔比耶和《教会新闻》对此都有详细的论述。还可参见 Félix Rocquain, *L'Esprit révolutionnaire avant la Révolution, 1715—1789*, Plon, 1878. Jean Egret, *Louis XV et l'opposition parlementaire*, Armand Colin, 1970. Patrice Allio, "Querelle des refus de sacrements Durant le Parlement de Paris, 1749—1759", mémoire de maîtrise, 1988. M. Foisil, P.Chaunu, 摘自 *L'Emoi de l'Histoire*, n° 6—7, 1990, pp.137—153。

第二部分

1. Daniel Roche, *Le Peuple de Paris*, Aubier, 1981.

2. S. Hardy, Mes Loisirs, 1764—1789,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français 6680—6687.

第三章

1. Norbert Elias, *La Société de Cour* (Neuwied & Berlin, 1969), Calmann Lévy, 1974, et Flammarion, 1985, avec la

préface de Roger Chartier.

2. Roger Chartier, préface à la réédition de *La Société de Cour* de Norbert Elias, Flammarion, 1985, p.XXI.

3. S. Hardy, *op.cit.*, 9 novembre 1768.

4. S. Hardy, *op.cit.*, 7 décembre 1770.

5. Chevrier, *Almanach des gens d'esprit*, 1774, 3 vol. t. I, p.297.

6. Jean-Claude Lavie, "les mots enjeu", préface à la réédition de S. Freud, *Le Mot d'esprit et sa relation à l'inconscient*, (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的再版序), Gallimard, rééd. 1988.

7.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op.cit.*

8. Jean Starobinski, *La Remèdedans le mal. Critique et legitimation de l'artifice à l'àge des Lumières*, Gallimard, 1989, chap.II, "Flatterie", pp.61—90.

9. AB 10158, *Gazetins de la police secrète*, octobre 1728.

10. *Ibid.*

11. Catherine-Laurence Maire, *Les Convulsionnaires de Saint-Médard*, *op.cit.*

12. AB10159.

13. AB 10162, 24—25 août 1732.

14. AB 10164, 12 septembr 1733.

15. AB 10164, 2 février 1735.

16. Claudio Melanesi, *Mort apparente, mort imparfaite. Médecins et mentalités au XVIIIe siècle*, Payot, 1991.

17. AB 10161, 24 janjvier 1732.

18. Robert Favre, *La Mort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Ly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1978.

19. AB 10160, 4 septembre 1729.

20. Arlettte Farge, *La Vie fragile*, *op.cit.*

21. AB 10160, 4 septembre 1729.

22. *Ibid.*, 12 septembre 1729.

23. AB 12170, fausse dénonciation de complot. Dossier de P.R. du Touche de la Chaux, garde du roi, 10 janvier 1762.

24. Archives nationales, fonds du procureur Gueulette, AD III 18, arrêt de la Cour du Parlement du 1[er] février 1762.

25. AB 12170, 10 janvier 1762.

第四章

1. Jean Buvat, *Journal de la Régence*, *op.cit.*, avril 1716.

2. Edmond-Jean Barbier, *Journal...*, *op.cit.*, 20 octobre 1726.

3. S. Hardy, *Mes loisirs*, *op.cit.*, 17 juillet 1771.

4. *Ibid.*, 15 mai 1773.

5. Jean Buvat, *Journal de la Régence*, *op.cit.*, 12 décembre 1722.

6. *Nouvelles à la main. Lettres de Paris du 24 mai 1777 au 2 juillet 1779*,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 ms.7083.

7. Jean-Marie Goulemot, "Démons, merveilles et philosophie à l'âge classique", *Annales ESC*, novembre-décembre 1980.

8. Pierre Ricoeur, article "Croyance", in *Encyclopedia universalis.*

9. Steve L. Kaplan, "Religion, Subsistance and Social Control: The Uses of sainte Geneviève", in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XVIII*, hiver 1979—1980, pp.142—168.

10. Abbé Amiet, *Le Culte liturgique de sainte Geneviève*, Ed. De la Ville de Paris, 1984.

11. Nicolas-Toussaint Delamare, *Traité de la police*, Livre II, titre X, *Des processions*, chap.III, "Procession de la châsse de sainte Geneviève".

12. 法国国家图书馆由勒桑（Le Senne）捐赠的书籍中有大量关于圣热娜维耶芙膜拜仪式的资料。其中包括 4° Z Le Senne 14616, *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confrérie des porteurs de sainte Geneviève.* 4° Z Le Senne 11328, *Statuts et règlements de la compagnie des porteurs, 1731, in-4°. 4° Z Le Senne 3009* (15), *Les Antiquités et cérémonies qui s'observent avant et au jour de la descente et procession de la châsse de sainte Geneviève avec les jours et les années qu'elle a été portée depuis 1206 jusqu'à 1725*, in-4°, 8 p.4° Z Le Senne 3009 (13), *Relation de ce qui s'est passé à la découverte de la descente et la procession de la châsse de sainte Genevièreen 1725 et de ce qui a suivi*, Paris, in-4°, 22 p。

13. Archives nationales, K 1014.

14. Edmond-Jean Barbier, *Journal...*, *op.cit.*, t. I, p.221 *sq.*

15. Bachaumont, *Mémoires secrets pour server à l'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n France depuis 1762 jusqu'à nos jours ou Journal d'un observateur*, Londres, Adamson, t. VII, p.182.

16. AB 10167, *Gazetins de la police secrète*, année 1740, journée du 3 mai.

17.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op.cit.*, t. II, L'église Sainte-Genevièvre, p.151.

18. Bachaumont, *Mémoires secrets...*, *op.cit.*, t. III, 15 avril 1770.

19. Paul Ricoeur, article "Croyance", *op.cit.*

20. Robert Mandrou, *Magistrats et sorciers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La fin des bûchers de sorcellerie*, Plon, 1968, p.482.

21. F. Ravaisson-Mollien, *Le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 *op.cit.*, t. XVI, 1749—1757, *Chercheurs de trésors.* 关于这个主题，还有一本很不错的书值得推荐，那就是 Jean-Michel Sallmann, *Chercheurs de trésors et jeteurs de sorts. La quête du surnaturel à Naples au XVIe siècle*, Aubier, 1986。

22. AB 10545，玛丽·盖诺（Marie Guéneau），Gueule d'Amour 之妻，作家，51 岁，因涉及用妖术敛财而获罪，année 1703。

23. AB 10590，妖术与空想，见关于玛丽—玛德莱娜·科隆比埃（Marie-Madeleine du Colombier）的资料，她是 J. Gaillard

的遗孀，1710年3月26日至12月29日因占卜爱情及运势被关押在巴士底狱。

24. AB 10557，戈巴尔·德·曼维尔神甫（Gobart de Mainville prêtre），12 novembre 1705。这位巫师会占星也会算命，声称可以通过召唤神灵来发现财宝。

25. AB 10577，espionnage et sortilèges.

26. AB 11855，trois particuliers se faisant passer pour sorciers，1754.

27.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ms. 4824，f° 377. Examen contre la possession de Landes，1735.

28. 想要活到500岁也很简单，相关的药方由钟表商福尔卡西（Forcassy）提供，见 F. Ravaisson，op.cit.，t. XIV，p.317：每25年服一次长生不老药；居住在远离城市的房子里；房间位于3楼；为了空气流通，开4扇窗户；不养猫狗；从右手腕上抽血；每隔半个月，都有一天只喝汤汁；睡羊毛床垫，身下垫一床羊毛被，身上再盖一床，并在头上戴一顶软帽，睡上3天3夜；温水中沐浴3小时；于是皮肤全都换新了。福尔卡西后来在巴士底狱呆了一个月，他的受害者气急败坏地当庭吞下水银，除了皮肤的碎片，什么都没有留下。

29.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ms.7581，*Recueil*：*Diversité*. A Evreux，1774. 大量文章揭露民众所犯的错误，例如第217页，“民众的错误”。清除民众的错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时至今日，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相关的内容：杰里科玫瑰每年的平

安夜开花；好多人以为大象根本就没有关节，所以只能站着或是倚靠着树睡觉；鸽子没有胆汁；母熊边生小熊边舔着它们；鸵鸟可以消化铁；天鹅临死前会发出悲鸣；蚂蚁啃噬种子尖，以阻止其发芽或是腐烂；人死之后会比活着的时候要沉；犹太人天生就带着一股臭味；年份中有 7、14、21、63（由 7×9 或是 9×7 构成），都是不祥之兆。

30. AB 10156, 30 mars 1726.

31. AB 10156, 18 mai 1726.

32. AB 10159, 31 mai 1729.

33. Lettres du commissaire Dubuisson, *op.cit.*, septembre 1738, lettre XI ; juin 1739, lettre VI, fête pour la paix.

34. S. Hardy, *Mes loisirs*, *op.cit.*, 31 octobre 1768.

35. *Ibid.*, 11 septembre 1770.

36. Steve L. Kaplan, *Le Complot de famine. Histoire d'une remeur du XVIIIe siècle*, Armand Colin, 1982.

37. AB 10167, 23 et 24 septembre 1740.

38. S. Hardy, *Mes loisirs*, *op.cit.*, 23 novembre 1772.

39. Mathieu Marais, *Journal et Mémoire*, *op.cit.*, 11 juin 1723. Affaire du For-l'Evêque.

40.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米歇尔·福柯对于与罪犯和小偷相关的大众文学分析（见 *Surveiller et punir*, *op.cit.*），讲述得十分清楚。

41. 关于这一点，只有通过以下资料才能了解得更清楚：

H. J. Lüsebrink (textes présentés par), *Histoires curieuses et véritables de Cartouche et de Mandarin*, "Bibliothèque Bleue", Montalba, 1984. Patrice Péveri, these en cours 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Louis Flandrin sur Cartouche, texte inédit, "Pour une étude de la pègre parisienne au XVIIIe siècle: le procès de Louis-Dominique Cartouche". Isabelle Foucher, *Deux bandes de voleurs du XVIIIe siècle*, mémoire de DEA,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sous la direction de J. Revel。

42. Bibiothèque de l'Arsenal, ms. 7557, *La Vie de Cartouche*, déclaration de 20 acdusés, f° 9, 2 décembre 1721, récit de Jean-Pierre Balagny.

43.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op.cit.*, p.72.

44.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op.cit.*, t. IX, De la Cour, p.6.

45. *Ibid.*, t. I, *Le Monarque.*

46. Duclos (secrétaire perpétuel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Mémoires secrets sur le règne de Louis XIV*, *La Régence et le règne de Louis XV*, *mémoires édités au XVIIIe siècle* (avec des notes de Voltaire) et réédités en 2 volumes en 1764.

47. AB 10156, juillet 1726.

48.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op.cit.*, t. II, *Les j'ai vu et les je n'ai point vu.*

49. AB 10029, Journal du chevalier de Mouchy, 1744—1748.

50. Paul d'Enstrée, "Un journaliste policier, le chevalier de

Mouchy",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1898, p.195. Frantz Funck-Brentano, *Figaro et ses devanciers*, *op.cit.*, chap.XIV, "Le chevalier de Mouchy". Dossier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AB 11491 (année 1741)；AB 11575 (année 1745) .

51. 听国王忏悔的神父名叫佩鲁索（Pérusseau），是位耶稣会士。此处提到的替代他的菲茨–詹姆斯主教是苏瓦松市的主教，国王的首席指导神甫。Georges Minois, *Le Confesseur du roi. Les directeurs de conscience sous la monarchie*, Fayard, 1988.

52. Edmond-Jean Barbier, *Journal...*, *op.cit.*, t. II, p.406–407, août 1744.

53. AB 11582, affaire du Tanastès, 1745, f° 20.

54. AB 11582, interrogaton du 29 août 1745, f° 20.

55. Yves-Marie Bercé, *Révoltes et revolution dans l'Europe modern*, *XVIe– XVIIIe siècle*, 1980；*Fêtes et révolte. Des mentalités populaires du XVIe au XVIIIIe siècle*, Hachette, 1976. Robert Mandrou, "Vingt ans après, ou une direction de recherches féconde：les révoltes populaires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1969, t. 242, pp.29–40. Georges Rudé, *La Foule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法语译本, Maspero, 1982。Edward 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res, V. Gollancz, 1963. Christian Jouhaud, "Révoltes et contestations d'Ancien Régime", in *Histoire de la France* (sous la direction d'A. Burguière et J. Revel), *l'Etat et les conflits*, Ed. du Seuil, 1990, pp.21–99.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conscience sociale XVIe–XIXe siècle, préface de Jean Nicolas, Maloine, 1985. *Révoltes et société*, 2 tomes, "Histoire au présent",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89.

56. Saint-Simon (duc de), *Mémoires*, "J'ai lu", p.488.

57. Archives nationales, U363, *Recueil de Lisle*, *Conseil secret du Parlement de 1687 à 1774.*

58. Jean Buvat, *Journal de la Régence*, *op.cit.*, t. II, p.40.

59.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Actes royaux*, F 23622 (164–281), pièce 245.

60. Arlette Farge, Jacques Revel, *Logiques de la foule*, *op.cit.*

61. Edgar Faure, *La Banqueroute de Law*, 17 juillet 1720, Gallimard, 1977. Ernest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Le règne de Louis XV*, livre I, chap.II, p.24 *sq*.

62. Mme Dunoyer, *Lettres historiques et galantes*, Paris, 1723.

63. 我们不再引用关于此次暴乱的详细资料，因为笔者在一部专门的著作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Arlette Farge, Jacques Revel, *Logiques de la foule*, *op.cit.*）。

64. Steve L. Kaplan, *Le Complot de famine*, *op.cit.*

65. 关于女性在暴乱中所起的作用，请参见 Arlette Farge, "Evidentes émeutières", in *Histoire des femmes*, vol. III, sous la direction de Natalie Z. Davis et Arlette Farge, Plon, 1991。

66. AB 10155, samedi 25 août 1725, café Détienne.

67. AB 10023–10027，迪瓦尔（Duval）的文件，他是警察

总监的首席秘书。尤其是 AB 10027, année 1725。

68. Métra,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 ou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cours, des sociétés et de la littérature en France depuis la mort de Louis XV*, Londres, 1787. S. Hardy, *Mes Loisirs*, *op.cit.* 泰雷神甫（abbé Terrai）的 *Mémoires*，他是财政总管，与印度公司的某个股东通了 14 封信，并对 1775 年发生在巴黎的暴乱进行了叙述，Londres，1776。Ernest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t. IX, 1re partie, "Louis XVI, 1774—1789". Georges Rudé, "La taxation populaire de mai 1775 à Paris et dans la region parisiene", *Annales de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vril-juin 1956, n°143, p.139 *sq*. Robert Darnton, "Le lieutenant general de police J. P.Lenoir, la guerre des farines et l'approvisionnement de Paris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969, t. XVI, V.P.S. Ljublinski, *La Guerre des Farines.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lutte des classes en Franc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979. 手稿：Archives nationales Y 10558, émeute 3 mai 1775；Archives nationales Y 1279A, archives du commissaire Roland；bibliothèque de l'Aresenal AB 12441—12447；Archives nationales K 1022, n° 25.

69. Métra, *op.cit.*, t. I, p.338.

70. Condorcet, *Oeuvres*, t. V, Paris, 1867, p.101（杜尔哥的生活，写于 1783 年）。

71. Abbé Terrai, *Mémoires*, *op.cit.* 讲述 1775 年 5 月 3 日巴

黎暴乱的历史以及之前和之后所发生的事。

72. S. Hardy, *Mes loisirs*, *op.cit.*, du mercredi 3 mai 1775.

73. AB 12447, Affaire des blés, f° 63.

74. Georges Rudé, "La taxation populaire...", article cité.

第三部分

1. Pierre Rétat (sous la direction de), *L'Attentat de Damiens*, *op.cit.*, chap.8, "Le mobile de Damiens, fanatisme et folie", p.220.

2. Jacques Revel, "Marie-Antoinette", in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ition française* (sous la direction de François Furet et Mona Ozouf), Flammarion, 1988, pp.286—297. Jeans-Marie Goulemont, *Ces livres qu'on ne lit que d'une main. Lecture et lecteur de livres pornographiques du XVIIIe siècle*, Aix-en-Provence, Alinéa, 1991. Robert Darton, *Edition et sedition*, *op.cit.*

3. Pierre Laborie, "Histoire politique et histoire des représentations mentales", *Cahiers de l'IHTP*, n° 18, juin 1991, "Histoire poli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sous la direction de D. Peschanski, M. Pollack, H. Rousso. 这篇文章很清楚地解释了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同时还伴随着 Nicole Loraux 同样重要的回应 "Questions aintiques sur l'opinion. En guise de réponse à P.Laborie", Pierre Laborie, *l'Opinion française sous Vichy*, Ed. Du Seuil, 1990。

4. Arelette Farge, *Le Goût de l'archive*, Ed. du Seuil,

"Librairie du XXe siècle", 1989, p.146.

5.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Joly de Fleury, ms. 2072–2077. Mauvais discours autour de l'affaire Damiens, 1757–1760.

6. Catherine-Laurence Maire, *Les Convulsionnaires de Saint-Médard*, *op.cit.* Robert Darnton, *Edition et sédition*, *op.cit.* Jean-Marie Goulemot, *Ces livres qu'on ne lit que d'une main*, *op.cit.*

7.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献并未完整记录 18 世纪那些最主要的暴动时刻里遭逮捕的"闹事者们"的数量，以及在投毒事件（1679—1682 年）频发时期被火刑法庭怀疑和镇压的人数。

8. 参见保存在阿斯纳图书馆的警方密探的报告，尤其是 Roussel（AB 10028）, Damotte（AB 10123）et Poussot（AB 10139–10141）的报告，1738—1754 年。

9. 保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以 Y 开头的一系列文件中。

10. 回想起来，警察所逮捕的女性比男性要少，因为她们不像是负责人，更多的是民事案件而非刑事案件。

11. Michaël Walzer, *Régicide et Révolution. Le procès de Louis XVI, discours et controversies*, 法语译本, Payot, 1989（原版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第五章

1. AB 10139, 30 mars 1684. Menaces proférées contre le roi.

2. Michaël Walzer, *Régicide et Révolution*, *op.cit.*, p.15.

3. Ernst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 Princeton, 1957（法语译本 *Les Deux Corps du Roi*, Gallimard, 1989）。

4. Recueil Cangé, t. LXIV, in-4°, 1719 ；转引自 A.Babeau, *Les Préambules des ordonnances royal est l'opinion publique*, Picard, 1896, p.23.

5. A. Babeau, *Les Préambules...*, *op.cit.*, p.29.

6.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从 1724 年到 1764 年，有许多人要求国王将他们的家族成员关押起来。这些人绕过普通法院，直接面见国王，要求国王"触碰"他们，并请求国王将侵犯了家族荣誉的有过失的家族成员关押起来，以便让他从他们的眼前消失。可以参见 Arlette Farge, Michel Foucault, *Le Désordre des famillles. Lettres de cachet de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 Gallimard, "Archives", 1982。

7. AB 10419, février 1684. 圣安德雷的玛丽—热娜维耶芙被怀疑不怀好意地接近国王。

8. F. Ravaisson-Mollien, *Le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 *op.cit.*, t. XVIII, p.268.

9. AB 10419, *op.cit.*

10. Receuil Cangé, *op.cit.*, 1722 年流放维勒鲁瓦（Villeroi）元帅的决定之序言。

11. Sarah Maza, "Le tribunal de la nation...", article cité.

12. AB 10363, affaire Nicolas Martin, 1678.

13. AB 10528, dossier de François Henry de Bardy, sieur de Villeclerc, écuyer, mars 1701.

14. Georges Mongrédien, *Mme de Montespan et l'Affaire des poisons*, Hachette, 1953. Frantz-Brentano, *Le Drame des poisons*, Paris, 1899 (rééd. 1928). Dr Masson, *La Sorcellerie et la science des poisons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04. Jean-Claude Petitfils, *L'Affaire des poisons; alchimistes et sorciers sous Louis XIV*, Albin Michel, 1977. Marie-Claude Olivier et Jacques Solé, "Affaire des poisons et mentalité magique", *revue Marseille*, 1973, série 3, n° 95 (actes du 3e colloque *XVIIe siècle*). Arlette Lebigre, *L'Affaire des poisons, 1679—1682*, Complexe, 1989.

15. Robert Mandrou, *Magistrats et sorciers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Plon, 1968.

16. 这些行为尚未被完全挖掘出来，为了更好地认清当时的社会现实，必须借助各类文献资料。大量的文献中都提到这一时期使用毒药的谋杀行径。我们将它们罗列如下并对它们进行研究——请注重它们的史实，而并非出于文学需要而或多或少有些小说性质的文笔。主要资料请参见：AB 10338—10359：这 21 捆资料汇集了所有关于投毒的讯问记录及诉讼案件。法国国家图书馆：克莱朗博文集（*Collection Clairambault*）161—473，警察总监拉雷尼（La Reynie）关于毒药事件的文件。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语手稿 7608：涉及当时的一些秘密诉讼以笔录原件，险些毁于 1709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语手稿 7630：

拉若利（la Joly）的谋杀案。

17. Arlette Lebigre, *L'Affaire des poisons*, *op.cit.*, p.67.

18. F. Ravaisson-Mollien, *Le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 *op.cit.*, t. VI, p.437.

19. AB 10388, 3 octobre 1683.

20. AB 10731，据说卡特琳娜·戈德龙（Catherine Gaudron）"用一个盛满毒药的球状物掷向国王身边的诸位近臣们"。她于1721年4月被关进巴士底狱，她在里面待了太久，以至于人们最终都失去了她的踪迹。

21. AB 12023, année 1758. Fou dangereux, affaire Thorin.

22.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 Arlette Farge, *Le Goût de l'archive*, op.cit., pp.76—77.

23. 关于托兰的故事，还有更为与众不同且更完整的分析，可以参见 Arlette Farge, "La mort du Roi et l'imaginaire collectif, affaire Thorin（visions et crédulité）, 1758", in *Le Père. Métaphore paternelle et fonctions du père：L'interdit, la Filiation, la Transmission*, preface de Marc Augé, Denoël, "L'Espace analytique", pp.325—337。

24. 关于对国王的忠心这一点，可以参见一份有趣的报告，voir l'intéressante communication prononcée au séminaire de J. Revel（EHESS）le 8 mars 1991 par Lisa J. Graham（John Hopkins University）sous le titre "Entre bon discours et mauvais discours：le langage de la fidélité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V". L. J. Grahama 正

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就是 18 世纪的公众舆论，在此，十分感谢她与笔者所做的交流。

25. F. Ravaisson-Mollien, *Le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 *op.cit.*, t. VII, p.349 *sq*.

26. AB 10501, Jacques Vigier, 2 mars 1694.

27. AB 10558, Robert Laurent, 14 octobre 1705.

28. AB 10438, Benjamin Crutz-Crosnier, année 1687.

第六章

1. Bibliothèque de l'Aresenal, ms. 6608, Recueil, f° 107, *La Convalesence du Roy*, 1744.

2. Edmond-Jean Barbier, *Journal...*, *op.cit.*, octobre 1744.

3. F. Ravaisson-Mollien, *Le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 *op.cit.*, vol. XIV. 请注意卷首语："第 14 卷将用于介绍对冉森教派的镇压和对公众思想的监控。这些事件极易被理解，冗长的评论太显多余。"

4. Félix Rocquain, *L'Esprit révolutionnaire avant la Révolution*, *1715—1789*, *op.cit.*, p.115.

5. AB 11547, Modeste Brunet, 23 août 1744, 普索警探的调查和罗驰布吕纳警长的审讯记录。

6. AB 11548, Jean-François Cagnen prêtre, 21 mars 1744.

7. D'Argenson, *Jouranl*, *op.cit.*, t. VI, p.7.

8. D'Argenson, *Jouranl*, *op.cit.*, t. V, p.362.

9. Bernard et Monique Cottret, "Les chansons du mal aimé: raison d'Etat et rumeur publique, 1748–1750", in Mélanges Robert Mandrou. Histoire sociale, sensibilités collectives et mentalités, PUF, 1985, pp.303–315.

10. AB 11658, f° 143, 16 juillet 1748.

11. Edmond-Jean Barbier, *Journal...*, *op.cit.*, décembre 1748.

12. F. Ravaisson-Mollien, *Le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 *op.cit.*, vol. XV, P.446. Affaire du prince Edouard; t. XII, p.300 *sq.*, Affaire des libelles et des 14 vers contre le roi, après l'arrestation de Stuart.

13. F. Ravaisson-Mollien, *Le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 *op.cit.*, vol. XV, p.446.

14. *Ibid.*, t. XII, p.300.

15. AB 11664, dossier du chevalier de Bellerive, 18 avril 1749.

16. Dufort de Cheverny, *Mémoires*, *La Cour de Louis XV*, présentation et notes de Jean-Pierre Guicciardi, Perrin, 1990, p.97.

17. AB 11733, Clément-Jérôme de Rességuier, enseigne aux gardes françaises, 8 décembre 1750.

18. AB 11729, A. Allègre, novembre 1749.

19. *Ibid.*, f° 412.

20.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Joly de Fleury, procureur general au Parlement de Paris, ms. 2072–2077, année 1757 à 1765.

21. *Ibid.*, ms. 2073.

22. *Ibid.*, ms. 2072, 9 juillet 1757, prévôté de Mitry, arrestation de François Lépine.

23. F. Ravaisson-Mollien, *Le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 *op.cit.*, t. XVI, p.443.

24. Fonds J. de Fleury, ms. 2072.

25. *Ibid.*, ms. 2073.

26. *Ibid.*, ms. 2075, 17 février 1770.

27. *Ibid.*, 24 juillet 1762.

28. *Ibid.*, ms. 2077, 14 janvier 1757.

29. AB 11986, Mme Hatte de Vauné, 4 juillet 1758.

30. AB 11989, Mme de Sénac, 26 juillet 1758.

31. AB 11990, Cadot de Condé, 12 février 1758.

32. AB 12002, Moriceau de La Motte, juillet 1758.

33. Edmond-Jean Barbier, *Journal...*, *op.cit.*, p.289.

34. AB 12058, Tavernier, 1759–1789.

35. Michel Antoine, *Louis XV*, Fayard, 1989, p.735.

36. AB 12107, Michel Mitre-Touche, 23 février 1760.

37. AB 12094, Constans, 24 février 1760.

38. F. Ravaisson-Mollien, *Le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 *op.cit.*, vol. XIX, p.210.

39. AB 12164, Jacques Ringuet, 30 septembre 1762.

40. AB 12154, Pierre Dayrivier, 26 novembre 1762.

41. 如果想要了解得更为仔细，可以参见 Charles Aubertin, *L'Esprit public du XVIIIe siècle*, *op.cit.*, *3e épo*que, chap.II, "Mémoires de Bachaumont", pp.373—399。

42. Edmond-Jean Barbier, *Journal...*, *op.cit.*, vol. VIII, p.75.

43. AB 12057, Effer de Sybourg, juillet 1759.

44. AB 13292, Anne Apoline Josèphe Chevalier, femme de Nicolas Renard, 2 janvier 1766.

45. Marc Chassaigne, *Le Procès du chevalier de La Barre*, Paris 1920; Eric Walter, "L'affaire La Barre et le concept d'opinion publique", in *Le Journalisme d'Ancien Régime*, PUL, 1981.

46. Voltaire, *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XII, 16—18.

47. S. Hardy, *Mes loisirs*, *op.cit.*,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Français 6680—6687.

48. *Ibid.*, 29 janvier 1771.

49. *Ibid.*, 1er mars 1772.

50.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不做详细的论述。一方面是因为这一事件本身很出名，另一方面达勒·范克莱（Dale Van Kley）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稍后可以在他的著作中读到有关掌玺大臣莫普改革期间的各种檄文。

51. AB 12433, Louis Laporte, 6 févier 1773.

52. AB 12390, l'abbé d'Iharse, 7 avril 1771.

53. AB 12401, le sieur Lombard, 14 mars 1772.

54. Michel Antoine, *Louis XV*, *op.cit.*, p.595 *sq*.

55. AB 12227, Pauquet, 1[er] février 1764.

56. AB 12351，博蒙院长（Le Prévôt de Beaumont)，1768年11月12日，举报了挨饿现象。直到1789年他才重获自由。他出版了许多煽动性的陈情书，主要控诉那些“垄断小麦的人，正是在他们的逼迫下人们为了不至于饿死才不得不奋起反抗”。

57. Maurice Lever, *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marquis de Sade*, Fayard, 1991. 可参见第16章“Le temps immobile, 1778–1790”，可以找到对萨德的作品及其关押原因的详细说明。

1716年，有人在威尼斯听见了水怪的嚎叫，巴黎人以讹传讹，纷纷议论是土耳其人率领80万大军，乘坐200艘帆船，意欲攻打威尼斯。

1721年，著名大盗卡图什被捕，各种版本的故事传遍巴黎的大街小巷，来描述他曾经的“战绩”和悲惨的结局。

1769年，巴黎盛传教皇暴毙，这个谣言的产生只是因为法国国王宣布了一个活了100岁、名叫勒帕普的士兵的死讯。

法国大革命前夕，流言蜚语充斥巴黎街头巷尾，各个阶层的人都被裹挟其中。法国著名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着眼于普通民众，通过研究当时的日记、警察报告、手抄新闻、回忆录和巴士底狱档案，她发现在18世纪后半叶，巴黎公众已经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对他们的城市所发生的事情表达明确的意见，而政府一方面认为民众不够成熟、冲动或无知，另一方面通过密探系统对于民众的舆论进行严密的监控。在巴士底狱被攻破之前，巴黎的普通民众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变化，进而从崇拜国王转为处死国王？这种精神变化又是如何发生发展，直至深入人心？这正是本书着力阐述和尝试回答的问题。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Fu Lei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由法国驻华大使馆的傅雷出版资助计划资助出版

上架建议：人文社科·历史

ISBN 978-7-5496-2103-3

9 787549 621033 >

定价：55.00元